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基层立项课题优秀成果选编. 2019 / 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编.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20. 9

ISBN 978-7-200-15634-8

I. ①基… II. ①北… ②北… III. ①基层组织—政治工作—北京—2019—文集 IV. ①D6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115706 号

基层立项课题优秀成果选编 2019

JICENG LIXIANG KETI YOUXIU CHENGGUO XUANBIAN 2019

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

编

*

北京出版集团出版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印刷

*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21.25印张 306千字

2020年9月第1版 2020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0-15634-8

定价: 7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基层立项课题优秀成果选编 2019》

编委会

主 编：梁立新

副主编：朱华东

责任编辑：王艳杰 郭新平 张潇文 吕 力

评 委：崔耀中 高 峰 陈之昌 刘 阳

目录 / CONTENTS

提升首都职业院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路径研究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1)
依托首都历史文化资源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北京交通大学 (19)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以东城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为例	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党校 (33)
医院培育志愿服务精神问题的研究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46)
新时代首都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功能任务 ——以顺义区为例的研究	中共北京市顺义区委党校 (60)
金隅集团跨越式发展过程中区域党委组织力建设调查研究	中共北京建筑材料集团总公司委员会党校 (78)
乡村共同体文化与农村养老 ——乡村振兴战略在农村养老文化建构中的经验、问题及对策研究	中央财经大学 (91)
传媒类院校职业道德教育的重难点问题研究 ——以中国传媒大学为例	中国传媒大学 (107)
企业工匠精神的培育研究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29)

- “北京榜样”助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以部分市属高校为例 北京物资学院 (166)
- 引入公益诉讼机制加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问题研究
..... 中国政法大学 (182)
- 新时代视域下传染病医院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养路径探析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204)
- 国有企业工匠精神培育研究
..... 中国工人出版社 (212)
- 首都重大工程建设中农民工党员教育情况调查报告
.....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227)
- 新时代首都乡村文明建设研究
——以怀柔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为例
..... 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党校 (237)
- 首都重点工程建设中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性与创新性研究
.....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48)
-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石景山段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研究
..... 中共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党校 (262)
- 首都国企文化品牌建设研究
..... 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78)
- 划定医院“岗位红线”，强化党风廉政建设
..... 首都儿科研究所 (289)
- 关于加强机构改革进程中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研究
..... 北京市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301)
- 依托门头沟区红色文化资源，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
..... 中共北京市门头沟区委党校 (316)

提升首都职业院校基层党组织 组织力路径研究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基层组织是党的肌体的“神经末梢”，党的十九大将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摆到全党面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看北京首先从政治上看”，讲政治是对北京第一位的要求。因此，深入研究提升首都职业院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课题组对首都职业院校，重点是高职院校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组织力发挥现状进行研究，梳理归纳出其存在的薄弱环节和主要问题，深入剖析原因，多渠道了解掌握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党务工作者、党员群众等提出的对策建议，并结合实际工作探索出一些提升组织力的有效办法、途径和措施。

一、提升首都职业院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

课题组通过购买相关书籍、图书馆查找资料等形式，搜集、整理、归纳与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相关的国家政策、文献、著作、年鉴，并利用互联网、电视、报刊、微博、微信等多种途径收集资料，分析并整合首都职业院校（聚焦高职院校）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资料，通过多次研讨，形成提升职业院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基本观点。

（一）组织力是坚持和落实党的领导、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基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随后，全国组织工作会、全国教育大会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都针对基层党组织提升组织力进行了特别强调和做出具体要求。由此可见，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是其凝聚力、创造力、战斗力的重要来源，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在基层贯彻落实具有重要影响。各级各类基层党组织必须结合实际认真研究，持续贯彻落实，不断夯实党的基层基础。

（二）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职业教育。2014年，国家颁布《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开启职业教育发展新篇章。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高职院校要大规模扩招100万人，改革职业院校办学体制，提高办学质量。同年，教育部实施了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简称“双高计划”），提出建设一批高职学校和专业群，并要求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引领职业教育实现现代化，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提供优质人才资源支撑。北京市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出台了《北京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年）》等文件，开展了北京市特色高水平职业院校的遴选工作，按照“国内一流、国际领先”的标准，势必大力推进职业院校升级发展。这些都给职业院校发展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党是领导一切的，职业院校的基层党组织要引领高职教育发展，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不断提升组织力，为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证。

（三）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是职业院校办出特色的根本保障

我国职业教育起步较晚，目前处于由外延式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变时期。和普通高等院校相比，年轻的职业院校在发展过程中对教育教学、人才培养、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都缺乏比较成熟的经验，制度体系建设不够完善。职业院校党建工作普遍存在向基层传导层层递减现象，基层党组织功能弱化。职业教育教学规律的特殊性和新形势下生源类型的复杂性，又为其加强基层党建提出了更多要求，各项建设任务更加紧迫艰巨。进入新时代新阶段，职业院校要想办出特色，就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提升组织力，使基层党组织成为引领、推动、保障职业院校特色发展的核心。因此，需要有针对性地破解职业院校党组织在发挥组织力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难题，有效提升政治领导力、群众凝聚力、发展推动力等组织力，从而更好地搭建起基层党组织的“四梁八柱”，使其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二、首都职业院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发挥现状

课题组采用问卷调查、深度调研和座谈等方式对首都职业院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发挥现状进行了全面了解和归纳梳理。在理论研究基础上，经过多次研究讨论，设计了校内外两种调查问卷，在校内和京内高职院校开展了抽样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500 余份，校内覆盖所有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和党支部，校外包含 16 所高职院校。运用问卷统计分析软件对问卷进行了汇总、分类和分析，梳理归纳出了首都职业院校基层党组织在发挥组织力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关键问题和薄弱环节。同时，课题组还共同研究、设计了访谈提纲，与调查问卷形成互补。课题组成员以听取汇报、谈话、查阅材料等方式，深入到校内所有党总支（直属党支部）进行实地走访。针对其他高职院校，课题组成员克服放假和日常工作繁忙等困难，采用灵活的方式进行访谈，利用全市组工干部培训的契机访谈了 3 所高职院校的组织部副部长，通过电话、微信语

音的形式访谈了5所高职院校的党务干部，邀请4所高职院校的10名党务干部填写了访谈提纲等。此外，在学校内组织不同群体的座谈会和专题研讨会3次。

（一）政治领导力方面：党的政治建设摆在了首位、落到了基层，“双带头人”教师队伍培育机制初步建立

98.34%的同志认为其所在的党支部非常和比较重视将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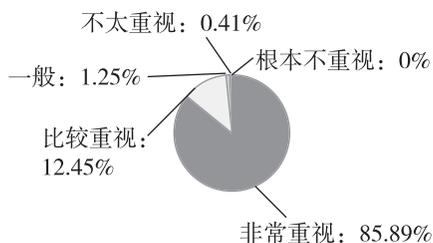


图1

在制度执行力度方面，95.45%的同志认为学校和二级学院落实《关于坚持和完善北京普通高等学校院（系）党组织会议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的指导意见》的相近及配套文件在执行过程中很到位及比较到位（见图2）；在制度执行效果方面，98.18%的同志认为学校和二级学院落实《关于坚持和完善北京普通高等学校院（系）党组织会议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的指导意见》的相近及配套文件执行效果很好及较好（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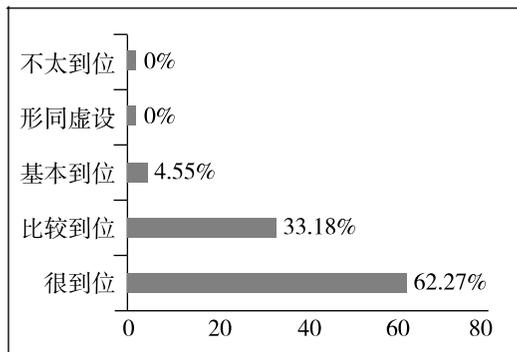


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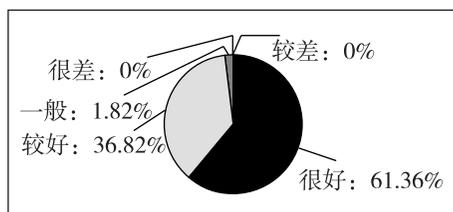


图3

党员同志认为在“双带头人”培育工作采取的措施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建立“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参与所在单位工作规划、干部人事、年度考核等重要事项讨论决策机制，其后为“双带头人”优先被推荐参加各级党务培训和业务培训，排在后面的是将“双带头人”的党务工作计入工作量，享受相应的津贴补贴待遇和将“双带头人”作为提职晋级、评奖评优等事项的重要考量因素。

通过调查我们也发现，各基层党组织普遍缺乏二级学院党组织在有关重大问题上把好政治关的具体办法。

（二）组织覆盖力方面：适应职业教育特点的功能性党组织正在探索建设中

只有 57.26% 的学校在学生顶岗实习、教师下企业实践、重大改革项目等团队中设立了或部分设立了临时或功能型党组织（见图 4）。由此可见，基层党组织尚未实现全覆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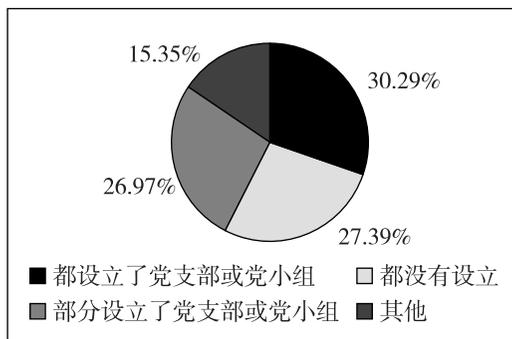


图4

（三）群众凝聚力方面：党组织宣传、组织、凝聚、服务师生群众的效果显现

94.61%的同志认为其所在的党支部凝聚力很强及较强（见图5）；党员认为其所在的党支部及其上一级党组织关心关爱困难党员群众的内容首先是解决思想问题，其次是解决工作困惑，再次是解决家庭实际困难，最后是解决生活需要（见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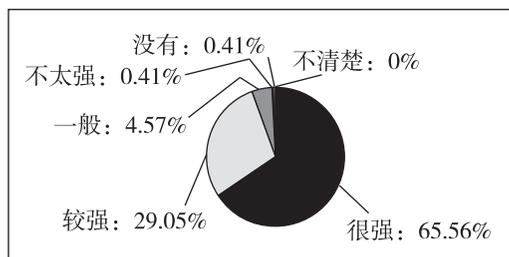


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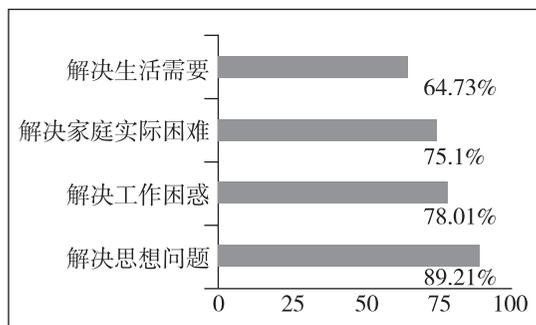


图6

（四）社会号召力方面：党组织带动群团建设和在校企合作中发挥作用初见成效

67.22%的同志其所在学校已建立起党组织带动工会、学会等群众组织共建共享的机制，还有13.28%的学校虽尚未建立，但正在谋划中（见图7）；56.43%的党员认为其所在党支部在校企合作中发挥的是协同配合的作用，32.37%的党员认为发挥了引领主导的作用，选择没有参与和不清楚的占11.2%（见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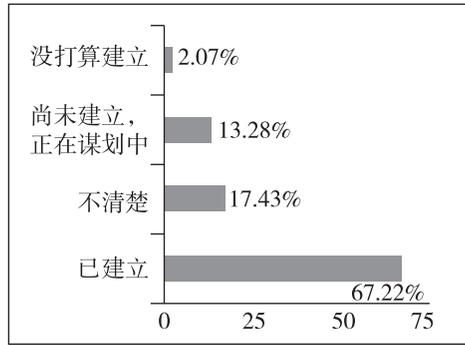


图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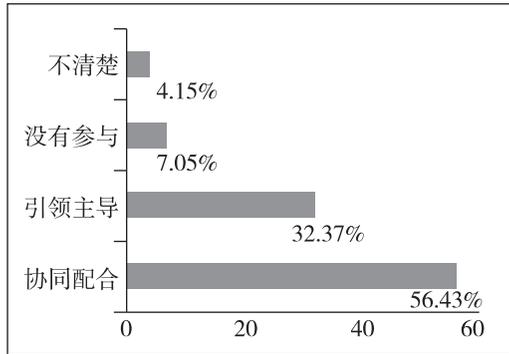


图 8

(五) 发展推动力方面：党组织成为推动职教改革的坚强堡垒

96.26%的同志认为其所在的党支部在引领教师（教职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发挥了非常好和比较好的作用（见图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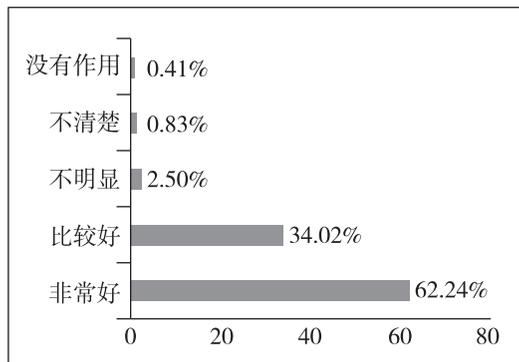


图 9

91.7%的同志认为在推动学校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其所在的党支部起到了非常大和比较大的促进作用（见图10）；88.8%的同志认为其所在的党支部在学校攻坚克难时期发挥了凝聚人心的作用，85.06%的同志认为发挥了勇挑重任的作用，71.78%的同志认为发挥了承担责任的作用，69.29%的同志认为发挥了整合资源的作用，66.39%的同志认为发挥了解决矛盾的作用，59.34%的同志认为发挥了民主决策的作用（见图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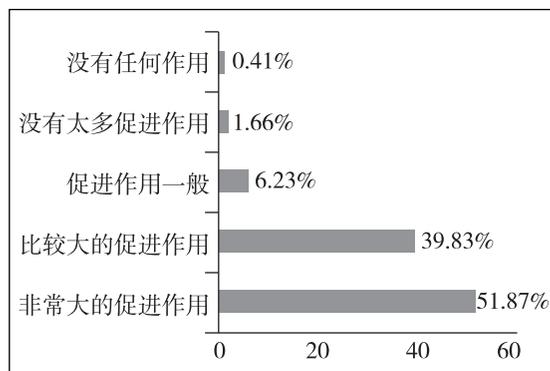


图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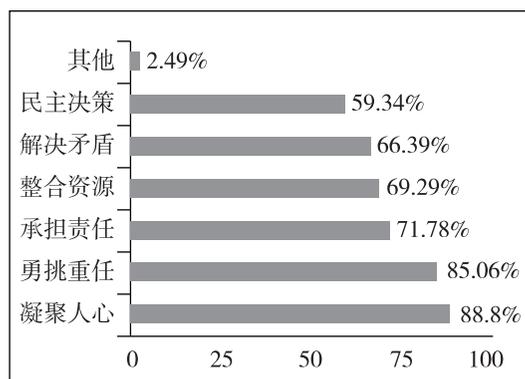


图11

60.17%的同志认为其所在学校党员在改革发展中当先锋不存在思想顾虑（见图12），22.41%的同志认为其所在学校党员在改革发展中当先锋存在思想顾虑；90.04%的同志认为其所在学校党员能够发挥出

先锋模范作用（见图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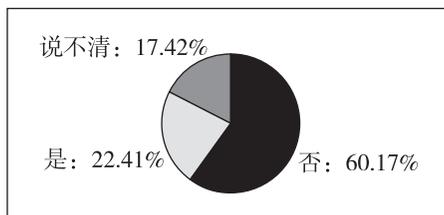


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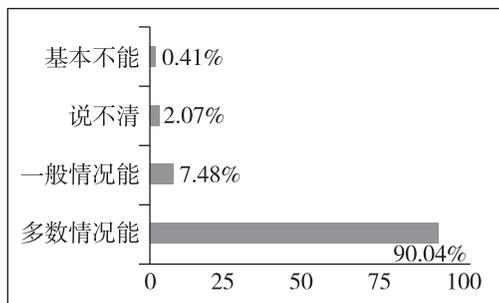


图 13

（六）自我革新力方面：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不断增强

97.92%的同志认为其所在党支部党员的整体素质很高和较高；在党支部书记履职方面，党员同志普遍认为其所在党支部的书记党务工作业务比较熟练，责任心较强，群众认可度较高，党务工作效果较好。

在党支部规范化建设方面，90.87%的同志认为其所在的党支部支委会班子成员齐全，分工明确、凝聚力强，90.04%的同志认为支部能够认真执行“三会一课”，88.8%的同志认为党支部设置规范，结构清晰，88.38%的同志认为支部工作记录及时、完整、规范，84.65%的同志认为重大事项均经过支委会或支部全体党员大会讨论通过，79.25%的同志认为支部制度健全且落实到位，77.18%的同志认为支部每月固定一天开展组织生活（见图 14）。党员认为最满意的 3 项支部工作依次是：组织生活，主题党日活动，换届、党费收缴、组织关系接转等基础

工作；50.62%的同志认为其所在的党支部已经将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44.4%的同志认为只是部分完成了转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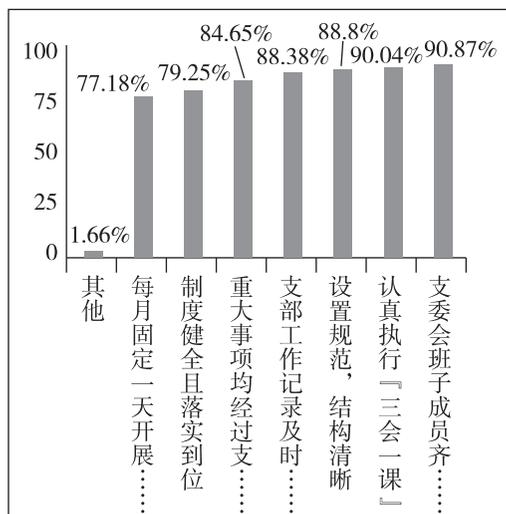


图 14

97.93%的同志认为其所在党支部开展活动的主要方式是专题理论学习，89.21%的同志认为是观看相关影片、录像，79.67%的同志认为是实地参观走访，77.18%的同志认为是讨论业务相关问题，58.92%的同志认为是志愿服务，41.91%的同志认为是结对共建（见图15）。79.67%的同志所在的党支部会在1个月内开展一次全体党员集中教育活动，18.26%的同志所在的党支部会在1~3个月内开展一次全体党员集中教育活动（见图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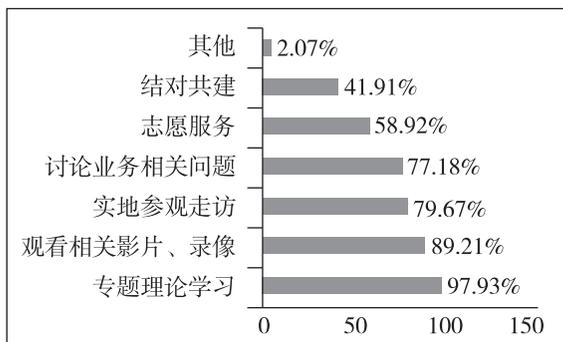


图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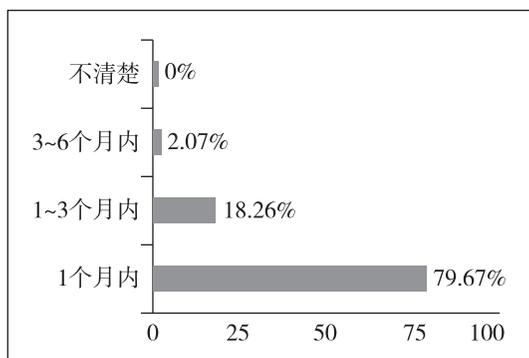


图 16

三、首都职业院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发挥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课题组对调研结果进行综合归纳，总结提炼出职业院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发挥存在的主要问题。立足首都职业院校，从历史沿革、体制机制、教育教学规律、“双师型”教师群体及高素质技术技能型学生特点等方面，剖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查找根源。

（一）党组织政治领导力的落地机制不够完善

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领导力，要求高校认真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分工合作、协调运行工作机制，确保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绝大多数首都职业院校办学时间短，很多由几所中职、职高、职工大学等不同性质的学校合并而成。其党组织在政治领导力方面仍存在薄弱环节：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不够强，把握各项工作的政治方向，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还有差距；制度建设也存在短板，部分二级党组织照搬上级制度，缺乏可操作性；院（系）党组织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落实力度不够，监督检查机制不完善；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措施实施效果不明显，受历史和教师自身原因，很难达到上级的比例要求；党务工作队伍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设置不够合理，能力不平衡，积极性没有得到有效发挥等。

（二）契合职教改革的党组织设置不够健全

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覆盖力，要求推动党的组织有效嵌入各类基层组织，党的工作有效覆盖各类群体。目前，职业院校党组织的基础性或常态化设置符合基层党组织的设置原则和构架。按照“与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机构相对应设置党支部”的原则，教学单位党组织所属教师党支部按系（教研室）设置，所属学生党支部按学院设置，机关党组织所属党支部按机构（单位）设置。但是，随着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特别是《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了“职业教育基本完成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变，由追求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转变，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目前，职业院校适应职业教育教学特点和针对一些专项工作和活动的创新组织设置明显不够全面，比如，在下企业实践教师、顶岗实习学生等特殊群体中建立党组织，在技能大赛、重大活动等专门工作中建立党组织，在学生宿舍、合作企业等重点地带建立党组织等。

（三）党组织发挥凝聚力作用不够到位

提升基层党组织群众凝聚力，要求基层党组织深深植根于社会基层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之中，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组织引领群众听党话、跟党走。由于发展时间较短和多校合并的历史原因，多数职业院校在发展中要经历更为复杂和艰难的融合过程，基层党组织在团结师生群众，凝聚人心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党组织的影响力和党员的威信度还不够强；对党员的管理还存在宽松软的现象，影响了群众对党组织的满意度；有时不能旗帜鲜明地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做好群众的教育引导工作；党组织关心关爱群众还存在不够及时、广泛的问题，仍缺乏化解矛盾的勇气和行之有效的办法，慰问帮扶困难群众的力度不足、方式方法值得商榷、效果不明显；部分党员欠缺主动做群众工作的意识和担当精神，未能很好地维护群众

的利益。

（四）党组织社会号召力的方法手段不够丰富

提升基层党组织社会号召力，要求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组织优势、组织力量、组织功能，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工作。随着职业教育步入快速发展阶段，校企合作不断深化，根据“双师型”教师下企业实践，学生实践，教学多、理论功底浅等特点，要求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方式方法也要随之调整，要探索出学校与企业结合的模式，不仅是业务能力上的共同培养，更要在育人上深度合作，探索共建党组织，共同培养“双师型”教师以及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方式方法。另外，高职院校普遍是三年大专学制，学生党员人数少，基层党组织更多的党建工作责任就落在了积极宣传党的正确主张，培养和带动入党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上。职教改革的新形势对学生党建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探索完善职业院校学生党员的培养、教育、管理手段和方法。同时，党组织领导下的群团带动机制不健全。职业院校普遍有党建带团建制度，但随着高校共青团改革的深入推进，新形势下党建带团建工作机制的修改完善还在探索中。除此之外，部分学校的党建带动工会、学术组织等群众组织的制度仍是空白。

（五）党组织服务大局、推进工作的动力不够充足

提升基层党组织发展推动力，要求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资源转化为推动发展资源、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发展优势、组织活力转化为推动发展活力。职业教育已进入升级发展的新时代，北京市更是对职业院校提出了更高标准。通过调研发现，基层党组织中党建和业务“两张皮”现象依然存在，习惯于把工作重点放在教学科研、业务提升上，党建工作还没能发挥应有的引领带动作用。如何创新观念，提高党员的党建工作意识，使党建工作与学校建设工作合力合拍；如何创新工作思路，不断丰富党建工作的形式、载体，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增加党建工作的活力和吸引力，真正起到凝心聚力的作用；如何创新工作机制，加强

工作研究，建设好专家型党建工作队伍；如何创新党建内容，以学校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结合党员群众思想实际，来确定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工作内容和实现目标，切实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这些都要求基层党组织要主动予以探索。

（六）党组织自我革新的意识不够强

提升基层党组织自我革新力，要求以正视问题的自觉、改革创新的精神，着力解决自身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推动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一直以来，职业院校各级党组织坚持问题导向，认真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始终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不过，仍有一些难题急需破解。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还未达到要求，对照党章、党规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核心作用还未充分发挥；党组织组织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还不够强，必须不断进行修正和整改；对软弱涣散党支部整顿力度不够、抓紧整改不实；在推动基层党组织活动载体、工作方式、运行机制等方面缺乏创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还没能形成常态，良好的政治生态还需要进一步建构。

四、提升首都职业院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主要路径

按照课题方案，课题组在校内开展了“党支部工作法”案例征集评选活动，共征集了40多个党支部工作案例，选取了一部分基层党组织作为典型研究案例，并结合调研、访谈中了解到的其他院校的优秀经验，探索出一些提升组织力的办法、途径和措施。

（一）加强顶层设计，深入提升政治领导力

结合实际，强化党建的顶层设计，研究完善基层党建工作制度体系，深入发挥政治优势和核心作用，以制度的约束力保护和激活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分工合作、权责清晰明确

的决策机制。建立广泛听取意见、相互尊重支持的沟通机制。书记和校长坚持每周至少沟通一次，集体决定重大事项前，书记、校长和有关领导班子成员进行个别酝酿、充分沟通。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既民主又集中的运行机制。尽快出台符合职业院校党组织特点的加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的实施细则。

完善二级学院党政联席会议事规则。进一步明确涉及办学方向、教师队伍建设和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等重大事项，由二级学院党委（总支）先研究后再提交党政联席会议决定。健全院（系）党组织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监督检查机制，充分发挥纪检监察部门监督作用，明确评价标准，定期对院（系）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及时发现问题，纠正偏差。

探索“靶向提升”等多层次多维度培训体系，促进党组织书记素质全面均衡提高。实施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工程，着力解决体制机制不断健全问题。按照政治素养、政治标准加强党组织负责人的培育培养；发挥基层党组织在评聘、评奖、考核等方面的把关作用，严把师德关和政治关。

（二）推动同频共振，全面提升组织覆盖力

在应建尽建基础上，结合职教改革的新情况新特点及时调整设置方式，有力推进党组织设置创新，使其有效覆盖各领域各群体，形成严密完善、坚强有力的组织体系。注重在技能大赛、顶岗实习、志愿服务、重大活动等特殊时期建立临时党组织，注重在高知群体、青年人才中以及校企合作、集中培训、下企业实践、“特高校”建设等专项工作中建立功能型党组织，强调在宿舍、社团等集中场所建立临时性或功能型党组织。建立“以党员为核心、以发展对象和入党积极分子为骨干、以共青团员为生力军”的志愿服务队伍。实施“社团振兴工程”。在社团组织探索建立党支部，在“社团+专业竞赛”“社团+创新创业”“社团+实践课程”“社团+志愿服务”“社团+特色活动”中扩大党的影响力。打造创客中心，集聚创新创业人才，探索在学生创客团队、孵化企业中建立党组织，扩大党的覆盖面。努力探索将党的触角向最具活跃度、最

有增长点、最富发展力的组织延伸，将党建工作融入教学、科研、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服务等各方面，实现党的建设与业务发展“同频共振”。

（三）开展结对服务，广泛提升群众凝聚力

在校内，建立联系服务基层制度。班子成员每人联系1~2个基层党组织、民主党派支部和教师入党积极分子、党外代表人士、知名专家，使基层党组织真正成为群众的“领路人”和“主心骨”。推行党员“政治生日”制度。通过赠送政治生日卡等形式，为当月入党的党员过“政治生日”。推行党员固定主题党日活动制度，固定每月第二周周五下午为全校统一活动时间。健全党内激励关怀帮扶制度。设立党内表彰、党员活动、党内慰问等专项资金。党组织平时注意了解群众的工作生活情况、思想状况和心理状态，积极组织带领群众参加党组织学习参观、实践服务等活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要把解决实际问题作为最终落脚点，并同解决思想问题结合起来，对家庭生活困难、身心健康存在问题等有特殊情况的群众提供精准帮扶，确保帮扶及时有效。

在校外，通过党员回社区报到，与贫困地区或低收入村结对帮扶，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方式，提升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对社会的贡献度和服务能力。

（四）深化校企合作，大力提升社会号召力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职业院校应当根据自身特点和人才培养需要，主动与具备条件的企业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就业创业、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方面开展合作。厚植企业承担职业教育责任的社会环境，推动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面对新的改革发展，职业院校要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引领校企合作发展，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沟通协商机制、宣传带动机制、参与决策机制。可借鉴特色品牌活动，建设“结对共建 育人同行”活动升级版。充分发挥党建带群团学组织作用，从单纯党组织结对共建升级为党团工学各级组织与副中心、雄安新区等属地政府、企业、社区等结对共建；共建内容

升级为服务国家战略、区域发展、校企合作、社区教育和终身学习等，为校企全面深度合作、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提供组织保障。

要按照党的要求行动，将党组织的触角延伸到具体的合作目标、内容、方式等方面，引导基层党组织在“课程思政”建设的途径、方法和载体上不断创新，通过示范课堂、评优选先等形式，努力形成典型经验和课程示范，让“课程思政”真落地，让素养教育见实效，对企业产生重要影响，彰显党的强大组织优势。

（五）借势职教改革，着重提升发展推动力

当前，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政策支持力度是空前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处于最好的时代。特别是北京市开展的特色高水平职业院校遴选，正大力推进首都职业院校升级发展。入选“特高校”的职业院校抓住建设契机，未入选的职业院校参照标准加速建设，都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强化创新意识，克服因循守旧的思想障碍，争当改革先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合力。要加强党组织规范化建设，调动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党组织活力，推动党组织活动载体、工作方式、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工作创新、制度创新，通过“标杆院系”“样板党支部”建设，培育一批起到先进带动作用的党组织；通过“优秀案例”和“优秀工作法”评选，探索形成一批可推广、可复制、可借鉴的优秀经验和典型做法；通过定期评选“优秀党员、党务工作者”，形成一批先进的带动者，树立正风正气，讴歌先进典型好声音，唱响好人好事主旋律，使党组织更好地融入中心工作，将党组织的组织资源转化为推动发展资源、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发展优势、组织活力转化为推动发展活力。

（六）强化团队学习，稳步提升自我革新力

通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主题教育促使广大党员以自我革命的勇气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努力建设一支信念坚定、素质优良、规模适度、结构合理、纪律严明、作用突出的党员队伍；要严肃党内政治

生活，严格执行“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谈心谈话、民主评议党员等组织生活基本制度，把组织生活作为查找和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大力开展优秀案例评选活动，不断增强党内生活“四性”；将软弱涣散党支部与先进基层党组织结对，持续抓好整改工作；积极运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加强基层党建，创新活动方式，使党组织活动更好地融入中心工作、融入党员需求、融入群众关切；基层党组织结合工作实际，及时认真查找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揭短亮丑，红脸出汗成常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科学构建定性评价与定量考核相结合的党建考评体系；着力构建人力、财力、物力全方位的党建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干部人才培育机制、阵地建设保障机制、经费保障机制、工作调度机制、创新激励机制等，不断加大对基层党建工作的保障力度。

课题负责人：高 东

课题组成员：贾 琼 张金英 林玲玲

武 飞 兰丽丽 胡丽霞

依托首都历史文化资源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北京交通大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离不开历史文化精神的继承与发展。首都历史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记忆留存，是民族文化认同的根本与维系民族精神的纽带。依托首都历史文化资源，弘扬历史文化精神，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由之路。

一、首都历史文化资源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

历史文化资源指的是“人类社会生活过程中的遗存，这种遗存可以为人类现在及今后的社会生活所利用。在这个瑰丽的宝库中，有大量的实物遗存和文字遗存。在实物遗存中，包括历史文物、历史遗址或文化遗址及墓葬等。文字遗存，是在陶、骨、金属、竹、木、石、帛、纸等载体上面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人类社会生活”。首都北京拥有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其中包括古人类及考古遗迹、帝都时代的宫殿园林与城市建筑、古代交通驿站系统的遗存、军事设施与战争纪念地、名人故居、近现代革命史迹等。首都历史文化资源内涵丰富、功能独特，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富强民主文明生活的物质遗存，凝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所形成的精神文化，是优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资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良好的

载体与平台。

（一）首都历史文化资源蕴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理念

1. 首都历史文化资源蕴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

中国作为长期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历代有为的统治者，致力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历代有识之士，积极谋求经济发展、民富国强，为涵养“富强”的价值目标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古代政治思想中的民为邦本、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民本思想，可以为涵养“民主”价值目标服务。中国作为礼仪之邦，重德厚礼的历史传统源远流长，以北京孔庙、国子监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建筑群，为涵养“文明”的价值目标提供了文化底蕴。此外，许多历史文化遗迹体现了和谐有序的社会体征观念，如体现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颐和园，显示左右文武平衡、主辅和谐社会整体观念的北京城中轴线，为涵养“和谐”的价值目标提供了文化支撑。

2. 首都历史文化资源蕴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

近现代历史文化资源具有中外文化融合的特色，特别是近代新文化运动时期自由主义传统的形成与发展，有利于引领“自由”的价值取向。近代新式教育的兴起，教育受众愈来愈多，诸多教育机构如原辅仁大学、原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等培养的新思想的民众，对于平等思想的提倡，有助于“平等”的价值取向的倡导与传播。中华历史文化中“崇正义”的文化传统，圆明园遗址的残垣断壁，诉说着中华民族为抵御外辱、坚持正义所做出的努力，这都为涵养“公正”价值取向提供了思想资源。“法治”是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中国近代法治的转型，为涵养“法治”的价值取向提供了历史借鉴。

3. 首都历史文化资源蕴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

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留下的诸多作战遗迹，如北京焦庄户地道战遗迹等，展现了中国军民团结一心共同抗日、保家卫国的历史场景，有利于宣扬“爱国”的价值准则。首都民俗文化中对于中华传统美德的

推崇，有利于宣扬“敬业”的价值准则。首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老字号的“诚信”经营方式、“鸡黍之约”的文化思想等，都为宣扬“诚信”提供了丰富资源。与人为善是中华传统美德之一，《管子》中说“善人者，人亦善之”，传统文化中“性善、仁政、忠、惠、宽、敏、敬”等个人的修身养性文化，有利于宣扬“友善”的价值准则。

（二）首都历史文化资源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从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战略高度，持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作为一项根本任务，切实抓紧抓好。”首都历史文化资源所蕴含的丰富深刻的精神和教育价值，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首都历史文化资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文化根基

首都历史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的物质呈现。历史文化连接着过去、启示着现实、昭示着未来，是新时代民族精神不断发展创新的文化基础。首都历史文化资源所拥有的多种多样的表现形态与丰富多彩的思想内涵，鲜明地诠释着历代先进的中国人探索国家出路、寻求人民富强的艰苦历程，是凝练和展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源泉。广大党员群众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体力量，只有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熏陶下，才能更加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进而培养爱党、爱人民、爱祖国的深厚情感，从而树立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伟大梦想、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的崇高志向！

2. 首都历史文化资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参与基础

广大党员群众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力量。首都

历史文化资源大多是中国自古以来集体观念、集体思想与集体智慧的情感表达，作为优质的思想教育资源，具有感知性、现实性与渗透性的特点，对于新时代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价值观念具有直接的教育作用。首都历史文化资源多以遗址、遗迹、实物、图片与影像等为传播载体，向广大党员群众传递着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的优秀精神品质和崇高的理想信念。通过开展调研考察、撰写报告、志愿服务等形式，激发广大党员群众学习和研究历史文化资源的热情与志向，进而提升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效性。

3. 首都历史文化资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拓宽了实践载体

首都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多样，相互融合，包含古今史迹，特色鲜明，蕴含着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因素，涵养着道德品质、价值理念、理想志向、进步思想等积极因素，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仁人志士的奋斗经历、革命精神和思想成果，展现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进程，孕育着价值观自信和道路自信的正能量，这些历史文化资源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道德观教育的重要载体。

二、近年来北京市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经验及存在问题

首都历史文化资源是北京独具特色的宝贵资源优势，是提升北京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的重要文化支撑。近年来，北京市十分重视保护和利用历史文化资源，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与突破，同时也存在一些尚需进一步改善与加强的问题。

（一）北京市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宝贵经验

1. 重视程度不断提升，科学规划不断优化

中共北京市委发布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施

意见》明确指出：“利用北京文源深、文脉广、文气足、文运盛的优势，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①北京市在保护历史文化资源方面的意识越来越强，对于历史文化资源的利用成效也越来越显著。“中轴线文化”“运河文化”“永定河文化”等文化观念广泛传播，相应的历史文化资源得以保护和利用。同时，为增强首都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科学性，近年来北京市相继制订相关规划，如《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等。这些历史文化品牌的诞生与整体科学规划的推进，为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复兴提供了新的契机，也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提供了良好的素材与载体。

2. 人文特征日益凸显，文化产业不断推进

首都北京拥有众多的历史文化遗存，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与北京的古都风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之间的联系日益凸显，并被充分挖掘与利用起来，初步形成历史文化品牌带动区域产业发展的趋势。丰台区依托卢沟桥、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门头沟区依托古村落发展休闲旅游文化产业，通州区依托古老的运河文化规划新城核心区，等等。北京此类文化产业和保护实践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北京历史文化中心的内涵，这些都将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源泉。

3. 文化浸润日成风气，社会活动日益广泛

首都历史文化资源之中，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故宫、颐和园、天坛、八达岭长城和明十三陵等所产生和带来的文化氛围已浸润到首都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并日渐形成正能量的风气。今年新挖掘的历史文化资源——香山革命纪念馆和双清别墅，成为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新课堂和新场所。双清别墅是见证中国革命史

^① 中共北京市委.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施意见 [N]. 北京日报, 2014-05-26.

的圣地，筹建新中国的革命摇篮。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香山共同指挥了渡江战役和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进程，筹备召开了新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见证了“红色进京路”的峥嵘岁月，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革命从农村走向城市，印证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当前，全党上下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教育活动中，广大党员通过参观香山革命纪念馆和双清别墅了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奋斗的革命历程，思想上受到洗礼，精神上得到振奋，进一步增强了香山历史文化资源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

（二）北京市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的问题

1. 学术支撑与学术底蕴需进一步加强

近年来，学术界对北京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研究比较充分，但对其深刻的文化内涵与学术底蕴的理解与阐释不够。许多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价值判定，主要集中在其旅游开发方面，如故宫、天安门、颐和园、天坛、十三陵等是北京旅游产业的重要支柱。固然，独特的首都历史文化遗迹和风貌，是北京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首都历史文化资源并不完全等同于旅游资源，不仅仅是审美的景观，其真正的文化价值在于传承首都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是一个城市、民族与国家变迁、沿革与发展的历史见证。进一步深化与加强首都历史文化资源的学术滋养，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

2. 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需进一步提升

一些新开发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者们比较注重开发有形价值，忽略提升资源本身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一定程度上并没有起到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正向引导的作用。例如对南锣鼓巷胡同文化的开发利用，虽然已经打造出来了品牌文化，但是人们走进南锣鼓巷胡同并没有真切感受到“京味”文化，只是体会到热闹的商业文化，一定程度上也没有真正起到发挥首都历史文化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因而在进行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过程中，不应只

注重经济利益，更要重视文化和社会效应，进一步提升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真正凸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指引作用。

3. 知识性、文化性与思想性、观念性的有机结合需进一步加强

近年，随着经济和文化资源开发的持续升温，许多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虽然打出了文化与思想的招牌，但也仅仅是利用文物古迹做背景和依托，其文化内涵并未得到提升。如永定河的水景规划，一定程度上将其变成了带状盆景，一方面破坏了其古朴自然的原始风貌和河流生态；另一方面永定河作为“北京母亲河”所体现的文化性与思想性，并未完全提炼和表现出来。同时，永定河所蕴含的抗战的红色文化，也有待进一步挖掘。首都不同类型的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状况呈现不平衡的状态，对其文化性与思想性有机结合的认识需进一步加强。一些名人故居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的活动遗迹，在旧城改造过程中被遗忘或拆除，而这些正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好素材。再如，北京拥有历史文化悠久的山川河流，兼具自然、知识与文化多重魅力，但利用过程中往往忽略其人文资源的价值。云蒙山的鬼谷子传说、雾灵山的刘伯温事迹等，未系统加工整理成宣传的文字材料，进而削弱了首都历史文化资源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

三、依托首都历史文化资源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与策略

首都北京是国家历史文化资源的集中地，亦是历史文化教育传播的引领者，理应充分发挥首都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优势，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示范作用。

（一）创新传播方式，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方式“活”起来

第一，传统式拓展，扩大宣传途径。传播首都历史文化资源，有利于首都文化传承，有利于陶冶人民群众的心灵，更有利于提升首都的文化软实力。宣传首都历史文化资源，可以从阅读、视听等多角度多途径

着手。其一，编撰图文并茂的首都历史文化资源普及读物或丛书，扩大受众范围。其二，绘制翔实的首都历史文化资源手册，作为旅游参观调研的宣传赠品，拓宽宣传渠道。其三，创建首都历史文化资源公众号，分主题制作微视频，充分利用新媒体。此外，为了更好地发挥首都历史文化资源的宣传作用，不断增强宣传教育的吸引力与感染力，需要不断创新历史文化资源的讲解方式。在充分利用传统讲解方式的同时，可以大胆创新采用唱歌、相声、快板等艺术表现形式进行讲解，采用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语言”讲解“中国故事”，让广大人民群众在艺术熏陶中接受思想洗礼。

第二，立体式推广，增强宣传力度。利用标牌、宣传栏、微信二维码等多种方式，在重要的首都历史文化资源的遗迹与遗址，简明扼要介绍相关的历史文化信息，呈现历史的变迁和追述文化的情思。立体式宣传的优势在于：其一，全民参与的广泛性，凡是参观资源的人们都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领略首都历史文化资源的文化变迁。其二，全民参与的快捷性，首都历史文化资源信息的传播立体式、全方位铺开，不受阅读时间、途径等的约束。其三，全民参与的保护性，让更多民众广泛享受首都历史文化资源的价值，并成为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者、历史文化价值的传承者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

第三，体验式培育，丰富宣传方式。首都历史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的总和。人们大多在博物馆、纪念馆、历史遗址等通过一个个历史遗物、历史展板去感受其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与时代精神，这往往容易形成枯燥、单调的审美疲劳，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从而有所降低。依托首都历史文化资源，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验式培育，赋予博物馆、纪念馆、历史遗址等新的文化体验，开发集观光旅游、参观考察与文化调研于一体的历史文化主题节。同时，选取每个历史文化资源具有纪念意义的时间举办有特色的纪念活动，例如重回历史场景体验生活、利用科技手段打造声光化电的模拟场景与人物故事。这样，一方面扩大了首都历史文化资源宣传的力度与深度；另一方面体验式培育激发了参与者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从而巧妙地

将爱国、自由、民主、富强等价值观融入体验式教育之中，进而更好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整合特色资源，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教材“动”起来

第一，整合首都历史文化资源种类，对首都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整体定位与合理规划，打造不同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精品品牌，重点打造具有首都特色的历史文化区。如孔庙—国子监的“国学中心”、什刹海休闲文化区、会馆文化区、大栅栏—琉璃厂文化区、报国寺收藏文化中心等。与此同时，依托历史文化资源精品及历史文化区所蕴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进行有目标有主题有内涵的主题教育活动。红色文化资源如卢沟桥与宛平城历史文化保护区、焦庄户地道战遗迹致力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爱国层面的价值目标；提倡科学与民主的五四运动文化资源如北大红楼和《新青年编辑部》致力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层面的价值目标；名人故居文化资源如谭嗣同故居、李大钊故居、董必武故居、蔡元培故居、张自忠故居等致力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人层面的价值目标。

第二，整合首都历史文化资源主题特色展览，依托历史文化资源聚集区，进一步发挥首都历史文化资源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例如依托西城区的系列会馆展示会馆文化与民俗文化；依托陶然亭展示中国古代园林文化的发展历程与其所体现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文化思想；依托近现代革命遗迹等战争纪念地，运用珍贵的历史图片、文物文献资料以及多媒体艺术手段等，回顾展示近代先进的中国人留下的历史遗迹，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所做出的牺牲，引导广大党员群众在新时代明辨是非荣辱，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第三，整合建立首都历史文化资源信息中心，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构建首都文化服务体系提供翔实的素材与载体。首都历史文化资源信息中心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分布、内涵、价值、保存现状与利用程

度等进行统一的整合、管理、维护与更新。信息中心为广大人民群众依据不同的群体选择提供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同时，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共建共享的资源主题方案，从而将历史文化与价值观教育注入资源之中，有效避免历史文化资源旅游化、景观化，激活其本来应有的思想文化功能。

（三）创设历史课堂，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战线“连”起来

第一，加强首都历史文化资源内容建设，夯实教育支撑点。完善首都历史文化资源的教育内容建设，系统整理挖掘历史文化，既要包括中国近现代时期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阶段的文化资源，又要涵盖首都古代遗址文化、传统文化和都城文化等资源，在此基础上拓展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全方位总结首都历史文化资源所体现的各种精神，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夯实教育支撑点。同时，由政府统一规划统筹安排，集中组织首都历史文化研究的骨干力量，广泛搜集和征集与历史文化资源相关的文献与史料，实地采访历史文化资源的见证者与亲历者，进一步完善丰富首都历史文化资源库，在“北京印迹”网站^①的基础之上，拍摄首都历史文化资源系列微视频，建设历史文化资源网上展览馆，编写历史文化资源融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读本与图书。

第二，提升首都历史文化资源传播语言能力，找准教育切入点。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对象的特点，利用首都历史文化资源有针对性地设计宣传方式和语言风格，尽量避免直接搬用政策和文件语言，而多采用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生活语言，让首都历史文化资源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更加接地气、更加贴近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对

^① “北京印迹”网站是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在对北京老城历史文化资源信息进行梳理、整合后开发的网站，于2018年12月17日启动上线，系统梳理和采集了北京老城18大类73小类历史文化资源3万余条。

于中老年群体，可以采取参观调研、观看影像、文艺展演、主题演讲等传统的教育形式，对于青少年群体，可以采取网络直播、红色动漫、沙画等时尚的文化传播形式，在传播首都历史文化的同时，提升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效性。

第三，建设政府、社区、学校“三位一体”的育人机制，增强教育着力点。通过政府规划、社区行动、学校开展，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首都历史文化资源学习与教育活动，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了解首都历史文化，传承历史文化，形成崇尚历史文化的良好氛围。通过邀请首都历史文化相关领域专家及博物馆、纪念馆、名人故居等爱国主义基地讲解员等专业人员，主动进社区、进校园、进课堂，为广大人民群众举办系列别开生面的首都历史文化主题教育讲座，在与专家学者面对面的互动交流中实现文化传承、思想解惑和价值引导。

（四）打造教育基地，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根基“固”起来

近年来，北京市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了系统梳理与深入挖掘，打造了许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示范基地，如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博物馆等，此外还有众多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如圆明园、双清别墅、东北义园、抗战名将纪念馆等。充分发挥挖掘教育基地的培育服务功能，丰富教育基地的培育方式途径，使教育基地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最大化地合理发挥。

第一，挖掘基地的精神内涵，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吸引力。首都历史文化资源拥有观赏性、艺术性与思想性凝聚一体的特性，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华民族先辈们对崇高理想信念的坚守、对开拓创新精神的发扬。以此为素材，可将其精神内涵引申为政治信仰教育、民族精神教育和行为规范教育，而这正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每一个首都历史文化资源教育基地都记录了源远流长的历史，承载着意义非凡的文化基因，彰显着伟大的民族精神。建设教育基地，挖掘精神内涵，使得历史文化资源不仅仅呈

现物、景、历史，更呈现洞见人性的印迹、民族的历程、闪亮的思想与不朽的精神，体现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展现的崇高精神与价值取向。教育基地的题材、内容、形式多样，但通过研究精神内涵，系统地阐释与提炼，指导广大民众在接受历史文化资源本身信息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其背后的象征意义，将其蕴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新生发和提升出来，寻求其阐发当代价值的新途径，最大限度地发挥首都历史文化资源所具有的教育效果。

第二，丰富教育形式，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感染力。对于教育基地，实地参观是大众最熟悉的方式，新时代可以通过更多与时俱进的教育形式使得广大民众从情感上认同、行为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一，教育基地的历史文化教育资源进入首都高校课堂教学与社区讲堂，特别是有机融合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不断增强“主渠道”的作用，将思政课所讲述的典型历史事件、历史遗迹、革命遗址，与其实体的所在位置，形象地结合呼应起来。其二，发动社会民众力量，与教育基地共建首都历史文化资源相关网站，建设历史文化资源网上纪念馆，在网络上虚拟参观教育基地，可以采用全方位三百六十度的现代科技虚拟景观使人仿佛置身历史场景中，深入了解历史文化，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三，通过志愿服务的形式，拓展实践教育服务队伍，改变走马观花式的游览，让更多的民众主动融入教育基地的环境之中。在教育基地担任志愿讲解员和义务引导员，身临其境地去感受、体验、传播历史文化资源。广大民众通过教育基地氛围的熏陶、情景的感染，用身体与心灵共同感受中华民族先辈们的精神面貌和理想信念，与周围的历史文化氛围形成共鸣，自主领会首都历史文化资源所蕴含的精神与思想感召力，在自我价值观教育中实现知、言、行的统一。

第三，提升教育效果，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影响力。首都历史文化资源相关的教育基地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践场所，需要基地与高校、社区合力建设，三方的力量相互帮助、相互监督、相互支持。其一，共同制订教育基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规划。在与大众文化、时尚文化对比的过程中，突出呈现社会主义核心价

价值观教育所传承的中华民族历久弥新所形成的爱国、艰苦奋斗、自强不息、诚信友善的品质。依据不同的首都历史文化资源的特点，制订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相应的规划，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历史文化资源教育基地的深厚底蕴与积淀。其二，及时了解与反馈教育基地在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中的效果。教育基地与参与教育的相关部门制订合理的教育测评方案，结合参与者的情感体验、理性认知与行为表现等进行调查分析研究，科学理性地对待反馈意见，并依此不断改进教育内容与途径。其三，与时俱进地找准教育基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结合点，力争做到旧物新读。作为首都历史文化资源教育基地应具有危机意识，及时关注与主动融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热点、难点与重点，使得教育基地可以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稳固基地，使广大民众真正能够通过历史文化资源教育基地获得有情感、有深度、有理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2] 中共北京市委.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施意见 [N]. 北京日报，2014-05-26.
- [3] 王岗. 北京历史文化资源调研报告集 [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
- [4] 戚本超. 北京历史文化研究——北京山区历史文化资源整合研究 [M].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
- [5] 徐美英，郭亮，黄楠竹. 革命历史文化资源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价值及应用——以重庆市为例 [J]. 思想教育研究，2015（7）.
- [6] 陈艳红，董玉来. 红色教育基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载体 [J].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8（5）.
- [7] 侯仕福. 威海革命历史文化融入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的价值及实现 [J]. 理论观察, 2017 (7).

[8] 邵士庆, 白静. 以北京文化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 [J].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2017 (4).

[9] 顾萍, 袁久红.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与路径思考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5 (10).

[10] 林泰山. 利用红色资源助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 [J]. 求知, 2018 (12).

[11] 陈诗师, 卜志纯. 红色资源融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探究 [J]. 南方论坛, 2019 (2).

[12] 胡建, 冯开甫. 红色资源: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载体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6 (1).

[13] 张泰城, 常胜. 红色文化资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J]. 求实, 2016 (11).

[14] 李艳. 红色文化资源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J]. 广西社会科学, 2017 (10).

课题负责人: 闫长丽

课题组成员: 韩振峰 朱晓菊 白夜

王永凤 张瑞霖 郑士鹏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以东城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为例

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党校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任务，指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十九届四中全会结束第三天，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深入上海杨浦滨江、古北社区视察，并指出“要牢记党的根本宗旨，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把群众大大小小的事情办好”，“要推动城市治理的重心和配套资源向街道社区下沉”，聚焦基层党建、城市管理、社区治理和公共服务等主责主业，整合审批、服务、执法等方面的力量，面向区域内群众开展服务。

一、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基础

（一）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的共同要求

新时代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是社区党建与社区治理共同发展、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现实基础使然。一方面，社区党建是城市党建工作的基础，社区党组织是引领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组织载体。改革开放以来，社区已经成为人民居住、生活的重要场所，社区居民对于社区的需求日益多元化，社区党建的工作重心也逐步转移到如何做好群众工作和

加强基层政权建设上来，社区组织结构、社区利益群体、社区群众需求、社区基层民主的变化对社区党组织提出了新命题新要求新考验，社区党建需要找到新的工作突破口应对时代之需。另一方面，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超大城市病的集中凸显，社区治理面对的公共事务和社会问题日益增多，在化解社区冲突、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能力、开展基层治理方面任务艰巨，社区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需要更多的组织引导和支持。考察社区党建和社区治理，不难发现二者所面临的问题是有共性的，而二者的有机结合恰好可以各取所长，互补短板，社区党建可以为社区治理提供更多的组织制度支持，而社区治理也可以打开社区党建相对封闭的工作格局，实现共同发展。

（二）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政策环境成熟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特别重视党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发挥，从社会治理和党的建设两方面出台相关政策，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在推进社会治理方面，2017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提出要“促进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2019年6月24日，《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指出：“完善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建立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村民自治组织和村务监督组织为基础、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为纽带、其他经济社会组织为补充的村级组织体系。”在加强基层党的建设方面，2018年10月28日，《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中明确了“社区党支部，全面领导隶属本社区的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围绕巩固党在城市执政基础、增进群众福祉开展工作，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组织整合辖区资源，服务社区群众、维护和谐稳定、建设美好家园”。在该条例中，为了增强社区党委、支部的稳定性，把社区党支部的任期由原来的3年延长为5年，并且明确了社区党支部书记和社区主任“一

肩挑”等制度。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提出“充分发挥街道社区党组织领导作用，有机联结单位、行业及各领域党组织，构建区域统筹、条块协同、上下联动、共建共享的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

（三）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组织体系完善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其中“领导基层治理”是党的十九大对基层党组织职能的新提法和新定位，也是新时代对基层党建的新要求。而从目前基层社区党支部的数量和绝大多数社区治理的组织体系上看，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组织基础坚实。从基层社区党支部的数量上看，中共中央组织部《2017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显示，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457.2万个，有100602个社区（居委会）建立了党组织。具体到北京市，北京市目前共有3091个社区，每个社区至少有一个基层党支部，社区党员的数量约占全市党员总数的20%以上，^① 这为北京市的社区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这些广泛覆盖于社区的基层党组织，是夯实社区治理能力的领导主体和中坚力量。从基层社区治理的组织结构来看，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各级党委（党组）着眼于完善社区治理工作的整体功能，以区、街道、社区三级党建协调委员会为基础，构建起了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体系框架，进一步规范了区、街道、社区三级党建协调委员会的工作机制。

二、东城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主动适应城市社会群体结构和社会组织架构的变化，推进基层党建工作创新，推进国家治理

^① 殷星辰. 新时代以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与思考——以北京市为例 [J]. 中共山西省党校学报, 2019, 42 (04).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近年来，北京市东城区在城市社区中重点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不断提升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能力，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创新实践。

（一）突出政治引领功能，建强社区基层组织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首要功能是政治引领。北京市东城区坚持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切实发挥社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一方面，通过扩大组织覆盖，严密组织体系，提升组织能力，全面加强党对基层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统一领导；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带组织、书记带党员、党员带群众等方式，确保基层治理充分体现党的意志和要求，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1. 加强“三级共建”夯实社区组织体系

第一，区级层面，坚持高站位指导，理顺运行机制。2018年4月，东城区在北京市率先出台了《东城区关于党建引领街道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实现“街道吹哨、部门报到”的实施意见》构建党建引领、街道吹哨、部门报到、群众满意的工作机制；明确“三级管理、五方联动”的总体工作思路。“三级管理”是建立纵向到底的“区、街道和社区”三级管理机制；“五方联动”是要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五种力量在社区治理中的多元主体作用。第二，街道层面，持续改进街道、社区党组织对辖区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例如东城区北新桥街道确立了“六联席两联系”制度、“民情面对面”制度，通过街道社区党建协调分会会议、社区党建联席会议等形式，搭建区域化党建平台，编制出以街道工委为核心、社区党组织为基础、其他基层党组织为“结”点的“一轴三网”大体系，各级各类党组织都能在这个体系里明确自己的定位，发挥辖区内的统筹协调和政治引领作用，使社区党组织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增强“四个意识”，树立“四个自信”，做到“两个坚决维护”，以基层党建确保社区治理正确的政治方向。第三，社区层面，规范社区党建工作体系。加强社区网格党支

部建设，选优配强社区网格党支部班子，推进基层党建与基层网格治理有机融合；健全社区党建考评体系，完善社区党建的建设“三级联创”活动，坚持以评促建，提升社区党建整体水平；深入推进区域化党建，将区域内机关、事业单位、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党组织等纳入其中，统筹辖区内各类党组织积极发挥政治引领功能，实现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主要职责。

2. 形成“三带”机制凝聚社区政治共识

第一，组织带组织。充分发挥政治引领功能，仅靠街道和社区党组织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为了最大层面地动员社区内各类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东城区182个社区党组织普遍成立了社区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把辖区内的物业公司、社会组织、驻地单位等组织列为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的成员，由街道副职领导担任党建协调委员会主任，通过组织带组织的方式强化了社区党组织的统筹协调功能。第二，书记带党员。充分发挥优秀社区党组织书记的作用，以社区党支部书记带动普通党员，发挥政治引领作用。东城区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社区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2018年9月在全区范围内成立31个优秀社区党组织书记工作室，重点发挥书记带党员的传帮带作用。例如，和平里街道启动了优秀书记带年轻后备人才的“1+1选优工程”，街道成立2个优秀社区党组织书记工作室，并为工作室配备了8名学员，加强社区党组织后备人才队伍建设，计划在三年内培养200名左右社区党建后备人才，从而打造一股坚强的政治后备力量。第三，党员带群众。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社区治理呈现出诸多多元化问题，社区居民差异显著，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在增强统一思想、增强政治意识上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东城区通过党员干部带动了300余家单位，90多个党支部，14683人次的党员群众参与，清理了240个院落及215个楼门道，清理杂物375卡车，在群众中得到了高度的好评。东城区特别重视党员模范作用在群众中的发挥，不断激发党员干部参与社区事务，通过党员干部带动居民群众参与社区治理，树立良好的政党形象。

(二) 突出服务引领功能，创新社区服务机制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工作抓手是实现服务引领功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理念的重点在于通过服务引领创新社区治理，进而重塑党与国家、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东城区近几年在党建引领社区服务功能方面以创新社区服务机制为重点，有效地破解了一系列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1. 创新一个模式践行全方位服务理念

自2016年东四街道办事处创新“周末卫生大扫除”服务模式至今，东城区在全区17个街道的182个社区全面推广这一模式，全方位服务社区居民。“周末卫生大扫除”是以每周六定期发动机关社区党员干部清理胡同院落废弃物为开端，建立了“周末卫生大扫除”长效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是通过周末“大扫除”的方式，以社区党员干部进胡同服务群众的实际活动，影响带动居民家庭和个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治理能力的提升。东城区委坚持以党建引领，在“周末卫生大扫除”工作的开展过程中，积极探索出一套以“统一思想、统合力量、统抓问题、统建机制、统领各方、统筹多元”为核心要义的“六统”工作机制，并将其成功地发展成为一种城市基层治理工作模式。创新处级领导和党员干部“包社区、包片区、包街区”的“新三包”制度，实现了处级领导包社区、机关干部包片区、党员干部包街区。以东四街道为例，截至2018年底，东四街道开展活动共计110次，共有13030人次参与，清理了217个院落及170个楼门道。2018年5月，东四街道社情民意调查报告显示，居民对街道整体工作成效的满意度高达98.3%，对街道党建工作满意度达到87.5%，对街道卫生状况变好的评价达到91.3%，对街道公共环境和便民设施整体变好的评价达到83.8%，对街道整体风貌变好的评价达到92.8%，对公共环境治理满意度达到76.8%；同时，居民对街道公共安全的满意度高达98.8%。目前，东城区在17个街道全面开展和推行“周末卫生大扫除”，各街道在东四街道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这一模式，在胡同社区综合整治促提升

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党员干部深入社区，接触群众，及时发现和解决了许多群众面临的矛盾问题，赢得了居民的广泛认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基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赢得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拥护。”

2. 依托一个机制规范科学化服务体系

2018年，北京市总结平谷区等地区的实践经验，确立了以党建引领，以街道乡镇为重心，以“街道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为抓手的社会治理新路径。东城区抓住这一改革机遇，率先在北京市出台了《东城区关于党建引领街道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实现“街道吹哨、部门报到”的实施意见》，提出构建党建引领、街道吹哨、部门报到、群众满意的工作机制，并构建了区、街道、社区三级综合监督体系，规范服务体系科学化运行。第一，区级全程监督体系。利用东城区既有的城市管理网格和社会治理网格平台，搭建网格平台一体化运转机制，在全区17个街道分设网格管理中心，拓宽问题发现渠道，把网格平台打造成为响应和解决民众诉求的窗口。推进城市管理网、社会服务管理网、社会治安网、城管综合执法网等“多网”融合发展，实现区、街道、社区三级在信息系统、基础数据等方面的深度融合、一体化运行。发挥区网格平台的监督职能作用，完善“吹哨报到”响应处理机制，对于启动“吹哨”的事项，实行“问题收集、街道吹哨、部门报到、处理反馈、核实结项、综合评价”闭环管理，强化部门服务基层意识，实现街道层面城市管理难题的“早发现、早吹哨、早报到、早解决”。第二，街道层面问题解决体系。加大向街道赋权力度，在街道层面建立“问题清单化、部门席位制”运行模式，通过街道考核职能部门的逆向考核机制，加强街道对辖区事务的统筹指挥调度和资源整合力度。根据问题事项具体情况采取清单式分级分类处理，对于街道层面能够解决的问题，在街道层面解决；对于街道层面不能解决的问题，通过按照清单分类，上传网格管理平台，按照“吹哨”流程分派给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协调解决。第三，社区层面问题发现体系。推动构建“社区居民群众+社区自治组织+

街道社区党员干部”问题发现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社区街道党员干部起引领带头作用，东城区绝大多数街道都建立“党员干部每日一万步”的工作机制，要求党员干部每天深入社区街道步行一万步，从源头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同时鼓励居民和社区自治组织随时发现问题随时报，通过社区党委、社区居委会、“两代表一委员”和社区“微网格”平台及时发现问题、反映问题，构建社区层面的发现问题科学体系。

（三）突出自治引领功能，培育社区自治体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强调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坚持以实际问题为导向，遵循共建共治共享原则，善于自我改革、自我超越，大力发展合作治理、共同治理机制，积极探索自主治理机制，使社会充满生机活力。近些年在东城区委的领导下，东城区各级党组织在引领社区自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1. 引领社区协商机制，健全社区自治体系

东城区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在基层协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把握社区协商的正确方向，坚持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充分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促进群众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在鼓励多领域、深层次参与协商、依法平等表达意见和诉求等方面积累了一些成功的做法。第一，“五民”工作法。近年来，在东城区委的引领下，在多个街道社区逐步推行“民事民提、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办、民事民评”的“五民”工作法。2018年，东城区出台《东城区加强和完善城市社区治理的实施意见》，持续推广普及社区协商共治“五民”群众工作法，自2017年以来，在全区182个社区共开展居民议事协商会议2050场，解决了社区环境整治、社区停车管理、社区助老服务等1403个事项。对全区6个试点街道、30个试点社区的社区工作者开展为期三天的社区治理能力建设培训，提升了基层协商能力和水平。例如景山街道景山东街社区，通过“五民”工作法成功解

决了困扰街道多年的环境脏乱差、胡同乱停车、噪声扰民和僵尸车问题。第二，多种形式的民主议事平台搭建。在引领居民协商的实践中东城区搭建和发展诸如“小院议事厅”“公共空间讨论”“家和万事兴”等十分有效的民主协商议事平台。通过这些平台完善“社区议事”的参与主体、规则、形式、流程，使得社区居民民主协商的能力和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例如“小院议事厅”就是搭建了社区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讨论的平台，让社区党委、党员、社区居民、社区其他组织等多元主体在这个平台上共商共议社区事务，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考察前门草厂社区的“小院议事厅”，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公共空间讨论”是一种严格按照程序进行的居民参与决策模式，东城区在许多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中都引入了这种讨论方式，由于严格的程序性，参与讨论各方在专业人士的引导下，参与讨论和决策的能力也得到了较大提升。“家和万事兴”则是居民调解机制，它由社区老党员、老主任、老公安、老教师，再加上社区干部、社区民警、楼门长，以及普通群众组成，主要用以调解小区各种大小纠纷，例如景山街道鼓楼社区的“家和万事兴”一年平均可以解决社区内各类纠纷100余件。这些民主议事协商平台都是在党委领导和引领下不断发展和健全起来的社区自治体系。

2. 引领自治组织发展，激活基层活力

东城区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工作中，积极探索引领自治组织发展，计划基层活力的有效方式。第一，培育发展居民自治组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一环就是“重民生、强自治”，充分发挥基层自治组织的整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优势。目前东城区17个街道都有由辖区居民自发组织的居民自治组织，少的街道4~5个，多的街道这类自治组织已经达到20余个。这些居民自治组织已经突破原来的纯娱乐性质的自治团体，而不断朝着更为专业化和职能化的方向发展。例如，东四街道的“花友汇”组织，已经开始承担胡同平房环境美化和绿植养护的工作；建国门街道地区的“车友会”普遍发展，承担了本社区、小区和院落的停车管理职能；前门街道的“居民治安队”把前

门三里河地区的公共秩序维护、区域安全和游客指引等作为本组织的主要职能。类似这样的居民自治组织还在不断地细化和发展中。这些居民自治组织不仅极大地调动了居民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而且提升了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治理的能力。第二，培育和引进专业化的社会组织，以市场化方式强化社区治理。大力推进社会组织发展平台建设。把专业的社会组织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引进社区，为社区提供专业化服务。仅2018年一年东城区就依托创益汇平台对外发布36个服务需求；举办两场项目对接洽谈会，12个发布部门与230余个社会力量对接洽谈；共收到项目申报材料236份，其中77个项目进入立项评审；最终确定38个服务项目的承接方承接社区发展各类事项。此外，东城区还在一部分街道组建社会组织发展和孵化平台，例如，朝阳门街道就组建“朝阳门社会组织创新发展中心”，指导社会组织在社区开展服务，建立项目监督评估机制；开展微创投、政府购买服务，以项目带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通过搭建街道社会组织发展平台，实现有效衔接区级与社区平台资源，指导社区平台开展工作，极大地提升了社区治理的专业化水平。

三、关于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的几点思考

虽然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工作中，东城区做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某些重要的方面，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3点。一是社区党建工作的资源基础相对薄弱，资源配置比较匮乏；二是基层社区工作存在负担过重、任务过多的问题；三是社区党建人才队伍建设薄弱，奖惩机制和激励手段缺乏。针对上面的3个问题，要进一步提升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能力，做好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工作，就应该集中力量做好如下4个方面的工作。

（一）创新资源整合机制，建强社区党组织工作基层基础

提升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能力，关键在于创新资源整合机制，坚强社区党组织的基层工作基础。目前，社区党建工作的资源基础相对薄弱，

资源配置相对较少，这是制约社区治理的重要因素之一，创新资源整合机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突破口。要建立党建引领的社区资源整合机制，首先，加大外部资源引入力度。尽可能地将专业技术部门的智库资源和政府部门的行政资源纳入党建引领的制度化框架内，增强社区各项公共事务和项目的专业性和科学性。其次，加强社区内部资源的整合和互相补充。促进社区内部的资源共享机制建立，在资源共享的前提下，通过党建工作制定社区发展的规划和原则，在共同认可的基础上达成多元治理主体之间资源的转移、开发和优势互补。盘活社区内的既有资源，例如驻社区的文化、商业、企事业等资源，将其纳入到社区治理的系统工作中来，实现公共资源高效利用，促使社区富余资源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最后，大力发展社区信息化平台建设，把现代化信息手段最广泛地应用于社区治理工作，利用现代化的沟通交流平台，例如微信、微博、公众号、信息化管理云平台等，与社区居民建立无缝链接，在最大限度、最广层面上问计于民、问需于民，为社区居民提供精准化服务和供给。

（二）加大社区减负力度，提升社区党组织服务居民能力

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明确提出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社区减负增效是基层减负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以来，关于社区减负的工作已经全面推开，核心是解决社区行政负担过重导致的社区自治职能缺失的问题。要加强党建对社区治理的引领，就必须进一步加大社区减负的力度，明确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的社会治理职能，通过厘清区职能部门、街道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之间的职责边界，依法制定区职能部门和街道在社区治理方面的职责清单，对社区工作实行准入制度和清单管理。完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履行职责事项和协助政府工作事项清单。建立长效机制，对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职能进行规范和审核，从制度上明确哪些是社区应该承载的职能，哪些是上级职能部门应该承担的职责，严格规定属于各职能部门、社会团体、街道办事处职责范围内的事项，不

得转嫁给社区。进一步把社区党组织从繁重的行政性事务中解放出来，充分挖掘社区党组织在引领社区治理方面的职能和潜力，真正回归社区治理。

（三）完善干部激励机制，加强社区党组织干部队伍建设

“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要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在社区的政治领导核心作用，必须建强建好社区党组织干部队伍建设。强化社区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意识，在社区党建、班子建设、队伍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等方面发挥好班长作用。制定完善的干部激励机制，完善社区工作者的职数管理、绩效考核、激励奖励，完善能进能退、能上能下、奖勤罚懒、动态规范的社区工作队伍管理机制。打破社区常规性的社区书记选聘机制，为优秀社区书记和工作者打开向上发展的渠道，鼓励社区干部走上更大的舞台，为社区书记和党员提供更多的展示平台。同时，鼓励政治素质过硬、专业素质良好、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走上社区领导岗位，为社区党组织注入活力。社区党组织要继续推进社区党组织领导班子年轻化建设，吸引更多、更优秀的年轻人到社区来工作。强化社区人才培养，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鼓励社区工作者考取专业职业资格证书，提升社区工作者的专业化水平，建立对执证专业人才的奖励机制。

（四）提升社区党建能力，充分发挥引领社区治理作用

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理念体系中，社区党建是社区治理的“牛鼻子”，提升社区党建能力的关键在于能够持续开发社区党建功能，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引领、指导、整合功能，并在此基础上适时更新党建理念，主动创新党建工作模式，实现社区党组织政治功能与社区治理的同步发展。目前，社区党建能力虽然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和改善，但在引领社区治理方面还要不断持续地加强社区党建能力，把社区党建工作与社区治理工作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将社区党建政治引领和思想引领功能与社区治理实际工作接轨，通过二者的结

合，在实践工作和服务中，让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真正在居民群众中入脑入心、见行见效；另一方面，在社区党建水平的整体提升方面，应着眼于打造各具特色的社区党建品牌，充分释放社区党建价值功能，加快社区党建与社区治理的耦合、与社区文化的融合，以优化社区治理、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为依托，不断创新党建新模式，探寻适合本地区发展的品牌路径。

课题负责人：徐珊珊

课题组成员：许 杨 焦向东 许 坤

医院培育志愿服务精神问题的研究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志愿服务精神是当代志愿者精神面貌的体现，也是时代精神的具体表现。医院培育志愿服务精神，是促进医务人员职业精神的重要抓手，是促进医院管理、丰富医院文化的有效途径，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有力举措，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之义。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志愿者协会以医院文化理念为核心，强化志愿服务精神的引领力；以组织建设为基础，提升志愿服务精神的凝聚力；以制度建设为保障，加强志愿服务精神的支撑力；以内容创新为动力，深化志愿服务精神的吸引力；以榜样示范为抓手，增强志愿服务精神的感召力；以志愿文化为载体，切实提高志愿服务精神的影响力。随着志愿服务的不断发展和要求的不断提高，从理念、政策、操作和社会4个层面，分析了医院培育志愿服务精神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了发挥党委政治核心作用、发挥志愿者主体作用、关注志愿者自身诉求及发挥社区团体等桥梁纽带作用等建议，进一步培育志愿服务精神。

志愿服务是国家、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的生动体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志愿服务事业和志愿服务组织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志愿服务工作做出指示，强调志愿者事业要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行；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为志愿服务搭建更多平台，更好发挥志愿服务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一、志愿服务的发展和志愿服务精神

(一) 北京市志愿服务发展的历程

1963年，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掀起了全中国学习雷锋的高潮。北京市志愿服务则是发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学雷锋邻里互助活动。从1993年青年志愿行动出现，至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这段时间是北京市志愿服务事业全面起步并不断壮大的时期；尤其是2001年至2008年北京筹备奥运会期间，志愿服务实现了质的飞跃，让各国友人、全国人民都对北京乃至中国的志愿服务有了新的认识，志愿者的微笑成了北京最好的“名片”。

奥运会的举办极大地促进和激励了北京市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之后，各项赛会、重大活动不断举办，志愿服务理念逐步普及；《北京市志愿服务管理办法》《北京市志愿服务指南》等制度规范相继出台，志愿服务规章逐步完善；北京市及各区志愿服务联合会相继成立、“志愿北京”平台建立，志愿服务生态逐步打造；各项志愿服务经验总结成果不断显现，志愿服务理论不断积淀；北京市志愿服务事业顶层设计不断完善，统筹协调机制逐步健全，志愿服务组织、品牌项目、典型事迹不断涌现，志愿服务活力竞相迸发。截至2019年11月底，北京市实名注册志愿者438.3万人，注册志愿服务团队7.6万个，累计记录志愿服务时长3.8亿小时。

在重大活动中，志愿者们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2019年9月至10月，6.8万城市志愿者参与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的服务保障，他们在人流密集的旅游景点、交通枢纽、商业场所、场馆周边等城市志愿服务站点提供服务，在重点社区、公共文化机构、公益机构等为首都市民和广大游客提供帮助。

(二) 医院志愿服务发展历程

2009年底，原卫生部等八部委发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志愿者医

院服务”活动的倡议，各级各类医院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志愿服务活动。目前，医院已成为我国社会开展志愿服务的重要场所之一。截止到2014年，约有97.5%的医院开展了志愿服务活动，67%的医院成立了志愿服务专门机构，79%的医院配备了专职人员从事志愿服务管理工作。医院志愿者提供了咨询导医、护送陪伴、心理干预、出院随访、节日慰问、临终关怀、宣传教育、图书借阅、办公室文书等服务内容。我国正处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志愿服务对优化医疗服务治疗、建立“以病人为中心”的医疗服务模式可以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2017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订了《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2018—2020年）》，明确提出大力推行志愿者服务，鼓励医务人员、医学生、有爱心的社会人士等，经过培训后为患者提供志愿者服务。医院志愿服务逐渐呈现出覆盖全、内容多、需求大、作用大等特点。

（三）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志愿服务的发展历程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志愿者协会成立于2010年，党委书记亲自担任协会会长，副书记担任协会副会长，团委书记担任秘书长，党办、门诊部、团委、离退休办、工会、宣教中心等重要职能部门负责人担任理事。2014年，协会加入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守护天使”志愿服务项目。经过九年的努力，志愿者队伍不断扩大，既有医院职工，也有离退休人员、学生、社会人士和专业音乐治疗团队、幼教团队等。志愿者们根植于宣武医院，服务在社会基层，从幼儿园到养老院，从党政机关到社区、军营，从北京市区到京郊农村，志愿服务多点开花，范围已扩展到京津冀乃至华北、全国各地。宣武医院打造了“合理用药从娃娃抓起”“红色‘1+1’”“天使在身边”等一系列品牌志愿服务项目。2017年，神经外科首席专家凌锋发起的“中国志愿医生”团队首次走出国门，服务世界人民。2019年9月至10月，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中，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200余名志愿者承担了城市志愿者任务，在院内外提供了导医、咨询、陪伴、义诊宣教等多项志愿服务。此外，

观礼台前、主题彩车上、广场医疗点、指挥部驻地……处处可见提供医疗保障服务的志愿者们。9年来，志愿服务事业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生根发芽、迅速发展壮大，已经进入了稳健高效的发展轨道。在新时代，为满足人民群众在医疗领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宣武医院志愿者协会正在做出新的探索和努力。

二、志愿服务精神内涵及医院培育志愿服务精神的重要意义

（一）志愿服务精神的内涵

志愿服务精神是指个人或群体基于对和谐社会、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在主动奉献社会、服务他人和互帮互助等志愿服务行为和公益活动中体现出的自觉意识和精神理念。其内涵通常被概括为“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奉献精神是志愿服务的基本内核。奉献意味着无偿地为他人、为社会服务，推动集体利益、社会公益，促进社会进步。

友爱精神是志愿精神的重要特质，它是激发形成志愿精神的重要动力。志愿者们因志愿服务这个共同的志趣而聚集，在参与志愿服务的过程中相互理解、信任、友爱，这就是友爱精神的生动反映。

互助精神是志愿精神的根本主旨。互助精神既指志愿服务具体实践中志愿者帮助受助者、志愿者之间相互帮助、受助者得到帮助后帮助他人，所形成、传递的互帮互助的良性循环和浓厚氛围；又指“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众志成城、同舟共济的社会主义互助精神，是一种宏大的精神力量。

进步精神是志愿精神的实践归宿。一方面，受助者通过志愿服务得到了物质或精神帮助，个体的境遇实现进步；另一方面，志愿者在志愿服务当中锻炼了能力、体现了价值、提升了精神境界，从而实现了志愿者个体的进步和志愿服务群体的素质、志愿服务整体水平的提升。

志愿服务精神突出体现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要

求，是当代志愿者精神面貌的体现，也是时代精神的具体表现，对于促进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医院培育志愿服务精神的重要意义

志愿服务精神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其内涵会因地域、人群、文化、时代而异。不同国家的志愿服务精神带有明显的文化内涵和地域特征。可以说，志愿服务精神不仅体现在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中，也是志愿服务组织在开展志愿服务的基础上凝练出来的精神理念，这对于指导志愿服务实践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第一，医院培育志愿服务精神，是促进医务人员提升职业精神的重要抓手。志愿服务一方面为培育、提升医学职业精神搭建了新的教育平台；另一方面也丰富了职业精神教育的内容。健康所系，性命相托，以医学专业为背景的志愿服务凸显了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职业精神内核和“敬畏生命、珍重健康”的医学终极价值观。同时，志愿服务能够使医务人员更全面、细致地体验患者就医过程中的困惑，从而换位思考，自觉提升自身的医德修养。

第二，医院培育志愿服务精神，是改善医院管理、加强医院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医院开展志愿服务，一方面可以满足患者非医疗性服务的需求，一定程度上能弥补医院在医疗服务人员数量、环节上的不足，缓解医院压力，改善医院运行质量；另一方面，可以为医院管理“查漏补缺”、提供新的视角，帮助医院提升医疗服务品质。

医院开展志愿服务也是丰富医院文化的有效途径。一是公立医院公益性本质特征与志愿服务精神不谋而合，公立医院作为国家基本医疗服务的主要提供者、社会责任的实践者和实现者，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是体现公益职责、满足患者需求，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医疗服务新模式的重要实践；二是医院开展志愿服务可以在更大的范围、以更灵活的方式服务社会和群众，符合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建立新型医疗服务模式、优化医疗服务质量的要求。

第三，医院培育志愿服务精神，是构建“以人民为中心”和谐医

患关系的有力举措。“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要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人民的切身利益。医疗卫生事业是关乎民生的大事。医院开展志愿服务，有利于营造和谐的就医环境、医患关系。随着医疗模式逐渐向“以患者为中心”转变，医院在为患者提供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的同时，还要兼顾患者在心理、生活等方面的需求。医务人员通过志愿服务拉近与患者的距离，增强了医疗服务的代入感和实践性，有利于促进医患关系进一步和谐，建立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第四，医院培育志愿服务精神，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志愿服务能够弘扬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开展志愿服务，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通过生动、具体的活动潜移默化地影响每一位志愿者、传递给每一位受帮助者，并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认识转化为崇德向善的志愿服务活动行为或意愿，从而营造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良好社会风尚，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地落地生根。

三、医院培育志愿服务精神的经验

（一）以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强化志愿服务精神的引领力

志愿服务所倡导的“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共通共融，志愿服务这一行动也是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实和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途径多种多样，在医院大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让志愿服务精神深入人心，也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志愿服务精神的引领力，主要体现在医院文化理念的基础上、引导下，通过总结凝练志愿服务文化理念，指导志愿服务实践更好地发展，引领、鼓舞广大志愿者更加积极地投身志愿服务、改善服务质量，推动志愿服务事业不断前进。

宣武医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提炼了“宣武医院，健康家园；共经风雨，共享未来”的文化理念。“健康家园”强调医院以救死扶伤为天职，以防病治病为宗旨，以人群健康为目的，努力将医院建

设成为现代化医学中心和医患满意的健康家园；这与志愿服务精神中的奉献精神、友爱精神内在要求相一致。“共经风雨，共享未来”的共享理念则强调医院和患者、医务人员是一个共同体，在医院的建设发展历程中追求同行、互助、共赢的精神理念；这又与互助精神、进步精神不谋而合。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下，医院始终坚持“以病人为中心”，不断改善服务质量、就医体验，营造服务文化。

宣武医院志愿者协会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通过总结志愿服务工作的长期经验，提出了“传递温暖共享健康”的志愿服务理念，和“用心用情至诚至爱”的服务宗旨，以此贯穿于志愿服务活动的始终，积极引导和鼓励医务人员投身医院志愿服务实践，有力促进了宽领域、多形式、高质量的志愿服务活动，彰显了医务工作者“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

（二）以组织建设为基础，提升志愿服务精神的凝聚力

医院志愿服务组织是志愿者沟通交流的平台，是志愿者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组织载体，起着连接医院与志愿者的桥梁作用，是医院志愿服务的重要保障。加强志愿服务组织建设，能够促进医院志愿服务持续、稳定发展，提升志愿服务精神的凝聚力。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志愿者协会由党委书记亲自担任协会会长，形成了党委牵头抓总、职能部门齐抓共管、各党团支部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大大提高了部门合作效率和志愿服务组织效能。宣武医院党委还将志愿服务工作列入每年的党委工作计划和财政预算，自觉将志愿服务与医院精神文明建设和日常工作结合起来。同时，各党支部积极发挥导向作用和党员的表率作用，制订了符合本支部实际情况的志愿服务计划，在医药分开综合改革等重要时间节点发挥重要作用，实现了志愿服务与发挥党员先进性的相互促进。

（三）以制度建设为保障，加强志愿服务精神的支撑力

宣武医院志愿者协会把制度建设作为推动志愿服务活动发展的重要

保障，先后制定了《志愿者招募办法》《志愿者条例》《医务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管理暂行规定》《志愿者服务激励办法》等规章制度，明确规定了志愿者协会的工作职责，志愿者的职责、权益和服务规范，以及志愿服务工作的 workflows、工作标准，使得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工作都有章可循、有规约束。目前还形成了物质与精神相结合，个人、集体两个层面，不同群体、时长、时段等激励形式相互补充的完善体系，具有鲜明特色。

这些制度，有效地提升了志愿服务工作的规范性、指导性，也使强化志愿服务精神有了制度支撑。

（四）以内容创新为动力，深化志愿服务精神的吸引力

多年来，宣武医院志愿者协会以内容创新为动力，吸引了一大批优秀志愿者深入参与，已有注册志愿者 1700 余名，提供了门诊导医、义诊宣教等形式共 34645 人次、76453 小时的志愿服务。

志愿者们医院日常运行、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活动、落实医药分开综合改革等“医改”任务等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2019 年，志愿者协会联合周边幼儿园，率先在神经外科开展了亲子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极大缓解了患儿及家属的紧张情绪。

志愿者协会还开展“医务社会工作”志愿服务，即医务人员利用业余时间，在院内或走进农村、街道、社区、学校等进行义诊咨询、健康教育等志愿服务。此外，音乐治疗志愿服务于 2014 年起，长期在康复科、综合科、神经内科进行服务。

自志愿者协会成立以来，各党支部发挥专业特长，逐步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志愿服务活动，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志愿服务项目。急诊联合党支部的“天使在身边”急救技能公益行深入基层，“你行，我也行！”的口号逐渐响亮；药剂科党支部的“合理用药从娃娃抓起”等志愿服务活动走进学校、幼儿园，使广大儿童、家长受益。

（五）以榜样示范为抓手，增强志愿服务精神的感召力

宣武医院志愿者协会成立以来，志愿者队伍不断扩充，从本院职工，逐渐扩展到临床学生、离退休职工、院外人士。

2012年3月，离退休职工组成的“老年志愿服务团队”成立，目前有成员46名，平均年龄65岁，在劳动节、重阳节等志愿服务推动日，到各个岗位积极奉献，取得了良好效果。医院先后涌现出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优秀志愿者，北京市五星级志愿者，北京市最美志愿者，共铸中国心同心、铭心奖，同心共铸中国心健康中国感动奖，学科建设成就奖，社会公益感动奖，精准扶贫贡献奖等典型。

医院积极表彰表现突出的志愿者，通过年会表彰、主体宣讲、院庆展示等多种途径加大宣传力度。使志愿者榜样深入人心，促进学有榜样、行有标杆，让每个人都可以从榜样身上汲取正能量，提升自己，转化为实际行动，切实增强志愿服务精神的感召力。

（六）以志愿文化为载体，提高志愿服务精神的影响力

志愿服务文化将志愿者的价值观和志愿服务组织的核心价值观统一起来，真正实现志愿者为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团结友爱、无私奉献、共同进步。

志愿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等3个层面。

物质层面，志愿者协会独具特色的协会标识、医院志愿者独特的“橙马甲”、五星级志愿者专属服装、获奖证书等相关有形实体，构成了志愿文化的物质层面，是最直观的志愿文化表现形式。

精神层面，宣武医院志愿者协会聘请了“北京的活雷锋”——北京军区总医院原副政委孙茂芳作为医院志愿服务形象大使，凝练出“传递温暖共享健康”的志愿服务理念，和“用心用情至诚至爱”的服务宗旨，在志愿者表彰大会上大力宣传，使之真正成为行动指南和精神动力。

制度层面，医院制定了一系列包括志愿者登记注册、管理、激励等

制度，为志愿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保障条件，使医院志愿服务步入了科学发展的良性阶段。

四、医院培育志愿服务精神的问题及原因

宣武医院注重把弘扬志愿精神和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积极探索符合医院实际的志愿服务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随着志愿服务的不断发展和要求的不断提高，医院也发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理念层面，志愿服务精神入脑、入心、入行不够深入

志愿者主要来源为院内医务人员，自社会招募的志愿者极少。一是社会对于志愿服务的重视程度不够；二是由于医疗卫生领域专业性强，志愿者们需要具备一定的医学常识、专业技能，才能有效地为患者提供所需的服务；三是人们对志愿者的作用、意义认识不足，部分人群加入志愿服务多是基于学校或单位要求，被动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参与度不高。志愿服务意识缺乏，志愿服务文化认同不足。

（二）政策层面，对广大志愿者的激励措施不足

一是没有与时俱进，形成系统的激励机制，激励机制要随着时代、环境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二是缺乏合理可行的考核评价方法，没有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现阶段，大部分志愿服务组织均以志愿服务时长作为考核评价方式，缺乏对志愿服务质量等行之有效的考核评价方法。三是缺乏灵活多样的激励方式，没有形成多元的激励机制，志愿服务组织由于没有深入了解志愿者真正需求，激励措施容易“一刀切”，以物质激励为主，缺乏文化引领等精神激励。

（三）操作层面，医院志愿服务的管理机制尚不完善

志愿服务目前在医院范围内大力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如培训管理不能及时有效、技能培训不够专业全面及志

愿者在从事志愿服务过程中所涉及的伦理问题等，造成志愿者队伍不稳定，志愿服务缺乏长效性。

（四）社会层面，缺乏拓展志愿服务精神的有效支持

志愿者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和推动。政府需要提供政策支持和建立合理有效的工作机制。政府要通过建立和完善志愿服务评估和激励机制，将志愿服务与公民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如对表现突出的志愿者在社会福利、就医、就业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授予志愿者勋章，使之成为志愿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等；要营造志愿服务社会环境，使志愿服务成为社会风尚和公民的自觉行为。

社会组织需要发挥物质保证及桥梁纽带作用。一是为志愿服务的顺利开展提供一定的物质支持，二是社会组织可以为志愿服务的提供方和接受方搭建桥梁，将服务提供给真正需要的人。同时，社会组织参与志愿服务，能够充分激发和增强社会组织的责任感，营造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志愿服务的浓厚氛围，从而吸引更多的社会组织投身公益服务，形成“递增效应”。

五、医院进一步培育志愿服务精神的对策建议

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医疗卫生行业是关乎民生的重要领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保障。新时代对志愿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推动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推动志愿服务健康发展”，对志愿服务事业进行了新部署。新时代需要新气象，新时代需要新思路，新时代需要新发展。医院培育志愿服务精神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有提升的空间，在培育志愿服务精神、推动志愿服务健康发展上，仍然任重道远。

（一）发挥党委的政治核心作用，构筑完善的志愿服务管理机制

志愿服务精神与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一脉相承。在志愿服务精神培育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作用，利用党组织号召力强、影响力大、覆盖面广的优势，以党的基层组织为核心，将志愿服务精神的培育与争先创优、岗位建功等活动相结合，充分调动党员的积极性，鼓励带头弘扬志愿服务精神，提高志愿服务水平。通过党员先进典型引领志愿服务精神的培育工作，把党外群众、团员青年、大学生、退休人员充分带动起来，扩大志愿服务精神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完善的志愿服务管理机制是培育志愿服务精神的重要保障。要充分发挥党委政治核心作用，建立志愿服务工作评价体系，设定评价指标，通过监督、反馈、持续改进，使之长期化、规范化、系统化。

（二）发挥志愿者的主体作用，促进志愿服务精神的知行合一

医院志愿服务精神的培育应当注重尊重志愿者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其自身的积极性、主动性，由“要我参加”转变为“我要参加”。志愿者被医院认可、被患者需要的同时，自身价值得到提高、精神心灵得到满足。这种回馈作为一种“内在奖励”能够带给志愿者持久的激励，一方面激励志愿者主动参加志愿活动、提升自身服务质量；另一方面，也激励志愿者主动参加培训学习提升，并带动身边的人加入到志愿服务行列中来，达到知行合一。

（三）关注志愿者的自身诉求，加强对志愿者的关怀关爱

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需求可以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物质激励方面，一是除了为志愿者提供服务必备的设备外，可以给予志愿者纪念品、服装，提供必要的交通餐饮保障等，激励志愿者持续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二是可以将志愿者当前提供的服务与未来升学、就业、晋

升和奖励等机会挂钩，为志愿者提供潜在回报。精神激励方面，可以提供荣誉激励，如定期召开志愿者总结表彰大会、总结分享会等，对于取得突出成绩的志愿者给予奖励，将优秀志愿者列入优秀市民、优秀青年等个人荣誉表彰范围，使志愿者感受到社会对其付出的认可和重视，给予志愿者精神激励。

（四）发挥社区、团体等桥梁纽带作用，扩大志愿服务的社会支持

现阶段，随着国家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服务协会和爱心社团，医院可以选择组织完善、信誉良好、认可度高的志愿服务组织联合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整合资源，取长补短。同时以这些志愿服务组织为纽带，扩大志愿服务的社会支持。医院应充分利用院报、网站、网络新媒体等平台倡导志愿服务精神。通过宣传传播，使医院的志愿服务工作得到社会各界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吸引更多的民众加入到志愿服务行动中。应发挥社区、媒体等的桥梁作用，吸引社区居民、痊愈后的患者等积极投身到志愿服务活动中，以服务社会的形式践行志愿服务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参考文献：

- [1] 王立华. 后奥运时代：北京志愿服务如何实现常态化发展[J]. 中国社会工作, 2009 (22): 35-36.
- [2] 新华网. 北京注册志愿者达 438.3 万人 [EB/OL]. http://www.xinhuanet.com//local/2019-12/02/c_1125295750.htm.
- [3] 吴薇, 童莹, 吴懿俊, 等. 国内三级甲等医院志愿服务现状调查与分析 [J]. 中国医院管理, 2014, 34 (9): 65-66.
- [4] 陶倩. 当代中国志愿精神的培养研究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 [5] 人民网. 廖言: 大力弘扬志愿精神 [EB/OL].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1229/c40531-26293139.html>, 2014-12-29.

[6] 王慧茹. 大学生志愿精神及其培育研究 [D]. 辽宁大学, 2017.

[7] 花蕾, 王蕾, 王香平, 等. 党组织在弘扬医院精神中的实践与思考 [J]. 中国医学伦理学, 2015 (4): 128 - 131.

课题负责人: 张国君

课题组成员: 张 维 花 蕾 王建敏

邵夏龙 王 赛

新时代首都基层思想政治工作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功能任务

——以顺义区为例的研究

中共北京市顺义区委党校

法治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但要让法治真正发挥调整社会关系和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就必须将其内化为人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的自觉行动。当前，法治理应成为调整社会关系和公民行为的基本方式，但由于受思想政治宣传教育工作不充分等因素的影响，法治的社会氛围尚未完全形成，法治的社会规范功能尚未完全发挥出来，法治实践正面临着“最后一公里”的困境。因此，如何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践中的功能，并将其融入立法、执法、司法、普法、依法治理和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等法治建设的各个方面，则是当前各级党委政府应当重点研究的紧迫课题之一。

一、思想政治工作助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理论基础

思想政治工作，亦称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个国家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的主客观世界持续地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或改造，使他们形成符合国家或社会群体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①在我国，思想政治工作

^① 张耀灿、郑永廷、吴潜涛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治理国家的一大法宝，是党做好其他各项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党的重大顶层设计，其与思想政治工作密切相关，相互促进。思想政治工作之所以具有助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功能，关键在于思想政治工作与依法治国之间一脉相承，存在非常紧密的内在关联关系。

（一）思想政治工作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目的一致

我国依法治国的目的是通过依法维护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安全稳定，最终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则是将社会倡导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价值体系、行为规范等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传递给人民群众，以促使其养成符合国家和社会需要的思想政治素质。思想政治工作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党和国家政策宣传的主渠道，当前应当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主要内容之一，向人民宣传法治理念、公平正义价值与行为规范，引导全社会提升法治素养并借此促进和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由此可见，依法治国和思想政治工作作为社会调控的重要方式，两者在目的上存在一致性，都是通过规范和引导人民群众的行为，来协调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进而推动国家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最终促进人与社会全面发展。正是由于两者在目标向度上的高度一致性，才使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思想政治工作互嵌互补有可能。

（二）思想政治工作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过程协同

依法治国体现的是人类对理想社会治理方式的追求，属于政治文明建设范畴，而思想政治工作体现的是人类对崇高的思想道德、人格品质的追求，属于精神文明建设范畴。自古以来，这两种文明建设无论在历时性还是共时性方面，总是彼此存在于对方建设全过程，相辅相成，互促互进。就历时性而言，法治因涉及法治诸要素整体的革命性变革，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过程，需要思想政治工作开路，扫除前进路上的各种

思想障碍，而思想政治工作致力于人的良好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其对象上全员性、空间上全域性和时间上全程性等特征，决定了其也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需要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做保障。从共时性而言，依法治国的有效实现需要经历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等诸多环节，而每一个环节，最终起决定作用的都是人的良好法律素养、政治素养和道德品质等，即法治实现的诸环节都需要思想政治工作帮助人们提高政治觉悟、厚培法治理念、提升法治素养，可以说，凡是有法治推进的地方必然伴随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两者的实现过程也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协同性。

（三）思想政治工作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方式互补

古往今来，法治和德治都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二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法律难以规范的领域，道德可以发挥作用，而道德无力约束的行为，法律则可以惩戒。当前，法治方式成为主导性的社会治理手段。但是，法治方式却具有调控范围的有限性特性，只能适用于法律力所能及的问题，即人的“行为”中与他人利益相关的问题，而道德问题、观念问题、思想问题，则法治很难介入，也很难运用法治方式来解决。与法治方式不同，以思想道德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政治工作则主要通过理论教育、实践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疏导、心理咨询、冲突缓解等柔性方式，旨在促使社会公众开启心智、解疑释惑、坚定信念、提升修养、完善人格，养成良好思想政治素质。法治方式体现着法律的外部刚性，注重法律规范的强制作用，着眼于人的外部行为的合法性；而思想政治工作方式趋向柔性，重视主体的自我规范和约束，着眼于人内在的思想政治素质，围绕人的思想与行为而展开。法律问题虽然需要运用专业的法治方式进行处理，但也要注重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教化作用，尤其是道德的规范约束作用；而思想政治工作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引导，则需要依靠法治的方式方法予以保障，遵循必要的程序和规则。只有法治方式与思想政治方式有机结合、刚柔并济、相互补充，才能实现社会大治。

（四）思想政治工作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同源

现代法治理念滥觞于古代西方政治理论，是被包裹在古典政治伦理语言中的一种社会治理理想。在人类早期，法治是与正义和善紧密联系在一起，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家是达到“美好生活”的唯一可行的手段，而达到美好生活乃是政治组织的主要目标。易言之，法治就是实现善或正义的手段。进入中世纪以后，法治受到了宗教神学的浸润，限制世俗权力成了当时法治的核心要义。文艺复兴以后，“法治”一词又被披上了政治法律语言的外衣，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合理性、合法性提供了有力的论证，同时还为限制君主专制权力，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自由、财产等提供了根本保障。直到19世纪以后，“法治”一词才逐渐摆脱了政治伦理语境而披上了比较纯粹的法律语言。但是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国家国内外矛盾的加剧，法治又出现了与政治合流的趋势。而我国的依法治国作为共产党领导人民选择的治国理政方略，本身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推进的，在此意义上，思想政治工作与依法治国必然是同源的，且都是为实现党的执政目标服务的。

二、新时代对思想政治工作助力全面依法治国提出新要求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既是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和可靠保障^①，又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要确保这一重大决策部署得到有效落实，就必须进一步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功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性和工具性虽然为我国法治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但因缺乏明确的制度规划，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未能完全显现。有鉴于此，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思想政治工作与全面依法治国统筹谋划，并且对思想政治工作在依法治国中的功能发挥提出

^①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第2版。

了新的要求。

（一）依法治国需要思想政治工作增强全民法治观念

思想家卢梭曾深刻指出，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①。他所指的最重要的法律，就是风尚、习俗和舆论，也就是经过教化所形成的人们的法治观念。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而要人民拥护和信仰法律，就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进一步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形成知法、尚法、守法、用法、护法的良好氛围。十九届四中全会则一以贯之，要求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虽然33年的普法宣传教育在向公众普及法律知识，使其知晓法制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并没有完全培育出公民尚法、守法、用法、护法的社会氛围。正因为如此，十八届四中全会就思想政治工作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做出部署，明确要求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从而把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引向深入，从过去简单地进行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的宣传教育，转向了包括对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一系列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活动的宣传教育，更加彰显了思想政治工作对培育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的重要性。

（二）依法治国需要思想政治工作实现以德治来滋养法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有效实施有

^① [法]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2页。

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①。基于法治与德治两者关系的原理，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原则。因为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即在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的同时，还需要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仅有法律的刚性规制，则虽能守住行为的底线，但也会使社会充满戾气和积怨；而如果仅有道德之教化而无法律之规约，则必然德操失守，恶行滋彰。因此，只有育法以德，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用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同时融德于法，强化道德的规则意识，用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才能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发展了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完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政策体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这就为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政治工作对法治建设之功能发挥指明了方向。多年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表明，坚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德治方式发挥治理功能的重要途径和载体，其在提高全社会内在的守法精神和信法遵法的思想道德素质方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可以肯定地说，通过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激发德治之效，不仅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而且对法治实施诸环节有序运转都能够起到积极的支撑作用。

（三）依法治国需要思想政治工作来培育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

火车快不快，全凭车头带；法治好不好，关键看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各级领导干部在推进依法治国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因为各级领导干部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其能否坚持

^① 习近平：《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2/10/c_1120093133.htm。

依法办事，对全社会具有重要的示范带动作用。正因为领导干部在依法治国中的特殊作用，党中央要求把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作为树立法治意识的关键，并且提出其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但如何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的能力呢？只能通过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法治宣传教育，来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使其树立起正确的法治观，增强对法律的信任和支持，在确保自己做到知法、懂法、遵法、守法的同时，还能够自觉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是依法治国实现的必要思想基础和心理条件，而法治精神则是法治意识的升华，凝聚着法律至上、公平正义、人权保障、权力制约、社会和谐等法治社会所应普遍尊崇的价值追求。领导干部只有充分了解法治精神并愿意自觉弘扬法治精神，则其才真正具有了法治思维。可见，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习得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之一，没有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干部培养法治思维则是一句空话。

（四）依法治国需要思想政治工作的灵活性来优化法治模式

法治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和内在要求。^①在我国，党的十八大也把法治确立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并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但古今中外法治的实践表明，法治在国家治理中固然有其不可否认的优势，但法治却不是万能的，治国理政仅靠法治这一手，对于一个理想的文明社会还远远不够，还应该注重德行的建设^②。因为法治赖以实现的法律作为对社会生活做出反应的普遍性规则，其具有规范的稳定性、适用的普遍性以及执行的刚性，这些特性相对于法律所要调整的变动不安的社会来说，则两者常常并不合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深刻指出：法治的稳定性、规范性、预期性、强制性和权威性等优越性一旦延伸，就会转化为其劣势，表现出僵化、呆滞，面对瞬息万变的社

① 张文显：《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法学》2014年第4期，第5—6页。

② 於兴中：《法治是一种文明秩序》，《检察日报》2015年3月19日，第3版。

会生活很难做到与时俱进，无法关注到每个个体的特性需求。^① 相较于法治的僵化的特性，思想政治工作则具较大灵活性，其最大优势就是能够紧跟时代主题的变化和社会问题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宣传教育内容和方式，及时贴近和主动契合社会实践。因此，在法治失灵的领域或者面对大量出现的“法治剩余”事务，就亟须思想政治工作来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以弥补法治之不足，如我国基层大量的社会矛盾纠纷主要由人民调解组织通过说服、教育、批评、劝导来预防和化解等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来化解。当前，行业性组织、群众性自治组织等也常常用这些方式解决问题。而这些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灵活性、便捷性、有效性是法治方式所无法比拟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就是希望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来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来弥补和优化法治模式对海量发生的社会问题解决的无能为力。

三、顺义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思想政治工作功能发挥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从我们调研了解的情况来看，顺义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思想政治工作（以下简称依法治国思想工作）虽然发挥了思想教育、思想凝聚、关系协调、舆论引导、社会控制、正向激励等功能。但是，由于各方面原因，思想政治工作功能发挥并不充分，在理念、工作机制、工作平台、方式方法等诸多方面都还存在不少亟须改进的地方。

（一）存在的问题

1. 对依法治国思想工作的功能缺乏充分认识

当前，党中央将“依法治国”作为“四个全面”战略之一进行布局，那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观已经成为当下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功能缺乏明确认识，思想

^① 江必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思考》，《科学社会主义》2015年第5期，第78页。

政治工作内容陈陈相因，不能将思想政治工作与依法治国有机联系起来，甚至不清楚依法治国思想工作有哪些具体功能。因此，在工作部署、督促检查、措施落实中存在一定的盲目、虚化、弱化等问题，并且在依法治国中出现思想政治宣传“跟风应景”“虎头蛇尾”现象，思想政治工作缺乏持续和深入，难以对社会形成法治观念的教育。

2. 对依法治国思想工作的地位认识模糊

“思想政治工作是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在依法治国中具有其他任何方式和手段都无法替代的功能。但从顺义区来看，有些单位领导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对依法履职和本部门工作法治化的促进作用，弱化依法治国思想工作的地位，片面地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务虚”的工作，是政工部门的事情。所以，在部署、安排本单位、本部门工作时，经常出现思想政治工作让位于本单位、本部门承担的具体业务，让位于全区经济工作。还有部分领导认为在依法履职时做思想政治工作既费力又耗时，还没有什么效益，属于可有可无的工作。所以，在实际的执法、司法和其他履职工作中，只强调依法办事，基本上不太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也无从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对法治工作的支撑和滋养作用，往往出现法治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相分离，致使法治工作陷入孤立无援的窘境。

3. 尚未搭建起依法治国思想工作功能发挥的平台

公民的法治意识是法治国家形成的基础，而全民法治意识的养成需要充分挖掘、搭建和合理运用各种宣传教育平台，开展形式丰富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然而，顺义区当下依法治国思想工作主要寓于全区各国家机关自行组织的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日常业务培训课等狭小的课堂空间，功能发挥并没有搭建起相互协同、分工负责的平台，这就导致全区依法治国思想教育的对象主要为基层领导干部和公务员队伍，而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村居民自治组织等机构或组织中的作为法治主体基础的普通群众则因缺乏有效的功能平台，而很难获得接受系统法治思想教育的机会。

4. 依法治国思想工作功能发挥缺乏统一的教育内容

依法治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直接决定着其工作的实效。从顺义区依法治国思想教育的内容来看，具有行政执法职能的各单位不仅在本单位职工中开展的法治思想的培训较少，而且针对公民的关于法律意识、法治思维、法治价值、法治理念以及思想政治工作与依法治国相互关系的教育内容则更为不足，通常以法律宣传、案例引导等普法形式代替依法治国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且其教育内容主要围绕本部门执法工作展开。而行政执法机关之外的其他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组织和单位，由于尚未完全认识到依法治国思想工作的功能价值，除零星地开展一些有关法治常识的教育外，很少有较为系统的与法治有关的内容。教育内容的碎片化、教育时间的非经常化使得各类受教育者很难形成整体性的关于法治的意识。

5. 对依法治国思想工作缺乏有效的绩效评估机制

随着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逐渐深入和细化，因思想政治工作绩效考核缺失导致的全面依法治国推进缓慢的问题日益显现，主要表现在：一是在确定受教育对象法治意识阶段出现脱靶现象。有关单位或组织因调研缺失或不充分，对受教育者的法治底蕴缺乏精准把握，导致制订不出符合实际的依法治国思想政治教育计划，工作无的放矢。二是在依法治国思想工作落实阶段，没有建立动态化的实施体系。思想政治教育应当有严格的实施体系，做到有目标、有计划、有措施、有检查、有奖惩。但顺义区目前并没有建立起必要的干部队伍、工作动态、组织体系、工作责任制、部门协同管理以及教育成效评价等有效的实施体系，导致依法治国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具有不连贯性或偶发性。三是在督促检查考核阶段，没有构建起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也没有形成检验教育成效的评估方法，缺乏对依法治国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进行客观全面的思考与总结。

(二) 成因分析

1. 依法治国思想政治教育干部的能力有限

目前，顺义区各机关、企事业单位、村居委会中负责依法治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干部法科出身或研修法律的人数较少，具有法治素养的政工干部的不足导致依法治国思想工作往往沿袭思想教育的传统功能，对依法治国的精神实质触及不深。而一些具有法律知识和法治思维的干部往往不具体负责法治教育工作。这种懂行的不参与，参与的不懂行的现象，导致思想政治工作很难对法治的推进起到支撑和滋养的作用。

2. 缺乏专门的负责依法治国思想工作的协调组织

依法治国是一项须各方都必须参与才能推进的伟大工程。顺义区虽然成立了依法治区委员会来落实依法治国工作任务的宣传、协调、督促、检查，但由于该委员会主要成员单位以国家机关为主，覆盖面有限，很多社会主体或村居委并非其参与单位，导致大量的企事业单位和村居委员会依法治国工作出现了盲区，而依法治国思想工作则成了盲区中的盲区。可以说，正是由于专门的负责依法治国思想工作的协调组织的缺失，才使得该项工作的功能得不到应有的发挥。

3. 普通群众作为依法治国主体作用没能有效发挥

很多老百姓对法治存在认识误区，认为搞法治就是治老百姓，故对政府推进型法治存在心理抵触，加之政府对于依法治国相关政策的宣讲力度不足，行政执法和司法中存在一定的滥用权力、违反法律的现象，以及没有建立起良好的依法治国思想工作沟通与表达机制，现实中老百姓很难真正实现其知情权和监督权。“塔西佗陷阱”的存在，使得依法治国思想工作很难调动起长期处于人治环境中的老百姓对法治的参与热情。

4. 工作效果难以设置合理评估指标体系

依法治国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软行为”，其对各种利益关系的调节以及对各类社会矛盾的处理主要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这是由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性质决定的。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在依法治

国中所发挥的功能通常不可能立竿见影，而是表现出很强的潜隐性。该特点决定了对依法治国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效果在短时间内很难给予科学的评价，而设置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则更加困难。

5.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平台运用不充分

网络作为依法治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平台，目前其在顺义区依法治国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功能发挥不太理想，表现在：一是缺乏能够将思想政治教育、依法治国知识和网络技术有效融合的专门人才和对全区居民开放的依法治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门户网站，也没有建立与教育对象进行沟通和交流、传递依法治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微信、QQ、微博等新媒体交流工具；二是未能对网络空间予以净化，一些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相符合的杂音、非主流思想不能及时澄清；三是教育形式单一，缺乏互动交流的渠道和平台，难以激发教育对象接受教育的兴趣，也很难最终影响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并达到引领思想、解难释疑、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重要功能。

四、提升顺义区依法治国思想工作功能有效发挥的路径选择

虽然前述各种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顺义区依法治国思想工作功能的发挥，但社会转型所带来的重大变化，却给其发挥功能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场域。要想进一步发挥思想政治工作滋养和支撑法治的功能，就必须直面问题，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

（一）提升法治教育的实际效果，夯实“关键少数”的认知基础

1. 量体裁衣，制定精准化的法治理论教育内容体系

针对当前基层领导干部自觉学习研究法治理论主动性低，法治认知表面化，存在“经济上，法治让”的现象，区委应当建立经常化、制度化的学法计划。通过摸清领导干部法治底蕴，量体裁衣制定精准的法治教育内容体系。区委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应当按照区委

学法计划，系统开展宪法法律和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教育，确保各班次学员都能够有机会学习宪法和执政必须掌握的有关法律知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基本内涵、基本范畴、基本原理以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2. 创新形式，增强法治理论教育实效

一是建立领导干部“逢会必讲法，逢会必学法”制度，突出法治教育的地位；二是建立领导干部“亲自讲法”制度，倒逼领导干部强化学习实效；三是建立领导干部“依法析案”制度，提高其法治思维能力和运用法治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四是建立领导干部“法治引导”制度，对党员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因法治建设落实不力引发的不满、抵触、对立等心理或情绪要掌握话语的主动权，强化正向引导，增强走法治之路的信心。

（二）整合法治教育资源要素，加强法治宣传组织保障

1. 坚持并落实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法治宣传教育的原则

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普法工作的领导，按此要求，一是区镇党委政府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二是要科学设置依法治国思想政治工作功能发挥的协调组织构架，尽可能把各方面力量凝聚起来，必须做到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三是落实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强化法治宣传责任制。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把各单位各组织落实法治宣传教育情况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对部署不周、落实不力者必须问责。

2. 健全普法教育工作机制建立齐抓共管工作格局

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的要求，宣传、文化、教育部门和人民团体就必须在普法教育中发挥职能作用，同时在全区范围内分层建立由各单位各组织共同参与、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一是在区镇党委政府领导下分层建立各层级有关部门间的顶层协调机制，明确各自分工和职责，力争做到权责明确，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二是制定和完善工作奖惩制度，确保制度明确具体，避免吃大锅饭、出人不出力，或者自扫门前雪等现象出现；三是建立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等以案释法制度，搭建统一的以案释法平台，定期开展释法活动；四是进一步加强普法讲师团、普法志愿者队伍建设，整合各单位师资力量和其他资源，实现资源的互通有无和信息共享；五是抓实中小学法治教育。建立中小学法治教育督察机制，对每学期落实学法计划情况进行不定期督察。

3. 充分发挥各单位工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

一是工会组织要积极承担起本单位党政领导与职工之间沟通的任务，增强彼此思想和工作上的了解，提高党政领导工作的针对性和增强职工配合工作落实的自觉性；二是工会组织要加强职工的法治理念的教育，通过开展法治理论和法律实务的宣传、法治知识竞赛、职工维权案例讨论等多种方式帮助职工提高法治意识；三是工会组织应当加强对法治意识较高职工的举荐工作，调动其推进法治宣传的主动性。

4. 更加重视村居委会在依法治国中的作用

一是政府应加大村居委会法治宣传教育经费的投资力度，解决村居委会组织法治宣传教育的后顾之忧，让法治教育的触角延伸到每一个角落；二是村居委会应当积极作为，加强与村居民的沟通交流，了解群众法治底数和需求，引导群众行为符合法律规定。

（三）丰富依法治国思想政治功能发挥的载体，搭建多元多样工作平台

1. 注重传统文化教育，引导公民修身修德

一是可以通过校园、家庭、机关、军营以及社区等不同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来承载和传播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凝结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观念再现出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品德修养，包括建设图书馆、文化长廊、文化广场、博物馆等文化服务设施，提高群众的基本文化素养；二是开展富有竞争性的群众法治文化服务活动，打破政府自上而下的供给

模式，满足群众多样化的法治文化需求。

2. 牢控思想政治教育传媒载体话语权，强化法治观念引领力

进一步健全媒体公益普法制度，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文化传媒应当坚守传播阵地，抓牢思想政治教育传媒载体的话语权，选择构建贴近群众生活、符合群众利益诉求的法治议题进行优先报道，来影响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点和关注度，发挥传媒载体的舆论导向功能。可以借鉴央视6集专题片《法治中国》模式，将本区法治发展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人物、法治成果、法治讲座、公开庭审实况等制作成片，通过电视台、微信公众号、微博、QQ等传媒进行传播，打破过去法治教育局限于本单位的桎梏，扩大法治理念的传播面。

（四）准确定位依法治国思想工作功能，提升宣传教育实效

充分发挥依法治国思想工作功能，是开展普法教育工作的基本方向和目标，也是依法治国全面推进的前提，为此，必须做好如下两方面的工作。

1. 准确定位依法治国思想工作的功能

这是普法教育工作的逻辑起点。对于依法治国思想工作的功能，目前没有统一的认识。我们从思想工作功能与依法治国相契合的视角，将其功能定位为以下6个方面：①思想启蒙功能，就是通过思想工作启迪和开导社会反对蒙昧、落后、专制和迷信，打破旧有的思想观念，传播新思想、新观念的功能；②思想凝聚功能，就是用特定的思想观念把分散的、千差万别的个体的多元化思想通过思想教育凝聚成一种相对统一的思想的功能；③关系协调功能，就是思想政治工作者通过一定的思想工作方式，正确处理组织内外各种关系，使各种利益相关主体相互支持，和谐配合，为社会正常运转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以促进国家治理目标顺利实现的功能；④舆论引导功能，就是思想政治工作者通过对有关信息的组织、选择、解释、加工和制作来影响公众舆论的耗散状态，进而促使其向着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变化的功能；⑤社会控制功能，就是对社会秩序予以规范的功能；⑥正向激励功能，就是思想

政治工作者对激励对象通过肯定、承认、赞扬、奖赏、信任等具有正面意义的激励艺术，调动社会大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的功能。

2. 完善依法治国思想工作功能发挥的制度机制，提升教育实效

当前，在人治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最根本和基础性的工作就是开展普法宣传，确立支撑整个法治大厦的精神层面的意识与观念，开发法治社会内在灵魂的“软件”系统^①，培养全社会对法治的虔诚信仰，破除“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权大于法”等非法治行为和思想。一是建立普法宣传教材统编机制，确定统一的宣传内容，主要将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作为法治宣传教育的核心内容，以提高对法治的共识，达到思想启蒙和思想凝聚的目的；二是建立宪法日主题活动制度，在城市公园、街道或者其他公共场所开展形式多样的“宪法与我们的权利”的主题活动，唤起民众对宪法的尊重和对自身权利的珍惜，唤醒人民群众对法治精神的遵从；三是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完善守法诚信褒扬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健全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制度。通过联合施治，确实做到让守信者一路绿灯、失信者处处受限，从而形成引导社会成员诚实守信的正确导向。通过这些制度机制的整合落实，一方面能够为法治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另一方面则扫清了公民法治意识提升的各种障碍，从而为法治宣传教育取得成效奠定坚实基础。

（五）建立依法治国思想政治功能发挥的绩效评估机制，提高工作动力

1. 着眼评估的督促功能，建立政策引导机制

所谓政策引导机制是指在绩效评估工作中通过制定表彰、奖励、批评、处罚等与受评对象切身利益和发展前途相关的激励性、导向性政策，促进受评对象全面发展，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机制。为此，

^① 姚建宗：《信仰：法治的精神意蕴》，引自《法律信仰——中国语境及其意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一要设计多样性奖惩政策，对思想政治工作者在精神、物质、职位、机会等方面给予奖励或惩处；二要使所定奖惩政策具有适度性，能够为实现思想政治工作对依法治国功能发挥提供动力；三要使政策体现科学性和合法性。政策内容既要符合党和国家政策、法律要求，又要确实能够激发受评对象的积极性，不能因政策引导不当而阻碍工作发展。

2. 加大智力投资，建立技术支撑机制

一是委托第三方专家制订评估实施方案，包括：受委托开展调查，设定评估指标体系；制订评估方案和明确评估目标；对评估结果的质量进行检查，制作评估报告。二是建构各种科学的评估模型，用于检验评估方案、评估计划、指标体系的信度和效度，对评估信息原始数据的处理和对各种评估信息的综合分析，对评估最后结果的评议定性，充分发挥数学模型在评估工作中的技术支撑作用。三是在思想政治工作功能发挥效果评估过程中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与方法，实现“评估工作数字化”，促进评估的理论、实践与技术的有机融合。

3. 完善教育管理措施，建立科学的心理调适机制

一是完善思想政治工作功能发挥绩效评估的宣传机制。通过正向价值引导，切实消除评估委托者普遍存在的畏难情绪、应付心理、好人主义、关照心理、从众心理等；消除受评估者容易产生的厌烦心理、轻视心理、恐惧心理、应付心理等。二是建立公正的目标管理机制。为克服评估工作中的盲目性、随意性，避免思想政治工作功能发挥的效果评估出现软、虚现象，必须建立公正的目标管理机制，包括：建立评估任务分解机制和互为制约的责任机制，确保任务到人、责任到人；建立与目标管理相适应的保证体系，做到奖罚分明，确保评估科学、客观、公正。

4. 合理确定评估权重，建立各种评估方法优势互补机制

思想政治工作功能发挥的效果评估会涉及各种非常复杂的因素，必然面临各种不同评估方法的使用，为不影响评估结果的客观公正，应当在对各种评估方法优劣进行判断的基础上，合理确定不同方法在评估中的权重，确保各方法都能体现出其本身的优势。一是要把定性评估与定

量评估结合起来；二是要把比较评估与达度评估结合起来；三是要把动态评估与静态评估结合起来；四是要把显性绩效与潜性绩效结合起来；五是要把第三方评估与群众满意度结合起来。

课题负责人：常有有

课题组成员：吕冬冬 张文婷

金隅集团跨越式发展过程中 区域党委组织力建设调查研究

中共北京建筑材料集团总公司委员会党校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强和完善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使国有企业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不断开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新局面。

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金隅集团在不断改革发展的进程中，随着2016年战略重组冀东水泥集团，再到2018年控股天津建材集团，三年两大步的跨越式发展，为金隅集团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集团的员工人数也由过去的3万多人增长到近6万人，企业遍布25个省市，集团的跨区域生产和经营的特征也日趋凸显。为了更好地在国有资本跨区域的布局中，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企业党建工作重要论述的精神，更好地实现管党治企，金隅集团党委根据2004年中组部提出的“区域化党建”概念，立足自身实际，在集团内开展了区域党委的实践。本课题旨在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区域党建工作的机制、方式方法和内容的基础上，对有效推进国有企业区域党建工作的全方位创新以及区域化管理和区域党组织建设进行探索研究。

一、建立国有企业区域党委的重大意义

（一）企业区域党委提出的背景

第一，个别国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党政“两张皮”现象。过去，在一些国有企业，尤其是生产型企业中不同程度地存在重业务、轻党建的现象，没有充分发挥好党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对企业的长远发展非常不利，长此以往也必将对国企坚持党的领导和正确的发展方向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上明确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别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尤其在企业并购重组的过程中，体量不断增加，企业的改革发展、转型升级、内部活力激发等深层次问题亟待解决，面对新形势，创新国有企业党建模式，真正落实“一岗双责”的要求，使党建工作和生产经营工作深度融合、互相促进，既能从源头上解决好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弱化、淡化、虚化、边缘化”问题，又能坚持以党建工作为引领，做好生产、创好效益，扎扎实实做好企业的各项工作，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传统的党建模式不能适应跨区域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和对党员的有效行为协调。传统的党建路径依赖于固有企业的基层党组织，具有明显的横向闭合性，这使得资源常常以内循环的形式被局限于企业内部的流通整合。而在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尤其在跨区域的生产和经营的大背景下，更需要实现资源分配的多元化和流动性。同时随着近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深入推进，重组并购已成为市场的新风向，随之而来的就是国企党员规模的扩张和党员构成的复杂多样，例如党员的地域流动性有所增强等。而面对这一新情况，传统的党建模式在维系组织行为的统一性上面临着种种问题，无法有效地实现对跨区域党员的行为协调，无法发挥国企党建“以人为本”的

优势。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提出要通过信息化手段应用来推动党内管理、发展党内民主，为党和群众的联系提供更多渠道，不断提升基层党建工作的信息化水平，执行党的工作使命，发挥基层党员干部的模范先锋作用，真正巩固党的地位。党的十九大继续针对党建工作做出指导，要求创新基层党建工作载体，提高基层党建工作水平。

（二）企业区域党委的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强企业、农村、机关、事业单位、社区等各领域党建工作，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区域化党建正是近年来创新基层党建的重要探索。

虽然目前的区域化党建的实践主体基本都是街道党委和社区党组织，但是金隅集团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积极探索创新国企治理体系，主动落实新时代国企党建要求，在国有资本跨区域布局中从实际出发，从2017年开始，就针对国有企业区域党建工作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在基层党的建设和经营管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企业区域党委，即集团所属区域党委，是指由地理位置相近的两个以上集团考核单元组成的党建和经营共同体，是集团党委所属区域党的基层委员会。根据发展布局 and 战略需要，集团党委动态调整区域党委管理范围、空间跨度和主要职能。其基本职责是发挥领导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领导区域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班子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确保区域企业改革发展稳定和重大事项决策落实，解决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对区域全面从严治党负主体责任。近年来，金隅集团一直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以“扁平化、专业化、区域化、信息化”为管理原则，大力推进区域化管理和区域党组织建设。

（三）企业区域党委的重要意义

企业区域化党建作为国有企业基层党建创新的有益探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要思想理论的基层党建工作需要，是适应党建实践发展、回应时代挑战、破解国企改革诸多矛盾和困境的良策，对于新时代国企基层党建工作水平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实现了企业基层党建功能的系统优化。企业区域党委是以保持党的先进性为目标，以实现党组织和工作全覆盖，增强新时代党建工作有效性为主线，按照区域统筹的理念，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统筹设置党组织，整合利用党建资源，统揽建设党员队伍，共享使用党建阵地，推进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资源有序流动、有效配合和优化重组，实现组织效能发挥最大化、教育管理效果最优化、组织工作成本最低化和工作力量配备最强化。

第二，实现了企业基层党建的科学化和现代化。区域党委以党建主体多元化为特征，突破了传统单位制党建的封闭性，将党建生长和发展触角从纵向封闭的“单位”转到开放的“区域”，通过集团区域内各个党建主体的共建共治共赢，实现对党自身的再组织和对企业资源的再整合，并突破传统企业基层党组织的属地管理，加以利益协调等柔性方式来实现国企基层党建的科学化和现代化。

第三，实现了企业基层党组织的跨区域资源整合功能。企业区域党委能充分发挥内部整合功能，一方面，可以支持区域资源集中优化配置的有序推进，在设立区域实体和虚拟部门的基础上，分阶段分步骤分类别实施对管理范围内的干部、人才、供应、技术、质量、安全、环保、公共关系和党的建设等要素的统筹安排，释放区域化红利；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建立企业区域化党建云平台，嵌入网络空间，充分发挥跨区域的整合功能，优化党务工作流程，提高党务工作管理效率。

二、金隅集团区域党委运行总体情况

集团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提出“扁平化、专业化、区域

化、信息化”管理原则，稳步推动企业领导体制机制改革，大力推进区域化管理和区域党组织建设。几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深化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取得了“强化引领、提升合力、压实党建、推动创新、加快发展”的明显成效。

（一）区域组成结构各具特点

金隅集团所属区域企业在组成上从不同维度可分为几种类型。从体量规模构成看，分为大小组合的“伞型”区域和均衡组合的“蘑菇型”区域。从企业股权结构看，分为全资为主的“一元型”区域和股权多元且合作方参与管理的“混合型”区域。从主营业务构成看，分为主业单一的“生产型”区域和产业链延伸的“市场型”区域。从空间距离角度看，分为相邻相近的“地缘型”区域和相距较远的“分布型”区域。从发展沿革过程看，分为改革推动形成的区域和自身滚动发展形成的区域。总体来说，区域间实际情况虽自有差异、各不相同，但共性特点是区域化效果较好，干部职工认可度较高。

（二）区域领导作用有效发挥

改革推动形成的各区域，目前为“党委领导+企业经营+区域协调”模式，企业之间虽无股权隶属和管理层属关系，但通过区域党委发挥全面领导作用，其他治理主体各司其职，推动了区域化运行，促进了扁平化管理。一是党委全面领导。各区域党委着力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上下功夫，引领企业高质量落实集团战略部署。各区域均建立健全了党委“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和配套议事规则，普遍完成“党建入章”并明确党组织在企业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明晰常委会的职责边界和发挥作用的工作流程。企业党员经理和班子主要同志一般进入区域党委会，实现交叉任职，保证企业重要事项经党委会前置研究，同时也将集团和区域意志充分带到其所在企业。各区域党委的领导地位已经形成，领导作用发挥较好。二是党政有效配合。区域党委书记兼任企业股权代表和法定代表人的制度设计，突出了责任人职责，理顺

了责任人与保证人的关系，确保“把方向”与“抓落实”相得益彰。党委书记作为区域责任人，能够突出主责主业，领导区域党的工作，主抓区域重点、难点和战略性任务，协调区域外部环境建设，支持区域各企业经理履行职责。经理作为企业保证人，在经理办公会职责范围内，研究和推动所负责企业生产经营具体事项，落实区域党委会决策，带领经营班子抓执行、抓落实。三是企业潜心主业。区域所属企业的经理一般兼任所在党组织的书记，“一肩挑”的安排有利于工作融合、避免“两张皮”，企业保证人带领团队围绕区域目标和企业目标，专注于工作落实的推动。

（三）区域资源力量有效共享

实现区域化党建以来，集团各单位结合实际推动资源共享、挖掘协作潜力，促进整体效益最大化，有效实现了“1+1>2”的改革初衷。一是推进共性统管。“生产型”区域普遍集合共性职能纳入统管，促进集约高效、标准统一、步调一致，提升管理效能；“市场型”区域亦结合实际，着力推进“能统尽统”。二是发挥班子合力。实现党建区域化之后，企业经营班子成员间的协同配合，得到空前增强，他们在发挥个人专长优势、服务区域整体工作上多有作为。三是促进优势互补。“伞型”区域积极发挥以大带小优势，“蘑菇型”区域充分推动企业间互补互鉴，增强叠加效应，滚动发展型区域着力推动资源配置向一线倾斜。各区域通过资源共享与优化配置，加快了一体化管理，有效实现了区域利益最大化。

（四）区域生产经营发展水平明显提高

集团各区域党委能够保持较高站位，主动“啃硬骨头”，多做“爬坡过坎”的工作，聚焦难点、长远、前瞻性问题，统筹谋划推动区域发展，提升区域竞争力、影响力和辐射力。一是推进“政企协调”。区域党委致力于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抢抓政策机遇，争取政府资源，增强企业可持续发展后劲。有的企业区域党委积极协调各方，集合力量攻坚，

推动其公司部分遗留问题化解，在房地取证、资源储备、资产盘活、矿界规范及陈年清欠等方面取得成效；有的企业区域党委着力推动万吨线项目加快落地；有的企业区域党委充分利用区位优势中标雄安等项目，积极参与国家新区建设。二是持续“产销协同”。不少企业区域党委发挥生产企业优势，主动作为，与营销公司联合起来打组合拳，开拓市场、经营市场，努力增强市场影响力和话语权。有的企业区域党委书记直接冲在区域市场协同的最前沿，主动协调各方，积极改善环境，推动了区域化在产业链上的延伸。今年以来，多部分区域实现量价齐升、产销联动，有的全面提前完成年度指标任务。三是深化“内部统筹”。坚持眼睛向内，强身健体，在区域挖潜上做文章，持续释放区域化红利。有的企业区域党委每月召开区域经营分析会，优化各项对标指标，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同步区域管理，提高整体管控水平；有的企业区域党委深化区域一体管理，加大内部交流、信息共享和相互学习，巩固产品质量，提高服务质量，开展降耗降成本，显著提高了区域整体盈利能力。

（五）区域党建格局初步确立

集团各区域党委对所属企业党的建设力度不断加强，基本做到“四同步”“四对接”。一是组织运行区域化。各区域党委推进党建一体化管理，普遍成立区域化的党委工作部门和群团工作机构，配齐配强工作力量，对党建任务统一部署、统一开展、统一评价。二是工作覆盖区域化。各区域党委推进管党治党向下延伸，提升“两个覆盖”水平。三是作用发挥区域化。水泥板块各区域党委主动推进“联建共创”，党建活动与水泥营销公司共享资源、联合开展，一体谋划推进。集团党委对各区域的政治、思想、组织引领不断强化，基层企业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挺进，区域化创新实践走向深入，区域企业发展呈现欣欣向荣的发展前景，取得了系统推进、整体见效的可喜成果。

三、金隅集团区域党委组织力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

在区域化改革中，集团所属区域党委能够勇于探索、积极实践、主

动作为，但对比全面从严治党要求、集团党委改革目标和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求，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在深化改革中持续改进和完善。

（一）党委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问题

区域党委发挥全面领导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企业经营班子抓执行落地、抓生产经营，企业所在党组织发挥保障和战斗堡垒作用，这几个主体在运行中的问题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党委与所属党组织的问题。各党委对区域“三重一大”事项一般分类定量做出界定，范围之外的事项由企业研究决定，而企业研究方式多样，有党组织会议前置研究、办公会直接讨论决定、党组织会议部分把关等，而干部人才、党内事务、涉及职工利益等事项若不经基层党组织酝酿和讨论直接上区域党委会研究，有悖党的组织原则，需要予以明确。二是经理办公会与本级党组织问题。企业所在党组织均为党总支或党支部建制，一方面若按现行安排，则区域党委与企业经营班子为同级，而企业党组织与其经营班子不同级；另一方面因党委驻地企业党组织沿袭已有设置，没有与驻地企业作为考核单元相对应的本级党组织（一般为党总支），该企业经理亦没有“一肩挑”的条件，这又与区域其他企业形成了不一致。

（二）党的建设与中心工作紧密融合的问题

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重在将党的优势转化为生产力，更好地服务发展大局，区域化党建格局下的融合不充分问题主要存在于3个方面。一是党政协调方面。在区域党委班子与企业经营班子“1+N”模式下，一些区域党委存在抓得多、管得细、统得全的趋势，这与抓大放小、抓主要矛盾、抓引领带动的总体要求不相协调，需要进一步明确。在企业层面，所在党组织的功能定位不统一，有的赋予把关定向职能，有的仅为党员教育管理，导致企业党组织融入生产经营的方式不同、深浅不一。二是资源共享方面。各区域党委推进区域协同、资源共享的差异较大，既有范围、力度的不同，也有方式、途径的各异，需要从共性要求上提出基本原则，从而确保党委在服从服务工作大局的方向上不偏离。

三是区域党建格局方面。在推进京外企业党的建设属地管理上，有的存在“一头热”，有的效果不明显，需要从导向上予以改进。在生产企业与营销公司的关系上，两者业务关联、区位相近、联系紧密，生产企业党建力量相对较强，营销党建基础一般偏弱，需要在党建一体化上完善设计。

（三）党建保障与重心下移的问题

主要是现状与目标不相称，保障投入不够充分。一是组织建设方面。现行做法一般为区域党委下不再设党委，这与党组织设置基本制度相悖，易产生“大型党支部”这种须纳入整改的情况。区域党委在组建过程中，普遍抽调企业同志加强区域党务部门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企业的党建资源。二是力量配置方面。存在党委书记向下兼职，以及党员经理未兼任企业书记的情形，这与区域化目标不一致。存在区域部门和人员较齐整，而企业部门设置和人员配置未跟上的情况，造成了头重脚轻。一些企业存在党务人才流失快、选人用人难的困境。三是投入保障方面。存在党组织书记和党务人员能力素质与新时代新要求不相适应的地方，亟须多维度加强教育培训。优秀党组织书记成为稀缺资源，需要从满足长远需要、加快梯队培养方面做好规划。同时，党建工作与互联网等新技术应用相结合还不够，致使信息化程度不够高。

四、进一步加强集团区域党委组织力建设的对策建议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的：“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围绕集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战略和“扁平化、专业化、区域化、信息化”管控变革方向，坚持在深化改革中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不断加强党的基层建设，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就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和改进建议如下。

（一）从推进区域管控体系改革上提升组织力

把握区域定位，聚焦区域发展，改革区域管理，不断为区域化管理注入新内涵。

一是推进班子统一管理。坚持条件具备一个、实施一个，在股权隶属、委托管理的基础上，稳步推进经营班子整合，解决党政班子“1+N”问题。其他区域若有经营班子整合需要，亦可采取经理兼职、副经理统一分工的方式实现。通过班子统一管理，进一步促进区域党政协同、经营融合。

二是推进业务统筹管理。各区域结合自身实际，以优化资源配置、增强区域合力为导向，分类实施对管理范围内的“人财物”“产供存”“技质环”等要素和资源的统筹安排，促进集约化经营、规模化管理。

（二）从完善区域协调运行机制上提升组织力

明确区域相关主体主责，理顺党政负责人职责边界，促进治理主体之间顺畅协调，构建高效的区域运行体系。

一是探索建立职责权利清单。围绕党委“管大局”、决定“干不干”，以及经理办公会“抓落实”、研究“如何干”，各区域党委对相应职责权限进行梳理，经过充分讨论形成共识，制定与本区域相适应的职责权利清单。

二是强化区域协同共享机制。区域党委统筹推进企业间的协调配合，确保区域利益最大化，整体发展最优化。用好考核激励手段，发挥评价督导作用，促进区域资源优化配置，发挥各企业合力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

（三）从完善区域化党建工作格局上提升组织力

坚持落实制度，落实标准，建立健全与区域化相适应的党建工作机制和格局。

一是沿着资本与管理链条推进管党治党。企业党组织隶属关系原则

与资本或管理关系相一致，区域企业党组织一般不实行属地管理，直接隶属区域党委，区域党委原则隶属二级集团公司党委。由于发展需要和历史原因，确需暂时属地管理的，要对接县处级以上党委，做到党的建设以区域党委管理为主。区域企业共青团组织与党组织关系保持一致，工会组织在驻地实行法人管理的同时作为区域工会的分会发挥相关功能。

二是将相关方党的建设纳入区域党委共管。坚持区域就近、资源共享、联建共创，把水泥营销公司党的建设纳入区域党委，与二级集团公司党委共同管理，做到组织共建、教育同抓、活动联办，区域纪委配合二级集团公司纪委加强对营销公司的党内监督，营销公司党组织主体责任保持不变。

三是与时俱进改进基层党组织设置。为确保党组织设置规范化，并兼顾企业驻地开展工作需要，区域各企业党员人数达到 50 人的设立党总支部，达到 100 人的设立党委，党组织建制随党员人数变化及时动态调整。为促进党政统一协调，建议区域党委驻地企业增加设立本级党组织，该企业党员经理兼任该党组织书记。

(四) 从加强区域建设的基本保障上提升组织力

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切实抓好基本队伍，强化基本保障，不断提升组织力。

一是大力建设党组织书记队伍。把各级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把优秀同志选拔到书记岗位上来，把书记岗位作为培养锻炼复合型干部的必要阶梯。着力抓好区域党委书记的选配工作，明确政治突出、能力全面、经历复合、素质过硬等具体化、系统化的任职条件，针对性设立培训提升课程。持续着力加强党支部书记队伍建设，支部设置一般与经营、作业单元相对应，促进工作融合、便于活动开展，党政原则“一肩挑”，必要时设立配备专职副书记。对一线兼职党支部书记和党务干部，可以给予一定工作补贴，纳入企业统一考核管理。

二是加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本着精干、高效和有利于党的工作原

则，着力加强党务干部队伍建设与力量配备，区域各企业须配备专职党务工作人员，区域党委要选优配强各类党务干部，不断提高党建专业化水平。健全党务干部与经营管理人员轮岗交流机制，完善区域企业之间的人才流动、锻炼提升、梯队建设等制度，促进资源融通、交流互补，发挥好人才队伍作用。

三是规范党务部门设置。区域党委所属党的工作部门和群团组织办事机构，要按规定设置到位，原则上单独设立，区域党员人数较少的可合署办公。区域各企业要坚持党务工作部门应设尽设，可与相关部门合署办公，确保重心下沉、基本工作落地。区域内的股权多元化企业，党务工作部门应挂牌明示。区域各企业应加强党建阵地建设，充分满足党员学习教育和党组织活动需要，视觉识别上要充分体现庄重严肃。

（五）从夯实区域党建工作的基础上提升组织力

一是抓好基本运行。规范和精简制度建设，集团制定的共性制度和二级集团公司发布的指导文件，区域不再重复制定，直接执行落实，涉及区域建设的个性化制度文件，由区域统一编制，区域各企业要减少新的党建制度安排。按议事规则规范组织召开各类会议，做好会前准备，避免议而不决，一般性会议可采用视频电话会议等方式召开；抓好党内基本制度执行，落实规定动作，增强规范化水平。注重提高党建信息化水平，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增强活动效果，提高工作效率。要落实好中央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的相关精神，会议、检查等进一步务实精简，减少重复报表，避免文山会海。

二是加大教育培训。集团层面抓好党组织书记培训，针对性设计对区域党委书记的培训方案；集团和二级集团公司共同抓好党支部书记轮训和党务干部培训，覆盖面适度扩大到副书记、支委和兼职党务干部；区域党委抓好党员教育和积极分子培训。通过多层次教育培训，进一步增强区域党委战斗力，帮助党务干部克服管党治党专业性不强的问题。鼓励通过多种方式，组织开展党委之间、企业之间的交流观摩，促进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共同推进区域化治理。

三是深化两个覆盖。各区域党委要坚持“四同步”“四对接”，落实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实现党员和党组织在生产单元全覆盖，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先进性、积极性、能动性，不断把党的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的竞争胜势。

总的来说，企业区域党委组织力建设必须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企业党建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移坚持以人为本，坚定不移搞好企业党建工作，牢牢把握新形势下企业党组织组织力建设的正确方向，不断克服和抵制不良思想文化的影响与侵蚀，及时排除和战胜各种错误认识对企业改革的干扰，从而为企业改革和发展提供可靠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课题负责人：应 超

课题组成员：王 岑 王怀斌 刘 哲 吴凤山

杜士卿 牛庆亚 关文婷

乡村共同体文化与农村养老

——乡村振兴战略在农村养老文化建构中的 经验、问题及对策研究

中央财经大学

一、农村养老现状：断裂与转型

家庭困境：老“乏”所养。当前传统的“中国式养老”及其价值体系“孝”正面临严峻考验，中国农村的养老困境产生的直接原因可概括为4个方面：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家庭经济权力的代际转移，人口流动导致的代际分离与养老供需失衡，家庭养老文化减弱。传统孝道在整体家庭养老的约束和监视作用衰减，这既来自代际双方的默认与实践，也来自社会公共道德的让步与撤退。

乡土困境：老“乏”所依。整体乡村生活中的解构与重组对农村老年的生存境遇也产生深刻影响。首先，从整体社会层面来看，社会转型下的中国农村，乡土社会松散，礼治权威的流失与解体和公共生活的减少（应星 2014；赵旭东和张文潇 2017）。其次，从人与人的关系层面而言，乡土村落不再是“守望相助”的关系群体，亲朋邻里关系的疏离已不可避免（王跃生 2017）。有研究表明中国农村老年人可能依赖的社会支持网整体脆弱：包括新农保、基础养老金、机构化养老、基层政府养老工作等正式制度化资源严重不足，效果有限，亟待完善（刘燕舞 2013；张川川和陈斌开 2014；方黎明 2016）。社区及社会在农村养老资源配给上不足，老“乏”所依不容忽视。

以上已基本勾勒出当代中国农村养老的基本情境与现状，综观家庭养老困境及其背后原因，均与中国整体社会转型密不可分。从我国学者

对于社会转型的分析与预测来看，今天的中国农村社会生活被整个社会转型所影响，并处于新旧转型过程之中，不是非旧即新、一蹴而就的新旧交接，而是正在经历有学者曾经预言的“旧的体制被打破，新的体制尚未建立”的过渡时期（李培林 1992）。具体到养老层面，则表现为“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与代际关系受到冲击，而新的可补充或全面替代的养老模式尚未建立起来”。

二、乡村共同体重构的探索

（一）乡村共同体的概念、历史背景与意义

构建“乡村共同体”就是本研究致力探索的理想模型。“一定的地域”“共同的纽带”“社会交往”“认同意识”是一个社区或共同体最基本的要素和特征（项继权 2009），社区成员的认同感、安全感和凝聚力是社区共同体的基本内涵（黄家亮 2014）。西方学者滕尼斯将“共同体”描述为“休戚与共、同甘共苦，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主要是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的群体（家庭、宗族）里实现的，共同体是建立在有关人员的本能的中意或者习惯制约的适应或者与思想有关的共同记忆之上的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等作为共同体的基本形式，不仅仅是它们的各个组成部分加起来的总和，而且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滕尼斯 2010）。当前的中国农村，对于原有的集体及村社区的认同和归属感已经淡化，乡村社区及共同体陷入信任与认同危机。“失落的共同体”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现象，对农村生活产生深远影响，而养老断裂也正是其中的一个反映。然而，传统乡村共同体对于社区生活依然具有价值与意义，有研究表明乡村共同体的共生文化可以提供互惠、互信、互助，有利于减少冷漠和排斥（张小军和雷李洪 2018），也可以为乡村社区治理、社区服务、文化体系的建设提供路径（黄家亮 2014）；社区层面建设共同体也与国家建设要求的共建共享治理格局具有高度的吻合性，社区共同体可以为这一目标实现提供新思路（梁贤艳和江立华 2017）。因此，通过社区整合的机制，

为老年人构建老年友好的乡村共同体，为老人及乡村社区的所有成员培育养老、敬老的认同感、安全感、凝聚力，孕育理念，并引导行动，是本研究极力靠近的理想目标。

（二）乡村共同体的策略设计

当前社会转型与养老断裂进程中，农村社会“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与代际关系受到冲击，而新的可补充或全面替代的养老模式尚未建立起来”，老“乏”所养、老“乏”所依的养老困境也使得农村老年生存质量值得广泛关注。在这一背景下，在可操作的范围内为老人们争取和连接更多的资源，是解决当前困境的有效途径。立足于这一现实，本研究将干预思路与目标确定为：适当修复传统养老模式，挖掘替代性养老潜能；整合社区养老资源，构建老年友好的乡村共同体；最终提升老年生存质量。

1. 西方经验

本研究将西方对社区处于疏离情境下的老人的关爱策略作为重要的经验借鉴。社会脱离理论表明，由于社会关系水平较低而产生的“社会疏离”会使老年人面临多种风险。针对此类老人，1982年至2002年的研究显示，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广泛实施的社区干预方案中，守门人培训（gatekeeper training）制度被证明是最为有效的方案（Findlay 2003）。

守门人培训的特点是：动员和培训非传统社区体系，激励公众参与；能够适用于农村等任何社区环境，适用于多种心理干预活动；连接政府、专家与公众，推动建立以社区驱动为内在动力的社区效能；成本效益合理（Findlay 2003）。守门人培训制度始于1960年的美国，最初用于自杀干预，后推广到更广泛的心理问题干预（Isaac, Elias et al. 2009）。守门人是指与心理问题或自杀风险人群保持联系，并能根据自身对自杀风险因素的认知而将风险个体识别出来并给予帮助的人。守门人，一类是医学、社会工作等专业帮助群体；另一类是在社区层面挖掘没有专业技能但能辨别风险人群的普通社区成员，如老师、牧师、社区

工作者等 (Quinnett 2007; Isaac, Elias et al. 2009)。守门人培训能够帮助守门人发展识别风险人群、评估风险级别、管理特别情况的知识、态度和技能。

2. 西方经验的本土化核心路径

“守门人”模式的本土化策略，与“守门人”的西方模式相较，在“谁是守门人”“干预路径”这两个关键问题上既有借鉴又有创新。“守门人”的西方模式中普通社区成员主要包括：老师、牧师、社区 NGO 工作者等具有一定教育水平且有志愿精神的人；中国本土化方案中，“守门人”成员则主要以基层干部与热心乡邻为核心成员。“干预路径”方面，本土化策略借鉴了西方经验中的“守门人”培训制度、分级干预制度等内容，同时又结合中国农村实际，系统设计为三条具有本土化特色的核心路径：一是强调基层政府（基层干部）引领与参与，提升基层干部对老人的支持；二是培育友邻同伴互助，促进乡邻对老人的支持；三是关注代际养老，部分修复家庭养老模式。

(1) 基层政府角色：引领与参与。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的治理与保障在我国具有广泛的历史与现实基础，也应该是我国开展包括养老服务在内的基层社会公共服务最为有效的核心资源。乡镇干预、村干部，是典型的农村基层治理权威与精英，他们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处于农村经济核心与权力核心（杨善华 2000；吴愈晓 2010）。改革开放前，在“总体治理”模式下，农民与人民公社、公社干部有高度依附关系（应星 2014）。但之后基层权力与农村老年人的联结下降。当前的老年人，出生后成长期所经历的是“总体治理”模式下与地方精英与权力唇齿相依的紧密联系，但目前农村老年人整体上离精英与权力核心越来越远，甚至滑落到整个农村边缘的位置，这进一步加深了老年人的弱势身份与地位。正基于此，“守门人”本土化方案中充分动员作为农村精英和权力人物的基层干部，将其身份从“农村治理的干部”转变为“关怀老年人的守门人”，深入切实组织并参与帮助老人的各类基层服务，既增加老年人获得的正式资源支持，又提升老年人对自身地位的评估，从而促使老年人的生存质量提高。这一路径的设计也恰好顺应了我国近

年来正在倡导的基层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要求，与精准扶贫等重大公益性公共服务在农村基层政府工作中大幅增加（陈颀 2018）、干群关系呈现健康发展的新趋势（邹宇春 2018）相一致。本项目所开展的方案从农村养老层面对基层公共服务的内容加以补充。

（2）同伴友邻角色：互助与关爱。“守望相助”是“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并且中国自古就有邻里互助的传统（景军和赵芮 2015），但当前的中国农村已难以为继。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发现，农村邻里间退化为形式上的比邻而居，实质上的帮助并不多见，而相互关心更是匮乏，这与以往研究发现一致。但在比城市更趋近传统社会的中国农村，乡土同伴友邻互助更具有现实意义，也更可能被启动或唤醒，成为农村养老的重要支持者。本项研究与友邻互助相关的干预内容是多维度的：守门人的身份是多样的，村干部既是基层干部也是乡邻，热心志愿者更是乡邻代表；干预活动中，开展同伴互助是在老年群体内部激发培育朋友邻里间的互助互爱精神；干预活动在干预村社区开展活动中，进一步发挥社会影响力和感召力，培育全社会关爱老年人的基本理念。本研究通过在一定程度上营建老年友好的社区生存环境，帮助老年人强化与乡村邻里之间的关系，并为其建立与他人的互助关系，从而改善老年人的生存境遇。

（3）代际关系：部分修复传统养老模式。代际养老是我国长期孝文化传统的具体实践，也是农村养老不可或缺的关键资源。社会转型与工业化进程中，代际关系较传统松散化已不可逆转，提倡完全修复单纯依靠家庭养老的传统观念已不合时宜，但中国传统家庭却依然是养老特别是情感支持不能放弃也无法忽视的重要资源（贾玉娇和范家绪 2019）。这一背景下，本项研究只将家庭干预定位于整体干预方案中的一个环节，倡导的是部分修复代际关系的理念，以促进家庭支持在养老过程中的存续；其核心是增进代际间互动，特别是代际间的情感联结，促进子女对老年父母的关爱意识与能力。例如在春节这一具有家庭团圆文化意义且子女返乡相对空闲的时间点，在节前节后组织老年人子女参加老年健康知识培训、关爱老年人等相关活动等；在全社会倡导养老理

念，鼓励典型带动社会整体氛围等。

代际关系、友邻同伴、基层政府，构成了一套体系化由内及外、由近及远的社会支持网络。社会网络关系可分为强关系/弱关系（Granovetter 1973；边燕杰 1998）。家庭关系，特别是父母 - 子女关系，从未被质疑是强关系。目前中国农村老人所面临的老“乏”所养，其核心是强关系，特别是父母 - 子女代际关系的弱化（不是“强关系”变成“弱关系”，而是“强关系变弱”，两者有本质区别）；老“乏”所依，是农村社区内其他关系与老人也呈现松散的、互动较少、互惠关系不明显等弱关系特征，在老年生活作用与功能有限，总体上传统乡村共同体的消退更为明显且影响深远。本研究尝试探索建构乡村共同体的中国策略，以“守门人”制度为核心，以促进“代际养老、同伴互助、基层政府引领”为三条本土化路径，实则通过“部分修复强关系（代际关系）”和“强化弱关系（基层政府、友邻同伴）”，实现为农村老年人系统性地整合社会支持资源，促进农村社区整合，构建老年友好的乡村共同体，缓解农村养老困境，提升老年人心理健康与生存质量。

3. 中国策略的操作设计

对于乡村共同体中国策略有效性的检验，本研究将聚焦于农村老年人心理议题。当前中国农村，对老年人群的心理状况产生影响的宏观社会原因与养老环境密不可分。多项研究在探讨农村老年人包括自杀在内的心理问题时，都将社会变迁下农村家庭养老格局与代际联系的弱化作为了农村老年人出现精神孤寂，甚至自杀现象最重要的社会成因（张玉林 2012；黄润龙和刘敏 2013；刘燕舞 2013；应星 2014），传统家庭为老人提供的保护作用受到了挑战，老人的弱势地位进一步加深。本研究将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检验乡村共同体的中国策略是否能够显著提升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从而总结出行之有效的中国经验。

针对“以‘守门人’制度为核心，以促进‘代际养老、同伴互助、基层政府引领’为三条本土化路径”的中国策略，我们将其操作化为：“守门人”模式建设：建立以村干部、村医、热心志愿者为主要成员的

守门人团队；开展守门人知识技能培训；建立守门人职责督导机制；建立守门人与专家的联系机制；培养并督导守门人实施开展以下活动：

- 幸福提升计划：健康知识科普与宣传；公共娱乐及体育活动培育及倡导；养老敬老社会活动倡导。

- 养老守护计划：建立守门人与老人的联系机制、守门人定期走访老年人机制、守门人定期开展老年活动机制。

- 同伴支持计划：老年畅谈互助会、邻里互助组等团体活动。

- 家庭幸福计划：邀请家属，特别是配偶与子女，参与老年健康科普活动、家庭联谊会、家庭互助会。建议在春节前后家庭团聚子女返乡时开展。

三、乡村共同体重构的检验：基于农村老年人心理干预的实证研究

（一）实证研究背景

本研究的实证研究案例主要来自 2011 年至 2016 年在我国四川省（绵阳市、资阳市）、云南省（玉溪市）、黑龙江省（海林市、东宁市）、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山东省（肥城市）、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福建省（漳州市）、甘肃省（高台县）、河南省（濮阳市）9 个省、自治区完成的农村养老社区干预研究。在每个实验点，选取至少一个村开展 7 个月心理干预研究，其间开展干预督导与中期随访，干预完成进行干预效果评估。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小组座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式对村干部、村民、老人家属、老人进行研究，以评估干预效果，以及效果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二）研究发现：过程与案例的解释

1. 与子女关系的联结

代际互动与公共监督。代际关系的松散化或弱化，是当前传统中国式养老模式受到冲击的最大原因。在这一变迁的大趋势下，我们很难也

不应该重新强化这一传统理念，但可以尝试部分修复其在今天农村也依然适用且应被重视的部分，即“养老”的精神方面。因此我们邀请老人的成年子女参与相关活动，以促进他们与父母的情感与互动。

举办“水泉村敬老爱老亲情联欢会”，19名老人和他们的子女共同参加此次活动。活动首先从自家子女、儿媳和老人相互找优点开始，儿女给老人找5个优点，并大声说出来，老人给子女找5个优点，同样大声说出来，然后，子女或儿媳站起来去深深地拥抱自家老人。在这个活动过程中很多人泪流满面，感慨万千。一个老人的儿媳听到老人对自己“挺孝顺、经常关心我们老两口、有好吃的也记得给我们送一点”的评价后，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下来了，她说：“公公对我的评价太高了，我做得并不好，以后一定好好做！”尽管不太善于用拥抱来表达感情，但当一个外出务工的儿子给他拄着拐杖、行动十分不便的老父亲一个深深的拥抱时，很少说话的父亲也哭了。（内蒙古赤峰访谈记录 20140427）

情感的促进是一方面，在全村开展老年关爱活动的过程中，敬老的公共舆论与氛围逐渐形成，甚至成了改变子女家庭策略的潜在因素。一位守门人提到：“我们定期组织老人们一起聊天，大家开始不愿意说，后来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说了，而且也都开始说家里好的坏的，高兴的不高兴的。一个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老人说发现家里孩子们对自己好起来了，原来孩子们一听说老人们有个地方会去聊天，说家里的事，就开始注意自己对老人的态度，他们说，咱不能让老人出来说我们不孝顺，咱要顾脸面。”（山东肥城访谈记录 20140310）

如前文所述，当今农村家庭养老弱化的原因复杂，道德约束与公共监督上的缺失是其重要原因之一。许多研究发现，现在农村代际养老在家庭策略的考虑上，越来越倾向于功利性和交换原则（郭于华 2001；王跃生 2010；王萍和李树茁 2011；孙薇薇 2014），代际养老从伦理关系与文化传统的约束机制简化为经济上的计算与权衡，这不但深刻地影响着物质性养老的具体执行，更使精神层面的养老严重匮乏。一方面，这种策略从个体家庭泛化至整个农村社会，被默认与实践。另一方面，乡土社会的碎片化，使乡邻倾向于不过多地干预他人的家务事。两者叠

加，其结果是对代际养老在乡村公共监督上的匮乏与冷漠。当老人开始有地方倾诉，有人倾听，子女被他人议论的风险进而产生，这在客观上形成了无言的舆论，无论听的人是否会采取行动，顾及“面子”的子女也会开始注意或调整家庭策略。

2. 与基层干部的联结

基层服务与国家关怀。守门人需要开展的干预活动如：建立守门人与组内老年成员的相互联系登记制度（发放“爱心联系卡”：卡上登记守门人联系方式及老人信息，让老年人及家属能随时联系到守门人寻求帮助，随时了解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指导解决老年人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给予全面的支持）；建立守门人对危险人群和高危人群的定期寻访记录制度，每位每周至少寻访一次，若遇到心理问题，守门人进行劝诫援助，并酌情告知老人家属，若有必要可向精神科医生或专家求助。

这些制度，既使基层干部能够切实紧密与老人的关系，又为其加深与群众的关系赋予了公共合理性。然而改革开放后乡村干群关系或是冲突紧张或是不紧不慢彼此疏离，基层治理存在危机（黄家亮 2018）。眼下基层干部在活动中切实地走进老人的生活，贴近老人的心声，定期寻访，交谈不再止于寒暄招呼，而是有了更实质的倾诉交流。村干部通过培训掌握了老年工作的技巧与方式，并融入日常基层工作，习得了与老人交往的技能，得到了老人和周围村民的认可。乡村政治精英与权威关系不再是冲突或遥远的关系，与老人的距离近了起来，实质上给予了老人精神关怀，客观上减弱了老人的弱势地位，使老人对农村地位自评得以提升，促进其心理健康水平提升。一位担任村妇联主任的守门人提到：“老人对村里的依赖还是比较强的，如果村里、村干部给一些帮助，会很有影响，特别是子女都没在的情况。”

同时，许多守门人提到：“有了这个项目，有了守门人这个身份，帮助别人才是名正言顺的，否则别人会觉得出风头，甚至笑话。”（内蒙古赤峰 20160414）这既是中国告别集体生活之后，各家关起门来过日子的真实写照，在现实中体现了“各人自扫门前雪”的人情淡漠与社区断裂；也是我国基层工作长期危机的后遗症，即使身为村干部，要

想帮助他人和无私奉献，在现实中也需身份与解释的合法性。

从另一层面而言，村干部的守门人工作在客观上被视为代表政府乃至国家形象。在整个研究中，无论是老人守门人还是老人亲属、普通村民，他们对我们的干预研究最多的评价就是，“上面（国家）都关心老人了，我们也得关心呀！”这类话语表达口口相传，大家都深以为然，更内化为大家参与行动的合理性、道德性支持。尽管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并不会过多地提及国家的态度，但人们在解读所开展的研究时，却很自然地为其加上了“国家的名义”。这是研究开展初期的“未预结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

“国家的名义”不仅让更多的普通人理解并参与行动，更强化了老人获得国家关心的内在感受。农村老人对国家或者说集体主义有着特殊的情怀。在1949年至1978年间，我国建立去自我、去家庭、去血缘的“人民”为核心的共同体，将原来在政治上最边缘的人（如农民）塑造为国家政治的主体，一元化、总体化的“总体治理”模式，使农民在政治上高度依附于国家，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高度依附于人民公社，在人身上高度依附于从公社到生产队的各级干部（应星 2014）。这种集体主义生存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缓慢衰减，应该说进入21世纪后呈现快速消亡的趋势。中国当前的这一批老人恰恰是出生并成长在集体主义之中，或者说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集体主义挥之不去”，因而在日常生活中比年轻一代更热衷于集体表征，也更乐于与集体为伍（周怡 2018）。来自国家的关怀或者说集体主义生存方式对于现在的农村老年人是一种潜在的、难以复制的情怀。因而我们的干预研究正是迎合了老年人的这种情怀，来自“上面”或者说“国家”及“政府”的关心，对老年人而言，其意义更加深远。

3. 与友邻关系的联结

老年互助与乡邻他助。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关注老人与乡村邻里朋友关系在两个层面上的联结：一是老人群体内的自助与互助。我们在研究中动员开展同伴互助计划，由守门人组织，将具有心理问题风险的老人组织起来，定期开展活动：结对子、交朋友、相互关心、一起倾诉。

有的孤僻的老人，在这里结交了朋友甚至成了好朋友，有的三三两两成了一个互助的小团体，有的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感受到了自我价值。

一个比较具有说服力的变化是，对于“隐私”的态度。长期以来，农村生活早已不是过去“知根知底、没有隐私”的乡土社会，老年人常常抱着“说了也没用”“家丑不可外扬”的心态，将生活中的不满和痛苦隐忍在心里，无处诉说；加之其边缘地位，加深了这种痛苦对其造成的伤害。但在我们干预研究过程中，老人参与同伴互助活动时，每个同伴小组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倾诉家长里短、宣泄心头积闷、诉说世间不顺。“这些（不出门的）坏事，我告诉了别人，也听听别人的”，相互倾诉的过程中既排解了不满，又在和有相似遭遇的同伴交流中，降低了“相对剥夺感”。村里的邻里关系发展为朋友关系，关系得以强化。

二是全体乡邻对老人的他助。这些乡邻包括村干部守门人、热心志愿者守门人以及非守门人的其他村民，初步培育与唤醒全村对老年人友善的共同体文化与理念。村里的杨冬梅（音），现年41岁，在村里开设小卖部，常有老人在她那儿买东西，作为志愿者成了守门人之一。活动开展后，她在小卖部旁边摆设了十多个小凳子，放了开水壶、插卡收音机，时常有不少老人聚在她那儿聊天、叙事，她本人也积极为老人排忧解难，她那里成了一个老人聚会的永久“据点”。该村的李晓红从小在本村长大，又嫁在本村，老人都认识、喜欢她，她对老人也很亲切。随着干预活动的逐渐深入，在周围群众的举荐下，她家也成了守门人中心户。（山东肥城访谈记录20140427）

在社会变迁下，礼治社会很难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征（费孝通2010）。特别是经历了多次传统礼治秩序冲击与瓦解过程的中国乡村，公共生活与道德监督缺失（黄家亮2018）。我们的研究一直被村里人解读为“国家”对老年人的关注，村干部作为基层政府形象的参与，志愿者守门人作为普通人角色的介入，老人自身与家人被动员起来，爱老敬老的动员与活动有效展开，其整体影响辐射整个农村。村民王丙水（音），一直在北京开公司，在回家过春节时，看到村里开展的活动深

受感动。尽管他自己的父母已经过世，但他感觉自己作为家乡人，也应该参与到关爱家乡老人和孝文化重建的行动中去，因此他自愿拿出2万多元，在2013年春节前为全村困难老人逐户送上了鱼、肉等慰问品和慰问金，在村里引起了广泛好评，老人们非常感动。（山东肥城访谈记录 20140427）

这类似于一场道德化的过程，“社区作为面对面交往的地方性共同体隐蔽地嵌入个体意识的心理基础”，熟悉社区中“不会消失的见证人”（毛丹 2010）对个体产生道德规范和监视的过程。社区中的道德声音作为他人的非正式赞同会形成一个非正式影响的关系网络，比国家力量更能为社会秩序提供道德基础（毛丹 2010）。这一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私人生活不受监视、礼治秩序解体后孝道的失范。群体监视与规约的复出，超越私人家庭，对子女本身责任履行的监督产生了效用，对全体乡邻敬老爱老的理念与行为进行了感召与示范，初步唤醒了传统固有的与养老相关的内生性乡村文化，呈现出老年友好的乡村共同体文化的特征。

四、总结与反思

当前中国农村养老呈现出“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与代际关系受到冲击，而新的可补充或全面替代的养老模式尚未建立起来”的转型困境。置于此背景下，本研究立足社区共同体思想与社会整合理论，结合中国现实特色，在主观设计上动员各类农村社区资源（子女关系、基层干部、乡亲邻里）以增强老人的社会支持；实则部分修复弱化了了的代际强关系（子女关系），强化老人的弱关系（与基层干部、乡亲邻里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式微的传统与尚未完全建立的有效养老机制之间的沟壑；在客观上形成了以“基层干部引领、家庭养老存续、老年群内互助、乡亲邻里共建”为路径的社区整合策略，营造了类“共同体”的社区情境，以提升农村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为切入点探索了乡村共同体文化的重构的路径与策略。

从农村基层工作来看，本研究是农村基层工作在养老服务与建设方

面的一次有效尝试，更为我国基层政府自上而下开展养老均等化公共服务提供了实践路径。党委领导与政府负责是整个农村工作的基础，2019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指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应当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其中包括养老，要加强对包括老年人、贫困人口等在内的人群的关爱服务。无论是强调党与政府的农村基层工作的领导性作用，还是面向特殊人群工作的服务性特征，这些在本研究所倡导的县、乡、镇、村各级基层干部在养老关爱中的身份角色有深入的操作化策略建议和实证检验；如何将“服务”理念融入基层治理中并使其成为工作重心之一，也可以成为基层干部转变身份定位、完成基层治理的脚踏实地、带动解决农村养老困境的重要政策性参考。另外，基层政府各部门的合作与分工是整个研究完成的重要基石，映射出我国公共政策跨功能性与跨部门性融合、统筹政府不同部门资源在养老服务方面形成合力的重要作用（胡湛和彭希哲 2018）。

就老年群体本身而言，这一代老年人在理想上缅怀曾经的传统社会，或者国家与集体主义，留恋以往的共同体式的社会结合方式。在现实上面对家庭养老弱化、农村地位边缘化、乡邻关系松散等弱势困境，我们的研究动员尽可能多的社区资源增强老人的社会支持，营造类似“共同体”，或具有“共同体”特征的社区情境，这一过程在客观上也模拟了老人的理想社会，迎合并投射了他们关于共同体、整体社会与集体主义的情怀。同时，老年人在其中并不仅仅是被动的受助者，也是参与者与行动者，老人通过获得自助、互助与他助从而突破弱势情境，即可以提升自我效能、实现自我价值，缓解孤独与负向情绪。事实上互助养老的模式在我国一些地区已成为应对养老人力资源匮乏的问题的有效方式，发展为社区居家互助或机构互助的多元化形式。

就公众参与养老互助而言，本研究围绕乡村老年问题，在激发农村社区公众参与，引导自助、互助与他助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索。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既强调政府负责也重视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这对于农村养老模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引性作用。一方面，基层政府引领，目前依然

是动员农村各项资源投入养老实践最快捷有效的途径；另一方面，激发公众参与及养老互助，也应是并举之道。互助养老模式目前我国无论是政策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已是普遍倡导的农村养老模式之一（刘妮娜 2019）。本研究既通过自上而下政府行为引导民间互助意愿与行为，又动员乡村内发资源，促进友邻志愿者及老年同伴开展他助与互助，上下结合，以促进多元主体积极参与，促进互助共同体的实现。

倡导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养老（潘屹，隋玉杰等 2017）、建立“整体性治理”格局应对老龄化（胡湛和彭希哲 2018）是我国目前正在不断实践与探索的养老方向。本研究既是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干预中国方案较大规模、系统化、科学化的社会实验，也是以心理干预为切入点，对中国农村养老实践新方向的有益探索。来自国家的关怀、基层乡村干部的引领与支持、同伴互助与友邻关爱，与家庭养老互为补充，产生了强有力的作用。启动社会整体资源，促进社会整合，构建老年友好的乡村共同体文化，这应该是未来帮助我国农村老年人提高晚年生活质量可以参考的重要路径和策略。

参考文献：

- [1] 方黎明. 社会支持与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 (01): 54 - 63.
- [2]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3] 郭于华. 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对河北农村养老事件的分析 [J]. 中国学术, 2001, 3 (4): 221 - 254.
- [4] 黄家亮. 基层社会治理转型与新型乡村共同体的构建——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践与反思 (2003—2014) [J]. 社会建设, 2014 (1): 77 - 87.
- [5] 黄家亮. 中国乡村秩序的百年变迁与治理转型——以纠纷解决机制为中心的讨论 [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6): 147 - 154.

- [6] 李培林. 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社会结构转型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 [7] 梁贤艳, 江立华. 共建共享治理格局的社区“微”共同体路径 [J]. 南京社会科学, 2017 (10): 53 - 60.
- [8] 刘燕舞. 农村老年人自杀及其危机干预 (1980—2009) [J]. 南方人口, 2013, 28 (2): 57 - 64.
- [9] 毛丹. 村落共同体的当代命运: 四个观察维度 [J]. 社会学研究, 2010, 25 (01): 1 - 33 + 243.
- [10] 孙薇薇. 农村养老实践中的“功利养老主义”探析 [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36 (4): 53 - 59.
- [11] 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12] 王萍, 李树苗. 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纵向分析 [J]. 人口研究, 2011 (01): 44 - 52.
- [13] 王跃生. 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理论和经验分析——以北方农村为基础 [J]. 社会科学研究, 2010 (04): 116 - 123.
- [14] 王跃生. 社会转型及其对中国当代家庭的影响 [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17 (05): 58 - 68 + 157.
- [15] 项继权. 中国农村社区及共同体的转型与重建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 (3): 2 - 9.
- [16] 应星. 农户、集体与国家——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六十年变迁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 [17] 张川川, 陈斌开. “社会养老”能否替代“家庭养老”? ——来自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证据 [J]. 经济研究, 2014 (11): 102 - 115.
- [18] 张小军, 雷李洪. 乡村社区自主发展的中国经验 [J]. 江苏社会科学, 2018 (3): 99 - 107.
- [19] 赵旭东, 张文潇. 乡土中国与转型社会——中国基层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 [J].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 (01):

26 - 37 + 22.

[20] 周怡. “大家在一起”: 上海广场舞群体的“亚文化”实践——表意、拼贴与同构 [J]. 社会学研究, 2018 (5): 40 - 65.

课题负责人: 孙薇薇

课题组成员: 尹 银 赵思博 张现苓

传媒类院校职业道德教育的重难点问题研究

——以中国传媒大学为例

中国传媒大学

传媒职业道德问题是传媒领域最基础，也最重要的问题。随着新媒体在生活中的不断渗透，有些传媒从业者为了博取更多的关注，不惜拉低专业底线，以低俗新闻来吸引眼球；有些从业者以社交媒体信息为素材，不加识别，从而成为虚假新闻或失实报道的源头；有些从业者甚至突破法律底线，利用职务便利进行新闻敲诈。传媒职业道德领域出现的种种问题，不仅损害了媒体公信力和政府公信力，更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社会运行秩序。

传媒职业道德问题引起了学者的高度关注，研究者分别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展开了深入思考。本研究拟从传媒领域普遍存在的职业道德问题出发，结合传媒院校学生对传媒职业道德问题的认知现状，明确在新媒体环境下对传媒院校大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的重难点问题，并最终提出有针对性的职业道德教育方法和策略。为了明确上述问题，本课题将采取以下研究思路：首先，结合近六年来的传媒职业道德案例，确定新媒体环境下典型的传媒职业道德问题；其次，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了解传媒类院校大学生对典型传媒职业道德问题的认知现状；再次，对比典型职业道德问题及大学生认知特点，确立职业道德教育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最后，基于传媒职业道德教育的重难点问题，提出传媒院校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对策。

一、新媒体环境下传媒业呈现的典型职业道德问题

传媒职业道德问题引起了学者的高度关注，研究者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展开了深入思考。其中，案例分析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类研究，研究者是从具体传媒现象或者具体案例出发，对相应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例如菊丽娟关于《有偿新闻的危害及防范》、姚广宜关于《新闻敲诈的成因及对策——中外新闻法律与规制的比较研究》、徐宁刚关于《杜绝虚假新闻报道的现实路径》、陈欢关于《新闻寻租的理论分析与建议》、陈永兴关于《媒体审判的判断标准的困境与思考》等。相较于对某类问题的研究，对传媒问题进行整体的、系统的研究相对较少，郑保卫教授曾对各类主题做过如下分类：新闻失实与新闻职业道德关系研究，有偿新闻与新闻职业道德关系研究，新闻炒作、新闻媚俗与新闻职业道德关系研究，典型案例与新闻职业道德研究，新闻专业主义与新闻职业道德关系研究，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法制关系研究，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措施研究，外国新闻职业道德状况研究，网络媒体职业道德研究等。郑教授的分类标准对于后继研究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伴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又出现了诸多新伦理现象，那些近年来频繁出现的典型问题，部分无法划归于上述分类标准。例如传媒从业者由于对个体身份与职业身份把握不当而产生不当言行的问题。隐性采访中，被采访人关注隐私权问题，记者关注受众的知情权，如果在被受访者隐私权与受众知情权二者之间无法保持平衡，则可能出现新闻侵权或其他问题。对此，有必要结合典型案例对新媒体时代的传媒职业道德问题进行更加精细的分类。

（一）研究对象及方法

以2013年至2018年的《年度传媒伦理问题研究报告》中提及的年度传媒伦理案例为研究对象。该报告是由《新闻记者》杂志与上海市新闻道德委员会办公室合作，并邀请相关专家成立的年度传媒伦理研究课题组完成的。课题组在分析年度传媒伦理领域相关管理措施、理论研究、舆情热点的基础上，分别选出年度有代表性的传媒伦理问题。经过

对2013年至2018年共计六年的传媒伦理问题的分析,除去两项概括性论述外,其余57项均为具体案例。

以57项具体案例为分析对象,通过内容分析,对案例发生时间,案例涉及的媒体类型、相关伦理问题进行编码分析。在分析传媒伦理问题时,采用以下三个步骤:首先,确定传媒伦理问题所涉及的关键职业道德问题;其次,对所分析的问题进行归类总结,确定其类属及维度;最后,选取其他两个典型案例,进行内容分析,以验证归类维度的理论饱和度。

(二) 研究结果与结论

1. 各类媒体传媒职业道德问题的变化趋势及出现的比率

通过对57个案例的编码分析,发现近六年来,传媒职业道德问题在电视、纸媒、网络上的出现情况如图1所示。2013年纸媒上出现的传媒职业道德问题最多,随后有逐渐递减的趋势。而与此相应的是,网络上出现的传媒职业道德问题呈逐年递增的趋势。电视上出现的传媒职业道德问题除了2016年特殊之外,其他年份都相对较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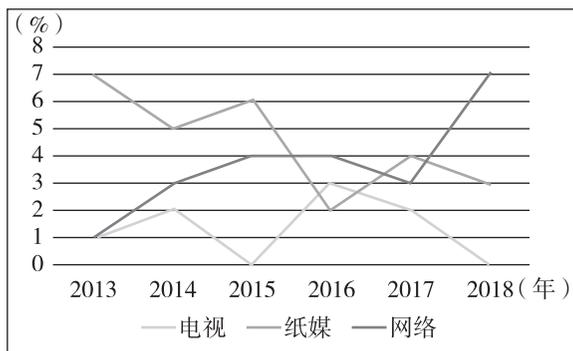


图1 传媒职业道德问题在不同媒体上的呈现趋势

在出现传媒职业道德问题的纸媒中,地方性综合类报纸相对较多,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南国早报》《新快报》等,也有部分娱乐类报纸。而在出现传媒职业道德问题的网络媒体中,除了今日头条、腾讯新闻之外,还有诸多传统媒体或者某些机构的新媒体平台。

2. 传媒职业道德领域易出现的问题类型

通过对 57 个案例呈现出来的传媒职业道德问题的分析可知，问题主要集中于以下类型：记者言论问题、职业态度问题、媒介审判问题、公器私用问题、隐匿信源问题、消息来源问题、隐私保护问题、隐性采访问题、写作建构问题、禁忌用语问题、煽情新闻问题、情感偏差问题、经济利益问题。以上 13 种问题出现的比例如图 2 所示，记者言论、写作建构以及经济利益问题是出现比例相对较高的三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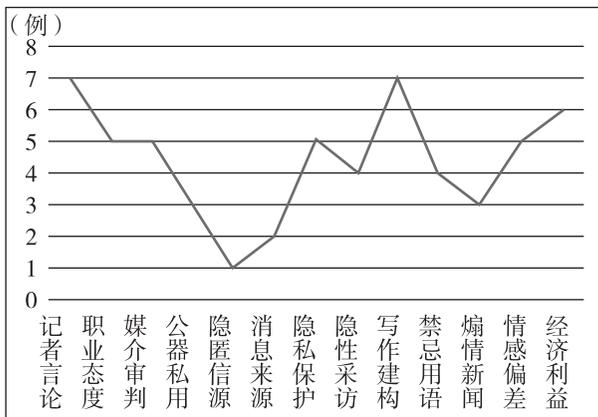


图 2 57 例传媒职业道德问题在各类问题上的分布

3. 传媒职业道德问题的多重维度

众所周知，传播的基本过程主要涉及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途径、传播效果、传播对象等内容。由于本研究只关注传媒从业者，即传播者的职业行为，所以对传播对象的行为将不予考虑，对传播途径在之前已经做了单独分析。所以本部分仅从传播者的职业、传播的内容和传播的效果三方面来考虑传媒从业者的职业道德问题。

对传媒职业道德问题的维度划分如表 1 所示。13 类传媒职业道德典型问题首先可以归入传播者的职业、传播的内容和传播的效果三大类属，其次，可以进一步划归为记者的身份、媒介的功能、消息的信源、内容的获取、写作的表达、情感的效果、利益的实现等七大维度。类属和维度之所以采用“边界”一词，主要源于问题本质。例如，记者在表达观点时应该注重个人情绪、观点，体现个性呢，还是应该代表传媒

人身份表达绝对严谨正确的观点呢?显然两个极端状态均是不恰当的,记者应该根据新闻类型、事件特点选择介于“个人言论”与“公共言论”之间的恰当状态。因此,避免此类传媒职业道德问题的关键就是记者需要恰当地把握二者之间的边界。与此类似,多数传媒职业道德问题的出现均表明其需要明确类似的边界,因此本研究特借用“边界”一词来说明解决传媒职业道德问题的思考角度。

表1 传媒职业道德问题的分类维度

类属	维度	典型问题
传播者的职业边界	记者的身份边界	记者言论问题
		职业态度问题
	媒介的功能边界	媒介审判问题
		公器私用问题
传播的内容边界	消息的信源边界	隐匿信源问题
		消息来源问题
	内容的获取边界	隐私保护问题
		隐性采访问题
	写作的表达边界	写作建构问题
		禁忌用语问题
传播的效果边界	情感的效果边界	煽情新闻问题
		情感偏差问题
	利益的实现边界	经济利益问题

4. 传播过程中易出现传媒职业道德问题的环节

通过上述维度的划分,经过对二级维度对应的传媒职业道德问题的分析,发现近六年来,57项案例分布的数量如图3所示。

由图3可以看出,57件案例中,出现问题较多的是记者的身份边界、写作的表达边界、内容的获取边界、媒介的功能边界等四方面。这几方面均与媒介从业者的职业道德意识相关,由此可见,对准传媒从业者和传媒从业者,进行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职业道德意识教育的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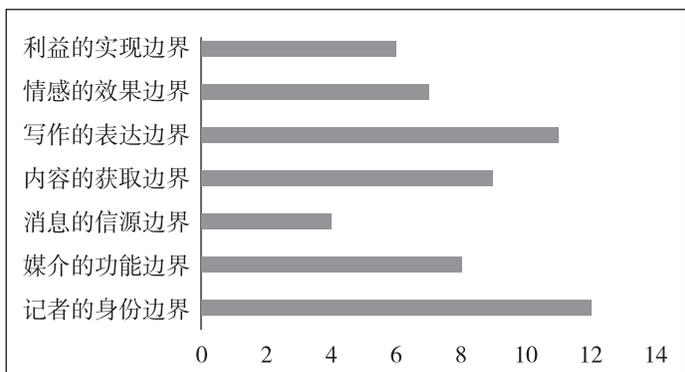


图3 57例传媒职业道德问题在二级维度上的分布

二、传媒类院校大学生对传媒职业道德问题的认知

传媒类院校大学生对典型传媒职业道德问题的认知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从业之后的职业道德行为水平。伴随着传媒业的快速发展，传媒职业道德问题也呈现出新的特点。本部分研究以上一部分为基础，针对13类典型问题，编制成调查问卷，由传媒院校在校大学生进行填写，以探讨传媒类院校大学生对这些新职业道德问题的认知情况，这将是本部分研究探讨的重点。

（一）问卷的设计

通过内容分析发现的13类典型的传媒职业道德问题，以此为基础，编制出共计39道题目的调查问卷。题目以随机的方式排列。

（二）调查结果

1. 传媒院校大学生对传媒职业道德问题的总体认知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中国传媒大学2018级本科生，以教学班为单位发放问卷，共计发放2100份，收回2008份，删除不完整数据，最终获得有效问卷共计1894份。

对于传媒职业道德问题的总体看法，即“总体来说，传媒人的职业

道德问题严重”，从结果看出，近一半人未进行明确表态。在有明确表态的学生中，有24%的人认同传媒职业道德问题比较严重，而33%的人认为传媒职业道德问题并不严重（见图4）。表明在校大学生对传媒职业道德现状持有相对积极乐观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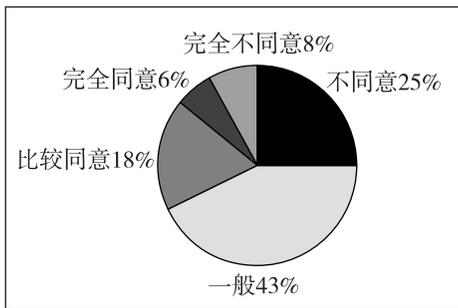


图4 大学生对传媒职业道德问题总体情况的认知

2. 传媒院校大学生对传媒职业道德问题的认知

对记者言论问题的认知：对“媒体人以其职业身份出现时不应强调个人观点”，表示同意的有54.6%，持中立态度的占25.9%，表示不同意的占19.5%。这表明大部分人都有区分个人身份和职业身份的意识。但是在具体情境中，尤其是在自媒体这一准则并不清晰的领域，表现出了一些不确定性。例如，对“媒体人可以在自媒体上发布采访后未获媒体刊发的信息”，42.5%的人不同意，33.2%表示中立，24.3%的表示同意。对个人身份和职业身份有明确区分意识的人数比例相应减少，而表示不置可否，持中立观点的明确增多。尤其是当问及“媒体人可以以其职业身份在自媒体上发表对公共议题的言论”，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的共占比49.7%，持中立态度的占19.9%，不同意的占30.4%。（见图5）这表明对于媒体人离开职业场景后，在自媒体上该呈现何种身份，该如何发表言论，呈现出了不同的意见。那么媒体人是否应该以职业身份在自媒体上发表言论，媒体人应如何把握个人身份与职业身份之间的边界，将是一个必要的研究话题。

对从业态度问题的认知：“媒体上是否常出现错别字或者常识错误”，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看出大学生对传媒从业者基本从业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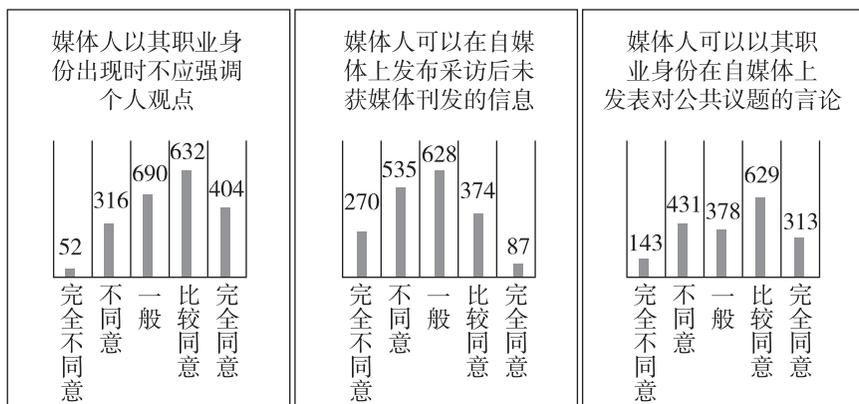


图5 大学生对记者言论问题的认知

度的认知。从图6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学生对传媒从业者的职业态度是认可的，认为传媒人普遍有着较为认真端正的基本从业态度，也能及时关注热点问题，并进行及时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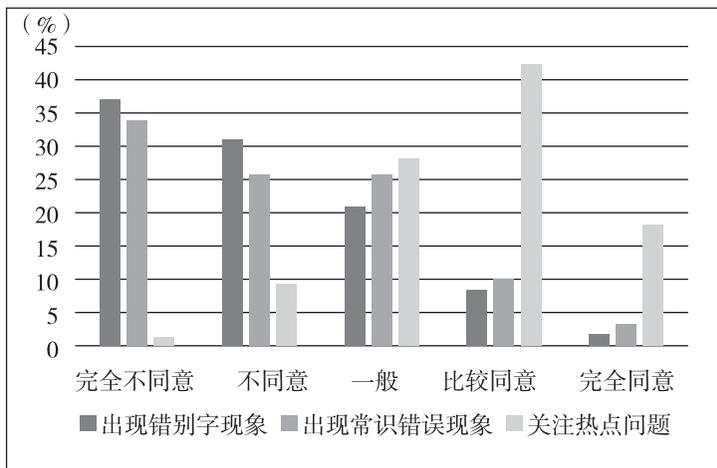


图6 大学生对从业态度问题的认知

对媒介审判问题的认知：对“突发事件时，媒体人须获得官方允许方可报道”，54.2%的学生表示同意，19.2%的学生保持中立。这是传统媒体普遍认可的规范，表明多数准传媒人已经有了内化的传统媒体的规范意识。对“媒体的报道对网络暴力有推波助澜的作用”，59%的学生表示认同。这里的媒体可能是网络，也可能是传统媒体，传统媒体对此是

否有相应的规范？新媒体相应规范不足，对哪些内容该追踪报道，取舍标准？不同媒体是否应该就同一话题进行反复的、重复度很高的报道？对于“媒体可以通过报道而引导公众转移注意力”，46.88%的学生表示不同意，这似乎与媒体的议程设置效果是相反的，或许作为大学生，所站的立场并非媒体人视角，而只是代表了普通受众。这也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见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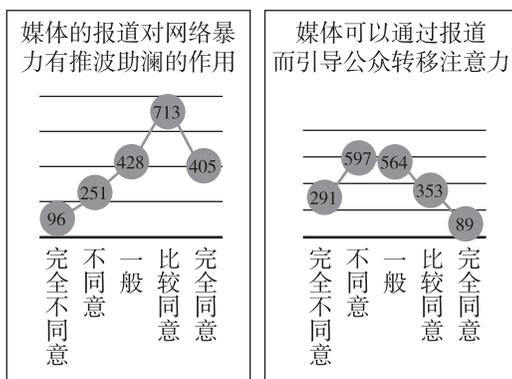


图7 大学生对媒介审判问题的认知

对公器私用问题的认知：对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功能，有较为统一的认识。尤其是关于“媒体人可以在其服务的媒体平台上发表广告软文”和“媒体必须担当起公众喉舌的角色”的调查结果，表明多数人对媒体的公众喉舌角色有清晰的认识。在“记者可以以家人或亲属作为采访对象来完成新闻”这一具体问题时，表示反对的人数明显多于表示同意的人数。从整体上来看，大学生对媒介的公器功能有较清晰的认识（见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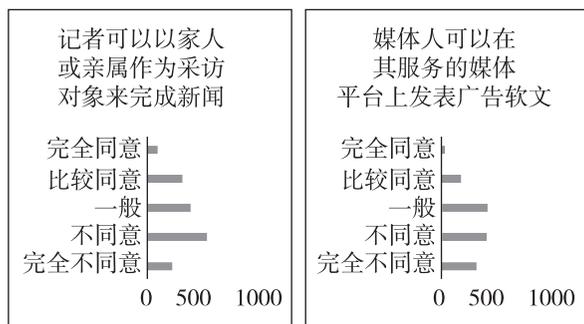


图8 大学生对公器私用问题的认知

对隐匿信源问题的认知：对于“不能公开消息提供者信息”，态度明确的支持者占了绝大多数，对于“新闻需要时可以透露”这个问题，仍有大部分人表示不可以透露消息提供者信息（见图9）。但是该如何理解“新闻需要”呢？这将是能否把握好边界的关键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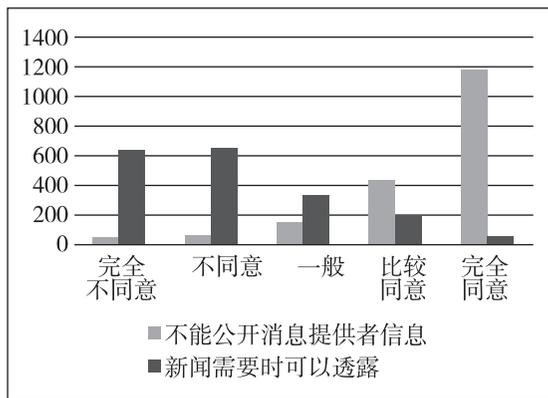


图9 大学生对隐匿信源问题的认知

对消息来源问题的认知：对于消息来源的问题，公共信息并不一定是唯一的新闻题材来源，小道消息也可以是重要新闻来源，但不能作为唯一新闻来源，对此，绝大多数大学生也认为不应以小道消息作为重要的新闻题材来源。同时大多数学生也表示不可以直接使用社交媒体上的内容作为新闻来源（见图10）。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是，如何恰当地利用小道消息，如何使用社交媒体上的新闻，如何把握其中的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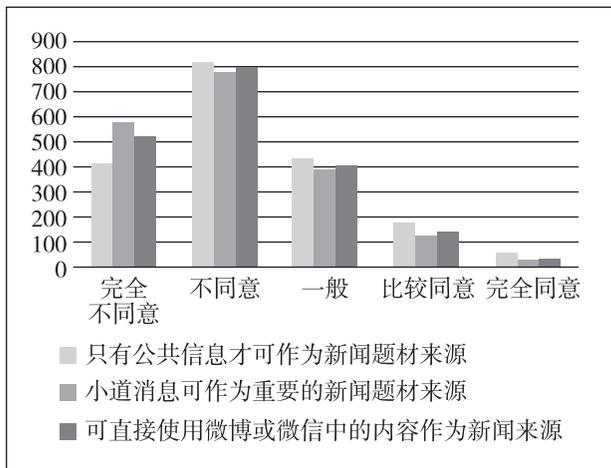


图10 大学生对消息来源问题的认知

对隐私保护问题的认知：“大众知情权是新闻报道的第一要务”，这点被多数大学生所认可。但是为了大众知情，媒体人是否可以隐藏身份去采访？部分人表示同意“媒体人可以隐藏身份去某些机构以搜集内部信息”。但是隐藏身份采访不应该成为常态，哪些情况适合隐藏身份也需要确立起明确的边界。对于“新闻可以透露性侵事件受害者的细节信息”，几乎所有大学生不认同该说法（见图 11）。而现实情况中却有不少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的采访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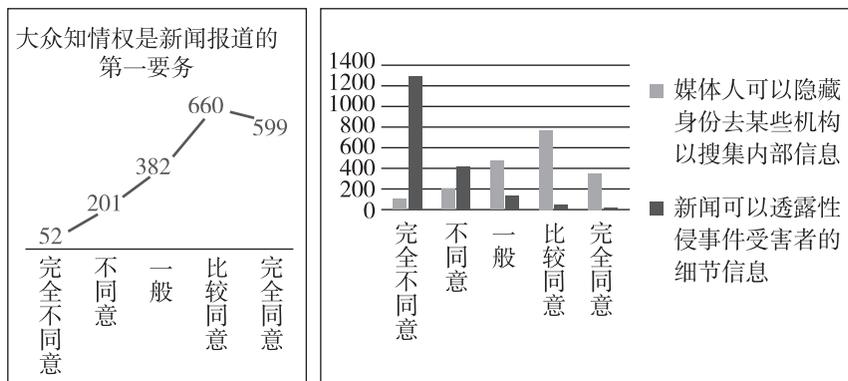


图 11 大学生对隐私保护问题的认知

对隐性采访问题的认知：由图 12 可知，大学生对隐性采访问题的认知表现出比较一致的状况，除了中立观点外，对于“媒体人采访时可以不使用自己的真实身份”，以及“媒体人可以使用隐藏的录音录像设备”，表示同意的人占多数。新闻的第一要务是真实准确，该如何把握实现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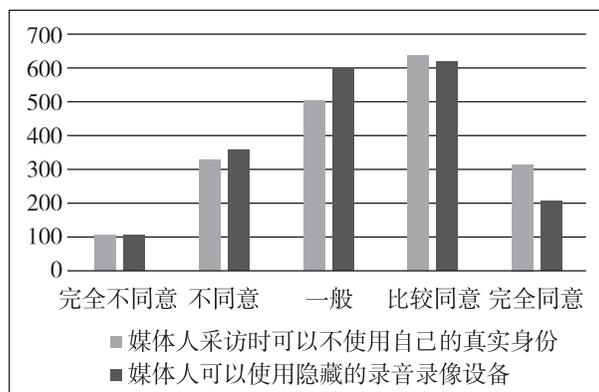


图 12 大学生对隐性采访问题的认知

实准确的手段呢，隐性采访始终被认为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采取的手段。这表明大学生对于隐性采访的正确使用存在某种程度的认知偏差。

对写作建构问题的认知：从图 13 可以看出，对于“编辑人员有权修改被采访者观点”这一问题，绝大多数大学生明确表示不认可。与此同时，还需要关注隐性修改或歪曲被采访者观点的现象，这点在问卷中没有体现。例如编辑人员在援引采访者的话作为问题答案或者评论观点时，不将相关背景呈现，只“断章取义”部分言论，实质上造成了修改或歪曲被采访者观点，而这一点也是有些人士拒绝媒体采访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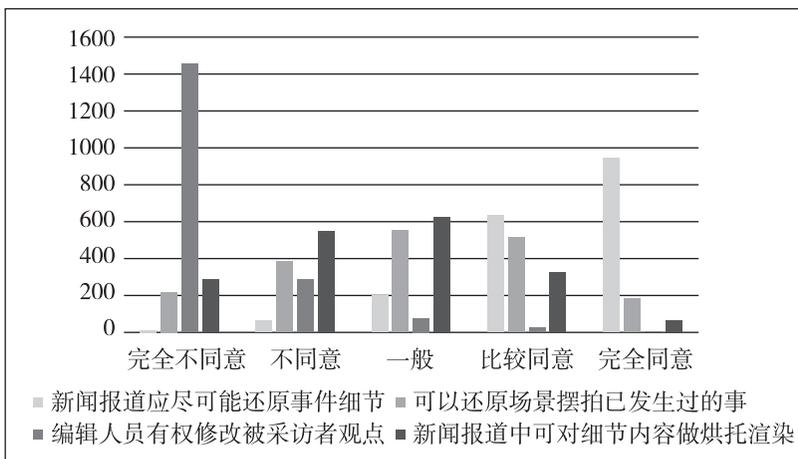


图 13 大学生对写作建构问题的认知

关于写作建构剩余部分问题的认知，相对而言比较彰显专业性，初入校园的准传媒从业者表现出了比较明显的认知偏差，尤其是对于新闻报道应尽可能还原事件细节的表述，同意选项的人数占了压倒性多数。这可能说明学生比较关注新闻报道的真实准确、全面深度，却忽略了辩证看待新闻报道的不同类型和层面。比如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为了不对当事人及家属造成二次伤害，防止负面情绪扩散甚至极端行为的模仿，伦理层面是不允许进行事件细节详细报道的。其他两题包括“可以还原场景摆拍已发生过的事”，以及“新闻报道中可对细节内容做烘托渲染”，不同意与同意人数相差不大，说明对此方面的认知也存在偏差。

对禁忌用语问题的认知：关于禁忌用语问题的认知状况，联系当下年轻人对于语言的再创造倾向以及网络用语的惯性传播，结果也比较符合“00后”的特点，但与传媒职业道德规范还存在差距。从图14可以看出，其中对于“标题与内容不符”，除了大概五分之一的人不置可否，选择同意与不同意的人数几乎相等，这比较耐人寻味。一般理解标题是内容的精练概述，两者需要相符，才能确保根据标题选择进一步浏览内容的受众没有“上当感”，但几乎40%的准传媒从业者都选择了同意标题与内容不符。这可能与新生代大学生比较喜欢求新求异、不走寻常路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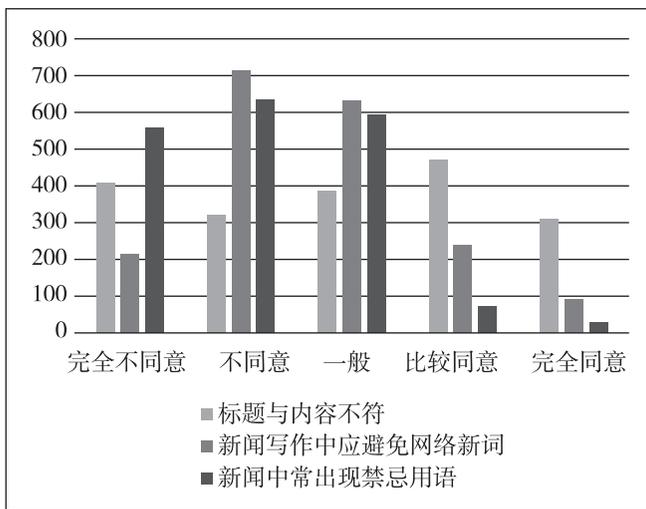


图14 大学生对禁忌用语问题的认知

“新闻写作中应避免网络新词”一题，准传媒从业者除了中立外，相对压倒性地选择了不同意，即受试者同意新闻写作中出现网络新词。这或许与当前年轻人对于网络使用的参与度高、偏好强以及求新求异的特点有关。“新闻中常出现禁忌用语”，参与者压倒性地选择了不同意，说明大家对于新闻报道的感受还是正面居多，基本传媒职业道德规范也已达成共识。

对煽情新闻问题的认知：从图15可以看出，对于“标题或内容可用夸张手法处理”一题，不同意的比例高达75%，表明大多数准传媒从业者掌握了基本传媒职业道德规范；不过除了18.7%的受试者不置可否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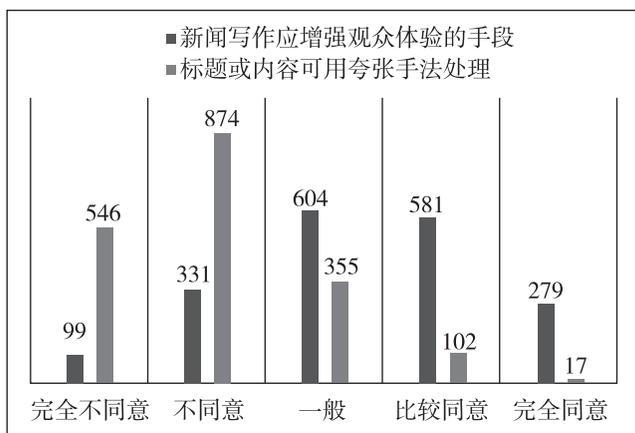


图 15 大学生对煽情新闻问题的认知

还有 6.3% 的人选了同意。而对于相对隐晦的煽情手段，即“新闻写作应增强观众体验的手段”一题，比起不同意的人数，选择同意的人数总和更多；而就单个选项而言，最多的人选择了“一般”，即中立。这可能与当前的准传媒从业者成长于多通道刺激的环境中有关，即戏称的“网络原住民”，他们习惯了声音、图片、视频等传递信息的方法，所以认为新闻写作应增强观众体验的手段。对此需要辩证地看待和引导。

对情感偏差问题的认知：如图 16 所示，对情感偏差问题的认知，准传媒从业者基本是理性的。对于“媒体应该通过正面事件，正向引导观众”一题的回答，同意的人数占到 58%，中立的比例为 23.6%。不过此题目的表述还可以进一步加以考虑和修正，正面报道是我国新闻界基本的伦理规范，但并不一定只在正面事件中才能体现出正向引导。尤其是生活中不尽如人意的总是存在的，那么如何正面报道是需要进一步通过专业训练掌握的重要技能和伦理规范。对于“媒体人可以通过引导观众产生倾向性观点”一题，受试者压倒性地选择了不同意，这也表明受试者把握了基本的传媒职业道德规范。

对经济利益问题的认知：从图 17 可以看出，对经济利益问题的认知，对于明显义利取舍的题目，比如“节目要优先考虑经济效益”一题，受试者压倒性地选择了不同意，这表明准传媒从业者掌握了“综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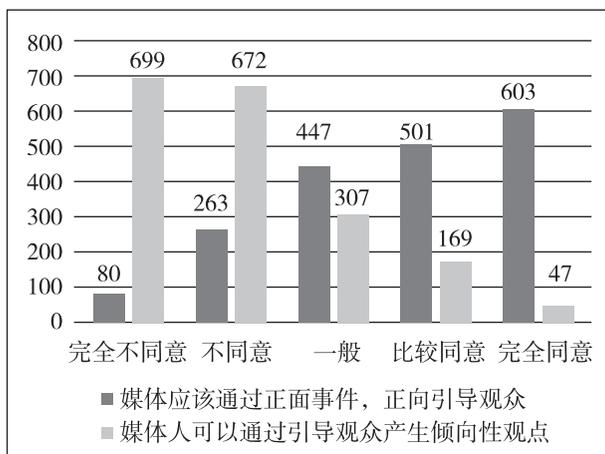


图 16 大学生对情感偏差问题的认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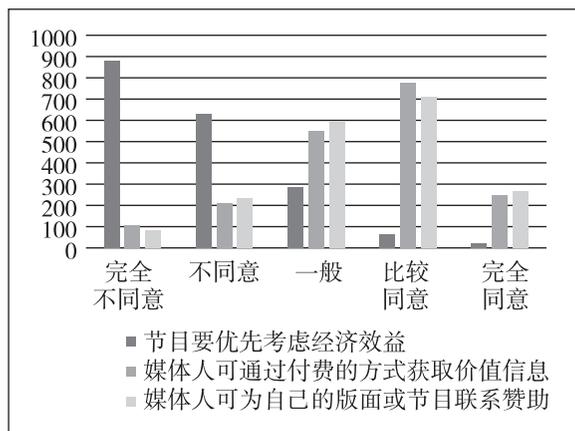


图 17 大学生对经济利益问题的认知

性”的传媒职业道德规范，但从后面两道题目的回答中可以发现，对于比较隐蔽的或者可能会“无意识”受利益驱动层面，受试者缺乏相关的规范意识。例如“媒体人可通过付费的方式获取价值信息”以及“媒体人可为自己的版面或节目联系赞助”，这都可能导致信息来源或者信息报道产生不适当的倾向性或偏差，当然这都有可能发生在“无意识”层面。所以再次表明，准传媒从业者的传媒伦理意识需要专业引导和塑造，包括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人、信息传播以及伦理规范的本质。

三、传媒类院校进行职业道德教育的重点难点问题

(一) 传媒职业道德领域典型问题的分类标准

本课题从两个研究思路出发，共同聚焦传媒职业道德领域的典型问题。首先，通过对传媒行业近年来呈现的典型职业道德案例的分析，确定业界常出现的传媒职业道德问题。不同时代，业界会出现带有阶段性特点的职业道德问题。而本研究主要聚焦于近六年来，以明确新媒体时代最典型的传媒职业道德问题。其次，通过了解传媒院校大学生对典型传媒职业道德问题的认知现状，确定大学生对不同问题严重程度的认识，与业界的实际情况是否相符。大学生认知与业界相符的，可以依据问题特点进行针对性教育，还有部分大学生认知情况与业界实际情况并不相符，这就需要深入分析认知偏差的原因所在，找出症结，明确教育方法。

首先，传媒业界出现频次和大学生的认知现状相一致，即为传媒职业道德教育的重点问题。如传媒领域中出现的因涉及经济利益而降低新闻准则的案例出现频次较高，而大学生也认为该问题相对比较严重。同时还有一些职业道德问题，在所有 57 例案例中出现的频次并不高，大学生也认为并不严重，此类问题可作为职业道德教育的次重点。

其次，传媒业界出现频次和大学生的认知现状不一致，即为传媒职业道德教育的难点问题。如记者议论问题，传媒业界出现的频次较高，但是大学生认知到的严重程度却相对较低。像这类问题本身出现较多，而大学生认知并不一致的，为职业道德教育的首要难点问题。还有一类是问题出现的频次并非最高，但是大学生认知到的问题相对比较严重，则为职业道德教育中的次要难点问题。

(二) 传媒职业道德教育的重点问题

写作建构问题，指在新闻写作环节，对新闻事件的描述与新闻事实之间的相符程度。记者一方面希望能够充分展示新闻事实信息，另一方

面希望通过生动的语言描述引起较多的关注。在写作过程中，该如何描述新闻真实，也是记者常会面临的问题。

经济利益问题，媒体或媒体从业者经常会面对在“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选择问题，缺乏职业精神或者自律不足者，便会禁受不住个体利益的诱惑，而做出违反传媒职业精神的行为，例如新闻寻租、新闻敲诈等，均是违背职业道德的典型行为。

媒介审判问题，指媒体超越司法正常程序，贸然对正在审理的案件进行案情分析、定性等一系列问题，先于司法机关而做出公开的判断和结论，从而引导受众，形成影响司法独立的舆论氛围。

隐私保护问题，记者在新闻报道中，既要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又要保护事件相关人员的隐私权，如果无法合理把握二者之间的平衡，将可能形成新闻侵权或者失实新闻等相关问题。

情感偏差问题，指通过对某事件或情节的重点关注，有意激发或共鸣受众的某种易诱发的情感，从而引起受众的普遍关注。

隐性采访问题，指不公开记者身份或伪装成其他身份，又或者公开身份但不说明真实意图，通过隐蔽的拍摄、录音等方法获取新闻素材的采访方式。隐性采访是一把双刃剑，往往是不得已的最后选择，但是媒体隐性采访的使用率相对较高，这也是造成很多职业道德问题的原因所在。

公器私用问题，指将媒体社会公器的平台与形象，为私所用。

隐匿信源问题，指未经消息源同意，不将消息源信息透露给第三方。如何在保护信源的同时，又不影响媒体的公信力，这也是传媒职业道德中常面临的问题。

消息来源问题，并非所有消息都可以成为新闻，有些人际之间的小道消息，或者是源于社交媒体的信息，均需要充分证实后才能成为公共传播信息。无论是单一信源还是小道消息，均须经多方证实后才可采用，否则将会演变为虚假新闻的源头。

（三）传媒职业道德教育的难点问题

记者言论问题，指记者在发表观点或新闻评论时，是否能够恰当把握个体身份与职业身份之间的角色平衡。记者有不同的个性，也有对事件的情绪或个人观点，如何在个人身份与职业身份之间取得平衡是媒介从业者会面临的职业道德问题之一。

职业态度问题，指媒体从业者对传媒工作持有的最基本的认真负责的职业态度。诸如新闻报道中出现“哑巴说话”的事例，把“市委组织部”写成“贪污受贿部”，把“致辞”写成“辞职”等错误，均是从业者对传媒事业缺乏最基本的敬畏精神所致。

禁忌用语问题，指在新闻写作中使用禁忌词汇、不雅词汇，或者采用某些双关语打色情擦边球的表述。例如把“国骂”嵌入标题中。有人表示如此标题可以表达媒体的报道态度和情绪倾向，有人表示这些标题有失新闻水准，通过这种低俗形式吸引眼球，也有失社会公德。类似的标题党也确为当下普遍存在的问题。

煽情新闻问题，煽情新闻指在报道中使用能引起受众强烈情感反应的文字表述或新闻图片，试图以此煽情方式来引发正能量，但实际效果却是引起公众的反感。如何拿捏媒体的情感传播效果，也是传媒职业道德需要面对的一类具体问题。

四、新媒体环境下传媒职业道德教育的原则与策略

（一）传媒职业道德教育应贯穿于从业者的职业全过程

1. 加强新媒体从业者的职业道德教育是重中之重

从各类媒体出现职业道德问题的情况可看出，传统媒体的职业道德问题有下降趋势，而新媒体的职业道德问题快速增长。之所以出现这种趋势，是由于对传统媒体已有相当长的研究，并且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准则规范，建立了强有力的行业约束力。同时，经过系统的教育活动，也增强了记者的职业道德意识。而新媒体的情况却是问题推进着研究需

求，成果远落后于新媒体的发展速度。一方面针对新媒体从业者的规范准则尚不完善，多数是在试行中暴露出问题以后，才制定补救性准则。另一方面，新媒体从业者的行业准入机制尚不完善。传统媒体的从业者多经过正规专业训练，或者通过考核获取了记者资格证，这一过程能有效地提升其职业道德意识。对新媒体从业者来说，既需要引入相应的准入机制，同时也需要加强岗内职业道德教育和培训，这是减少传媒职业道德问题的重中之重。

2. 促进传媒从业者的自律意识及行为是紧迫之需

新媒体领域的传媒职业道德建设任务相当严峻，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传媒事业发展的关键。对此，完善的行业道德规范或法律制度固然是基本保障，但是太多的他律，过于事无巨细的规则又会限制从业者的工作弹性。尤其是当面临新现象、新情况时，从业者在第一时间做出迅速反应往往是其本能，或者是其长期内化了的行方式。从另一方面来看，传媒从业者面对的职业道德问题常常会涉及多方利益，面对这样的道德难题，只能通过自律，才能在无法满足所有利益方要求的情况下，做出相对恰当的决定。因此，进行新闻专业主义教育，使从业者通过对职业理念和精神的内化而形成自己的职业角色，才能使每个个体在从业中自觉担当起社会道义和服务公众的责任，这也是传媒职业道德建设的紧迫之需。

3. 培养准传媒从业者的职业道德意识是本质所在

陈绚指出，传媒职业道德应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记者的品德及其行为规范，包括记者的义务心、良知、新闻理想、记者职业生追追求等；另一部分是媒介发挥其社会功能，坚守新闻道德，真实、客观、公平地报道，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记者的职业理想以及对媒体社会功能的理解的职业道德意识，均是需要逐步潜移默化的。这部分内容的学习，必须放在与新闻专业技能同等重要的地位。教育部也有明确规定，媒介伦理与法律是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的必设课程。然而现实情况却是，现有新闻职业道德教育与新闻规划一并授课，相对于法律的刚性，职业道德过于宽泛，学生在学习中普遍产生重法律轻道德的意识。

这一现状必然为准传媒从业者未来在真实媒体中的行为埋下隐患。因此，真正重视对准传媒从业者的职业道德意识养成，是减少传媒职业道德问题的本质所在。

（二）传媒院校进行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方法与策略

1. 采用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问题意识”对于学生思维过程及整个认识活动都非常重要。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过程可以看作是师生双方不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具体来说，由教师首先按照教材要求和学生的学习需求提出问题，由学生对照教材内容并以小组为单位，思考并回答问题的要点。学生与教师之间也可以针对具体问题展开讨论，最后由教师进行归纳总结以实现教学目标的教学过程。

教师在课堂上的作用是通过抛出有价值的问题，引导学生从不同视角进行思考，通过教师的讲解，切入相关的理论内容，在理论的指导下达成问题的最终解决。道德领域的问题，由于具有鲜明的情境性，非常适合从问题出发去探讨解决路径。这样不仅能提高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更容易使每个具体问题落地，甚至能够再现问题发生的场景，为在未来工作中随时可能遇到类似场景的学生提供思想准备及思维视角。这不仅能够有效地缩短理论及应用之间的距离，更使得课堂学习更加接地气，对现实问题的解决起到直接促进作用。

2. 结合具体问题进行案例教学

传统媒体环境下的职业道德规范相对比较成熟，而新媒体环境下，由于不断涌现出新的传媒职业道德问题，相对滞后的职业道德规范无法及时满足现实要求，这种现状对传媒从业者的职业道德意识将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掌握快速解决现实问题的策略，是当下传媒从业者必须具备的专业素养。案例教学法是教师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需要，用代表性事例来启发引导学生解决现实问题的一种教学策略。针对某一典型案例，通过师生之间的讨论、对话、沟通等思想碰撞，使学生在掌握理论基础的同时，学会分辨问题，掌握问题解决的

基本思路。具体而言,针对传媒职业道德的课堂教学而言,案例教学过程可以细化为以下三个方面的思路:

首先,引导学生养成识别传媒职业道德问题的意识。传媒职业道德领域呈现出来的部分问题,主要是由于从业者缺乏职业道德意识,例如新闻报道中将“致辞”写成“辞职”,以及错别字等类似的简单问题,均为职业道德意识不足所导致。结合各类职业道德具体案例,让学生识别其中可能涉及的职业道德问题,提高学生对职业道德问题的敏感性、判别力以及自我反省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地降低部分潜在的职业道德问题的发生率。

其次,掌握传媒职业道德问题所涉及的规则与边界。本课题通过研究发现,在新媒体环境下最常出现的传媒职业道德问题共计13类,可以划归为记者的身份边界、媒介的功能边界、消息的信源边界、内容的获取边界、写作的表达边界、情感的效果边界以及利益的实现边界等七大边界维度。结合案例,让学生充分认识到7个维度13类典型传媒职业道德问题所涉及的规则与边界,引导学生在面对现实问题时,具有规则和边界意识。

最后,通过案例教学或角色扮演,引导学生做出恰当的道德决策。结合案例,让学生扮演案例中所涉及的不同主体,站在不同视角思考传媒行为可能会造成的各种后果。通过讨论及对比分析,在面对传媒职业道德问题时,能够做出合乎道德的选择。

参考文献:

[1] 郑保卫,樊亚平,舒纾.我国新闻职业道德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述评[J].新闻界,2008(2):3-5.

[2] 严三九,刘峰.试论新媒体时代的传媒伦理失范现象、原因和对策[J].新闻记者,2014(3):25-29.

[3] 陈力丹.我国传媒自律建设需要从观念转变做起[J].新闻爱好者,2007(1):1.

[4] 陈绚.论记者的私德与媒介的公德[J].山西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16 (1): 69 - 75.

[5] 李鹏. 我国新闻职业道德面临的困境——《新快报》陈永洲事件透视 [J]. 新闻界, 2014 (7): 28 - 31.

课题负责人: 阴军莉

课题组成员: 姚 旭 王晓丽 齐向梅

杨雁鸿 刘 鑫 须大为

企业工匠精神的培育研究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工匠精神是撑起制造业强国的脊梁。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要绕开“中等收入陷阱”，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由温饱型向有品质生活过渡，国民经济就要实现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发展动力就要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而这一切有赖于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实现。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发展离不开工匠精神。工匠精神自2016年以来每年都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同时也使企业和学界越来越深入地践行和探讨工匠精神。一方面，人们开始把工匠精神作为一种工作的态度和信仰，向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拓展，融入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为满足社会消费升级和个性化美好生活的需要，就需要培育工匠精神，将创新融入产品和服务中，将产品和服务做精、做细、做好、做雅，使之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一部分。

一、企业工匠精神的内涵

（一）企业工匠精神的定义

工匠精神意味着做事十年如一日的执着，倾尽心血和精益求精。工匠精神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工匠精神通常是指每一位劳动者自身及其工作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精益求精的态度与精神。狭义的工匠精神通常是指产品制作过程中追求质量的态度及工匠们自身精益求精的精神

(张晓燕, 2019)。因此, 工匠精神实质上就是追求卓越的创新精神、精益求精的品质精神、用户至上的服务精神。

工匠精神是一种职业精神, 它是职业道德、职业能力、职业品质的体现, 是从业者的一种职业价值取向和行为表现。工匠精神外在表现为精益求精、精雕细琢、唯美至上、追求极致、痴迷忘我、高超技艺、心无旁骛、不断创新的品质(图1)。而对产品和服务品质的极致追求则使工匠由普通的匠人升华到大国工匠。它不仅体现工匠对产品、技艺的精益求精, 也体现其对自我认识、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精益求精。这种理解有利于工匠主体性和创造力的发挥, 以及对工作的热爱。数字时代的工匠精神借助于互联网和数据工具进一步实现产品或服务的内在价值。在第九届全国3D大赛上, 人们将懂得三维数字化技术, 从事数字化工业的应用型人才定义为“数字工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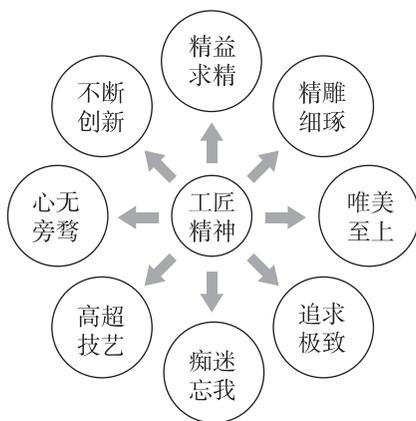


图1 工匠精神的外在表现

一般认为, 工匠精神包括高超的技艺和精湛的技能, 严谨细致、专注负责的工作态度, 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工作理念, 以及对职业近乎痴迷的热爱和责任感。工匠精神是寓于特定人身上的一种品德和气质。《韩非子·定法》说:“夫匠者, 手巧也……”可见, 手艺精巧是工匠的基本特征之一。现在对工匠的理解除了手艺人之外, 还包括技术工人

及普通熟练工人。吴晓波^①曾说过：“和互联网没有关系的匠人，不是真的新匠人。”这里的新匠人实际上就是具有数字工匠精神的匠人。

首先，工匠精神是一种人生态度和价值观。热爱自己的专业，热爱自己的工作，心存敬畏、心无旁骛。严谨、耐心、专注、从容独立；不好高骛远、不心浮气躁；脚踏实地、执着专一；立足岗位，潜心修炼；如醉如痴沉浸在工作的快乐中，陶醉在技艺的提升中。为自己的工作骄傲是现代工匠精神的特点之一，这种骄傲并非是建立在辉煌成就或高报酬基础之上，因为工匠不一定是拥有伟大成就或拥有巨额财富的人。其次，工匠精神是一种做事态度。做事认真细致、追求极致和唯美的创新（欧阳帆，2019），也就是对自己工作质量近乎苛刻的要求和标准，不断追求更精巧的生产方法，更完美的艺术境界。最后，工匠精神是知识、感悟和经验的沉淀与升华。

企业工匠精神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精益求精的品质精神、协作共进的团队精神、追求卓越的创新精神这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中，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是根本，精益求精的品质精神是核心，协作共进的团队精神是要义，追求卓越的创新精神是灵魂。

（二）工匠精神的发展

工匠精神的内涵是不断发展和与时俱进的。从农耕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工匠精神从局限于专业匠人的领域扩展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种对事业信仰的工匠精神被一代代工匠发扬光大。过去，有工艺专长的人被称为“工匠”——木匠、铜匠、铁匠等，各类手工匠人用他们精湛的技艺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增加色彩。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工匠精神开始向深度和广度拓展。深度方面：人们开始借助数控机床完成手工难以把控的精度要求，减少或杜绝了废次品，3D

^① 吴晓波，财经作家，广东梅县人，1968年出生于浙江宁波，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EMBA课程教授，常年从事公司研究。吴晓波联合复旦大学，逐步构建起一套对新匠人的数据评估体系，自2017年开始，经过了一年多的算法打磨，形成了“新匠人指数”。

打印技术为把工匠精神推向极致提供了条件；广度方面：工匠精神开始渗透于各行各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对待工作也要有‘工匠精神’，善于在精细中出彩。”2016年4月，习近平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谈道：“无论从事什么劳动，都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在工厂车间，就要弘扬‘工匠精神’，精心打磨每一个零部件，生产优质的产品。在田间地头，就要精心耕作，努力赢得丰收。在商场店铺，就要笑迎天下客，童叟无欺，提供优质的服务。只要踏实劳动、勤勉劳动，在平凡岗位上也能干出不平凡的业绩。”工匠精神这一拓展不仅包含了工业化时代对标准和规范的遵循和坚守，同时也包含了数字时代为满足个性化需求而进行的创新和创造。

（三）当代企业工匠精神释义

当代工匠精神主要是指在信息社会中，借助于互联网、计算机以及其他相关工具，对所提供的产品品质或服务质量的精益求精、尽善尽美、追求卓越的德行操守和内心执念。它是信息社会职业道德、职业能力、职业标准的体现，是从业者的一种职业价值取向和品质表现（王晓晰，2018）。无论是今天的设计师、软件工程师、经理还是教师、律师，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都是“工匠”。当前，市场消费的个性化、品质化成为趋势，而工匠精神恰好顺应了这一发展的大趋势。工匠精神坚守的恰恰是产品的精益求精的高品质（查国硕，2017），恰恰是在高度个性化的同时增加了产品的附加价值。

在当今的数字时代，企业更需要大批的优秀技术人才，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不断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因此，“大数据创新意识+工匠精神”为大数据时代的“工匠精神”赋予了新的内涵。可以说，大数据时代的工匠精神，既彰显了传统工匠精神的本质特征，又蕴含了互联网发展的时代特色，还融合了大数据创新的社会特性，其内涵本质在于将“大数据创新意识”与“工匠精神”深度融合，融入企业发展战略和生产经营之中，走“数据创造价值、创新驱动未来、品质追求卓越”的精益求精之路。

数字时代的工匠精神除了继承传统工匠精神之外，还具有数字时代的烙印。例如，吴晓波与复旦大学等基于独特性、成长性、创新性三个基本维度，构建的“新匠人指数”体系，通过个人价值、市场价值、产业价值和文化价值四个方面的评估，估算出匠人的价值，以及在匠人群体中所处的位置。据统计，我国新匠人平均年龄不到40岁，77%以上的人拥有本科以上学历。家居日用行业本科以上学历占比82.86%，其中博士学位占比8.57%；食品行业的新匠人本科及以上学历高达85.72%，占比位居四大类之首（图2）。21.7%的新匠人具有海外留学经历，其中大部分人拥有硕士及博士学位。新匠人在创业前工作职位为经理及以上职位的占比达到65.55%（图3）。从创业经历看，新匠人中很多人不满足于按部就班地继承家业，有相当一部分是“创二代”，其比例达到21.85%。这说明作为数字时代的新匠人不仅需要知识和技能的厚重积淀，而且需要社会经验的积累和感悟，以及敢于创新的魄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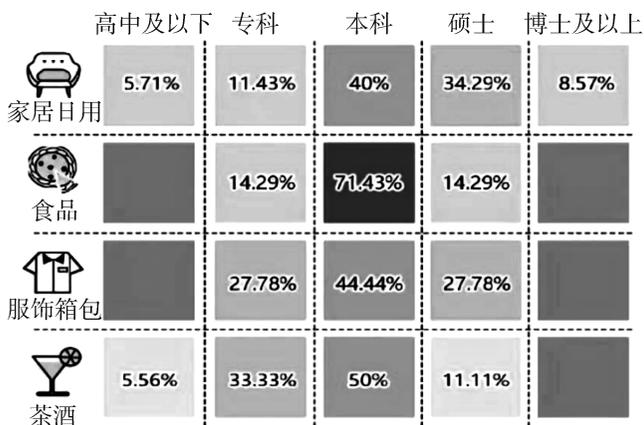


图2 2018年新匠人的学历结构

资料来源：《吴晓波频道2018新匠人调查报告》，2018年7月15日。

数字时代的工匠精神，要有大勇不惧、大术无极、大道无疆、大艺法古、大技贵精、大巧破难、大任担当、大工传世的大国工匠。他们都是经过长年累月的淬炼而变得无比坚韧的。李克强总理在中国工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经济形势报告时说，“中国制造”要尽早变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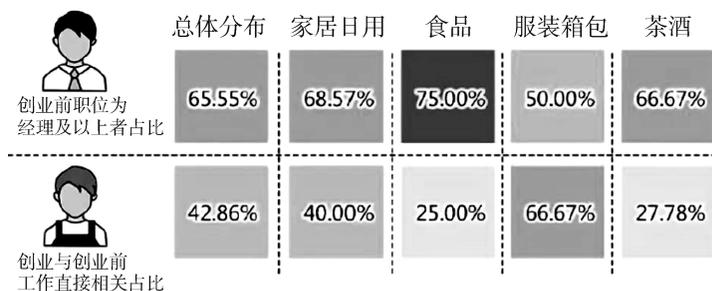


图3 2018年新匠人的资历结构

资料来源：《吴晓波频道2018新匠人调查报告》，2018年7月15日。

“中国精造”，无论是日常消费品生产，还是“高精尖”大飞机制造，都需要有一大批“身怀绝技”的大国工匠。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需要脚踏实地的工匠精神，而数字化和工匠的结合符合现在中国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方向。数字工匠将成为未来中国智能制造的中流砥柱。

二、培育企业工匠精神的意义

培育企业工匠精神对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图4系统地说明了企业工匠精神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过程、作用和重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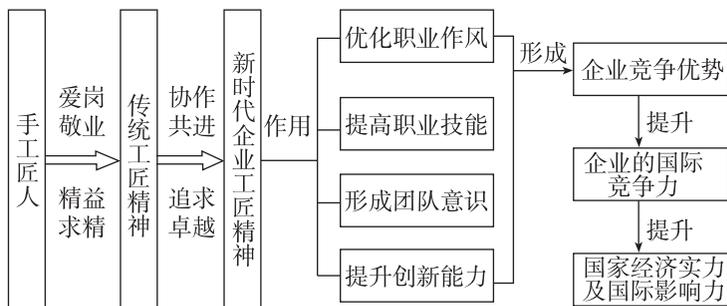


图4 新时代企业工匠精神的意义

（一）塑造品牌和建立标准，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由一般工匠到企业工匠、大国工匠，再汇聚为工匠精神，这是一个不断提高、不断升华的过程。工匠对产品和服务品质的精致追求，形成独树一帜的品牌，进而做成产品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标准、世界标准。这也使产品和服务由一般的产品标准到技术标准，再到数字标准，进而成为做事的规范和准则。

1. 塑造品牌

工匠精神使企业品牌得到淬炼。2017年5月，国务院设立“中国品牌日”，评选出中国工匠十大品牌（表1），这些品牌包括制造、科技、食品加工、医疗等多种行业，其中，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荣登榜首。华为塑造了全员参与、全员重视质量的企业文化，并渗透到工作的各个环节，用工匠精神定义中国制造。

表1 2017年中国工匠十大品牌

企业	排名	对工匠精神的看法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	任正非：“只有工匠精神才能提供消费者所需要的高品质产品和服务；只有工匠精神才能提供传世之物，让后代人对当代人保存一份记忆和敬意；工匠精神契合了供给侧改革的需要是走向全球，提升中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需要。”
海尔集团	2	张瑞敏：“无论是王进成功完成世界首次超高压带电作业，还是海尔正在探索的首个世界级物联网模式，其实都是在用我们的工作诠释着大国工匠的精神，就是挑战自我，挑战极限，振兴中华！”
格力电器	3	董明珠：“你的心中具有工匠精神，你的产品就一定做成功。专业化的理念以及争做第一的态度，正是工匠精神的一种体现。不断去探索，不断去创新，不断地向消费者提供严谨优质的产品，工匠精神必将引领中国制造升级。”

续表

企业	排名	对工匠精神的想法
三一集团	4	梁稳根：“三一品质，终将改变世界。弘扬工匠精神和兴工强国精神。”
完达山乳业	5	王景海：“严格自律，认真发挥工匠精神，把自己的活儿干好，把自己的产品质量做精、做好，让消费者永远相信我们。”
浙江和艺轩家具有限公司	6	无惧时间流逝，耐得住性子！不怕时间检验，把握好品质！不论是家具还是徽式工厂，都只有以匠心坚持品质，才能够让其不断传承下去。
安徽中烟	7	当一个企业里每一个人都具备工匠精神时，那么这个企业生产的产品一定从骨子里就有优秀的基因，一定会成为行业里优秀的产品，这个企业也一定能发展壮大并经久不衰。
拜博口腔	8	工匠精神对于医疗机构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拜博开始从优秀到卓越的战略，追求精益求精，注重细节，耐心专注，不断完善，专业敬业，力争第一的工匠精神。
北京青花瓷酒业	9	开展多元化的个性定制服务，满足细分市场的需求。并回归酿酒人的本质和初心，用专注、坚守、精准、务实的态度和精神去做好产品，服务好我们的消费者。
上海妙宅	10	秉承“科技、创新、品质、健康”的设计理念，以打造健康居所为己任，以专注、极致的匠心精神，从睡眠健康、卧室健康延伸到家居健康系列产品。

资料来源：南方财富网以及各公司领导对于工匠精神的理解。

http://www.southmoney.com/paihangbang/201710/1660154.html

由表1看出，十大品牌企业都将耐心、专注、创新，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的品质，提高企业的核心技术和核心能力作为企业发展之道。正是因为有了工匠精神的引领，才使企业发展得越来越好，品牌也打磨得越来越亮。

2. 建立产业标准

工匠精神由个别匠人追求卓越的创新精神，变成大众的跟进，进而

成为一种时尚，变成产业标准，成为行业普遍遵循的准则。当品牌树立后，产品标准也随之形成，产业的发展将会踏上新的台阶。在新的更高的基础上，再由个别匠人进一步对工匠精神的追求，逐渐成为每个人的共同跟进，从而使产业标准进一步提升。循环往复，人类产业标准不断精进，技能不断提升，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工匠们沉浸在不断雕琢自己的产品、不断改善自己的工艺之中，享受着产品或服务升华的过程。

工匠精神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是中国制造前行的精神源泉，是企业竞争发展的人力资本，是员工个人成长的道德指引。追求卓越的创新精神，是判断一个工人能否被称为当代“工匠”的一个重要标准。李克强总理（2017）在昆明考察云南白药集团时强调，工匠精神和企业家精神是百年老店的两大支柱。以工匠精神保证质量、效用和信誉，以企业家精神经营壮大形成产业。^① 李克强总理指出“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要靠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工艺创新，其中关键是以客户为中心，不断提升消费需求，倒逼“中国制造”全面升级。

（二）提振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融合发展

工匠精神是对事业的信仰。工匠的初心都是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为了让商品更加符合消费者的需求，以人为本，会花费很多心思、精力和时间，将商品打磨得精致。要打造国际品牌，提升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就要严格把好产品的质量关。建设“制造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扭转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现状，需要在创新能力、劳动生产效率、产品质量等多方面来提升和完善。到2018年，中国制造业品牌跻身世界品牌500强中的前一百位只有海尔和华为两家，这说明我国制造业品牌国际化进程缓慢，企业在塑造品牌的进程中，更多依靠成本优势和国内市场，而非技术的进步与革新。

当前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融合发展程度进

^① 2017年1月24日，李克强总理在昆明考察云南白药集团时的讲话。

一步加深，数字化变革加速，需要发挥更多的复合型人才优势，为经济融合发展奠定人力资本基础。正如德国人的质量观：“没有质量的数量毫无意义，唯有以质量为基础的数量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数量。”一些工匠在普普通通的使用价值里，注入了更多的欣赏价值、艺术价值、愉悦身心的价值。在不断忘我追求产品的极致过程中，价值的增值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正如同仁堂做药的理念：“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些国内外驰名商标和奢侈品品牌就是这种工匠精神的经典之作。彼得·冯·西门子曾说，“人口有 8000 万的德国，之所以有 2300 多个世界品牌，靠的是德国人的工作态度，是他们对每个生产技术细节的重视”。以工匠精神打磨的精品，消费者愿意为之付出这份辛劳的价值。吴晓波的新匠人指数的四个价值维度中的市场价值（图 5），即销售收入所体现的品牌影响力，实际上是对工匠精神的很好诠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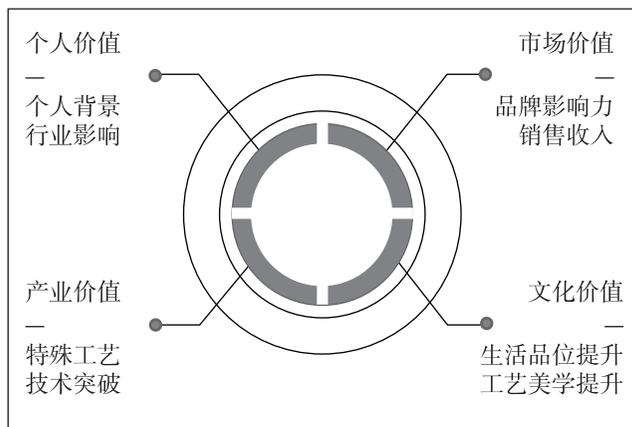


图 5 百匠指数评选维度

资料来源：百匠君，今天，第一个大数据意义上的新匠人评价指数出炉了，吴晓波频道 2017 年 11 月 8 日。

（三）弘扬工匠精神，铸就中国梦

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呼唤工匠精神，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呼唤工匠精神。实现中国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离不开全体劳动者的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和创造性劳动。工匠精神是在劳动中完成的，美好生活需要劳动创造，工匠精神与实现美好生活的目标相得益彰，无法割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匠精神历久弥新，贯穿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同样也是中国当代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它属于每一位中华儿女，以工匠精神助力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各行各业发挥敬业、专注、创新、精益求精、实干求真、追求卓越的精神，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用实干托起中华民族的未来，用工匠精神铸就中国梦，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作为一种思想理念和职业品质，工匠精神是实现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跨越的精神源泉，是培育大国工匠的道德指引，是成功实现“中国制造 2025”的智力支撑。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转型期，国民消费已经由数量型向品质型转变，供给侧必须适应需求侧的新要求。很多企业也积极转型升级，向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方向发展，而要顺利完成转型升级则需要大批的复合型高素质人才。当今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是大势所趋。海尔集团为一线员工转型搭建首席技师发展通道，通过互联工厂的竞比产生互联工厂级首席技师，产业线竞比产生产业线级首席技师，到集团级首席技师；最终通过竞比，诞生海尔智能工匠。

数字工匠精神促进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催生具有感知、分析和交互功能的智能硬件产品，推动单纯的硬件产品向“互联网+软件+硬件+服务”系统转变。品种更多，品质更高，功能更强，性能更优。中国经济要迈上产业链的中高端，劳动者的职业技能首先要迈上中高端。当务之急是培养大批高水平的工匠，培育高技能领军人才，努力攻克一批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提升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水平，推进企业创新力的提升，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推动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只有把数字产业

和服务渗透到传统产业，让尽可能多的传统产业和个人分享数字红利，才能加快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五）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的精神境界和职业操守

数字时代的竞争主要是人力资源的竞争。数字工匠精神是信息社会高素质技能人才的精神境界和信仰，是职业操守的唯美至尊追求。人力资源的内在素养主要是指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内在修为（包括个体和群体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是数字工匠精神在信息社会人力资源职业素养的整体提振，而不单单是个别人的卓越。

随着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各行各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的职责，是培育工匠精神的必经之路。近几年推出的大国工匠中，很多工匠的第一学历就是职业院校，他们以卓越的技术实力展示了不论是在卫星、高铁等“高精尖”科技领域，还是传统行业，工匠人才的不可替代。2018年，中国共有职业院校1.17万所，年招生达928.24万人，在校生2685.54万人，发展规模位居世界第一位（图6）。

职业教育已经具备了大规模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能力。中职毕业生就业率连续10年保持在95%以上，高职毕业生就业率连续10年保持在80%以上，近70%的职业学校毕业生在县市就近就业（图7）。在现代制造业、新兴产业中，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职业院校培养出的技术与技能人才是具有工匠精神的匠人的主要来源。

到2018年末，高等职业教育共设19个专业大类，99个专业类，共769种专业，专业涵盖范围广泛，既包括传统的农林牧渔，也包括现代的资源环境与信息安全，几乎涵盖各行各业（表2）。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和技术支撑，为中国的繁荣发展奠定雄厚的人才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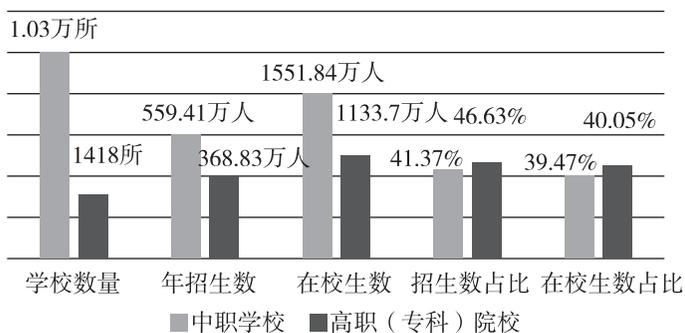


图6 2018年职业教育基本情况

数据来源：教育部就职业教育的改革实施方案新闻发布会公布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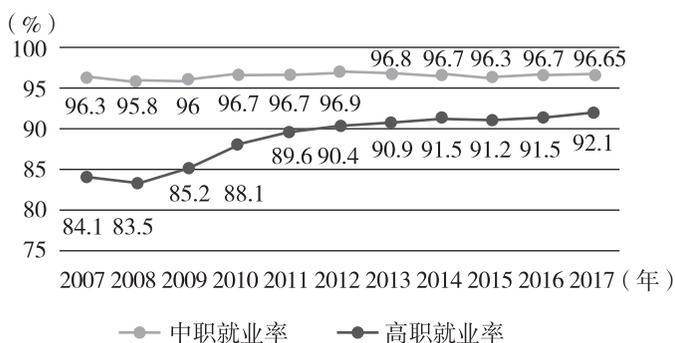


图7 2007—2017年中职就业率高与高职就业率

数据来源：教育部就职业教育的改革实施方案新闻发布会公布数据。

表2 高职教育与中职教育专业分类

类型	专业类别
高职教育	农林牧渔大类、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能源动力与材料大类、土木建筑大类、水利大类、装备制造大类、生物与化工大类、轻工纺织大类、食品药品与粮食大类、交通运输大类、电子信息大类、医药卫生大类、财经商贸大类、旅游大类、文化艺术大类、新闻传播大类、教育与体育大类、公安与司法大类、公共管理与服务大类
中职教育	农林牧渔大类、资源环境类、能源与新能源类、土木水利类、加工制造类、石油化工类、轻纺食品类、交通运输类、信息技术类、医药卫生类、休闲保健类、财经商贸类、旅游服务类、文化艺术类、体育健身类、教育类、司法服务类、公共管理与服务类、其他

资料来源：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及专业简介（截至2018年）、《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

北京市 2018 年末共有 141 所职业院校，其中中职学校数量 115 所，高职院校数量 26 所。目前，职业院校毕业生已成为支撑中小企业集聚发展、区域产业迈向中高端的产业生力军，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人力资源支撑。

三、企业工匠精神的培育现状

(一) 企业工匠精神的发展状况

1. 人才成为工匠精神的重要载体

当前，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引发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经济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为了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加强人才培养和管理成为培育企业工匠精神的重要方面。知识型、技能型、应用型的“数字工匠”成为数字化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重人才培养，以人才建设为基础，培育企业工匠精神，提升企业运营绩效成为企业发展的新特征和新趋势。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数字经济大国，人才和“数字工匠”培养对数字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为企业工匠精神培育提供人才支撑，为数字化培育“最强大脑”，也为产业数字化输送量足质优的后续力量。

2. 工匠精神与企业文化深度融合

我国工匠精神发展历史悠久，从农耕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工匠精神从局限于专业匠人的领域扩展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种对事业信仰的工匠精神被一代代工匠发扬光大。工匠精神并不是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所特有的文化传统。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工匠精神的内涵也不断深化和广化。2016 年是新中国工匠精神的政策元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工匠精神”开始回归大众视野，成为全社会共同追求的价值标准。

企业是工匠精神培育的重要主体，企业发展与工匠精神息息相关，企业文化是“工匠精神”扎根的土壤，也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无形力量。把

工匠精神注入企业文化，将工匠精神与企业文化深度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是诸多中国企业实现稳步发展乃至“走出去”的文化基础。

图8揭示了企业发展与工匠精神的内在关系。华为作为全球领先的ICT（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提供商，从1987年创立到今天的世界通信制造业巨头，离不开完善的内部治理架构和管理体系。企业文化是企业管理的重要支撑，也是企业发展的遗传基因（DNA）。“狼性文化”^①“垫子文化”^②“不穿红舞鞋”^③是华为企业文化的三大主要特征。华为在完善人才引进和培养体系的基础上，将工匠精神进一步融入企业文化。通过《华为基本法》为企业制定了“管理大纲”，定下标准基调，从制度上让企业文化落地，规范员工行为，实现企业价值追求。将工匠精神培育和企业文化深入融合，培育出本企业独特的工匠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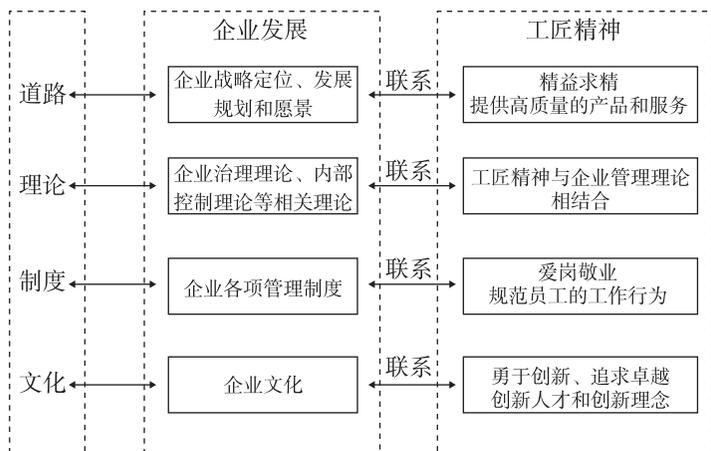


图8 企业发展和工匠精神的关系

3. 工匠精神同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融合程度提升

随着工匠精神与企业文化不断融合，工匠精神在企业内部各方面进

① 狼性文化：主要指华为文化中的狼性特征：一是对产业发展敏锐的嗅觉；二是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三是群体奋斗。

② 垫子文化：华为创业初期，每个员工的桌子底下都放有一张垫子，就像部队的行军床。除了供午休之外，更多是为员工晚上加班加点工作时睡觉用。

③ 不穿红舞鞋：企业要专注于公司的现有专业领域，禁受其他领域丰厚利润的诱惑。利润就像红舞鞋，企业穿上它就脱不了，只能在它的带动下不停地舞蹈，直至死亡。

行渗透，逐渐营造“刻苦钻研、精益求精、心无旁骛”的工匠文化氛围，通过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三链”体系，直接反映在企业人才引领和产品创新上。工匠精神的传导机制表现为：价值观引导—人才引领—专业技能和行业标准提升—产业升级。企业文化和价值观是工匠精神的要求，人才是工匠精神的载体，专业技能是工匠精神的实现手段，产业升级是工匠精神的最终表现。

人才作为企业工匠精神培育的重要载体，以人才为引领，促进专业技能水平和行业标准提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徐工集团是我国制造业的典型代表，成立于1943年，目前位列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第一、世界第六的位置。徐工集团将工匠精神深入融入企业发展过程中，以人才竞争力进一步推动运营竞争力和品质竞争力（图9）。当工匠精神融入企业文化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必然会对产业链上下游的产品质量严格把控，同时带动行业标准提升和产业转型升级。企业工匠精神的培育离不开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三链”体系，即产业环境和社会环境。徐工集团通过“三链”深度融合，以工匠精神为基础，不断实现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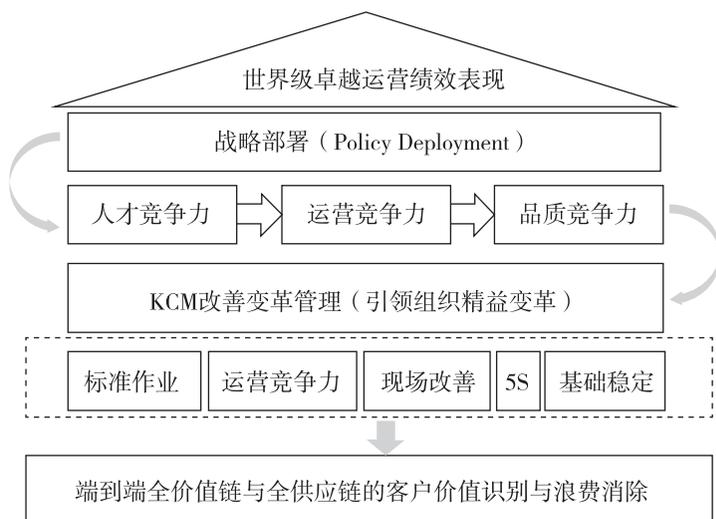


图9 徐工集团精益制造运营体系^①

^① 根据徐工集团官网精益制造体系运营图整理绘制而得。

（二）企业工匠精神培育中的主要问题分析

1. 工匠精神要与企业发展实际相结合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匠精神的内涵不断深化和广化，工匠精神已不仅仅是手工匠人所特有的品质和应当具备的精神。以精益求精、专注创新、爱岗敬业为主要特征的工匠精神成为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和高标准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然而，当前各行各业对工匠精神的理解存在认知误区，缺乏全面有效的把握。

工匠精神关键在于创新，不能千篇一律。许多企业没有根据自身发展特点，制定适合本企业工匠精神培育机制，单纯地模仿和套用成功企业的经营之道，并不能取得长远的发展。企业应当根据本企业经营性质和职工整体素质，丰富并落实切实可行的宣传导向，对企业职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职工摒弃打工思维。工匠精神的内涵随社会发展不断深化和广化，其培育机制也应当依据企业自身特点不断改进，通过工匠精神的培育形成企业的独特竞争力。正如华为的“狼性文化”“垫子文化”“不穿红舞鞋”是其企业文化的外化形式，其独具匠心的企业文化是无法复制和超越的。

2. 企业内部工匠精神的激励、管理和评价机制需进一步完善

企业工匠精神的培育要依托企业内部健全有效的管理体制机制作为保障，要对标行业标准和华为等标杆企业。当前，工匠精神越来越受重视，培育工匠精神成为企业获得长足发展的重要动力，大多数企业开始重视和宣传工匠精神。但是许多企业只停留在工匠精神宣传这一层面上，尚未建立健全关于工匠的激励机制、管理机制和评价机制等企业相关体制机制。

首先，企业内部激励机制不健全。激励机制是企业文化建设和制度建设的重要环节，激励机制不健全难以充分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对企业员工尤其是技能型人才，要及时给予一定的激励，留住企业优秀人才。此外，许多企业的管理和评价机制不健全。企业缺乏相应的管理体系建设，不利于员工对工匠精神的追求和培育，许多企业并未将工匠精

神培育与企业管理制度相结合，员工缺乏工匠精神养成的制度保障和企业环境。许多企业缺乏对工匠精神培育质量的评价体系，无法对企业工匠精神培育质量和员工的工匠习惯进行有效的评价和衡量，工匠精神培育的效果和力度则也会相应地降低。

3. 工匠精神培育和传承的社会环境需进一步优化

当前我国正处在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弘扬和培育工匠精神对于我国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全社会来看，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能工巧匠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漠视和轻视其职业和劳动成果，工匠缺少受尊重的社会环境。工匠精神寓于匠人的工作中，匠人严谨认真、精益求精、追求完美，是工匠精神的集中体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广大的基层劳动者和能工巧匠。

四、影响企业工匠精神培育因素的定性分析

根据具有工匠精神的匠人成长实践，可以看到，决定培育当代工匠精神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图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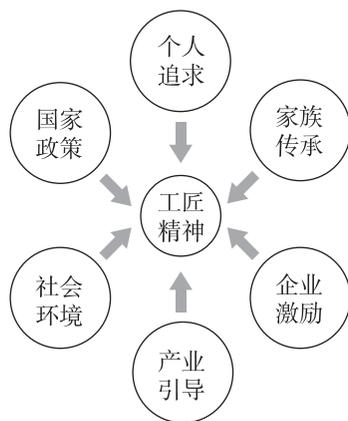


图10 决定工匠精神的因素

（一）国家政策引导

国家政策对于工匠精神的培育起着导向和关键性作用。历史上有“士农工商”的划分，手工艺者处于较低的社会层次。因此，国家政策引导会影响社会环境，从而影响人们对产业选择和职业发展的影响。通过给予荣誉和奖励的导向作用，使匠人愿意为打造精品和不断创新付出毕生的精力。我国每年对五一劳动奖章、奖状获得者实行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以精神鼓励为主的原则，而获奖者中的许多人都是赋有工匠精神的大国工匠。中华全国总工会对获奖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颁发证书、奖状、奖章或奖牌，对个人给予一次性物质奖励以及免试进入国家或省级成人高等学校学习的机会。

当前，全球寿命超过 200 年的企业，日本有 3146 家，为全球最多，德国 有 837 家，荷兰有 222 家，法国有 196 家。日本的工匠精神举世闻名，保洁、竹艺和高科技等各行业都培育和继承工匠精神，通过电视节目对“匠人”详尽地报道，向公众传输工匠精神的观念和理念。我国应充分借鉴德国和日本等制造大国培育工匠精神的相关经验，从政策上加以引导，加强职业教育和培养高技能人才，为工匠精神的培育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从国家战略层面解决高技能人才短缺，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技能和高素质人才^①。由图 11 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本专科和普通高中招生人数基本呈稳定状态。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制定多方面举措培养高技能人才。设立专项资金，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拿出 1000 亿元，用于 1500 万人次以上的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

^① 资料来源：《2019 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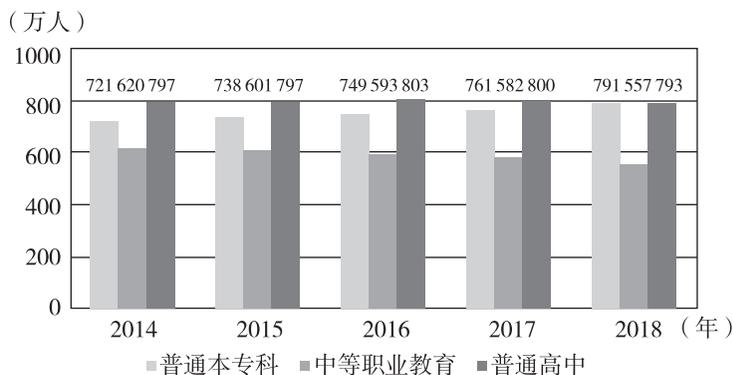


图 11 2014—2018 年中国普通本专科、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招生人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9 年 2 月 28 日。

(二) 社会环境条件

工匠精神需要有成长的社会环境。当前经济社会中，工匠的价值远远被低估。“精神是无形的水，需要接纳它的社会容器”，而这“容器”就是社会普遍的尊重。面对各行业的个性化需求，柔性化制造技术、数字化制造与设计技术，特别是三维数字化设计制造技术成为关键。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对杰出代表、劳动模范和工匠所体现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给予高度赞誉，同时要求全社会要大力营造“尊重知识、尊重劳动、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氛围。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从 2010 年之后，研制的所有飞机，都舍弃了蓝图和工艺卡片，全部基于三维设计的制造体系。数字经济发展对于数字工匠的需求和数字工匠精神的召唤，使整个社会逐渐形成尊重人才和数字工匠、敬仰工匠精神的社会环境和良好风尚。

(三) 产业引导

产业是培育工匠精神的沃土。各国精品的培育过程几乎都经历过市场竞争和各种范围赛事的筛选才脱颖而出，这也使具有工匠精神的人才频繁辈出。职业技能大赛是推动工匠辈出的重要渠道。我国职业技能大赛起步相对较晚，产业层面通过行业协会和工会作为联系纽带，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和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对于培育具有行业特色工匠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8年公布的第八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我国无技术等级的职工人数比例达72.8%，没有专业技术职称的人数达61.3%，有高级职称的人数仅为4.5%。来自全国总工会的一组数据显示，当前高端技术工人需求缺口一直居高不下。在全国7.7亿就业人员中，技术工人达1.65亿，其中高技能人才4791万人。因此，以工匠灵魂之道，涵养劳动者的技能传承绝非无稽之谈，而是现实之需。行业协会和工会是产业、企业和职工的重要纽带。行业协会和工会通过建立内部相应的奖惩机制，对行业员工和企业进行直接正向的引导，培育具备行业特征的工匠精神，为产业发展指明方向，也为企业工匠精神的培育营造良好的行业环境。

（四）企业激励

企业对具有工匠精神员工的大力褒扬和各种奖励，激励员工对技术的不断精进和忘我创新的追求，是工匠精神得以发展的机制保证。要进行生产，提供精品或更高的星级服务，就必须有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在当前社会生产条件下，物质资本相对雄厚，人力资本相对稀缺，而具有工匠精神的员工更是稀缺。企业对具有工匠精神员工的奖励则使企业形成一种工匠精神的文化氛围，有利于具有工匠精神的人才队伍的不断成长。积极鼓励自主创新，把工匠精神的具体内涵融入员工绩效标准，提高员工对工匠精神的接受和践行力度。提倡以质量优先，制定严格的生产标准和管理制度，把工匠精神融入企业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培养一批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知名品牌。许多具备工匠精神的企业往往提供的产品是行业里的著名品牌，比如德国的机械、化工、电器、光学产品，直到厨房用具、体育用品等，都是世界上质量过硬的产品，“能用100年”，“德国制造”成了质量和信誉的代名词。山西华翔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民营股份装备制造企业，有近30位大工匠年薪超过百万元，最高达300多万元，是该企业总经

理年薪的4倍，李克强认为这样重视工匠作用的企业大有希望。

（五）家族传承

传统工匠精神的传承一般会沿着家族血脉渗透到家族后代的骨血中，成为家族成员之间的精神纽带，甚至成为他们的性格乃至命运的一部分。日本东京商工研究机构数据显示，全日本有21666家企业超过150年历史，日本家族传承是日本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对“家”这一观念的认同和传承，在传承中形成本企业的独特文化。正如马伯庸所云：一个家族的传承，就像是一件上好的古董。它历经许多人的呵护与打磨，在漫长时光中悄无声息地积淀，慢慢地，这传承也如同古玩一样，会裹着一层幽邃圆熟的包浆，沉静温润，散发着古老的气息。工匠精神代际之间薪火相传，不断创新，才走到了今天的数字时代。即使到了数字时代的今天，家族传承决定的工匠精神虽然逐渐弱化，但有些方面仍然不断被发扬光大。

（六）个人习惯养成

工匠精神具体到个人层面，就是兢兢业业、踏踏实实、不断创新的敬业努力精神。这是决定数字工匠精神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因素。毛泽东指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小鸡，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① 内心对精致完美的追求，变成一种信仰和习惯，一种对工作的敬畏，并由热爱而全身心投入。它是从小养成的一种人生态度。不仅把工作当作赚钱养家、安身立命的工具；而且还充满对职业的敬畏、对工作的负责、对产品的执着态度；极度注重细节，不断追求完美和极致，给用户无可挑剔的体验；将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融入每一个环节，做出打动人心无可挑剔的产品。真正的专注、内敛和极致，使得“术至于极者，几近于道”。李克强总理说：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7页。

“我们国家工业制造产品最大的短板还在质量上，质量的关键环节在人。”

此外，具有工匠精神的个人还可以通过专业技术技能的提升带动企业员工队伍建设，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和产业标准。通过“羊群效应”激发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从而带动企业员工队伍整体能力的提升，有利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可以说，员工个人的发展与企业、社会和国家息息相关。工匠精神是培育大国工匠的道德指引，也是员工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重要途径。

五、企业工匠精神培育的定量分析

根据影响企业工匠精神培育因素的定量分析，进一步深入研究，则找到培育企业工匠精神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以便有的放矢地培育企业工匠精神。

（一）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分析研究

构建我国工匠精神综合评价体系需要考虑各地区多方面指标的发展情况，评价指标体系尽可能客观、集中反映我国企业工匠精神的水平。目前国内外常用的方法主要分为两类：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本文选择客观赋权法的主成分分析法。同时，为了分析不同时间节点下同一地区的企业工匠精神的变动，本文选用了考虑时间变化的主成分分析方法，即全局主成分分析。

（二）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来源

本文在构建企业工匠精神指标体系时，参考了刘亮（2008）、高宁广（2018）等人的研究成果。刘亮从企业家个人和创新环境两个角度构建了适合中国数据特征的企业家精神指标体系，而高宁广则从精益求精水平、职业能力水平、创新能力水平三个方面对中国区域制造业工匠精神进行评价。本文选取除香港、澳门、台湾、上海、西藏以外的29个省级区域作为研究样本（上海和西藏缺失有关职业教育的关键数据），时间范围为2011年至2016年（2011年前各统计年鉴一般采用大

中型企业的统计方式，而 2011 年后才统一采用规模以上企业的统计方式)。分析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工会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等。基于以上研究思路，考虑到我国家族因素对培育企业工匠精神的相对弱化和统计数据的缺失，本文主要从影响企业工匠精神培育的五个层面来选取指标数据，确定国家政策层面、社会环境层面、产业引导层面、企业因素层面和员工个人层面 5 个一级指标和 16 个二级指标，具体的指标体系构建如表 3 所示。

表 3 企业工匠精神培育指数指标体系构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计算方法
国家政策	政府对研发的支持力度 X_1	来自政府的研发资金/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
	国家对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的支持 X_2	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人数
社会环境	职业教育经费投入 X_3	技工学校教育经费/在校学生人数
	职业院校的建设 X_4	技工学校个数
产业引导	工会开展劳动竞赛的积极性 X_5	开展劳动竞赛的基层工会/ 基层工会组织数
	工会对劳动者的奖励 X_6	工会组织省级及以上劳动模范和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人数
企业因素	创新活动强度 X_7	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数量/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
	创新产出 X_8	有效发明专利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
	技术改进投入 X_9	技术改造经费支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
	产品创新收入 X_{10}	新产品的销售收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
	开办研发机构的积极性 X_{11}	有研发机构的企业数量/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
	研发活动的经费投入 X_{1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经费内部支出/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
	研发活动的人力投入 X_{1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人员/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

续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计算方法
员工个人	专业技术能力认证 X_{14}	技工及高级技工认证数/总认证数
	劳动竞赛参与度 X_{15}	参加基层工会组织劳动竞赛的职工人次
	受教育程度 X_{16}	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上）占比

（三）主成分分析结果说明

1. 指标相关性的分析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是合理可行的。从实验的相关系数矩阵结果来看，多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相对较高，其中最高的相关系数达到了 0.832，指标之间均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另外，从 KMO 检验结果来看（表 4），其检验系数为 0.743，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的显著性为 0.000，说明数据具有结构效度，适合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进行处理。

表 4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743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979.299
	自由度	120
	显著性	0.000

2. 指标权重的确定

首先需要提取主成分因子，根据实验结果，可以从中提取出 7 个主成分，其累计的方差贡献率达到 87.049%；然后计算出 7 个主成分各自的得分权重 w_i ，利用以下公式计算每个初始指标在综合得分 F 中的权重：

$$F = w_1 \times Z_1 + w_2 \times Z_2 + w_3 \times Z_3 + w_4 \times Z_4 + w_5 \times Z_5 + w_6 \times Z_6 + w_7 \times Z_7$$

得到 16 个初始指标的权重体系如图 12 所示：

在培育企业“工匠精神”各因素中，企业因素影响程度最大，占比为 37.33%，其他依次为：员工个人、产业引导、国家政策和社会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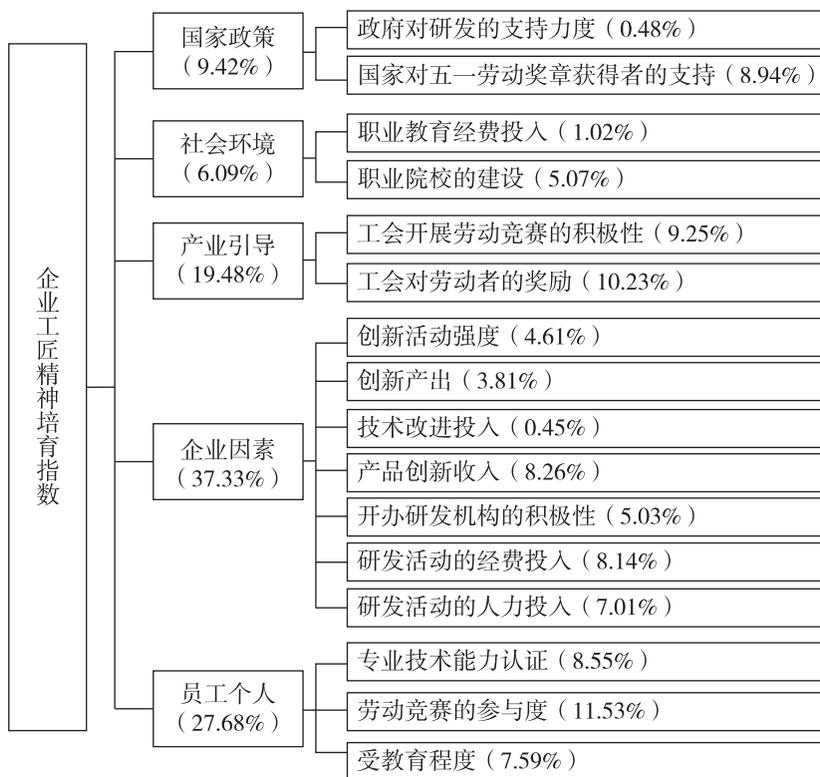


图 12 企业“工匠精神”培育指数指标权重体系

境因素。

(1) 企业因素对企业工匠精神培育的影响最大。根据定量分析结果来看，企业因素的影响程度达到 37.33%，占比最大。企业作为工匠精神的重要载体，是培育工匠精神的主要阵地，企业通过加大研发活动的经费投入 (8.14%) 和人力投入 (7.01%)，以增加产品创新收入 (8.26%) 为目的，加大企业创新活动的强度 (4.61%)，增强开办研发机构的积极性 (5.03%)，为企业员工提供学习、锻炼、认真搞研发的机会和平台，营造全企业上下努力创新搞研发的氛围。企业因素对培育企业工匠精神的创新能力水平至关重要。

(2) 员工个人对企业工匠精神培育的影响次之。人才是企业和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是激活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打造高

质量发展的支撑体系离不开工匠精神，而个人是工匠精神的第一践行者，因此，员工个人的发展对于工匠精神培育的影响占据次席，达到 27.68%。

对于员工个人来说，要积极参与到企业、工会或行业组织的劳动竞赛中去（11.53%），通过与同行业、同公司或者同部门的其他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的比拼，充分了解自己的不足，通过追求更高级别的专业技术能力认证（8.55%），逐步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员工个人因素对培育企业工匠精神的职业能力水平至关重要。

（3）产业引导对企业工匠精神培育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行业协会和工会是联系职工的重要纽带。行业协会和工会积极宣传精益求精、专注创新、爱岗敬业的工匠精神，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活动，如职工劳动竞赛（9.25%）等引导职工培养工匠精神的意识，通过对优秀职工进行评选和奖励活动（10.23%）激发行业学习工匠精神的热情和积极性，宣传本行业优秀员工事迹，为行业职工和企业树立学习的榜样和标杆。行业协会和工会从产业引导层面出发，培育具备行业特征的工匠精神，为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企业工匠精神的培育营造了良好的行业环境，所以产业引导因素对企业工匠精神培育的影响也不容忽视（19.48%）。

（4）国家政策和社会环境对培育企业工匠精神的影响程度较低。国家政策和社会环境因素影响程度虽然较低，只占 9.42% 和 6.09%，但是也不能忽略。2016 年是我国工匠精神的政策元年，自 2016 年以来，工匠精神已连续 4 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及，工匠精神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国家和政府需要出台更加具体的有关企业工匠精神培育的政策措施，加大对工匠精神培育的支持力度，例如国家对“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的支持对企业工匠精神培育的影响程度达到了 8.94%。

而国家政策也会影响工匠精神培育的社会环境，通过加大职业院校的建设（5.07%），增加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1.02%），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树立全社会尊重职业教育、崇尚职业教育、尊重人才培

养、尊重工匠精神的良好风尚。

3. 指标合成结果

利用主成分综合公式得出的指标权重，对通过无量纲化处理后的16个指标进行加权处理，即可计算出2011年至2016年各个省级地区企业工匠精神的培育水平，数值越接近100，说明企业工匠精神培育水平越高；越接近0，说明企业工匠精神培育水平越低，详细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2011—2016年各省级地区企业工匠精神培育指数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北 京	54.7	51.8	55.1	50.8	51.3	56.1
天 津	42.1	40.8	40.8	42.9	44.6	42.3
江 苏	29.5	30.5	27.7	30.1	33.2	36.1
广 东	27.2	26.5	23.9	27.8	31.2	35.8
山 东	24.8	27.2	32.8	26.6	30.1	30.6
浙 江	27.1	25.8	26.3	27.1	30.8	34.5
湖 北	21.1	22.3	22.8	24.2	26.3	22.5
湖 南	19.3	18.3	20.8	23.4	27.4	29.1
陕 西	25.5	23.0	21.7	22.3	21.1	21.2
河 北	18.9	17.7	17.6	21.5	22.4	25.2
重 庆	18.6	16.7	16.6	18.9	21.4	23.2
黑 龙 江	24.9	18.4	17.1	16.6	17.6	19.3
四 川	14.1	15.6	16.0	18.4	19.4	21.2
山 西	18.5	16.8	16.5	16.3	17.0	18.3
安 徽	15.5	14.9	18.1	17.5	17.8	19.1
辽 宁	15.7	13.2	14.2	13.3	20.1	26.2
内 蒙 古	13.8	15.5	19.7	16.5	16.7	20.3
福 建	14.1	14.2	22.5	13.4	15.8	15.7
河 南	15.6	13.6	19.7	14.8	15.6	14.7
海 南	15.1	13.7	14.6	15.8	14.8	14.1
甘 肃	16.2	14.7	13.2	14.0	15.0	13.4
宁 夏	16.4	14.4	12.5	13.9	13.9	13.4

续表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吉林	11.0	12.4	9.5	15.1	16.7	12.4
江西	8.6	7.8	13.6	9.0	15.1	13.6
新疆	10.6	9.8	9.6	9.7	12.0	11.6
广西	10.8	9.8	9.5	8.2	10.1	10.6
云南	10.3	7.3	6.9	7.3	10.6	9.8
贵州	8.8	8.4	5.8	5.6	6.6	7.8
青海	7.3	13.4	4.5	4.2	3.8	7.1
均值	19.2	18.4	19.0	18.8	20.6	21.6

注：此排序的依据为 2011—2016 年的平均综合评价指标。

(四) 分析结论

通过对 29 个省级地区从 2011 年到 2016 年的企业工匠精神培育指数的综合评价，得出以下结论。

1. 企业工匠精神总体水平呈现上升趋势

中国各地区企业工匠精神指数大体呈上升趋势，从各省的均值来看，已经从 2011 年的 19.2 提升到 2016 年的 21.6，这反映出中国企业工匠精神的培育环境、劳动力职业素质、企业产品创新研发能力等方面都处于不断提升的阶段。

2. 中国各省区企业工匠精神的培育状况不均衡

首先，北京企业工匠精神培育指数在各年份中均居全国首位。尽管在 2011 年至 2016 年呈现一定的起伏波动，最高 2016 年达到 56.1。而较低的云南、贵州和青海培育指数都在 10 以下，分别为 9.8、7.8 和 7.1。2016 年高于均值的省份 11 个，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低于均值、高于 10 的省份 15 个，主要分布于中西部。

造成各地区企业工匠精神培育水平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在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造成了职业教育水平上、创新研发氛围上、人才集聚效应上的差异，影响了企业职工在产品质量、产品

创新方面的追求，进而影响了企业工匠精神的培育。

六、企业工匠精神培育的对策建议

当代企业工匠精神的培育是社会生态的全方位滋养和呵护。是在国家政策引导与扶持下，社会赋予工匠以较高的价值符号，产业对工匠精神的推动与繁荣，企业对富有工匠精神的工匠的栽培与酬报，员工个人的挚爱与追求。工匠精神是工匠们在长期职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良好职业素养、彰显的特有职业品质，是职业精神的萃取。在国家提出“弘扬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恪尽职业操守、崇尚精益求精”的大背景下，培育企业工匠精神需要从以下方面进行统筹。

（一）运用物联网技术建立质量追责制度

通过前面的分析论证可以看到，在当代社会诸多影响工匠精神的因素中，企业和个人是培育工匠精神的最主要的两个因素。因此，要培育更多的具有数字工匠精神的工匠，首先应在制度层面上建章立制。企业在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前提下，借鉴《吕氏春秋》中“物勒工名”制度，对职工个人进行严格的质量管理。所谓“物勒工名”，就是器物的制造者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凡不符合质量和标准的，要追究制造者的责任乃至杀头。这种严格的质量追责制度和统一标准制度，对于秦始皇统一六国和我国万里长城至今仍雄踞天下具有重要的品质意义。《唐律疏议》中明文记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企业根据自己的产品或服务特点，运用物联网技术，因地制宜地建立严格的质量追责制度，问题产品出现虽然罪不至杀头，但建立必要的惩罚机制，从制度层面上使员工养成精益求精的习惯，从而使工匠精神的培育有了制度保障。

（二）设置激励工匠精神的利益分享机制

要成为具有工匠精神的工匠，个人主动参与是关键。要培育企业工匠精神，企业除设置惩戒机制外，还要使员工为获得物质和精神方面的

回报，而发自内心地敬业和不断创新。“胡萝卜”一般要优于“大棒”。虽然工匠精神几乎没有个人利益的追求和牵绊，但作为企业，为激励员工不断创新与奋斗，激发员工的工匠精神，制度层面的安排是必不可少的。

例如，华为企业的成长壮大与其与奋斗者分享利益密切相关。华为先后为其员工推出奖励期权计划（TUP）。根据 TUP 计划，员工获得期权后五年为有效期，然后清零。员工只有不断努力工作才可换取更多的奖励期权，同时避免老员工拥有大量股票后坐享其成，不思进取。企业还配以严格的质量审查制度，使员工对自己的产品负责；同时享受精益求精的成果，重视细节，避免废次品和不符合标准的服务从自己手中流出。企业把工匠精神作为重要的文化纳入员工成长范畴，并通过加强培训、管理、制度激励机制等方式，使职工充满集体荣誉感，同时伴随荣誉而来的是高额度红利回报。如 2010 年华为内部股票购买价格为 5.42 元，每股分红 2.98 元，年收益率超过 50%^①。

此外，要把工匠精神落实到员工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层面，渗透到每一个员工和管理者的心灵深处。山西华翔集团有限公司有近 30 位大工匠年薪超过百万元，最高达 300 多万元，是该企业总经理年薪的 4 倍。用制度养成大家的工匠习惯，再把工匠习惯升华为“数字工匠精神”。不仅使企业产品与服务清丽脱俗，而且也使企业永葆青春，成为百年老店。要完善激励制度，让工匠们获得相应的精神和物质奖励，凭技术和“绝活”获得优先发展的机会，在评模、评先、评优方面给予倾斜。

（三）通过提升荣誉鼓励职工参加技能大赛

工匠可以不追求自身利益，但社会不能不给予这些具有工匠精神的人应有的被尊重的社会地位与物质利益。李克强总理曾指出，只要潜心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大胆创新能者多得的激励机制，中国制造不

^① 七鼎咨询，华为股权制度，2018 年 3 月 13 日。

仅会以性价比风靡全球，更能靠高质量行销世界。为使工匠精神不断得到打磨和历练，并推动产业标准的提升，我国开展了各种规模、范围和级别的职业技能大赛，从职业技校的学生到教师，以及企业员工，在产业层面使参赛人员、参赛职业技校和参赛企业不断为荣誉而战，为产品和服务的精进而努力，不断通过创新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品质和标准。通过技能大赛，使大国工匠脱颖而出，并形成千军万马提高技能和创新的热潮。

例如，由教育部牵头的一年一度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2019年来自全国37个地区的17450名选手参加了中、高职组87个项目的比赛^①。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已举办四届，全国总工会授予各工种决赛前三名选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授予前五名选手“全国技术能手”称号，并直接晋升技师职业资格，已具有技师职业资格的，可晋升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这对于培育企业工匠精神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营造工匠精神成长的生态环境

培育大国工匠，提倡工匠精神，就必须有良好的大气候和小气候，也就是工匠成长的生态环境。大气候就是要纠正轻视劳动特别是轻视普通劳动者的不良风气，在全社会树立国之工匠被敬仰的社会风气。当一个社会不再把追星作为时尚，而是把“大国工匠”作为时代楷模和价值符号，如让智能检定中国标准国际化运用的黄金娟，为火箭焊接“心脏”的高凤林，打造国之重器、71岁奋斗不止的陈和生，中国铁路济南局高铁线路维护工程师吕关仁，用完美工艺为大飞机C919添翼的“数控女神”兰惠等，比电影明星更出名、更吸粉、更被当代青年所崇拜时，尊崇工匠精神的风气就在全社会树立起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

^① 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n/jyb_xxgk/s5743/s5745/201907/t20190703_388793.html.

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小气候就是让每一个企业员工以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为己任，在提高技能不断创新中得到精神和物质上的奖赏和激励，让普通工人在普通岗位上也能将自身锻造为大国工匠。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要求，在企业内部实现“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让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①”。采取岗前培训和在岗培训相结合、“请进来”和“送出去”相结合、个人自学和内部帮带相结合等方式开展专业知识培训，同时引入“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培训理念，利用 elearning（电子学习）系统、微信群等多种载体，建立并不断丰富云案例库，以加强岗位业务知识、技能的掌握和运用。

（五）落实“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

数字时代服务业就业人数已超过制造业居于首位，社会对人及其技能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因而建立和完善职业技能证书制度迫在眉睫。要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就必须有一流的劳动者和大国工匠，才能成就大国重器；没有竞争力的企业，也就没有强大的国家。国务院提出“从2019年开始，在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启动‘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以下称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②。“深化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模式改革，借鉴国际职业教育培训普遍做法，制订工作方案和具体管理办法，启动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③“建立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制度，为劳动者提供便利的培训与评价服务。从事准入类职业的劳动者必须经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④“把职业技能培训作为保持就业稳定、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关键。”

①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② 国务院：《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号。

③ 国务院：《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号。

④ 国务院：《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国办发〔2019〕24号。

键举措，作为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① 2017年11月，吴晓波和腾讯社交共同发起了“匠心守护基金”招募计划，向全社会招募满足“新匠人”标准的匠心企业。通过个人价值、市场价值、产业价值和文化价值四个维度，对匠人的品牌价值进行量化评估，从而计算出匠人在创新性、成长性、独特性方面的指数。这是国内第一个针对新匠人的数据分析产品，对“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起到重要激励作用。

（六）与高校协同育人和建立现代学徒制

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现代学徒制培训。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实现企业用人与学校培养的有效衔接。“将职业道德、职业规范、工匠精神、质量意识、法律意识和相关法律法规、安全环保和健康卫生、就业指导等内容贯穿职业技能培训全过程。”李克强总理提出大工匠要以师带徒、薪火相传，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使中国制造不仅有价格竞争力，更有质量竞争力。根据2019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要用5到10年左右时间，职业教育基本完成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变，大幅提升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提供优质人才资源支撑。著名企业家、教育家聂圣哲呼吁：一流工匠要从少年培养，有些行业甚至要从12岁开始训练，要尽早恢复学徒制。

“把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和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的重要方式，使城乡新增劳动力更多接受高等教育。”^② 并使岗位技能等级提升与薪酬挂钩。强化职业技能鉴定证书的复训、考评，逐年提高高级和技工级别人员在技术人员中的占比，通过技术比武和年度业务考核等形式选拔业务骨干，不断强化梯队建设。

^① 国务院：《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国办发〔2019〕24号。

^② 国务院：《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国办发〔2019〕24号。

（七）加强企业职工思想品德的匠心教育

培育工匠精神，不仅包括对员工的“懂技术会创新”的知识技能要求，更包括“有理想守信念、敢担当讲奉献”的精神境界要求。工匠精神最终还是靠自身的无怨无悔、执着真诚、敬畏品质的追求，但也离不开加强企业职工思想品德的匠心教育。将企业打造成具有工匠精神的品质企业，将员工打造为德艺兼修的匠人。李克强总理在考察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时勉励同学们：“国家不仅需要高端科研人才，也非常需要高技能人才，希望你们更加注重坚守专业精神、职业精神和工匠精神，努力顶起中国制造的脊梁。”国家政策的引领对于工匠精神的培育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018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总投入为2463亿元，比2017年增长6.17%；普通高职高专教育经费总投入为2150亿元，比2017年增长6.16%。李克强总理指出“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要靠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工艺创新，其中关键是以客户为中心。唯有打造匠心品质，把“匠心”融入到技术标准和细节中去，才能以客户不断提升的消费需求，倒逼“中国制造”全面升级。

参考文献：

- [1] 张晓燕. 新时代工匠精神的内涵及培育路径 [J]. 经营与管理, 2019 (12): 75-77.
- [2] 欧阳帆. 落实立德树人 培育工匠精神 [J]. 智库时代, 2019 (44): 7-8.
- [3] 王晓晰. 工匠精神涵义探析 [J]. 科技资讯, 2018, 16 (03): 225-227.
- [4] 查国硕. 工匠精神的现代价值意蕴 [J]. 职教论坛, 2016 (07): 72-75.
- [5]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R].

2017-10-18, www.qstheory.cn.

[6] 李龙. 从“3H”崛起简析山东企业抢抓“互联网+”机遇的管理创新经验 [J]. 科技经济导刊, 2016 (23).

[7] 潘驰远, 李啸天, 宋梓清. 工匠精神对中小企业文化影响研究 [J]. 现代商贸工业, 2019, 40 (18): 51-52.

[8] 许意强. 打造工匠精神 企业必须学会走自己的路 [N]. 中国企业报, 2016-05-17 (014).

[9] 潘建红, 杨利利. 德国工匠精神的历史形成与传承 [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8, 40 (12): 101-107.

[10] 李伟. 制造强国建设背景下的工匠精神研究 [D]. 河南师范大学, 2017.

[11] 马伯庸. 一个家族的传承, 就像是一件上好的古董 [EB/OL]. <https://new.qq.com/omn/20180811/20180811A05QAQ.html>.

[12] 高萧萧. 践行“工匠精神”追求“精益求精” [J]. 企业文化部, 2018-09-11.

[13] 曾青生, 郑雄林, 曾娜. 新时代工匠精神融入思政工作的价值探析 [J]. 江西教育, 2019 (Z1): 41-43.

[14] 刘亮. 企业家精神与区域经济增长 [D]. 复旦大学, 2008.

[15] 高宁广. “工匠精神”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影响的实证分析 [D]. 北京邮电大学, 2018.

[16] 郑刚, 雷明田子. “互联网+”时代的新工匠精神与产品创新 [J]. 清华管理评论, 2016 (10).

[17] 大工匠年收入过百万 李克强赞叹: 企业有希望 [EB/OL]. <http://www.chinanews.com/m/gn/zon/09-06/8323902.shtml>.

[18] 第四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开幕 [N]. 人民日报, 2012-08-06.

[19] 曹顺妮. 工匠精神: 开启中国精造时代 [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

[20] 陈轩, 林翎. 培育工匠精神, 锻造工匠人才 [EB/OL]. 劳动观察, 2018 - 06 - 03.

课题负责人: 杜振华

课题组成员: 王 勃 朱 硕 米师悦

刘晓娜 茶洪旺 胡 春

“北京榜样”助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以部分市属高校为例

北京物资学院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就提出了“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的要求。5年来，各个高校根据自身实际做了大量探索，在“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方面打造了一些载体，甚至形成了一些品牌，但总体来说，其持续性、有效性和覆盖面仍然不足。同时，已经持续多年的“北京榜样”评选活动及“北京榜样”事迹宣讲活动，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双重组织保障下，其持续性、灵活性、艺术性、实践性已经得到彰显。对于首都高校来说，“北京榜样”无疑是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培育最有效、最便捷的身边教育资源。因此，对“北京榜样”助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现状进行调研，找出目前存在的问题，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改进的对策建议，是一项出于问题意识和现实关切的重要研究课题。

一、“北京榜样”助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独特优势

（一）“北京榜样”的核心价值底色与价值观滋养作用

“北京榜样”是产生于北京又超越北京、在全国具有巨大影响力和

感召力的优秀群体，这些源于基层、出自平凡、充满正能量的榜样人物身上，充斥着浓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底色，他们既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人格典范，也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国家建设者，还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维护者，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家国情怀、奋斗精神、道德追求和优秀品质必将成为大学生成长成才、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价值滋养。多年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连续举荐和评选，已经使每一环节、每一过程、每一上榜人物，均成为承载、传播、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鲜活载体和有效平台。

“北京榜样”的选树过程，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过程。“北京榜样”不仅仅是外显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或感人事迹，更是内隐的超越性的人格范式和价值图式。因此，“北京榜样”更像是一种价值符号，选拔举荐“北京榜样”，实际上就是在倡导“北京榜样”承载的价值图式。

“北京榜样”的传播过程，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同过程。“北京榜样”举荐选树出来之后，宣传教育部门或大众媒体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广泛宣传和报道榜样的动人事迹，大学生在了解“北京榜样”人物及其事迹的同时，深刻感知、体悟榜样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从心理上、情感上形成对榜样价值内涵的接纳、喜爱，并在行为上产生趋同意向，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形成。

“北京榜样”的学习过程，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过程。“北京榜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精神实质上的内在契合，不仅让大学生在“感动”和“心动”中心向往之，而且使大学生萌生“行动”起来跟着学的意愿和信念。“北京榜样”在为实现国家价值目标凝聚力量、为树立社会价值导向强基固本的同时，更为遵守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价值准则塑造人格典范和价值图式，直接引导大学生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北京榜样”助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独特优势

与高校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其他载体相比，与其他各式各样的榜样学习活动相比，“北京榜样”在助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独特优势主要体现在三方联动的育人体制供给、亲善便捷的交互氛围创设、具体可信的教育资源呈现三个方面。

1. 三方联动的育人体制供给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思想政治理论课、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及英雄模范人物的学习都是常用的培育载体和途径，这些传统载体和途径确实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在灵活性、艺术性、实践性等方面有待提升。有的高校结合自己的特色资源搭建了持续性、艺术性、实践性较强的培育平台，如北京物资学院的“杨洪璋德育实践基地”，以获得全国“节约之星”称号、“北京榜样”上榜人物、北京物资学院退休教师杨洪璋老师几十年如一日，带领物院师生以万全爱心项目无私奉献的故事为原型，在本校通过原创话剧、学生座谈、带领实践等多种形式取得了很好的教育效果，但也存在后劲缺乏、鉴赏疲劳、内容单一、覆盖面有限等不足。以“北京榜样”选树及传播为培育平台，充分发挥平台的助推作用，能有效克服高校在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遇到的困境，更重要的是为大学生实现政治社会化、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了目标参照，为探索新时代高校、政府、社会三方联动的协作育人体制提供了实践模式供给。

2. 亲善便捷的交互氛围创设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发挥的思想性、理论性、系统性作用毋庸置疑，但长期存在的说教性、灌输性、官方话语特征等易导致大学生产生逆反和抵触；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虽然具有随时随地、针对性强的显著优势，但有时也存在说教色彩浓厚、身教效果不佳、感染力不强等问题；学校组织的各种实践活动具有

较强的主体参与性和感受性，但缺乏主客体之间的思想碰撞与互动交流；传统的榜样学习活动如雷锋学习日，重大纪念日如“九一八”纪念日、抗战胜利纪念日、国庆等也具有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作用，但榜样人物的凝固化、不在场性及高大全的完美形象，纪念日、庆典活动的固定时间节点限制等，都使培育活动的鲜活性、便捷性、灵活性大打折扣。“北京榜样”助推平台恰好克服了以上诸多问题和弊端，来自基层、出自平凡的北京榜样人物对大学生来说，有的像和蔼慈祥的邻居叔叔阿姨，有的像可亲可爱的学哥学姐，甚至有的像任劳任怨的父母。大学生可以真实触摸到他们，闻到他们的精神气息，感受到他们的心灵轨迹，只要愿意，随时随地可以与他们互动交流。以“北京榜样”为助推平台，对大学生来说最大的优势就是亲善便捷的交互氛围创设。

3. 具体可信的教育资源呈现

与抽象深奥的理论分析相比，与空洞呆板的说教相比，与他者口中的年份故事相比，“北京榜样”真实具体、鲜活生动、以小见大的感人事迹，对大学生来说，就是近在眼前、无可置疑、可亲可信可学的优质教育资源。他们“热爱祖国、奉献首都的家国情怀”是增进大学生政治认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素材，他们“服务人民、拼搏为美的奋斗精神”为大学生努力学习、报效祖国提供了动力之源，他们“积善成德、诚信友爱的道德追求”为大学生修身养性、选择人生道路提供了价值指引，他们“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的优秀品质”更是大学生攻坚克难、永攀科技高峰的精神滋养。面对面、心贴心的交流必然会把榜样群体“美好生活建设者、创新时代领跑者、社会和谐维护者、优秀文化传承者”的作用充分展现在青年大学生面前，为青年大学生认知、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具体可信的教育资源。^①

^① 这一段对“北京榜样”精神内涵和作用的表述参考了中共北京市委发表于《求是》杂志2019年第5期上的文章《北京榜样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中的概括。

二、“北京榜样”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作用发挥情况调查分析

网络信息检索及实际访谈结果显示,在北京,部分部属重点高校已经多次举办过“北京榜样”优秀群体事迹报告会,有的校园也出现了相关宣传材料,但也有很多高校尤其是市属高校在这方面比较薄弱。为了了解“北京榜样”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作用发挥情况,课题组选取北京物资学院、北京联合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印刷学院、北京财贸职业学院五所市属高校开展调研,为保证数据的真实可靠,调研主要选取大二、大三及部分研究生为样本开展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100份,回收1056份,经过逐一检查筛选出有效问卷968份。经过逐项统计分析,形成以下几点结论。

(一)大学生对“北京榜样”的关注度总体较低,大部分学生有一定认知和浅层认同,但缺乏全面充分认知基础之上的深度认同

大学生对“北京榜样”及相关评选活动的关注度能反映大学生的认知、情感取向,而对“北京榜样”的认知、认同既是榜样发挥作用的前提,也是榜样作用显现的初级表现。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的大学生对“北京榜样”评选活动及优秀群体“时代楷模”授予活动“不太关注”和“从不关注”的比例合计高达89.6%,只有10.4%的大学生“关注较多”,这说明被调查大学生在对“北京榜样”的认知取向上存在偏差,一定程度存在认知兴趣不足的问题。在回答“您了解‘北京榜样’及其事迹吗”时,40.5%的大学生选择“不了解”,53.2%的大学生选择“了解一点”,选择“非常了解”的只占6.3%。这说明部分大学生对“北京榜样”认知度不是很高。但84.9%的大学生认为既然“北京榜样”来自基层,那应该是“可亲可敬可学”的,说明建立在非充分认知基础上的感性认同或表层认同度比较高,但明显缺乏理性认同和深度认同。大学生对“北京榜样”的关注、认知、认

同状况表明,“北京榜样”助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尚缺乏坚实的认知基础和情感基础,应在提高认知、夯实情感基础方面下功夫、出实招。

（二）大部分学生认可“北京榜样”承载的价值观及可贵之处，但相当部分学生表示效仿意愿不强

在回答“您认为‘北京榜样’优秀群体之所以能够被层层选树出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时,65.8%的调查对象选择了“他们身上承载着当下中国社会最需要提倡的核心价值观,契合人们的价值追求”,27.5%的选择了“他们在各自岗位上有突出工作业绩或不凡表现”,只有极少数调查对象认为是由于“他们的人缘好”或“其他说不清楚的原因”。这反映出首都大学生对“北京榜样”评选结果的公正性认同度较高,同时说明大部分学生认可“北京榜样”承载的价值观契合人们的价值追求,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学生内心渴望追求的价值观正是榜样人物承载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认同是“北京榜样”助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良好心理基础。但在回答“您愿意更多了解‘北京榜样’先进事迹并在今后的生活中效仿他们的行为吗”时,44.4%的调查对象选择“愿意了解并效仿”,45.2%的调查对象选择了“愿意了解,不一定效仿”,还有8.8%的选择“不想学习任何人,想活出自己的特色”,这些数据反映出相当一部分学生虽然承认榜样价值并愿意多了解,但仅限于“旁观”式的认知而已,效仿并付诸行动的意愿不是很强,还有少部分学生流露出对榜样人物的拒斥心理。这些情况说明目前“北京榜样”在价值引领方面作用明显,但在大学生的行为引导方面效果显现不足,为进一步发挥“北京榜样”的助推作用,需要在知行转化方面多下功夫。

（三）大部分学生对“北京榜样”融入学习过程持积极接受态度，但目前尚未形成有效的融入机制与路径

在回答“如果让‘北京榜样’优秀群体进入课堂、宿舍等场所,

与大学生直接交流对话谈心，您乐意接受吗”时，选择“非常乐意”和“乐意”的人数总计达87.2%，而选择“不乐意”和“非常不乐意”的只占问卷样本的12.8%。这组数据表明绝大部分大学生对“北京榜样”人物走进课堂和宿舍与大学生面对面交流谈心是欢迎的。当问及“如果将‘北京榜样’优秀群体的工作岗、事迹岗建成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流动基地，您是否赞成”时，69.6%的调查对象选择“赞成，也愿意经常去参与实践活动”，10.2%的选择“不赞成，太浪费时间”，6%的选择“不赞成，那些岗位太具体，缺乏教学价值”，还有14.2%的选择“无所谓”。可以看出大部分学生赞成建设实践教学流动基地，但也有少部分学生不赞成，主要原因是对“北京榜样”的内在教育价值认识不到位，需要引起重视。同时，这组数据显示的大部分学生对“北京榜样”融入学习过程持积极乐观态度的背后，提出的一个严峻问题是目前尚缺乏“北京榜样”融入大学生学习过程和生活环节的常态化机制和有效路径。调查数据显示，63.6%的调查对象不记得所在学校举办过“北京榜样”优秀群体先进事迹报告会，20%的调查对象直接选择“从来没有举办过”；44.1%的调查对象认为很少或从未在校园见过“北京榜样”宣传材料，39.3%的调查对象选择“没注意”；41%的调查对象不记得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在讲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相关内容时提到过“北京榜样”评选活动及先进人物事迹，还有14.6%的直接选择“从没提过”。这些数据反映出“北京榜样”在进校园、进课堂、进大学生头脑方面尚有较大的推进空间，在助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方面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出来。

（四）大学生对“北京榜样”融入学习过程的话语方式和宣传展示形式有特殊的喜好，现有宣传展示形式有待进一步整合创新

在问到“如果把‘北京榜样’优秀群体事迹引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过程，您认为哪种话语方式更有吸引力”时，48.9%的调查对象选择了“民间话语”，32%选择了“网络话语”，选择“官方

话语”的只占14.2%。这表明大学生在宣传话语方式的选择上,更倾向于通俗易懂接地气的民间话语,以及符合自身生存方式和表达方式的网络话语,对较正式、较规范的官方话语则不是很欢迎。对于最喜欢的“北京榜样”宣传展示形式的选择,48.7%的选择“网页、微电影、微视频、微博、微信”,35.2%的选择“歌舞、戏剧、小品等文艺节目”,9.6%选择了“电子屏、展板、宣传栏”,只有6.5%选择了“事迹报告会、座谈会等”。这说明互联网是大学生最喜欢、最乐于接受的榜样宣传展示平台,其次是寓教于乐的文艺节目,最不受欢迎的是展板、宣传栏、事迹报告会等传统形式。这就告诉我们大学生对“北京榜样”融入学习过程的话语方式和宣传展示形式有特殊的偏好,不能简单复制社会上通行的宣传展示形式和话语方式,需要对“北京榜样”现有的宣传展示形式在保留原有优势的基础上,根据当代大学生的认知特点和接受偏好针对性设计、创新。

三、制约“北京榜样”助推作用充分发挥的主要原因

(一)“北京榜样”的传播场域远离大学生日常生活圈

大学生日常生活圈主要在校园,课堂教学和校园文化是影响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的最重要因素。但从目前情况看,市级层面“北京榜样”的传播场域主要涉及北京十六区及所有街乡镇,目的是通过综合运用新闻宣传、文艺展演、报告会、道德讲堂、编辑出版书籍等多种形式,把“北京榜样”的动人故事讲给广大市民听,有的区在主要街道还建立起“榜样一条街”,有的居民小区搭建了榜样人物宣传栏,这就使得市民们在逛街遛弯的时候就能感受到榜样的存在。另外,市属媒体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搭建了“北京榜样”常态化宣传渠道,还将“北京榜样”人物事迹融入文艺创作、节目演出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生活中,创作了“北京榜样”事迹戏剧等,总之,宣传攻势和传播热度空前。但所有这些有创意、有温度、有影响力的传播形式都远

离大学生日常生活圈，还未形成一股常规化教育力量正式进入高校校园，大学生对“北京榜样”的有限认知要么是在家庭居住地（北京生源）耳濡目染，要么是在校园之外的公交站、地铁站邂逅偶遇，缺乏系统深入的认知，“北京榜样”也就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高校选树典型和宣传借力“北京榜样”的积极性不高

众所周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选树榜样、宣传榜样、借力榜样会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取得事半功倍之效。但近年来高校在选树典型和宣传借力“北京榜样”助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方面的积极性不高，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高校选树典型工作效果有所弱化。在选树标准上长期突出强调志愿服务型、家庭贫困型、身残志坚型和学习优胜型等模式化类型，在选树方式上不同程度地存在名额摊派、轮流坐庄等怪象，在宣传学习上存在毕其功于一役、缺乏对其精神内涵概括提炼、不注重对典型榜样的持续养护等问题，使得高校选树典型工作日益缺乏感召力和吸引力，选树的典型也不能很好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二是高校对出自校园的“北京榜样”宣传学习力度不够。校园中产生的“北京榜样”是大学生真正的身边榜样，具有极高的可信度和可学性。如2016“北京榜样”年榜人物张博研、2018年榜人物“90后”北大女生宋玺，都是非常适合大学生学习的青年榜样，2017“北京榜样”年榜人物北京交通大学教授贾利民则是师生共同的学习榜样。但高校自身宣传学习力度不够，也没有在高校系统形成辐射效应，因而尚未对首都大学生产生群体效应。三是借力“北京榜样”平台资源助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积极性不高。“北京榜样”先进事迹校园宣讲活动的主导意识薄弱，没有形成常态化的联系、邀请机制，大多处于上级相关单位安排下的被动接受，活动带有偶然性和时机的不确定性；校园文化建设缺乏“北京榜样”元素设计，尤其北京市属高校在体现北京精神、学习北京榜样、服务北京建设方面口号喊得响亮，隐性传播工作却做得不够到位；没有关注榜样人物与大学生之间的直面交流、互动环节设计，“运动式”的榜样人物先进事迹报告会，大

学生完全是忠实而被动的受众，榜样人物近在咫尺，可感、可睹、可闻，唯独不可交流，这无形中在大学生与榜样人物之间竖立起一堵无法逾越的心墙，影响了大学生对榜样人物的情感认同；没有开发出系统的课堂融入方案，造成“北京榜样”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彻底失踪失声。出现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高校、政府、社会三方协同育人机制尚不完善，导致高校囿于联系烦琐，无专人对接，人财物保障跟不上等顾虑而放弃借力“北京榜样”平台资源。

（三）传统榜样认同困境对“北京榜样”认同的不利影响

综观历史，曾经有许许多多榜样人物响彻心扉，如雷贯耳，如雷锋、张思德、邱少云、黄继光、刘胡兰、王进喜、时传祥、张海迪、张华、徐本禹等。他们的确曾经是时代的精神偶像，引领和教育了一代人。但随着时代变迁，当代大学生对传统榜样人物的认同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一是传统榜样人物自上而下的产生方式与大学生自下而上的认知认同路径产生偏离，使得榜样人物成为游离于大学生之外的“与己无关”的存在，被视作“他者”高高挂起，缺乏学习的原动力。二是传统榜样人物的官方宣传路径与大学生自主认同之间形成张力，导致官方宣传越红火越密集，榜样人物的政治化色彩越浓厚，大学生趋避意愿越强烈。三是传统榜样人物塑造上的高大全的完美形象与大学生自身不完美之间的落差，导致“学不来”“不好学”“不愿学”的畏学心理滋生蔓延。四是传统榜样人物的悲壮命运对大学生榜样学习心理的负面影响。细数历史上的榜样人物，要么荡气回肠、英年早逝，要么信念坚定、历经苦难，少有好人好报好结局的榜样宣传，这对初涉人生、满怀美好生活憧憬的大学生造成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久而久之，大学生只好采取敬而远之、承认但不效仿的态度。长期形成的这些认同困境对大学生接受、认同“北京榜样”产生了不利影响。可见，消除大学生的传统偏见，帮助他们走出认同困境是充分发挥“北京榜样”助推作用的当务之急。

(四) 当代大学生价值追求特点遮蔽了“北京榜样”的作用发挥

当前在校大学生大都成长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社会急速转型、文化多元多样、各种思潮风起云涌、虚拟网络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其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都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首先，肇始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价值对传统价值的颠覆，同样发生在奔向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具体来说就是在实用理性和技术理性的支配下，整个社会对感官价值、实用价值的重视超越了生命价值和精神价值，世俗价值淹没了神圣价值，这种转变对青年大学生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大学生对能带来感官享受的体育明星、影视明星、歌星等的追捧和崇拜超过了对承载着精神价值、生命价值的英雄、道德榜样及优秀人物的崇拜，这是包括大学生在内的现代社会的人在价值追求上的最大变化。其次，既定社会风气及虚拟网络对大学生的价值追求产生了深远影响。四十多年的市场化行为极大激发并释放了人们的逐利欲望，对名利的渴望和追求成为人们无须避讳的显性动机。受此社会风气的影响，大学生务实型功利化价值观代替了理想型超越化价值观，表现在偶像崇拜上就是对名人名流、成功人士、网络大V、网络红人等的关注和崇拜大大超过了对凡人善举、平民榜样的关注崇拜。大学生价值追求上的时代印记和特点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源于基层、出自平凡的“北京榜样”的作用发挥。

四、充分发挥“北京榜样”助推作用的对策建议

(一)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价值理念为指导，引导大学生的价值追求，着力提升大学生的精神境界

“北京榜样”属于草根榜样群体，他们不是明星名人名流，他们扎根基层、默默奉献，以凡人善举、常人伟力绽放于社会各个领域。发挥他们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助推作用，必须重塑当代大

学生的价值追求结构，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理念为指导，着力提升大学生的精神境界。

引导大学生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奋斗幸福观理念，正确把握“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与“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的辩证关系，激励大学生以奋斗的姿态祛除“佛系”心态，以奋斗幸福观取代享乐幸福观，用心灵丰盈、精神高贵带来的深度满足和持久幸福，去代替感官享受、物质富足带来的表面满足和暂时幸福。

指导大学生践履新思想中“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以习近平总书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担当和境界处理好个体与群体、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激励大学生眼睛向下，脚踏实地，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甘于为人民群众服务，勇于为人民群众奉献青春。

倡导大学生树立新思想中着重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教育大学生以全球眼光、国际视野正确看待和处理人类发展进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妥善处理自身成长中的各种烦恼和困难，以较高的价值追求实现精神境界的提升。

（二）以全面融入大学生日常生活圈为目标，扩展“北京榜样”的传播场域，着力提升大学生对“北京榜样”的关注度

没有关注，就谈不上影响。提升大学生对“北京榜样”的关注度是“北京榜样”助推作用发挥的前提条件。因此，在保持现有社会传播力度和广度的基础上，尽快将“北京榜样”的传播场域由重点在社会转变为社会与高校并重，使得“北京榜样”全面融入大学生日常生活圈。从目前“北京榜样”在高校的传播情况看，偶尔举办的事迹报告会在帮助大学生关注、了解北京榜样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其热度和效度难以持久。真正深度融入大学生日常生活圈，需要政府、社会与高校联合建立基于“北京榜样”的协作平台，由政府协助、学校主导、社会参与一体化整体建设校园文化、整体设计校园活动、整体规划德育实践。

校园文化建设中要有“北京榜样”的元素嵌入。可以借鉴基层街巷、居民小区宣传榜样的有效做法，将榜样人物及其事迹介绍做成艺术牌匾植入校园绿化带或学生日常必经之道旁，把赏心悦目的自然景观与荡涤灵魂的榜样故事完美结合，让学生在不经意间关注和感受到榜样的存在；也可在校园休闲、锻炼、健身场所修建榜样长廊或榜样墙，让学生在闲暇锻炼放松时受到榜样精神的辐射，使“北京榜样”春风化雨般浸润大学生的心田。

校园经典活动设计中要有“北京榜样”的适时出场。如一年一度的大学生艺术节、新年文艺晚会、毕业典礼等经典活动，均可将已经融入榜样人物事迹的成熟的相关文艺节目、先进事迹报告、榜样巡讲等融入进来，使“北京榜样”人物和他们的感人故事在大学生的高度关注和期待中进入他们的视线，让大学生在轻松愉悦又难忘的环境记忆中认识榜样人物，感悟榜样精神，培养对榜样的情感认同。

校园德育活动规划中应有“北京榜样”的全面参与。可以将部分市属高校以“北京榜样”为抓手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型经验和做法加以提炼、推广。如北京物资学院依托“全国节约之星”“北京榜样”上榜人物、退休教师杨洪璋建立的“杨洪璋德育实践基地”，已经成为开展德育教育和社会公益服务的重要平台，也是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基地。依托该基地开展的“一堂课”“一本书”“一个展览”“一个话剧”“一个爱心社”“一个捐助站”的“六个一”活动，为高校借助“北京榜样”全方位、多角度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模式提供了有益借鉴。

（三）以平台共建、资源共享、工作互助为目标，完善高校、政府、社会三方协同育人机制，着力激发高校借力“北京榜样”资源的积极性

充分发挥“北京榜样”平台资源作用助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要求彻底化解高校在意欲使用“北京榜样”资源时的种种顾虑和困难，为高校提供各种便利和保障，从而激发和保护高校借力

“北京榜样”资源的积极性。为此，要以平台共建、资源共享、工作互助为目标，完善高校、政府、社会三方协同育人机制。

平台共建方面，高校要强化典型榜样选树工作的力度和信度，把自己的各种评优评先活动与“北京榜样”举荐评选活动结合起来，积极向“北京榜样”评选平台推荐大学生中的先进典型，举荐大学生中具有时代感、价值感的榜样人物。如把高校评选“学习之星”“五好学生”“自强之星”“优秀志愿者”“社会实践先进人物”“创业之星”等纳入“北京榜样”选树系列，与市国资委开展的“国企楷模”、市公安局开展的“最美警察”、市安监局开展的“安监之星”、市司法局开展的“寻找律师楷模”、市卫计委的“健康卫士”、市社工委的“社区好人”等并列，形成品牌链效应。

资源共享方面，高校首先要大力宣传出自校园的“北京榜样”上榜人物，形成制度化、常态化的宣传学习机制，注重对榜样人物的持续关爱与培养，并利用自身人才优势，组织具有相关学科背景和研究能力的专任教师、教育工作者，以及符合条件的上榜人物和优秀群体成员联合成立“北京榜样”教育研究中心，提炼契合大学生心理需求和成长诉求的榜样精神内涵，探索开发“北京榜样”有效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具体路径和方式，尤其在“北京榜样”进课堂、进宿舍、入脑入心方面应拿出具体可操作的工作方案，形成“北京榜样”上榜人物走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堂与大学生直面交流的常态机制。还可以选择距离较近、具有实践条件的“北京榜样”先进人物事迹岗进行重点建设，努力将其打造成有牌子、有制度、有内涵的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

工作互助方面，政府相关部门要为“北京榜样”助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工作设立专项经费、专人对接，鼓励高校开展“北京榜样”助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专项课题研究，鼓励市级教研机构评选“北京榜样”进课堂、进学生头脑优秀案例，鼓励评选一批市级“北京榜样”实践教学基地；高校要为“北京榜样”先进人物入校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待遇，要指定专门联络人员与政府相关部门实现无缝对接；网络媒体、基层单位要为“北京榜样”

助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营造良好的舆论支持和条件保障。

（四）以建立正确认知消弭认同困境为目标，重建大学生榜样学习信念，着力提升大学生对“北京榜样”的理性认同和效仿意愿

如果说拓展“北京榜样”传播场域和激发高校使用榜样资源积极性都是“北京榜样”发挥助推作用的外部推动力的话，那么以建立正确认知消弭认同困境为目标来重建大学生的榜样学习信念，则是“北京榜样”发挥助推作用的内部推动力。因为榜样“只有在它们被人们开采、获取、体验到的情况下，只有在它们被人们独立转化为个人信念的情况下，才能成为心灵的财富”^①。

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北京榜样”与传统榜样人物的异同。在“北京榜样”融入大学生学习生活过程中时，首先要阐明“北京榜样”群体的产生方式和现实状况，让大学生清晰知晓“北京榜样”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举荐、评选过程，明白“北京榜样”群体的光鲜之处和红火生活，破除传统观念中榜样产生自上而下、榜样命运悲壮凄惨的思维定式。其次要让大学生明白“北京榜样”群体构成的多层次性、多领域性、平凡之中的可贵之处以及榜样人物本身的有限性、非完美性，消除传统榜样人物“高大上”“完美无瑕”的刻板印象，让“北京榜样”以低姿态获得高度认同。最后要把民间、社会组织及高校教育工作者在宣传“北京榜样”中的主体地位与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结合好和发挥好，尽量消除大学生对传统榜样宣传单一官方路径的逆反心理和抵触情绪。

根据大学生的信息获取偏好和话语接受喜好优化宣传学习方式。当代大学生被形象地称作“网络原住民”“低头族”，网络已经成为大学生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成为大学生获取各种信息的主要途径。因此，

^① [苏] 苏霍姆林斯基：《教育与自我教育》，赵玮等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32页。

“北京榜样”的宣传载体一定要根据大学生的信息获取偏好，选择大学生易于接受、惯常使用的微博、微信、微课、微视频等方式。宣传话语一定要根据大学生的话语接受喜好选择民间话语和网络话语，尽量避免过于正式、过于政治化的官方话语，如把“北京榜样”先进事迹改编成朗朗上口、接地气、易于接受的民间歌谣和网络微小说，通过网络推送给大学生。鼓励校报、校园网络、电视台、广播台、微信微博等校园媒体的大学生记者走进“北京榜样”的内心世界，通过大学生记者的体验式报道，让“北京榜样”先进事迹更真实可信。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大学生对“北京榜样”先进人物及其事迹的深度认同。

深挖“北京榜样”的精神内涵与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契合点。榜样学习最重要的是领悟榜样的内在人格精神追求“神似”，而不是模仿榜样的外在行为表现追求“形似”。因此，深刻领会“北京榜样”的精神内涵，认真分析大学生成长成才需要，极力寻找二者之间的契合点，把“北京榜样”的精神内涵转化为大学生成长成才的价值营养和精神动力，是重建大学生榜样学习信念，提升大学生“北京榜样”理性认同的重要环节。

课题负责人：冯凡彦

课题组成员：张红霞 胡占君 李 谧

高亚春 雷爱民

引入公益诉讼机制加强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问题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不仅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也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六朝古都的显赫身份给北京留下了无数珍贵的文物古迹，整个城市本身仿佛就是一座无眠的博物馆。“北京历史文化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①一方面，它荟萃着辽、金、元、明、清以来的以中华皇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拥有众多与帝王有关的名胜古迹和人文景观，是全球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城市。另一方面，先人留下的一砖一瓦，以无言的姿态向每一位炎黄子孙诉说着蕴含于其内的中华民族千古流传的精、气、神，这乃是国人之力量与信心的来源。然而，由于目前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以及保护机制的不完善，北京城里各种文物古迹遭到毁损破坏的情况仍时有发生。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②传承北京的历史文脉，已是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题中之义。

本研究报告的主旨即在于探讨如何运用公益诉讼机制来加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所谓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相关团体、组织，依据法律授权，对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不特定多数人利

① 王金雪：《习近平：立足提高治理能力抓好城市规划建设、着眼精彩非凡卓越筹办好北京冬奥会》，《人民日报》，2017年2月25日01版。

② 杨丽娜：《习近平在京考察：在建设首善之区上不断取得新成绩》，《新华网》，2014年2月26日。

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依法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我国从2012年开始初步建立公益诉讼制度，一直到2017年完善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以检察机关为主导，符合一定资质条件的社会团体参与的民事与行政公益诉讼格局。本研究报告将主要探讨三方面的问题：①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现有保护机制的漏洞与缺陷；②引入公益诉讼机制加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可行性与必要性；③利用公益诉讼机制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制度完善。

一、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现状与问题

（一）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概念解析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一般叫作历史文化名城，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确定并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纪念意义且正在延续使用的城市。该概念于1982年被正式提出，目的在于保护那些曾经是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或近代革命运动和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的重要城市及其文物古迹。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而以城市为中心的开发建设活动和旧城更新改造，对古建筑、文物古迹及周边环境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建设性破坏”。^①于是，对国外历史城市保护比较熟悉的专家学者开始提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设想。在北京大学侯仁之、建设部郑孝燮、故宫博物院单士元三位先生的具体提议下，1981年12月国家建委、国家文物局、国家城建总局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报告。1982年2月，国务院转批了这一请示，公布北京等24座城市成了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1982年11月，全国人大通过的《文物保护法》第八条（现第14

^① 张松：《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制度特征与现实挑战》，《城市发展研究》，2012年第9期。

条)明确了历史文化名城的法定地位,规定“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由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门报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这标志着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的正式启动。

此后,为配合《文物保护法》,国务院还出台了《城乡规划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① 建设部也先后出台了《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管理办法》《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法律法规体系。有了良好的制度机制建设,历史文化名城开始了大规模的实质化建设发展与规范性保护。^②

(二) 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

作为六朝古都的北京,留给后世的,是一个国家辉煌历史的无声记忆、一个民族杰出才智的独特载体、一个文明遍历风雨的深厚底蕴。它于辽金时期以国都的身份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历史给北京留下了以故宫、颐和园、天坛等为代表的世界文化遗产和12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世界上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最多的城市,同时也是国家公布的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具有文物等级高、密度大等显著特点。

2017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的批复中,明确指出北京是我国的文化中心,并在第七部分以“做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城市特色风貌塑造”为题,特别强调要“加强对世界遗产、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和工业遗产的保护,凸显北京历史文化整体价值”。

作为中华精神沉淀的历史文化名城——北京,是我们祖先智慧的结晶、劳动的造物、雅趣的呈现,体现了我们国家的气质、民族的品格、

^① 王晓梅、朱海霞:《中外文化遗产资源管理体制的比较与启示》,《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6期。

^② 仇保兴:《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形势、问题及对策》,《中国名城》,2012年第12期。

文化的特性；是我们受赠于祖先而得来，应当守护于今世、传承于后代。为此，我们应当延续它独有的生命力，与文物对话、与古迹沟通、与北京这座古老而有着源源不断新鲜血液的城市同呼吸，使之自然而然融入当代中国人日常点滴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当中，进而成为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牢固纽带，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良因子，成为展现中华文明雍容博大之美的鲜活典范。

（三）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现状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实践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1983年批准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已有对历史街区保护的思想，提出了保护古都风貌不仅要保护古建筑本身，也要保护建筑周边的环境。^①

1990年北京市政府公布了第一批北京历史文化保护区名单。

1993年，在修订《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时，明确提出了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名单，并提出了从整体上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三个层次：文物保护、历史文化保护区、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

1999年，北京市政府批准了《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和控制范围规划》。

2002年，《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完成，其中提出“旧城整体格局的保护”。为了保障这一规划的实施，于2005年制定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以及把相应保护职责细致分解到了每一家行政机关的权力清单里，《条例》强调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原则。2016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十三五”时期加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规划》提出了“推动北京朝着世界文化名城、世界文脉标志的宏伟目标迈进”的发展目标。2017年，最新一版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里，辟有单独一章来专门阐述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新认识、新方向、新举措。2019年，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① 张帆、罗仁朝：《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城乡规划》，2004年第3期。

务委员会修订通过了《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明确了北京市城乡规划和建设“应当尊重城市的历史与文化，强化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完善保护实施机制，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传统风貌，完善涵盖老城、中心城区、市域和京津冀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①

这些不断深化、细化保护措施的规范性文件，构建起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三个层次：第一，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第二，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这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分批次公布不同层级的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名单并划定范围；二是根据其不同的特点采取不同的保护原则和措施。第三，历史文化名城整体格局的保护，一是提出市区建筑高度控制方案，二是提出整体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各项原则，三是将四合院民居列入保护对象。^②

（四）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问题

从制度建设的角度评价，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套机制可以说是相当严密的，保护对象明确，保护目标清晰，保护手段到位，保护内容丰富，保护责任具体，确实称得上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但是否也能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还有待商榷。之所以还要强调加强保护，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一点疏漏，那就是执行层面的面面俱到，也代替不了监督层面的无懈可击。事实上，现在运行的这套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机制里，只有内部的监督，系统内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从监察者角度对行政机关工作验收考核的监督，而没有外部的监督，尤其是来自公众和司法机关的监督。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未达到预期目标，甚至造成“破坏”的事例并不少见。造成目前这个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管问题，但另一方面更反映了外部监督的缺失——主要就是来自公众和司法机关

^① 《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19年4月28日，第7条。

^② 王军：《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实践及其争鸣》，《北京规划建设》，2004年第5期。

的监督的缺位。这使得行政机关往往不能及时发现文物被破坏的情况，或者其在发现时文物破坏的情况往往已经较为严重。具体缘由在于：

1. 文物保护机关相对弱势

行政机关颁布的行政处罚措施未能对文物破坏者形成有效的震慑力。文物保护部门往往属于弱势部门，要服务于当地的经济建设大局，这造成了文物保护工作困难多、阻力大，无法及时阻止不法分子破坏文物行为的现象普遍存在。

2. 缺乏社会公众的参与和监督

公众参与在现今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领域处于极其边缘乃至完全缺位的状态。政府部门在从立项、设计、实施到评审、验收、结项这一整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环节当中，基本掌握着独断专行、不容置喙的权力，况且无论在决策、执行还是监督阶段，相关制度设计都根本没有预留公众参与的空间与路径，顶多含糊其词地表示一下支持和鼓励的态度，然后便安排了作壁上观的角色定位。^①

3. 地方政府错误的文化建设方式

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开展的初级阶段，过去那种以盲目追求数量和规模为特征的跑马圈地发展模式确实能在短时间内让地方文化建设受益，当某些政府官员对这种发展模式的迷恋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便会产生一种自己无所不能的幻觉，认为只要牢牢握住行政权力这根指挥棒，不仅社会公众的意见是无关紧要的，就连专家学者的观点也无足轻重了，至于新闻媒体的看法更无关痛痒了，于是群众边缘化、专家御用化、舆论空心化，成了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全国各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中司空见惯的现象。^②

4. 司法机关对此类问题监督的缺位

行政权力的良好运行需要司法的监督 and 制约，这已经是现代法治社

^① 杨颀慧：《社会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困境及路径》，《殷都学刊》，2014年第3期。

^② 刘敏：《天津建筑遗产保护公众参与机制与实践研究》，2012年天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会不争的共同认知。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现行有效的行政制度在未规定司法机关或某种其他法律监督与执行机关对政府官员的行动至少做一种有限审查的情况下，就能防阻政府官员任意滥用权力。^①但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我们难以找出支持司法机关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进行有效监督的法律依据。即使实践中不乏检察机关的积极探索，但法律本身的短板仍让人感到遗憾。

二、利用公益诉讼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理论与实践

（一）公益诉讼的概念与意义

所谓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相关团体、组织，依据法律授权，对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依法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

从传统诉讼形式来讲，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都属于私益诉讼的范畴，是当事人由于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受不法行为的侵害，而向法院起诉求偿，所以一个最基本的起诉条件就是原告必须要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方能被视为当事人适格。

然而，这样一来就会导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对个体利益的侵害能够通过诉讼加以防范制止，进而可以获得填平甚至超出损害结果的补偿，反倒是对公共利益的侵害却处于投诉无门的境地，因为从诉讼法的角度说根本就没有一个有资格提起诉讼的适当主体。一个国家要是只有利己主义的私益诉讼，而没有利他主义的公益诉讼，是很难避免公益受损却无人追究的公地悲剧出现的。

我国从2012年开始初步建立公益诉讼制度，一直到2017年完善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以检察机关为主导，符合一定资质条件的社会团体参与的民事与行政公益诉讼格局。目前，民事公

^① [美]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主要包括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两类案件，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包括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三类案件。实际上，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案件范围远不止这五类案件，有必要在立法中适度扩大公益诉讼的案件适用范围。

公益诉讼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诉讼目的的公益性，以行政公益诉讼为例，检察机关之所以要把行政机关告上法院，不是为了实现任何私人利益，而是为了纠正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从而造成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状况。由此可见，行政公益诉讼解决的是行政机关因不当实施或未能实施行政行为而侵害公共利益的问题，此时检察机关有权对违法行使职权的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如果行政机关没有及时纠正改进的话，还会被告上法院。相较而言，行政公益诉讼更侧重诉前程序督促行政机关履职，民事公益诉讼则往往需要通过诉讼程序达到监督效果。^①

（二）利用公益诉讼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1. 利用公益诉讼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可行性

历史文化名城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伟大的民族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以及科学研究的价值。其所承载的文化资源是社会公共资源，由此产生的精神利益应属于全体中国人民，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本身自带公益属性显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公益诉讼不是公益性的诉讼，并非所有主观目的或客观结果带有公益性的诉讼都能被称为公益诉讼，作为公益诉讼客观范围的公益比人们通常理解的公益来得狭隘得多，这就产生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能否被纳入公益诉讼范畴的问题。公益诉讼并不是一种普适性与普及型的常规化司法救济机制，考虑到公益诉讼程序的烦琐、成本的高昂、执行的复杂等因素，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把公益诉讼设计成为了轻易不会动用的国之

^① 赵吟：《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功能定位及实现路径》，《法治研究》，2019年第5期。

重器，所以光是涉及公共利益恐怕还不够格，相关公共利益还要足够重要才行。

虽然古往今来尚没有人能说清楚公共利益到底是什么，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务实的角度根据重要与否对其进行排序，而我们可以采取一种多维度的权衡比较方法，例如是否属于国家的核心利益或社会的根本利益，到底在多大范围内存在多少不特定的受益主体，以及如果置之不理有可能产生多么严重的危害结果等。显然，触及利益越深、影响范围越大、损害后果越重，一项公共利益就越重要，也就越值得我们利用公益诉讼来保护。

历史文化名城中所蕴藏的公共利益完全符合这一标准。首先，用公益诉讼来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确有必要，因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就是在保护中华文明的根与魂，是整个社会的核心利益所在，而历史文化名城是属于全民族的精神财富，在中国找不出比这个更大的利益群体了，并且历史文化名城具有不可再生性，所以一旦遭受毁损将是无可挽回的损失。其次，公益诉讼适于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公益诉讼过程中均能找出足够手段加以保护，不管是事前防范、事中制止、事后补救，还是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保护，抑或是判处停止侵害、恢复原状、赔礼道歉，都能行之有效地对历史文化名城起到相应保护作用。最后，利用公益诉讼来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具有合理性。历史文化名城中的文化遗产是公益权与私益权的统一体，公益权既不能与私益权相剥离，也不能被私益权所覆盖，所以哪怕某件文物归属私人所有，他在享有相应私权的同时，也承担着积极保护的义务，而当他不能或不愿保护的时候，自当由法律预先设定的主体挺身而出提起公益诉讼代为保护。

实际上，我们不妨做一个横向比较。在2018年4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当中，专门设置了一项英烈保护公益诉讼条款，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对侵害英雄烈士姓名、肖像、名誉等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显而易见，与其说这项条款是想要保护相关英烈个人的人格利益，倒不如说真正保护的是其人格利益当中包含的公共利

益，即“民族的共同记忆、共同情感和民族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尊崇英烈、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①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实在没有理由不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纳入公益诉讼适用范围，因为历史文化名城中所蕴藏的公共利益即便不说更加重要，起码在重要程度上是完全能够与之等量齐观。历史文化名城当中同样蕴含共同情感记忆和民族精神，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有助于弘扬正能量的社会风气。

2. 利用公益诉讼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必要性

公益诉讼自身的特点决定了这是一种特别有效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机制。

首先，民事公益诉讼强调发动群众，避免公地悲剧。公益诉讼在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与现状显示，公益诉讼的实施需要来自于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无论是在线索发现，还是在证据收集，抑或是提起诉讼等的各个阶段，人民群众从来都扮演着生力军的角色。这就使得绝大多数公益诉讼其实是以公民诉讼的形式开展的，公民有权直接针对侵害公益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从而监督和保障法律的有效实施，因此也被形象地称为“私人总检察长诉讼”。^②

积极探索利用公益诉讼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事业的路线方针一脉相承，符合习近平总书记“让人民群众参与、让人民群众做主、让人民群众受益、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治国理政思想。这不仅有利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而且有助于公民意识的培育，甚至还有益于传统文化的弘扬与民族精神的提振，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事业永不枯竭的动力源泉。

其次，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在监督行政机关履职不力或监管不严方面具有极其突出的作用。具体包括：

(1) 检察监督的广泛性。检察机关在线索发现方面具有其他国家

^① 罗斌：《传播侵害公共利益维度下的“英烈条款”——〈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五条的理解与适用》，《学术论坛》，2018年第1期。

^② 侯佳儒：《环境公益诉讼的美国蓝本与中国借鉴》，《交大法学》，2015年第4期。

机关或者社会团体不可比拟的优势，由于检察机关是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所以检察机关在对法律执行活动监控的布局上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行政机关的怠职懒政行为能够做到及时发现、及时侦查、及时处理。

(2) 检察监督的专业性。检察机关是专业的司法机关，在专业人员配备、法律知识资源、调查取证职权、法庭抗衡技能、诉讼费用承担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能够有效克服公益诉讼取证难、胜诉难等种种障碍。

(3) 检察监督的权威性。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是《民事诉讼法》与《行政诉讼法》明文赋予的，例如在行政公益诉讼当中，检察机关会先通过检察建议的方式督促履职，如果行政机关不按要求及时整改，则会被告上法庭，这对行政机关来说具有极强的威慑力。

由此可见，如果能把公益诉讼机制，尤其是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机制，广泛运用到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当中，必将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外部监督，能够督促行政机关更好地保护北京这座城。

(三) 利用公益诉讼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国内实践

近年来，我国也已逐渐出现检察机关针对文化遗产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问题开展公益诉讼的实践。不少地方还开展过全面清查本地文保状况的专项活动，这些活动确实起到了督促检察机关依法履责的正面作用。

1. 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检察院相关工作案例

苏州是全国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检察院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作为该院工作的重点。近年来，该院针对行政机关不作为、慢作为等问题，充分发挥了行政检察监督的积极作用，促使河道污染、古城墙受损、文物古迹安全隐患等问题得以及时有效解决。姑苏区检察院不仅与苏州本土文史专家、民间热心人士、大学机构等达成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共同为开展名城保护出谋划策，还通过深入古城区17个街道155个社区的“检务驿站”及时收集群众反映

的监督线索。2018年8月，姑苏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地方主流媒体，发起成立“公益守护联盟”平台。其间，该联盟协同政府职能部门，先后介入并推动吴门桥损毁、上塘街“故明郝将军卖药处”石碑连续倒塌、李根源、横塘驿站等一系列历史文化资源被侵害事件，并以撰写公益调查报告、发出检察建议、召开联合调查会议、转化提案议案等方式推动多起事件取得进展，在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方面取得积极成效。

2. 山西省检察院在全省部署开展国有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专项行动

在山西省文物数量首屈一指的新绛县（古称绛州），这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处，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运城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8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600多处。2018年3月，山西省检察院在全省部署开展国有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专项行动。新绛县检察院针对当地文物“点多面广”的特点，对每个文物保护单位都进行了实地调查，就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绛州大堂、冯古庄墓地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绛守居园池存在的日常管理维护不到位和破坏文物的行为向新绛县文物保护中心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对相关文物进行修缮并加强保护。收到检察建议后，新绛县文物保护中心积极履职，文物隐患问题也得到有效控制。^①

总之，我们在今天强调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公益诉讼的互洽，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基于同时来自法理与情理两方面的理性分析与国内一些地区经过实践业已取得成功的经验支持，让我们相信双方的结合会让对方变得更加完善：公益诉讼会极大拓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渠道，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则能更加彰显公益诉讼的制度价值。

三、北京公益诉讼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尝试与完善

（一）北京利用公益诉讼机制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尝试

2017年9月，北京市检察机关在全面开展行政公益诉讼工作部署

^① 《壮丽70年·追梦路上的检察院 | 山西运城：用公益诉讼保护文物的每一个细节》，<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19-08-10/doc-ihytcerm9793494.shtml>。

会上提出，各院要按照市院党组提出的“一纵一横”新格局，以改革精神优化检察资源配置，着重在文物保护等领域开展专项活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关于文化中心的定位和市院“一纵一横”多项检察工作新格局，为首都检察机关特别是东城、西城、海淀等文物大区检察机关开展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①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对于以公益诉讼方式保护文物进行了一系列部署要求，充分体现出检察机关非常重视通过公益诉讼的方式来保护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截至目前，北京已经有多例开展文物保护的公益诉讼来保护北京这个历史文化名城的尝试。

1. 通州区人民检察院文物保护实例

通州区人民检察院为保护两座位于通惠河之上的石桥，开展了北京市首例针对文物的公益诉讼。2017年6月1日，通州区人民检察院向该区文化委员会送达《检察建议书》并提出两点检察建议，建议尽快启动对文物的保护工作。第二天，区文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接受检察院的建议。不久，区文委反馈了整改情况，向通州区检察院回复了《关于加强文物安全与文物保护工作的报告》，报告还附上了张家湾镇政府《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整改报告》。

2. 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文物保护实例

2017年8月，针对网友的举报，门头沟区检察院对门头沟区过水塔损坏问题进行调查。调查完毕后，门头沟区检察院决定对门头沟区的文物进行系统排查。2018年4月27日，根据摸排结果，门头沟区检察院向该区文化委员会提出两点检察建议。当天，门头沟区文化委员会相关负责人来到检察院，接受检察建议。6月27日，区文化委员会发出书面回复，称已划定三处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并制定了具体保护措施。截至7月25日，张家铺村天主教堂修缮已经完成工程量的60%，因北京连日降雨，完工期预计从9月底推至10月底；周自齐墓

^① 蓝向东、杨彦军：《以公益诉讼方式开展文物保护的可行性研究》，《北京人大》，2018年第6期。

的修缮预计年底前完工；宝峰寺的修缮预计于2019年完工。^①

（二）现有尝试反映出来的成绩与问题

在上述两案当中，北京市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方式，使得文物遭受破坏的问题得到了切实有效的解决，文物最终得到了有效的保护，这些尝试反映出来利用公益诉讼机制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思路是非常可行，其结果也是卓有成效的，是值得进一步总结铺开推广的，但目前利用公益诉讼机制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1. 文物保护公益诉讼没有严格的法律依据

虽然检察机关在尝试过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后都觉得通过这个渠道来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确切实可行，而且利用公益诉讼来保护文物的实际需求也是广泛存在的，但囿于法律的滞后，实际操作起来无法可依，在司法实务活动中就出现了法律教条与实际需求明显脱节的情形，为了配合诉讼顺利开展不得不将法律引申比附适用，影响了公益诉讼实施的成效和文物保护的结果。近些年，几乎全国每一个省份都制发过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检察建议，其中有不少地方还开展过全面清查本地文保状况的专项行动，却没有以任何一家文物局为被告提起诉讼。究其原因，法律本身的短板使检察机关开展文物保护公益诉讼没有严格的法律依据，也没有办法形成系统有效的流程和严密的措施来进行文物保护的公益诉讼。

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明确把文物保护纳入公益诉讼的范畴，在实务操作中只能以环境保护之名，行文物保护之实。这种做法实属无法可依困境下的无奈之举，虽然古建筑等的确是生态环境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在用环境公益诉讼来保护文物，运用文义解释、目的解释等方法解释环保法律的可适用性上会存在众多困难，略显牵强，操作难度也更大。而我国2017年底修正的《文物保护法》并未具体规定文物保护方

^① 贾潇：《文物保护遇上检察公益诉讼：一切开始变得不同》，正义网，2018年8月，<http://news.sina.com.cn/o/2018-05-24/doc-ihaysvix6062951.shtml>。

面的公益诉讼制度，同时我国最高院和最高检也并未针对文物保护类的公益诉讼出台相关解释，限制了基层文物保护工作的创新与落实，反映出观念跟不上行动、立法跟不上执法、理论跟不上实践的问题，以至于在司法实务活动中出现了法律教条与实际需求明显脱节。

与此形成明显对比的是我国针对环境公益诉讼和消费者公益诉讼的立法实践。目前我国已经分别在《民事诉讼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等多部法律和最高院、最高检发布的多部司法解释中针对上述两类诉讼的诉讼主体资格、适用范围、诉讼程序等进行了较为详细具体的规定，并在不断完善。正是基于其相对完善的法律依据，如今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和环境公益诉讼才能进展得如火如荼，探索出许多有效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环境的实践经验，有效打击了众多侵害消费者权益和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

2. 公益诉讼缺少广泛的公民、社会组织的参与

相较于发达国家的公益诉讼制度，我国现行的公益诉讼制度其实是大大缩水的，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是否广泛地允许公民个人或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方面进行了较为严格的筛选限定，我国目前确立了检察机关和法律规定的机关为主，有关组织为辅的格局，但实际上这些限制严重束缚了公益诉讼制度的活力。

公益诉讼的本意在于为新兴市民阶层分享国家权力和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一种直接介入的途径，用以弥补政治国家在维护社会公益方面的意识缺失与能力不足，体现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所以公益诉讼的底色正是公民诉讼，看似不起眼的平民百姓构成了公益诉讼的原始动力。^① 这告诉我们公益诉讼想要发挥最大的效果，必须做到最大限度的社会动员，才能真正发挥公益诉讼的作用。但目前我国公民个人被直接排斥在外，而社会组织则受到法律与现实的双重制约，所以公益诉讼亟须改变这种现状。文物公益诉讼也不例外，让公众参与文物保

^① 华小鹏：《论公益诉讼制度的本质与我国民事公益诉讼权的完善》，《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护的公益诉讼不仅有利于文物的保护，而且有助于公民意识的培育以及公民对历史文化名城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甚至还有益于传统文化的弘扬与民族精神的提振，是文物保护事业永不枯竭的动力源泉，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要方式之一。

3. 民事公益诉讼目前案件比重过小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张军检察长 2019 年 10 月 23 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中所提到的数据，目前我国公益诉讼案件中，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占 77.82%，民事公益诉讼占 6.52%，行政公益诉讼占 15.66%。张军检察长将其总结为：“起诉案件‘搭顺风车’多、‘啃硬骨头’少，更多借助刑事追诉已锁定的对象、固定的证据拓展公益诉讼效果，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案件偏少。支持社会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仅 87 件。”^①

我们认为出现这种数量悬殊现象的原因在于，虽然检察机关既有权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也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但由于民事诉讼法把检察机关设定为了备位主体，办案的相关程序和流程比较烦琐，所以如果出现竞合情形的话，检察机关往往更加倾向于选择行政公益诉讼的渠道。此外，行政公益诉讼存在一个由检察机关向行政机关发送检察建议的前置程序，要是行政机关能够按照检察建议要求及时整改到位，就不需要对其进行起诉。

4. 检察机关办案质量仍有待提升

此处所指的办案质量问题又分为两个方面：其一，盲目追求办案数量，而忽视了办案质量。张军检察长在报告中也提到了部分检察机关滥发诉前检察建议、办凑数案问题。同时出具的检察建议的数量较多，在部分案件中，检察建议本身的法律专业性不强，对于事实论述不够严谨、证据调查不够充分、法律适用存在瑕疵、部分整改建议不关注实际

^① 张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2019 年 10 月 23 日。

整改成效也缺乏可行性。其二，检察机关工作人员涉及公益诉讼相关的业务素质和能力也有待提升。提起公益诉讼是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授予检察院的一项新职能，然而目前很多基层的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司法理念尚未跟进，公益诉讼理论基础薄弱；在文物保护公益诉讼方面的办案经验不足，发现线索、证据调查和司法应对能力都有待提高。

（三）以公益诉讼方式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制度完善

目前，利用公益诉讼的方式来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虽然存在一些现实问题和不足之处，但是运用公益诉讼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思路非常可行，所以完善文物保护公益诉讼的方式对于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极为重要，本研究报告建议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

（1）宏观上建议制定《公益诉讼法》，明确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纳入范围，给予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促进民事与行政公益诉讼协调发展。

相比发达国家，公益诉讼在我国还是一项新生事物，从2012年首次把公益诉讼写入《民事诉讼法》，到2017年完成民事公益诉讼修订与行政公益诉讼立法，目前还处于草创阶段，文物保护的公益诉讼更是没有相关的直接法律依据，但利用公益诉讼保护文物却已经有了初步尝试，可立法与司法实践出现了严重的脱节。而且我国公益诉讼相关法律条文散落分布于多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当中，不仅效力参差不齐，权威性不够，而且内容不够具体，操作性不强，在实践中常常面临着无法可依的情形，以致各地在立案、鉴定、审理、结案、赔偿等诸多环节上的标准与做法极不统一，所以没有办法形成系统的体系，从而形成一整套高效运行的行为模式，指引检察机关的活动。因为没有相关法律保障，现行检察机关只能通过发诉前检察建议的方式对破坏文物的行为进行纠正，虽然因此许多行为被纠正，但始终不是合法有据，而且如果破坏文物的机关、个人不对其行为进行纠正，那么检察机关的后续保护行为也没有明确的法律指引。所以在梳理整合现有规则基础上积极补充实践经验 and 努力吸收理论成果，形成一部流程合理、机制完善、权责清晰

的专门《公益诉讼法》迫在眉睫。

在现行情况下期待更加广泛的公众参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建议在之后的《公益诉讼法》中应该明确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纳入范围，给予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为未来更加广泛的公众参与提供宏观支持与细节保障。既能为公益诉讼的发展预留足够空间，把包括文物保护在内许多关于国家、社会、民族核心利益的事项纳入适用范围，也能给予人民群众充分参与公益诉讼的机会与路径，让老百姓得以以更加直接深入的方式参与维护公益，更能关怀在生活当中遭受了不公正对待的弱势群体，使公益诉讼真正成为维护社会公正与大众福祉的一项制度。

(2) 中观上建议北京市政府与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给予检察机关明确支持，另一方面培育和鼓励相关社会组织参与。检察公益诉讼工作涉及相关部门较多，所以需要政府有关部门与检察机关相互配合，通力协作，形成强大工作合力，才能更好地完成文物保护的工作，协力保护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具体来看，又可以分为北京市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和文物保护单位三部分开展工作。

第一，北京市政府的工作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开展。首先，应当明确各部门的文物保护责任，配合建立对于文物破坏事故的行政责任追究和监督机制，确保文物保护主体将责任落到实处。其次，应当加强各部门协同，参考上海等地建立文物安全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建立检察机关与文化旅游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等的案情通报制度。最后，要给予检察机关明确的态度支持，为检察机关依法开展公益诉讼工作，提供更有力的保障，以方便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工作的开展。

第二，各级文物行政部门也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进一步合理规划北京各地旅游资源开发与文物保护工作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主动接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支持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为检察机关调取证据，获取文物保护公益诉讼案件的线索等方面提供有效的帮助与支持，从而保证文物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

第三，社会组织也应当成为文物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想

的治理体系中，社会组织应当作为社会民众的代表，主动监督文物保护部门以及其他对文物破坏的行为，同时接受人民群众的举报；同时，也可以参与或提起文物保护的公益诉讼，真正承担起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重担。然而，目前我国的文物保护组织和团体无论是数量还是影响力上都十分有限，还难以担负起承担文物保护的社会监督主力和公益诉讼的重任。因此在北京，可以由北京市政府倡导，各级文化部门引导，参考以山西为代表的部分文物资源丰富的地区的治理经验，逐步鼓励建立和培育以文物保护为宗旨的相关社会组织，建立文物保护员制度，扩大此类团体组织的规模和影响力，逐步形成以社会团体为主体的社会监督的新格局。同时，对文物保护组织进行公益诉讼的培训，提高现有文物保护组织提起或支持公益诉讼的专业能力，增强他们参与文物保护公益诉讼的意识，以便最终实现社会组织承担起文物保护公益诉讼责任的制度构想。

(3) 微观上北京市检察机关要强化自身能力，提高监督水平。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对检察机关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新的背景下，检察机关有必要实现新一轮的转型和发展，重新做出新的定位，完善与宪法定位相适应的多元检察职能体系，以应对司法改革的影响和反腐败监督的功能转变的新境况。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和公共利益的代表，公益诉讼无疑应该作为检察机关工作的重中之重。对于侵害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领域，当然包括文物保护方面，检察机关必须要承担起关键的责任，才能使检察机关真正成为国家和公共利益的化身。检察机关要想能够在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中承担起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责任，可以考虑从如下方面做起：

第一，树立转型意识，做好新的时代背景下的法律监督工作。随着我国监察体制的重大改革，我国的司法机关尤其是检察机关也面临着新形势和新问题，因此必须转变自身职能，培育新的业务点，扩展新的业务领域，重新做出新的业务布局。而公益诉讼就是目前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的新途径，也是全面提高检察监督水平的重要举措。北京市检察机关必须首先在思想上真正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有意识地将相关资源，

如编制、资金、装备等向公益诉讼业务部门倾斜，才是在新时期检察工作中继续保持“首都标准”的根本保障。

第二，强化自身能力，提高运用公益诉讼方式解决问题的本领。对于较为新颖的文物保护这个课题，北京市检察机关需要积极加强自身队伍建设，推动检察人员的专业素质能力取得新提升。这需要北京市检察机关及时总结文物保护公益诉讼的相关经验教训，并且对文物保护公益诉讼案件的特点与难点进行分析归纳，早日锤炼出一支在文物保护公益诉讼领域能征善战的拳头队伍。也只有自身具备了过硬的能力，北京市检察机关才能成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核心力量，成为守护这座文明古都的中流砥柱。

第三，设立文物保护公益诉讼技术调查官制度。文物保护本身是一个对于专业性要求非常高的工作。而在检察院主导的公益诉讼中，极有可能在调查取证、勘验、保全、鉴定、举证质证等环节需要涉及文物修复、古建修缮、文物鉴定、文物保护工程等具体的专业知识，但目前大部分检察机关还缺乏此类复合型专业人才。因此，北京市检察机关不妨参考我国知识产权法院的技术调查官制度，与相关的文物保护部门和单位合作，从文化部门、高校或者相关单位选拔出优秀的专业人才，作为全职或者兼职的文物保护案件技术调查官，以审判辅助人员的身份参与公益诉讼、提供技术咨询。

第四，与文化部门及高校联合培养法律与文物保护复合人才。对于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中遇到的专业性问题，技术调查官是一个短期内从外部寻求合作协助的解决方式，而从文物保护的司法救济的长期角度思考，如果打算长期坚持开展这项工作，那么北京市检察机关应该考虑与文化部门及设有文物保护相关专业的高校合作，联合培养同时精通法律与文物保护的复合型人才，以更好地适应繁重的文物修复、科学保护和司法监督任务。

第五，进一步探索文物保护方向的检察院支持起诉制度。我国目前《民事诉讼法》第15条和第55条第二款已经对支持起诉制度有所规定。尽管就文物保护公益诉讼的现状来看，短期内相关诉讼还是会以检察机

关为主导，但随着我国文物保护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完善，在不久的将来，检察机关同样可以通过辅助配合的方式来支持相关社会组织乃至个人提起文物保护公益诉讼。更加完善的支持起诉制度不仅能够弥补社会组织和个人诉讼经验欠缺和诉讼资源缺乏等缺陷，而且更有助于激发人民群众与市民团体对破坏北京历史文化名城行为进行监督的热情与信心。

四、结语

北京，是梁思成先生所称之为“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是吴良镛先生所称之为“中国都城发展的最后结晶”，是一座具有无可比拟的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值得我们对它一时一刻也不松懈地加以爱护。保护好历史文化名城，是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点环节，也是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部分。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名城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使命，也是对我们能力的考验。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并指出：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推动近十四亿人口进步和发展、确保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最终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但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

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引入公益诉讼机制加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对于建立起一个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历史文化保护领域的具体落实。通过公益诉讼机制，将检察机关和社会公众的力量引入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中，一方面是运用司法机制敦促相关政府部门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履行行政职责，完善对文物保护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使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提升法治建设水平；另一方面也是赋予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动员公众参与到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中，使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治理实现主体多元化、方式民主化的转变，扩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可依托的力量，整合社会资源，提升治理效能，更好地实现对历史文化名城的周全保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要加强文物保护和利用，加强历史研究和传承，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发扬光大。要增强文化自信，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公益诉讼不仅能体现出我们国家现代化治理能力的提升和治理体系的完善，更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核心体现。尽管目前这一制度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只要我们抱着功成不必在我的决心与信心，就必将会成为社会全面参与文物保护的世界典范。

课题负责人：李 响

课题组成员：于 静 贾会颖

新时代视域下传染病医院 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养路径探析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新时期全面推进党建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随着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等系列政策的出台，公立医院基层党组织建设目标更加明确，要求更高，任务更具体。传染病医院兼有公立医疗机构和公共卫生机构双重属性，同时也是健康中国战略下不可或缺的基础建设领域，加强传染病医院党支部建设已势在必行，而支部书记则是党支部的组织者以及新时代新思想的“播种人”，作为医院党的基层组织的带头人，其工作不仅直接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医院的贯彻、执行和落实，关系到党在基层群众中的信任和威望，更关系到医院的建设、发展和稳定。

《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文件中明确提到，党支部书记一般应当由内设机构负责人中的党员担任，这就意味着支部书记身兼党务和业务“带头人”双重身份。选拔并培育思想政治素质高、党务工作能力强、医疗教学能力强、学术科研能力强的“党建带头人、学术带头人”类型的党支部书记，将对服务医院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因此，探索新时代视域下传染病医院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养路径也具有十分重要且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为此，课题组开展了专项调研，共发放调查问卷 363 份，被调查人员包括院领导、党委委员、中层干部、党支部书记、支委、党员、护士长、普通医务人员，收回有效问卷 363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100 %。综合调研所

掌握的各方面情况，课题组形成该调研报告。

一、“双带头人”党支部书记的标准

“双带头人”指的是党建带头人和业务带头人。“双带头人”党支部书记，既要政治强，具备过硬思想政治素质，又要业务精，在临床、教学、科研等方面能力业绩突出，一般从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者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的优秀党员中选任。同时应把握以下基本条件：（1）政治素质高。理想信念坚定，能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积极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部署要求，对错误思潮敢于旗帜鲜明进行斗争。（2）群众威信高。品德修养优，医德医风好，在所在单位具有良好的评价，服务意愿强，热心党的工作，积极投身医院基层党务工作，有较强的奉献精神和服务意识，得到医务人员的认可和信任。（3）党务工作能力强。熟悉党支部工作情况，有较好的组织协调能力，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具备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高知分子工作等能力水平。（4）临床科研能力强。在专业领域具有较强的学术影响力，在临床实践、学术研究、实践应用等方面业务能力突出，能够团结带领党员医务骨干完成好人才培养、教学科研、学科建设等各项任务，有优秀医学工作表彰或临床科研成果奖励。

党支部书记是党的基层组织的带头人，其个人政治素养、品德修为、工作方法等对党员、群众的凝聚力起着重要作用，是基层党组织各项建设工作的带头人。医院业务带头人担负着科室建设、学科发展、培养人才的重任，高水平的科室带头人是一流医院、一流学科的核心竞争力。只有党性修养高、业务能力精、有威信、肯奉献的带头人才能带动科室上进、建设学科平台，推动医院发展，培养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医院临床党支部书记如果普遍成为党建带头人和学术带头人，就可以推动党的建设和业务工作双促进，提升基层党支部活力，为建设国际现代化医学中心及公共卫生救治体系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二、研究结果统计分析

参加本次调研的中层干部共计 75 人，普通党员共计 278 人；本科学历 101 人，硕士学历 111 人，博士学历 43 人；中级及以下职称 189 人，副高级及以上人员 33 人。

调查问卷中发现，60% 以上的中层干部及普通党员认为“担任党支部书记不影响业务工作，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能够相互促进”，20% 以上的中层干部及普通党员认为“担任党支部书记对业务工作有一些影响”；60% 以上的中层干部和普通党员认为“党务工作能力”“工作时间保障”“群众威信”是影响党支部书记作用发挥的重要因素，过半数的中层干部和普通党员认为“支部班子团结合力”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53% 的中层干部认为“行政业务部门的支持”也是影响党支部书记发挥的重要因素；80% 以上的中层干部及普通党员认为“提高政治素质和政治站位”“提升服务群众能力，密切党群关系”是促进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成长的重要关注点，此外，“党建工作实务培训”也是需要着重提高的方面。

三、“双带头人”党支部书记培养现状及原因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及半结构式访谈，发现目前医院在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建设方面还存在以下薄弱之处。

（一）重视临床科研教学，放松思想建设的情况依然存在

在社会竞争日趋激烈、传染病医院生存压力加大的形势下，传染病医院将工作重心倾向于学科建设、医疗质量提升、学生能力提高上。广大医护党员也把大部分精力花在临床治疗、教学备课、科研评比、职称晋升上，对思想理论学习有所放松。党支部在开展学习时围绕医院的总体学习安排，能够做到按规定动作落实，但是自主学习计划不充分，总结不及时，主题党日活动开展的形式较为局限，缺乏创新性，部分支部书记讲党课不及时。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医疗、党建“两张皮”现象，

久而久之会造成党员宗旨意识淡薄，纪律意识缺失，理想信念动摇，最终削弱党支部的活力和战斗力。

（二）队伍建设还不够扎实，后备人才储备不足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染病医院医护人员队伍呈现专业化、知识化、年轻化的特点，部分青年学术骨干、学科带头人对党建重要性认识不充分，对党务工作还不够了解，有些青年骨干不愿意从事党务工作。此外，大部分临床科主任、学术带头人的医疗、科研、教学压力大，面对支部党建任务重、责任大、要求高等情况，部分带头人不想做、不愿做支部书记工作；也有部分支部书记由于年资较低，在支部党员中的威信还不够高，话语权不强，双带头人人才储备匮乏。

（三）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身兼数职，工作精力较为有限

目前医院除离退休党支部书记为专职支部书记外，在职及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均为兼任，且大部分在职党支部书记为医院中层干部，医疗教学科研工作的工作压力大，同时也要处理较为琐碎的行政事务性工作。因此在党支部建设上，能够投入的时间和精力都有限。大部分支部书记虽然能够按要求完成基本的政治学习和党员发展任务，但深入探索研究党建工作仍旧较难。

（四）党建业务熟悉程度不够，党建经验较为缺乏

因多数支部书记为兼任，并非专职从事党建研究和工作的人员，且每届支部任期为3年，导致部分支部书记对支部工作规律和工作程序不够熟悉，经验不足，工作中有时会感到无从下手、不得要领。此外，部分支部书记也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自身角色定位认知不清晰，认为支部书记的任务就是上传下达、安排党组织生活、发展党员等，这种认知较为片面，定位也不够准确。

（五）考核与激励机制尚未形成，工作缺乏积极性

由于医院在医疗教学科研等方面改革发展任务非常繁重，没有过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投入到基层党支部书记队伍建设中。对兼任党支部书记的工作量和补贴问题尚未有明确安排，党支部书记工作经历也没有跟职务晋升、评优评先挂钩。另一方面，目前对党支部书记的工作如何评价尚无系统的考核标准，也未与年终考核挂钩，一定程度上导致党支部书记工作缺乏积极性。

四、医院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养的优化路径

医院中的党支部是以医务工作者为主的党的基层组织，在当前医院完成重点任务、提升患者就医获得感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通过优化传染病医院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养路径，以“突出政治建设、坚持双向引导、强化分类指导、科学设置支部、强化激励监督”为思路，把符合条件的学科带头人培养为党支部书记，把有条件的党支部书记培养成学科带头人。优化路径分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建立健全选拔任用机制

1. 明确任用标准

针对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标准不明确的问题，我们在调研的基础上，提炼总结出“双带头人”党支部书记的标准。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一般应符合以下标准：既要政治强，具备过硬思想政治素质，又要业务精，在临床、教学、科研等方面能力业绩突出，一般从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者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的优秀党员中选任。

2. 培养后备队伍

调查结果显示，入党时间早、入党时担任一些职务者，多是政治素质相对较高的人员，在临床工作岗位上也是表现比较优秀者，提示党组织应对他们予以关注，将他们列入后备人才的梯队建设。加强对中级职

称业务骨干的培养，为“双带头人”党支部书记队伍储备人才。

注重加强党支部书记后备队伍建设，建立“双带头人”后备人才库，明确培养规划，实行滚动管理；重视把科室带头人培养发展为党建带头人、把党建带头人培养成科室业务骨干；注重把热爱党务工作、业务能力突出的青年医务工作者选配为党支部副书记或支部委员，协助支部书记开展工作，作为后备人选进行培养锻炼。

（二）建立健全培养培训机制

1. 完善培训体系

通过党校培训、进修研修、挂职锻炼等形式，分级负责、分类实施，形成齐抓共管的培养培训体系。院党委负责制订总体培养规划和年度培训计划，每年至少组织安排1~2次集中轮训，定期开展后备队伍培训、支部书记培训和专题业务培训；各支部负责实施日常培养培训。

2. 丰富培训内容

以医疗业务、党务工作、领导力和群众工作等方面知识能力的学习培训为主，开展体系式学习、针对性解读、融合式讨论、案例式教学、项目式研究，增强党务工作能力、提升业务工作水平。后备干部、副书记、党支部书记分别规定培训学时。

3. 创新培训方式

综合采取理论讲座、网络选学、互鉴互学、实践研学等方式，将“党务培训与业务培训、院内培训与外出培训、现场培训与网络培训”等有机结合，实行个体化自主选择学习。通过支部间的交流学习，“书记讲给书记听，书记做给书记看，书记跟着书记学”，成立各支部间手拉手，互相帮助、学习借鉴的小组或“对子”，提高学习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建立健全作用发挥机制

1. 注重思想引领，突出政治建设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坚定正确的政治

方向放在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工作的首位。

2. 凸显业务引领

党支部书记要做好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的有机融合、同频共振，同规划同落实。充分发挥党支部书记的业务威望和影响力，团结带领业务骨干和拔尖人才，形成党员、医务工作者争做骨干的良好氛围，增强党支部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发挥示范作用

发挥后备人才干部在政治引领、支部建设、团结凝聚职工、促进医院中心工作等方面的示范带头作用，解决实际问题，增强医务工作者归属感、获得感；引领带动广大医务工作者在日常工作中亮身份、树形象，带头攻坚克难，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四）建立健全激励保障机制

给予双线晋升的激励保障机制，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纳入医院中层后备干部培养序列，其履职情况和工作实绩作为专业技术岗位评聘、干部选任、进修研修、院内人才培养工程等重要参考内容，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五）建立健全评价监督机制

强化目标管理，完善考评体系。把“双带头人”党支部书记培养工作纳入党支部书记和科室负责人年度述职评议考核制度，突出培育工作成效和党员职工评价，考评支部、科室培养“双带头人”的工作实效，体现业绩导向和过程管理。对培养效果突出的党支部予以表彰，对工作成效差的视情况分析原因做出调整。

（六）科学合理设置党支部

结合实际科学设置联合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通过调研了解到，党务工作和业务工作不能脱钩，党建工作要与业务工作有机融合，这就要求党支部的划分更加科学化、合理化，合理控制党支部的人数，

如20~30人。医疗、医技、管理可以有机组成联合党支部，打破原有的职能划分，也可以根据科研团队、任务团队灵活划分党支部，打破原有的划分方式，与当前医院的重点任务、中心工作进行有机的结合和调整。

通过科学设置党支部，依托研究团队、课题组合理布局，以利于工作开展为原则，有条件的由业务带头人担任党支部书记。但是同时也要尊重实际，有条件地逐步推进，注重解决新事物成长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课题负责人：李玉梅

课题组成员：张晓静 郭娜娜

蔺敬媛 刘满

国有企业工匠精神培育研究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支柱。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提出“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目标，为国有企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企业及其产品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者的竞争力，而要想成为世界一流企业，除了依靠科技进步创新创业，还需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培育爱岗敬业、技能精湛、创新奉献的劳动者大军。

弘扬工匠精神不仅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也是一种社会共识，更是企业发展依赖的精神力量。本课题以工匠精神的内涵及其构成要素为逻辑起点，通过文献梳理、实地调研，总结培育工匠精神的先进做法以及存在的问题，最终落脚到国有企业培育工匠精神的路径构建上。

一、国有企业培育工匠精神的必要性

工匠精神具有深厚的历史意蕴和丰富的文化语境，它是职业技能、职业素养和职业理念的体现，是从业者的一种职业价值取向和行为表现，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是中国制造前行的精神源泉，是企业竞争发展的品牌资本，是员工个人成长的道德指引。工匠精神的培育和弘扬，对于国有企业具有重要的意义，是走进新时代的使命呼唤。

（一）工匠精神的内涵及三个层面

1. 工匠精神的内涵

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工匠精神这个概念，

指出要“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表示要“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同年的《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中，又强调要“培养更多的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可以说，弘扬工匠精神，培养大国工匠，是党和国家在经济转型升级、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大背景下采取的一项改革措施，具有深远意义。

被誉为美国“工匠精神”第一人的发明家迪恩·卡门认为，工匠的本质——收集改进可利用的技术来解决问题或创造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创造财富，让这个国家生生不息。日本著名的“秋山木工”创办人、畅销书《匠人精神》的作者秋山利辉认为，匠人精神是匠人的灵魂，要培养的不是能干的工匠，而是有修为、素养高的工匠，成为一流的人之后，就能成为一流的工匠。

在中国，工匠精神古已有之，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之中，从“有志者事竟成，苦心人天不负”的坚持，到“凝神屏气无言语，两手一心付案牍”的专注，再到“不因材贵有寸伪，不为工繁省一刀”的严谨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造，无不蕴含着工匠精神的因子。进入新时代，工匠精神则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价值。工匠精神是一个综合的、多元的、多层次的概念，简而言之可以概括为：它是一种专业精到、追求卓越、传承创新、敬业奉献、责任担当的精神理念。具体包含三个层面，即在职业技能上：专业精到、技艺过硬；在职业素养上：精益求精、追求卓越、传承创新；在职业理念上：尊师重道、敬业守信、责任担当。

职业技能、职业素养、职业理念三个层面是相互联系、依次递进的关系，构成技术与信念、精神与实践、感性与理性有机统一的整体。职业技能是基础，职业素养是关键，职业理念是内核。

2. 工匠精神的三个层面

(1) 从职业技能层面上来说，首先要有高超的技能，专业要精到。

拥有造物的技巧是工匠之所以为工匠的前提，要成为优秀的工匠，其基本前提就是要拥有高超的技艺。工匠精神是“中国制造”的软实力。在实现制造强国战略目标、从“跟随者”转向“引领者”的关键时期，需要专业精湛的工匠人才把追求细节完美、质量上乘的“匠心”融入设计、生产、管理、服务的每一个环节，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解决各种生产问题，实现大工业时代的精细管理、精品制造。

(2) 从职业素养层面上来说，要有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态度和敬业精业的传承与创新能力。精益求精就是要把每件事情做精、做专、做细、做实，要对自己的工作怀有敬畏之心，尊重和重视自己的职业，尊重每一件产品。工匠的创造性往往体现为在实践中积累式地传承和改良，传承并不意味守旧，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发展和需求不断创新。工匠精神鼓励在传承的基础上开拓创新，这样才能让产品紧跟时代的步伐，底蕴深厚而又充满活力。

(3) 从职业理念层面上来说，要有尊师重道、敬业守信、责任担当的精神。工匠在自身掌握高超技艺的同时，要有传承和推广技艺的意识，使技艺能够得到继承和发展，让更多年轻的工匠立身、立德、立业。对待自己的工作，要敬业守信，在困难和问题面前要敢于担当，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创造力，感召和带动团队力量，执着于工作的每一个细节、每一点改进，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二) 工匠精神的时代价值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机器化大生产的发展，传统手工业的生存空间被大大压缩，有些甚至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因此，出现一种观点认为，工匠精神已经是过去式，并不适用于当今的社会。而事实并非如此，工匠精神在当今社会依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我国制造业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工匠精神

当前，我国制造业仍然大而不强，在资源利用效率、自主创新能力、信息化程度、产业结构水平、质量效益等方面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转型升级的任务紧迫而艰巨。

为应对我国制造业面临的严峻形势，我国政府提出制造强国战略，计划从2015年开始，在未来10年实现从制造业大国到制造业强国的转型。而这一伟大战略目标的实施与实现，需要每一个制造业领域的劳动者们发挥工匠精神，精益求精，不断提升技能技术水平。所以说，工匠精神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必备软件，是我国实现制造业强国战略的助力。

2.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需要工匠精神

尽管我国企业在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中占了100多家，但是，我国企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存在。我国实施的供给侧改革就是为了全面提升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我国企业及其产品的世界竞争力。李克强总理在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打造更多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质量时代，就必须培育众多“中国工匠”。国有企业及其产品的质量最终取决于广大产业工人的质量，因此，培育具有工匠精神的技术工人，对于我国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是打造更多“大国工匠”，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型升级的内在需求、根本保障和有效措施。只有激发广大劳动者弘扬工匠精神，提升勤奋作为、创新发展的意识，才能涌现出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打造出高品质产品，提高核心竞争力，从而实现从制造业大国到强国的转变。

3. 劳动主体的自我价值实现需要工匠精神

通过工作体现自身的价值是人作为主体对其生命意义的外在表达。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产品中自然也渗透着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与理解，表达着他们的自我意识。具有工匠精神的劳动者靠自己的手艺生存，他通过劳动成果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其自身价值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所以，工匠精神的发展有助于实现劳动主体的自我价值。

(三) 工匠精神对于国有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1. 工匠精神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转型升级的需要

长期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总体上走的是一条跟随式的发展道路,通过学习引进国外先进生产技术,不断做大企业规模,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后,面对发达国家先进生产力和发展中国家低要素成本,我国国有企业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亟须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而弘扬工匠精神对于国有企业改革转型升级、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竞争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 工匠精神是加强国有企业员工队伍建设的需要

随着企业设备装置自动化、集中化、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国有企业的员工队伍整体呈现出总量超员和专业结构性缺员现象,整体素质不高、技能水平单一、年龄结构老化和骨干人才流失严重的现象较为突出。国有企业要高度重视和全面加强员工队伍能力建设,通过工匠精神的培育,让员工加强学习、提升技艺,提高员工的整体素质和企业劳动生产率。这对于企业培养一流人才、创造一流业绩具有重要意义。

3. 工匠精神是传承国有企业优良企业文化传统的需要

我国大部分国有企业都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穷二白的时期建立壮大起来的,一代又一代国企职工怀着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志,倾注于祖国的各项事业,形成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精益求精、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优秀企业文化传统。

二、部分国有企业培育工匠精神的先进做法

国有企业是我国制造业企业群体的主要构成部分。企业要想发展,要始终以人为本,技能人才是企业的宝贵财富。技能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工匠精神的培育。工匠精神不是口号,它需要内化到每个劳动者的行动与习惯中,最终形成优良的企业文化基因和信仰。当前,我国面临资源日渐匮乏、产业亟须转型升级的关键发展时期,如何致力于培育和弘扬工匠精神,已成为影响我国现代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课题,也是企

业保持活力的根本。在工匠精神的培育方面，部分国有企业走在了前列。它们以落实《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为契机，打造产业工人精神文化新家园，从制度保障、教育培训和文化环境等方面培育工匠精神。

（一）出台配套制度，为工匠精神的培育寻求政策支持

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第一次对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专门进行谋划和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工人阶级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释放了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强烈信号，对于建设制造强国，提高发展质量，打造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借此契机，国有企业纷纷出台了落实该方案的实施细则，通过出台制度、争取政策来营造工匠精神培育氛围，保障技能人才的培养。如南方电网按照“政治上保证、制度上落实、素质上提高、权益上维护”的总体思路，以实施“五项工程”为载体，即领航工程、素质工程、成长工程、凝心工程、暖心工程，着力推进职工队伍建设改革落地见效，为培育工匠精神和技能人才提供制度保障。其中，成长工程中重视职工职业发展，用制度和机制引导职工立足本职、提升技能。通过建立管理、专业技术、技能三条职业发展通道，在技能岗位中设立特级、高级、一级、二级、三级、助理级六个层级的技能专家，给予相应待遇，特级技能专家与管理类正处级的岗级一致，加长了职业发展的“板凳”，提高了职业发展的“天花板”。同时，鼓励优秀技能人员竞聘技术专家，搭建了技能人员成长的“立交桥”，打通了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之间的通道。山钢股份莱芜分公司也针对该方案出台了“双五十条”的全局性文件，从制度上保障和发展了职工主人翁地位、激发了职工创新创造的活力和工匠精神的意识，促进了企业健康稳定的发展。长庆油田按照《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精神，制定了“加快石油工匠培育”“高技能人才管理办法”等7项激励制度，对标管理

干部薪酬待遇建立了操作员工的9级成长通道。这都为“工匠精神”的培育提供了制度保障。

此外，在工匠精神的培育上，一方面需要企业自身投资建设，另一方面还可以借助多方力量进行合力培育。针对《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大庆油田成立了以培育“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的铁人学院。全国总工会高度重视，并从宣传、师资、资金等方面给予了积极支持。经过近两年的发展，目前铁人学院已成为劳模、工匠的培训基地，并被中组部列入全国党员教育培训示范基地。

（二）重视职业培训，为工匠精神的培育提供切实平台

职业培训是培育工匠精神的核心工程，只有通过专业化的基本功训练、全流程操作和多平台创新培育，才能培养出开拓创新、精益求精的“匠艺”“匠心”和“匠才”。当然，在技能提升的同时，物质的奖励也是不可少的，这样才能保证员工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在这方面，长庆油田和南方电网根据自身实训基地的优势走在了前列。长庆油田注重差异化培训和竞技性引导，依托油田的大型实训基地、培训学校、厂处级培训中心等资源，每年承办一项省部级员工技能大赛，年度轮训员工达到5.4万人次，培育了上万名高技能人才。长庆油田还通过出台一系列创新制度、每两年举办一次成果展、每年拿出10万~60万元专项资金扶持重点项目培育创新机制。南方电网在职业培训方面，也确立了自己的“四有”标准，推动资源向一线倾斜。随着网络信息化的发展，很多企业突破自身条件的限制，创新性地采用了网上培训的方式，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三）强化价值含量，为工匠精神的培育营造发展趋势

企业利润为本的理念已扎根于企业文化，因而在国家工业转型期间，强化价值含量，为工匠精神的培育营造发展趋势显得尤为重要。国有企业是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更是党领导工人阶级革命、建设、改

革最为重要的阵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亲临国企一线考察调研，高度概括国有企业在国家改革发展中的六个重要力量，为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和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提供了根本遵循。一个企业能否涌现出众多“大国工匠”，与它的企业文化息息相关，重视工匠精神培养的企业，毫无疑问在人才、效益和美誉度上都是走在前列的。

在工匠精神的文化培育方面，京能集团充分利用北戴河矿工疗养院疗休养和空间资源，打造具有革命战争年代、和平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特点，宣传展示“地标”意义的石油、石化，电力、煤炭，化工、医药，地质等行业劳动英雄、劳动模范、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和先进集体、创新团队典型事迹，汇集长期本职岗位中涌现出的大国工匠和勇攀科学高峰的新时代楷模，以他们的故事影响和感染更多的人。

三、当前国有企业在培育工匠精神方面存在的问题

国有企业构成了我国制造业企业群体的主体，制造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依赖于千千万万具有工匠精神的国有企业技能人才。这就要求国有企业必须成为工匠精神的维护者和培育者，为制造强国战略目标实现提供人才基础。然而当前，国有企业在培育工匠精神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和障碍。

（一）培育工匠精神的激励制度不完善

1. 对技能人才的物质激励不足

对于技能人才来说，物质激励主要体现在劳动报酬的高低上。目前，我国大部分国有企业的薪酬体制设置为各级干部、管理者的工资待遇普遍高于一线技能人才，技能人才的工资整体偏低，导致技能人才缺乏追求工匠精神的动力。

针对技能工人的薪酬体制也缺乏应有的“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激励机制，往往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由于许多国有企业车间实行的是承包制，工资制度多以计件为准，高级技工每月只比

普通技工多一点补贴，除此之外并无太大区别。对于一个有工匠精神的高技能人才来说，其造就一件产品所耗费的大量时间和精力最终只能根据僵化的评判标准来衡量，技艺再高超也无法获得预期的高回报，其自然也不愿把心思放在对工匠精神的追求上。

由上可知，当前我国大多数国有企业尚未建立起以技术工人创新成果按要素参与分配的激励制度。而国有企业技能人才的偏低收入，也给国有企业带来了技能人才流失的问题。部分由国有企业培养多年的高技能人才被能提供更高报酬的外企或者私企“挖走”，给国有企业带来了人才损失。

2. 对技能人才的精神激励有待加强

对技能人才的精神激励并不是孤立的，它一方面与物质激励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也与技能人才是否被尊重、被认可的氛围相关。虽然近年来各级相关政府部门和各地企业纷纷掀起选树工匠人才的浪潮，营造出尊重技能、尊重人才、弘扬工匠精神的氛围，但较低的收入会让技术工人群体更加深刻地认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感觉自身的价值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工人的身份得不到社会大众的尊重。因此，在精神层面上，容易导致技能工人不以当工人为荣，更妄谈追求工匠精神。

3. 技能人才的晋升通道狭窄

当前，大多数国有企业实行的是人事管理和工人劳动管理相区分的双轨管理体制，技术工人的职业技能等级与专业技术职务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技术工人即使取得了再大的成果，也始终只能维持工人身份，无法以管理者的身份从事管理工作，这就形成了技能人才成长成才的“独木桥”现象，导致技能人才的晋升通道过于狭窄。

(二) 对技能人才的培训力度有待增强

1. 培训的资金投入及覆盖面有待提升

高超的技能是工匠精神的应有之义。近年来，国有企业对于员工培训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用于培训的经费也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但由于

技术工人技能水平提升具有周期长、紧跟最新技术发展前沿等特点，要使员工的技能水平不断提升，就必须将培训工作常态化。而要将培训工作常态化，特别是在新媒体传播方式普及的时代背景下，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些资金一方面用于构建培训的硬件设施，另一方面用于建设培训师资等软件资源。

当前，除了部分实力雄厚的大型国有企业，大多数国有企业在员工培训的基础设施和设备投入上相对有限，企业内部培训资源的深度和广度也相对不足，培训员工的覆盖面有待拓宽。要想培育出大国工匠级别的高技能人才，就必须与时代同步，融入现代科技手段，为高技能人才的职业发展搭建更好的培训成长平台。

2. 人才培养责任主体的权责不清

当前，部分国有企业存在人才培养责任主体权责不清的现象。有的企业是由人力资源部牵头组织对员工的培训，有的企业则是由工会组织牵头，还有的企业是两个部门相互交叉管理，带来了重复管理、非系统化管理的混乱局面，甚至会形成“三不管”地带，导致员工的培训不够系统化、精细化。许多技术工人培训后的晋升通道也不够通畅，使得培训和晋升“两张皮”，影响技术工人的职业发展前景。

（三）对培育工匠精神的重要性认知不到位

近年来，党和国家对工匠精神大力弘扬，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了工匠精神的重要性，但与世界上其他制造业强国相比，我国部分企业对工匠精神重要性的认知还不到位。

在日本，“匠人”是对一个人的尊称，大众也把工匠精神视为一种值得模仿和尊崇的优秀品质。为提高技能工人的成就感，日本各界积极举办各种评比活动和技能比赛，奖励那些具有工匠精神的匠人，以提高技工的社会地位。一些杰出的匠人甚至被尊为日本的“国宝”，能获得极高的社会声誉，由此可见日本对工匠精神的推崇。

而我国企业普遍存在将技能工人视为生产流水线上的“螺丝钉”现象，只要求技能工人按照程序完成既定动作，并未认识到技能工人发

挥主观能动性、以工匠精神进行创新创造所能带来的巨大价值。很多时候，当一些技术创新或者产品创新被宣传时，往往只能看到品牌以及企业领导者的名字，而真正贡献创新力量的技能工人却很少被提及，这是对工匠精神缺乏正确认知的典型表现。

四、国有企业培育工匠精神的有效路径

尽管制造业的现代化和自动化水平越来越高，但在人类社会发 展进程中积淀下来的工匠精神并未消失，相反，它依旧对现代制造业的不断升级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史经验证明，西方制造业强国的形成与它们对工匠精神的高度重视密切相关。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关键时期，要想更好地发挥国有企业的作用，就必须在国有企业内部大力弘扬和培育工匠精神，切实推动我国制造业水平不断提升。

具体而言，我国国有企业要培育工匠精神，需要在以下几个层面努力。

（一）经济层面：加大投入，增强以提升员工技能为主的培训力度

1. 增加用于员工技能培训的资金投入

技能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技术工人是否具有工匠精神的重要指标，国有企业要培育工匠精神，必然要以提升员工技能水平为抓手。要全面地提升员工技能水平，对员工进行系统的技能培训就必不可少。

《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中提到，要加大就业专项资金对职业培训补贴的支持力度，将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经费纳入各级政府人才工作经费预算，对参加技师、高级技师教育培训并获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产业工人，给予一定的培训费补贴。同时还提到，落实完善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加大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投入的政策措施；落实企业职工教育经费，完善经费投入与监督制度，允许企业培训费用列入成本并按规定在税前扣除；支持企业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教育。由此可见，国家已经从战略高度强调了对职工进行技能培训

的重视。国有企业在将政策落地的过程中，要继续加大用于员工技能培训的资金投入，包括在硬件设施和软件资源上的投入。通过培训，持续地、系统地提升员工的整体技能水平，为工匠精神的孕育提供坚实的技能基础。

2. 加大对员工创新创效的支持力度

创新是现代化生产模式下工匠精神的关键要义，没有创新因素的工匠精神将缺乏灵魂，无法创造更多的市场价值。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的消费水平极大提高，模式化、规模化的生产已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追求个性化产品的消费者越来越多，这就要求企业从发展前景的角度出发，制定差异化的竞争战略。而企业要获取差异化竞争优势，就有赖于员工发挥工匠精神中的创新品质，不断提高自身的技艺，改进产品性能，生产出个性化的、符合用户需求的商品。因此，鼓励员工进行技术创新，不仅是培育工匠精神的关键推动力，也是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有效手段。

国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应从资金投入和制度激励等方面，加大对技能工人创新创效的扶持力度，要不断深化群众性技术创新活动，开展先进操作法总结、命名和推广，推动具备条件的创新技能工人建立职工创新工作室、劳模创新工作室和技能大师工作室，以此来激励员工践行以创新为主的工匠精神。

3. 创新培训模式

在培训载体上创新。要顺应信息时代的知识传播方式，适应工业化、信息化融合发展要求，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载体。如线下成立实体培训学校和基地，推行现代学徒制，注重“手把手”“一对一”“面对面”的言传身教；线上则构建适合技术工人终身学习的网络公共学习平台，优化数字学习环境，满足广大技术工人个性化学习的需求。例如，南方电网不仅线下成立了“工匠大学”，更利用网络和新媒体打造了“跟着大国工匠学技术”等线上培训课程，为技术工人搭建线上岗位练兵平台。

在培训模式上创新。国有企业可以与职业院校开展校企联合培养模

式，对员工进行共同培养。职业院校具有理论资源优势，企业具有实践资源优势，两者结合，能更好地提升技术工人的技能水平。

（二）制度层面：顶层设计，为培育工匠精神提供制度保障

1. 构建培育工匠精神的激励制度

国有企业应建立以创新技能为导向的激励机制，建立健全培养、考核、使用、待遇相统一的薪酬激励制度，在关键岗位、关键工序培养和使用高技能人才，提高其相应待遇，实现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要逐步改变当前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管理人员工资高于技术工人的现象，做到不看文凭看本事、不唯学历唯能力，绩效明确。只要拥有精湛的技能，技术工人一样能拿到高工资。

同时，要完善各类技术工人表彰奖励制度，在精神和荣誉上给技术工人以激励。要在企业内部积极营造出以工匠精神为荣的良好氛围，鼓励员工进行技术创新、追求更高品质。每年组织企业各岗位开展劳动竞赛、技能大赛等，对竞赛中的优胜者进行大力度的宣传；选树典型，在企业内部形成尊重和崇尚工匠精神的浓厚氛围。

2. 统筹设计完备的培训制度

培训是企业培育高技能人才的有效方式，国有企业要建立完备的培训制度。完备的培训制度要密切贴合员工的培训需求，系统、全面、有针对性，不能流于形式。

国有企业可定期对本单位的员工开展业务培训和职业道德培训。通过业务培训，使员工熟悉专业技术领域的最新进展，进一步明确他们自身的技术创新方向。通过对员工定期开展职业道德培训，促使他们深刻理解工匠精神的要义和内涵，真正做到爱岗敬业、精益求精，从而开展持续性的技术创新活动，为企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企业还可以建立校企联合培训制度。企业可根据自身战略发展需求，与相关院校进行合作，为在校学生提供实训场所。学生可以在企业进行实际操作和技能培训，同时能亲身感受工匠精神在生产实践中的体现。企业在对学生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的同时，也是在为自身做后备人才

的培养。

3. 制定有利于培育工匠精神的人力资源制度

《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方案》提出，要拓宽产业工人发展空间；改革企业人事管理和工人劳动管理相区分的双轨管理体制，实行统一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打破职业技能等级与专业技术职务之间界限，实现有效衔接，改变技术工人成长成才“独木桥”现象；把优秀产业工人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纳入党管人才总盘子统筹考虑，搭建产业工人职业成长平台。可见，要让技术工人踏踏实实地发扬工匠精神进行生产实践活动，就要创造利于培育工匠精神的工作环境，打通晋升通道，解决他们在职业发展前景上的后顾之忧。

国有企业可在人力资源制度上打通技术工人走向管理岗位的发展通道，使有管理能力和管理意愿的优秀技术工人有机会从事管理工作，激发他们的创造热情，使企业与员工同舟共济。

（三）思想层面：教育引领，全面提升对工匠精神重要性的认知

1. 宣传工匠精神，树立工匠典型

企业要大力宣扬工匠精神，引导员工全面、深刻地理解工匠精神的内涵，认识到在日常生产中践行工匠精神的必要性，对工匠精神形成心理认同。要创新宣传方式，将树立工匠典型、传播工匠故事、弘扬工匠精神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多种宣传途径提高工匠和工匠精神的“存在感”。用员工身边的典型工匠人物的典型事例说话，挖掘工匠人物身上的工匠精神精髓，讲好工匠精神故事，让精益求精、追求创新的工匠精神感染更多的员工。在对工匠的推荐、评审、认定和激励等各个环节宣扬工匠精神，使崇尚技术技能、尊重劳动、鼓励创新创造成为企业员工提升职业素养的主基调，使工匠精神成为引领企业发展的风向标。

2. 建立崇尚工匠精神的企业文化系统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具有该企业特色的精神财富和文化形象，是企业在进行生产和经营活动时持有的价值观念，是企

业发展的灵魂。企业文化是一个系统，包含丰富的内容，其核心作用是促使组织成员形成共同的价值观，约束和引导组织成员的行为方式。好的企业文化系统可以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不适宜的企业文化系统会对企业的发展起到阻碍作用。

对于国有企业来说，要培育工匠精神，就要逐步建立起崇尚工匠精神的企业文化系统，用企业文化养育“匠德”。通过企业文化的引导，让每一个员工将工匠精神内化为价值理念，外化为实践活动，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积极创新、追求极致，使生产出来的产品更具品质，从而促进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和进步。

3. 积极借鉴国外先进企业培育工匠精神的经验

毫无疑问，当前世界上的制造强国都是极度重视工匠精神的国家，在制度上、文化上都有所体现，而国外的先进企业是践行工匠精神的具体执行者。例如，德国企业非常崇尚技能文化，鼓励发明和创新，推崇掌握精湛技艺的技工及职业。德国于2013年提出的“工业4.0”兴国战略目标也内含着个性化、专业化、灵活性的工匠精神与智能化的生产模式有机结合，使得德国技术工人严谨、务实、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自然而然地融入“工业4.0”计划中。虽然国情不同，但我国国有企业在助力实现制造强国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应当积极学习德国、日本等国的先进企业在培育工匠精神方面的先进经验，以提升自身员工的职业素养和企业竞争力。

综上所述，在我国实现制造强国战略目标的时代背景下，在我国制造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国有企业培育工匠精神势在必行、刻不容缓。让工匠精神回归，扎根在员工的价值理念中，落实在员工的生产实践中，将真正点燃工匠精神之火，助推我国经济实现更加快速的高质量发展。

课题负责人：安 静

课题组成员：习艳群 安 莉

首都重大工程建设中农民工党员 教育情况调查报告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同时要求，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大农村“城镇化”进程加剧，富余劳动人口涌向城镇，建筑工人成为农民向城市务工人员（农民工）转变的重要职业领域。在北京，随着具有政治功能、文化功能、国际交往功能、文化创新功能等重大工程建设的蓬勃兴起，这种转变更加明显。

经过二十余年的延续和累积，参与工程项目建设的农民工已形成国有建筑施工企业结构中一个庞大的群体，为国有建筑施工企业的生存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并日渐成为国有建筑施工企业继续发展壮大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伴随着农民工党员的拥入，农民工党员群体也已成为国有建筑施工企业中一个新的党员群体受到关注。

在这种双向交叉的作用下，参与首都重大工程建设的农民工特别是农民工党员群体的政治教育问题凸显，尤其对政治敏锐性高的首都而言，从工程安全、社会稳定、首都形象等方面看，农民工思想情况直接影响工程建设的溢出影响。“农民工人数多、规模大，社会影响广”的国有建筑企业，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落实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保障社会稳定，承担企业责任，这就使“如何做好首都工程建设中农民工党

员教育”成为承建首都工程的建筑企业党组织必须直面的课题。

一、调研情况

(一) 调查工程与样本分布

工程	样本量	百分比 (%)
北京新机场南航航空食品项目	67	25.67
北京新机场管廊项目	63	24.13
北京环球影城项目	42	16.09
北京环球主题酒店项目	69	26.43
国家游泳中心冰壶场馆改造项目	10	3.84
国家科技传播中心项目	10	3.84
总计	261	100

(二) 样本选择与调研情况

本课题选择了中建一局在建的6个国家级重大工程，分别为北京新机场南航航空食品工程、北京新机场管廊工程、北京环球影城工程、北京环球主题酒店工程、国家游泳中心冰壶场馆改造工程和国家科技传播中心工程。这些工程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有很强的政治意义，是北京在转换功能，建设冬奥会、北京大兴机场、通州区文化产业领域的重要政治工程，其政治影响力较高，是北京五年规划中的重要核心工程。我们选择了参与这些工程建设的10家劳务分包队伍共261个农民工党员进行分析。在调研的工程项目，通过问卷调查、材料调阅、现场走访、一对一访谈等形式开展调查。在调研过程中，值得欣慰的是，农民工党员对我们的调研很配合，谈话也很坦诚。作为中共党员，他们随着外出务工经历的丰富和外界环境的影响，政治思想有动态变化，他们虽普遍存在着诸多的现实困境，但对党依然有着很深厚的感情，对党员身份有着很高的认同，对党员教育有着强烈的诉求，这为我们加强农民工党员教育

取得成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和前提。

二、问题分析

对于当前建筑行业农民工党员教育而言，尚处于探索阶段，国有大型企业结合企业党组织建设和企业发展实际设置农民工管理办法。中国建筑于2019年7月印发《农民工党员管理办法》，对所属二级、三级、四级单位和工程项目进行指导，目前正处于宣贯和初步执行阶段，政策面向基层的穿透性还不明显。基于工程样本，我们认为，当前建筑业的党员教育面临以下问题：

（一）城乡二元体制和户籍制度形成流动障碍，“两不找”成为常态

开展党员教育的前提是先把党员找到，然而，确认党员身份，明确流动党员的党员归属却成了困境。建筑业农民工党员的户籍在农村，党员组织关系在家乡的农村党组织。很多建筑业农民工党员，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后，其职业目标、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活动范围等都锁定在城市，客观上需要并应该参加城市党组织活动。但是，建筑业农民工党员的农村身份，以及党员组织关系管理的制度规定，使建筑业农民工的党组织关系很难顺利地转移到务工地。在课题调查中，农民工党员认为组织关系转移到务工地面临诸多困难和障碍，首先是不了解组织关系转移手续，占50%；其次是在务工地找不到接收的党组织，占29%；再次是转接组织关系的程序麻烦，占24%。尽管近年来党和政府在统筹城乡关系、户籍制度改革、实行就业农民工进城落户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城市党组织对建筑业农民工党员的存在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而建筑业农民工党员对于城市党组织是否能够从形式到内容上接纳自己没有足够的信心，从而形成了“两不找”状态。本次调查显示，59%的建筑业农民工党员表示相关党组织没主动联系过自己；52%表示自己也没有主动联系过相关党组织；66%表示没参加过相关党组织活动。调查显示，建筑业农民工党员认为在务工地发挥党员作

用有诸多困难和障碍，首先是没机会参加相关党组织的活动，占62%；其次是缺乏相关党组织的支持，占41%；再次是不被其他党员接纳和认可，占3%。

（二）基层党建条块分割让建筑业农民工党员教育工作成为“盲区”

受城乡二元体制和条块分割体制影响，基层党建工作分为农村基层党建和城市基层党建两大领域，而城市基层党建又细化为社区党建、企业党建、“两新”组织党建等多个党建领域，农民工党建工作没有归口，成为“盲区”。尽管实行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但条块分割导致各人自扫门前雪，各抓各的责任区；尽管中央和地方党委出台了一些流动党员教育管理政策规定，但缺乏针对农民工党员的具体指导，农民工党员教育没有明确的硬性工作任务，也就成了可抓可不抓，想抓没抓手的工作。农民工党员的教育和培养工作处在“几不管”状态。从本次调查看，73.6%的农民工党员认为“党组织从未通知我参加学习”，27%的农民工党员认为党组织因为怕麻烦而不愿培养，45%的农民工党员认为城乡两地党组织都不重视他们发挥的作用。同时，建筑业农民工党员对党组织有希望和要求，首先是家庭能够得到党组织的关心和帮助，占60%；其次是希望党组织提供为务工地或家乡做贡献的机会，占50%；再次是希望参加务工地党组织生活，占47%；最后是希望本人得到务工地党组织的关心和帮助，占37%。

（三）“四方党组织”对建筑业农民工党员教育支持力度较小

“四方党组织”包括流出地党组织，指农民工党员原党组织关系所在地的地方党组织。流入地党组织，指农民工党员离开原组织关系所在地后，其新的事实劳动关系所在地的地方党组织。流入地发包方企业党组织，与分承包方单位建立合作关系的企业党委（总支、支部）。流入地分承包方企业党组织，承担企业发包工程和项目的分承包方企业党组

织。在调研的工程项目中，流出地、流入地、流入地分承包商对农民工党员管理缺位严重，作为流入地发包方企业，目前在有序推进农民工党员教育工作，但效果还不明显。

（四）建筑业农民工党员教育方法与评估机制缺位

从实际工作和调研来看，“四方组织”抓农民工党员教育存在问题较多，一是党员教育简单粗糙，方式过于单调、内容过于单一、需求过于笼统、手段过于陈旧等问题，缺少创新手段，造成农民工党员对主动接受教育培训缺乏积极性，培训经费投入不足，农民工党员培训经费往往偏低或没有列支；二是党务干部力量薄弱，建筑业为薄利行业，利润率较低，成本控制要求对工程项目定员影响较大，重大工程项目一般配备专职副书记，普通项目基本为“一肩挑”书记，党务干部的党建能力还无法满足需求；三是责任机制落实不力，多数“四方组织”党组织都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虽有实行党建工作责任制考核，但多停留在书面文件上，党建责任制要求里一般没有纳入农民工党建要求，并且实际检查中疏于督查、考核，抓农民工党员教育培训存在侥幸、懈怠心理。

（五）基层党组织党员教育缺位带来重大工程风险隐患

建筑业农民工党员政治参与度不足，必然造成农民工党员政治意愿无法正常影响政治输入系统，导致农民工党员合法权利形同虚设，政治话语权架空。新生代建筑农民工党员作为思想较为活跃、易于接受新鲜事物的青年农民工，长期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在追求物质利益满足的过程中，容易滋生党性不纯、政治观念淡薄、理想信念不坚定、思想觉悟不高等问题，这势必影响他们的政治参与能力和作用的发挥。而政治参与能力不足又会降低建筑业农民工党员的政治参与意愿，再次导致政治参与度不足。对于重大政治工程而言，政治思想稳定、管理受控进而形成有政治影响力的成果十分重要，对于安全、质量、环保等多项国家要求的落实承担表率作用，并接受更为严格的政府考核。大量缺失的党

员教育既存在农民工思想上的风险隐患，同时也极大影响了他们在组织生活中理应表现出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三、建议解决方案

（一）亟须研究制定适合建筑行业农民工党员教育的政策和规划

我国现代化能否顺利实现，最根本的取决于我国城镇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能否最终实现。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和城镇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力量之一，广大农民工队伍建设的好坏决定着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和质量。随着户籍制、单位制的逐渐放开和农村人口的不断拥入，党和国家相关部门、建筑行业，特别是承担国家重大工程的国有企业，应当尽快和直面农民工党员管理，特别是农民工党员教育对行业发展、工程建设和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加大建筑业农民工党员教育工作的顶层设计，做好农民工党员形势的科学监测。避免由于农民工总体上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法律意识较淡薄、金钱诱惑多样等原因，被不同力量利用，给政治工程的稳定性带来新的压力，进而带来社会风险和稳定风险。各级党组织必须从政治高度深刻认识到，农民工党员教育关系城乡建设的推进和现代化实现，关系党在各级基层党组织的巩固和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务必把农民工党员教育作为基层党建的重要工程来抓，出台适合本行业、本企业的农民工党建工作政策和规划。

（二）亟须把党员教育与当前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联系起来

《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提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新生代农民工党员作为中国共产党新生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按照党章的要求，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远大理想。当前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最终目标而要实现阶段性目标。农民工党员教育过程中，必须把远大理想信念教育与阶段性目标结合起来。教育他们扎扎实实提

高业务本领，为企业和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就是在向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迈进。在开展农民工党员教育时，要避免形式主义，只有将政治教育和理论教育转化为指导认识世界、生产生活的方法论和工具，才能真正发挥党员政治教育的实际作用。特别是对于在基础教育环节普遍缺失的建筑行业农民工党员而言，说教式、摆样子、盆景式的教育管理都将影响党员教育效果。

（三）亟须重视农民工的经济权益和政治权益，抓住农民工发自内心的发展需求

党员教育价值率是课题组重点关注的，也是企业党组织制定党员教育投入规划和党员教育政策的基础。一是要着眼于政治导向，加强政治教育和形势政策教育。特别对于重大政治工程而言，政治教育应当为常态化教育，纳入农民工每日晨训，并由农民工党员扩大到全体农民工群体。二是以建筑业发展需求为导向，结合“三会一课”安排，设计党员教育频次和内容。设计农民工党员教育内容时，要注重对建筑产业结构的需求进行调查研究，围绕当前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设置党课、确定专题和内容，切实增强党员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从本次调查看，首先是融入技能培训，占72%；其次是融入心灵关怀，占65%；再次是融入商务信息和就业指导，分别占48%。三是要着眼于以了解现实问题为重点的形势教育活动。不能满足于已有教材的照本宣科、参观示范点等活动，要紧密联系建筑生产的实际问题，引导党员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生产经验交流，推进党员教育深化，提高建筑业农民工群体思想政治素质和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四是要着眼于以提高政治稳定性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核心的党员教育评估。要改革党员教育效果的考评方式，由过去以知识性的书面考评为主转变为提高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核心的考评模式。五是要根据建筑业农民工党员的特点，灵活安排组织生活。从本次调查看，建筑业农民工党员认为方便采用的组织生活方式，首先是亲自参加，占48%；其次是网络，占41%；再次是电话，占8%；最后是手机短信，占3%。同时要根据建

建筑业农民工党员的新特点和新需求，改进学习形式，丰富学习内容。从本次调查看，建筑业农民工认为方便采用的学习形式，首先是运用网络，占86%；其次是运用微博，占45%；再次是运用视频，占34%；最后是运用手机短信，占21%。

（四）亟须做好“属企化”党员教育和“四方组织”确权

“属企化”是指不改变企业党组织隶属地方党组织的关系，而是根据企业相对封闭独立的生产环境，把农民工党员教育与发包方企业党员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切实解决农民工党员教育管理难的问题，是“属地化”的深化、强化和优化。流出地党组织负责党员组织关系的转出或流动党员活动证的发放和查验，党员证明信的出具等工作，了解党员外出后的思想、就业和生活等情况，及时向外出流动党员通报党组织的重要情况，通知外出流动党员按规定参加党员教育等重要活动。流入地党组织按“属地化”管理原则在管理好发包方企业党组织的同时，将分承包方企业农民工党员教育工作纳入该组织管理，将“属企化”作为流动党员“属地化”管理方式的具体体现。流入地发包方企业党组织，在党组织“双重”管理的原则下，按照最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发挥分承包方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有利于探索农民工党员教育新机制的原则，具体承担“属企化”管理的农民工党员教育工作。流入地分承包方企业党组织，在发包方企业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努力做好农民工党组织的建设和农民工党员的管理工作。“四方组织”围绕“建筑业农民工党员教育”这一中心工作建立协调联动关系，这里流入地发包方党组织要以对党的建设事业负责的态度和责任感，切实履行“牵头人”的责任，其他组织协调联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从而形成合力，使农民工党员教育工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五）亟须设计“轻量化”农民工党员身份确认及权利确认机制

“轻量化”是指易于理解、易于操作、易于推广。一是重视流动党

员活动证的发放，当前，流动党员活动证是农民工党员确认身份的重要标准，要加大发放范围和发放力度。二是简化组织关系转移手续，使每个新生代农民工党员不论流动到哪里，都可以及时地落脚到一个基层党组织，最大限度地杜绝“流失”党员的存在。三是探索新机制新方法，打破属地管理制度，依托中国共产党党内信息系统建设，在对每名党员基本信息进行采集的基础上，建立“党员信息查询系统”，在区域内实现网络闭环管理。探索在区域内实施流出地党组织与流入地党组织“网上转接”的办法，进一步简化党组织关系转接程序。或将政治身份并入身份证等统一管理网络，便于党员身份确认。四是维护农民工党员接受党员教育权利，接受农民工党员诉求，建立农民工党员“一对一”的对接互动制度，通过电话、短信、互联网等形式积极加强沟通，有效使用流动党员活动证、对接联系卡等，督促评估党员教育情况。

（六）亟须建立建筑业农民工党员教育的激励机制

目前，中建一局在农民工党员教育方面的管理有初步成效。在北京新机场管廊等重大政治工程中，将农民工党员情况和党员教育指标要求纳入经济合同，并在签约前对承包方企业党组织情况进行评估，这个评估结果直接影响签约情况和劳务资源名录的筛选和录入。从经济角度对承包方企业的农民工党员教育进行识别、约束和管理。同时建立奖励激励机制，对于在合作过程中，“三会一课”运转正常、党员教育发挥作用、农民工党员的贡献度、党内创奖评优情况等与承包方的实际表现评估挂钩，并对表现优秀的给予实时激励，极大地激发了承包方企业党组织在党员教育方面的管理积极性，维护重大政治工程的稳定，取得良好的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农民工党员这一群体将随着城乡结构调整变化而不断衍生新的需求和空间，作为新时代国家重大政治工程的建设者，建筑业农民工党员教育常研常新，并将在保护农民工党员教育权利，肯定和回报农民工党员在重大工程建设中的贡献，激励更

多农民工党员群体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作用、贡献力量、共享成果上发挥更大的社会意义。

课题负责人：姜 鹏

课题组成员：蒿竹兰 朱利辉

新时代首都乡村文明建设研究

——以怀柔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为例

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党校

2018年7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同年8月21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弘扬时代新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不断提升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10月12日，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专题会议指出，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落地生根的重大举措，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满足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的战略之举。2019年3月5日，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在市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引导农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文化聚集人心、教化群众、稳定社会的作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乡村文明建设，打造引领农村思想、道德教化、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平台。

一、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对建设乡村文明的重大意义

马克思指出：“文明如果是自发地发展，而不是自觉地发展，则留给自己的是荒漠。”在推动乡村文明的过程中，村民的思想意识和文明

行为，会随着生活条件、社会关系的改变而改变，但必须认识到，这种思想意识的改变并不是客观发生的，必须从个体的自发上升到群体的自觉才能形成强大的推进力量。这个过程就需要用思想引领从而焕发文明共识，并使之从被动到主动、从个体到群体，落实到每个人的行为实践中，最后形成强大的推动组织发展、群体和谐、乡村幸福的文明软实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可以通过载体平台宣传思想理论、文明风尚、社科技能、道德生活和一系列文化活动，春风化雨，凝聚村民个体为村庄群体、化被动服从为主动作为、化自发行为为自觉意识，助推乡村文明建设。

（一）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

党的十九大指出，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把这个战略写进党章。“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这三条标准直接与乡村文明建设有关。乡村振兴，不仅意味着农村地区的硬件设施得到完善和提升，更需要考虑和解决农村地区建设的“软件”工程。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把握“大城市小农业”“大京郊小城区”的市情和乡村发展规律，可以看出，新时代文明实践是把农村基层宣传文化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抓好，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农村开花结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的重要实践。新时代文明实践不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铸魂”工程，更是推动基层建设的重要抓手。

（二）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乡村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

文明实践中心建设首先要有载体，通过载体整合现有基层公共服务阵地资源，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新期待。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通过整合人员队伍、资金资源、平台载体、项目活动，打通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建设，让文化、科技、卫生资源和建设向农村延伸；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因地制宜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明实践活动，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常态化的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有助于在农

村建立一个互助和谐、环境优美、乡风文明的宜居乡村，让村民过上高品质高质量生活。同时，农村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改变将吸引部分优秀农村人才回流，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三）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强化农村阵地建设的重要手段

农村发展中面临的很多问题大多来源于思想认识的不足或偏差。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通过组织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和潜移默化的文明教育，形成村民积极参与文明建设的公共空间和良好舆论导向，能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地位，为农村的发展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村民通过文明实践中心的文化熏陶和思想教育，可以转变其传统的生活方式、处事态度和价值观念，改变农村的社会风气和不良习俗，带来农民观念的变革，进而解决农村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同时，以乡村文明促进农村治理是北京超大城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面对北京农村社会结构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的形势变化，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能推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农民生活安定有序，推动乡村文明建设，有利于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二、怀柔区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推动乡村文明的实践探索

北京市全面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以来，怀柔区整合党政力量和基层公共服务资源，吸纳社会力量，建立专业志愿服务队，通过开展参观、实践、培训学习等活动全面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主要做法有：

（一）做好顶层设计让乡村文明实践有依据

怀柔区积极与市文明办对接，掌握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正确方向，并根据中央和市委市政府有关方案要求，因地制宜，制定《怀柔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方案》，在功能定位、工作原则、组织

体系、工作方式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2019年5月8日，怀柔区召开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成立大会，截至目前，区、镇乡（街道）、村（社区）三级组织体系已全部建设完成，共成立1个文明实践中心、16个文明实践所、318个文明实践站，构建“实践中心—实践所—实践站”三级组织体系，形成新时代文明实践合力。

（二）整合各类资源让乡村文明实践有保障

怀柔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灵活统筹现有公共服务阵地，整合盘活各类资源，着力构建“1+1+7”的实践模式，推动乡村文明建设。第一个“1”即“一支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队伍”：统筹全区区直机关、镇乡街道、各村资源，整合体制内外力量，建成一支政治过硬、结构合理、专兼结合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队伍；第二个“1”即“一批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围绕理论政策宣传、教育服务、文化服务、科技与科普服务、健康健身服务等方面，初步打造5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通过开展参观、实践、培训、学习等活动，带领基层群众走出家门，走进基地，切身感受新时代美好生活，使之成为基层群众受教育、受熏陶的暖客厅、大课堂。“7”即“7项工作任务”：围绕“学习实践科学理论、宣传宣讲党的政策、培育践行主流价值、注重养成文明习惯、丰富活跃文化生活、持续深入移风易俗、建设幸福美丽现代化新怀柔”7项工作任务，把握农村群众的思想特点和接受习惯，依托农村文化阵地和文明实践基地，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截至目前，共建成区、镇乡（街道）、村（社区）下属志愿服务队535支，其中区级志愿服务总队1个由17个区直单位的92支志愿服务队组成，镇乡（街道）志愿服务中队16个由83支志愿服务队组成，村（社区）志愿分队318个由360支志愿服务队组成，三级服务队共开展志愿服务活动900余场次，参与志愿服务人员2万余人，累计服务群众16万余人次。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建设中，怀柔重点结合基层群众的日常生活、生产劳动和实际需要，统筹调配志愿服务，组织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特别是“新时代文明实践推动日”活动，深受广大村民喜爱，有力地推

动了怀柔区乡村文明建设。

（三）组织丰富多彩活动提高村民文明意识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充分利用节庆假日，策划文明实践活动，把精彩的活动送到老百姓家门口，让农民获得更多正能量，接收到更多的文化熏陶和滋养，不断提高自身文明素质。喇叭沟门满族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六一”儿童节慰问活动，为孩子们青春成长助力；泉河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系列活动，接地气的节目，寓教于乐的形式深受老百姓喜爱；汤河口镇、宝山镇、北房镇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进村入户，开展环境整治，照顾独居、高龄老人，政策宣讲等活动，提高群众文明素质，营造文明、有礼、有序的生活环境。

怀柔区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推动乡村文明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

1. 成为农村传播新思想的主阵地

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载体，依靠区委党校教师、大学教授、农技人才等力量，不定期深入基层，组织农村党员、村民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强化对新思想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更加自觉维护党的核心，更加自觉地在党的领导下建设美丽乡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2. 有效推动了农村移风易俗

新时代文明实践通过党员活动室、文化活动中心、道德讲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宣传教育，积极组织村民开展环境维护、打扫卫生和“三风”（村风、民风、家风）建设等志愿服务活动，积极培育崇德向上、爱护环境、孝老爱亲、邻里和谐、遵守村规民约、注重传统文化、传承民俗活动等乡风文明，实现了农村宣传教育、实际结合、实践养成、示范引领等方式的互补，指导运用村规民约，积极破除封建迷信、铺张浪费、大操大办、传闲话骂大街、乱上访等不良风气。同时，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以“扶志”和“扶智”的模式，在提高村民法律意

识、提高村民致富本领、提升村容村貌、改进风俗习惯等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使村风民风家风更加清朗。

3. 积极培养了农民文明生活新方式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通过一系列志愿活动，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村民的生活方式。比如，北宅村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打造出整洁优美的环境，同时优美的环境反过来也影响了村民的行为习惯，村民从点滴小事做起、从房前屋后做起、从不文明习惯改起，自己动手净化绿化美化家庭院落和公共空间。西台下村通过传统文化宣传教育，播放传统文化视频等方式教育村民，让村民自发形成了定期去文化活动中心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习惯。桥梓镇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开展“村风、民风、家风”建设，在全镇形成了孝老爱亲的良好氛围。创新形成新时代文明实践推动日，更是掀起了全区村民环境综合整治高潮。

4. 激发了农村发展内生动力

农村发展首先大都因为信心不足、缺动力、缺技术、对国家政策和产业发展信息不清楚。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开展理论宣讲、政策解读、劳动技能、科学技术、健康保健、传统技艺等实践活动，促进政策、信息、技术的落地，让村民通过文明实践“看、学、干、练”，获得劳动技能和精神生活的双丰收，从而激发起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宝山镇进村入户宣讲乡村振兴战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城文明小知识，既激发了广大村民干事创业的热情，又提升了村民自身综合素质。

怀柔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实践探索，成为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更好地满足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助推乡村振兴的有力举措。

三、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推动乡村文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虽然新时代文明实践在推动乡村文明建设中发挥了很大的助推作用，但通过调研不难发现新时代文明实践在推动乡风文明中仍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村民的文化素质偏低，文明实践缺少智力支持

村民文化水平能够决定文明实践的层次，为村风文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农村“两委”干部是文明实践主要发起人，党员代表和村民代表是文明实践的主要参与者。但通过对怀柔区8个村的调研发现，“两委”干部及党员代表、村民代表中的农村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有7人的文化程度是小学及以下，有33人是初中，57人是高中、中专，而大专及以上的仅有32人（其中包括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组等相关人员）。留在村里的村民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大部分处于初级水平，拥有一技之长的人较少。由于村民的受教育水平整体较低，没有较好的文化知识积淀作为提升学习能力的工具，农民的整体素质难以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提高，没有好的个人素质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建设进程就会慢。部分农民由于文化素质低，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政治素养、社会责任感也较差，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组织文明实践活动的水平。

（二）文明实践活动参与率有待提高

由于村民文化水平较低，对农村举办的活动缺少认识，由此引发了活动参与率不高的问题。在“农村文明实践活动”的调查中，有28%的受访对象表示经常参与不同种类的实践活动，有60%的人表示偶尔参加，有12%的人表示基本不参加，大部分村民参与活动的频率并不是很高。原因主要有：一是由于文明实践活动大多集中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或文化活动中心，部分村民表示参与活动不方便。二是部分村民认识较低，对一些文明实践活动认为是党员责任，无须参加；对于一些理论宣讲等不感兴趣，压根就没有“充电”的意识。三是在对农村文明实践活动的开展上，缺乏相应的针对性和层次性。部分年轻人反映，村里很多文化节目都以传统的形式表现，缺少现代气息，参与的热情不高。四是有部分村民表示有时村里一年就一次活动，参加的不多。

(三) 文明实践与产业发展融合得不够

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主旨是教育群众、服务群众、改善农村风气、树立新面貌。在活动开展过程中还是能通过宣传，一定地提高乡村知名度，促进村经济社会发展。调研中发现在一些经济基础较为雄厚的农村，村委经常会举办一些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农村文化活动，因为村委有经济支撑，能通过活动取得一些影响力，经济基础较好的农民也乐于积极参与文明实践活动。但是，一些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村子在农村文明实践活动方面的组织安排较少，因为组织一次活动，带不来收入。经济收入不同的农民，对于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是不一样的。经济基础薄弱的农民他们更倾向于如何生存，赚钱才是生活的主要部分，所以没有多余的时间来参与农村文明实践活动。从全区来看，文明实践活动开展很多，但缺少能把丰富的文明实践活动开发和推广的运作体系，文明实践活动与村经济发展没有进行产业化的开发和推广，相互融合不够，没有培养出有影响力的文明实践活动品牌，村民在实践活动参与中还存在误区。

(四) 文明实践的特色还不明显

特色的文明实践活动，能够赋予活动的灵魂，才能够把活动变为村民愿意参与、体验的“活”项目。尽管各镇乡、各村在文明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了很多特色，比如“新时代文明实践推动日”，每周六党员身穿红马甲捡垃圾，取得了较好的反响，但是有创意、有特点的文明实践活动的案例太少。通过调研发现各乡镇、各村的做法比较单一，实践活动大多是自上而下的行为，各村缺乏自主性；在文明实践推动的过程中，也缺乏对相关文明实践活动的特色指导，缺乏将怀柔区丰富多元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文明实践活动的创意，更缺乏把文明实践活动转化为特色品牌的创意，文明实践活动大部分还是围绕理论宣讲、环境卫生整治、敬老院关爱老人等开展，无论是在组织架构上，还是在实践活动上都应该寻求突破。

四、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助推乡村文明的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美好生活不仅是物质富裕，更有精神文明的追求，这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内涵所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是促进乡村文明建设的大工程，不仅需要做好顶层设计、系统谋划、全面推进，更有赖于广大群众将自己摆进去，提高认识、躬身践行，进而提升乡村文明程度。

（一）立足本区实际，标准化、特色化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对标中央和北京市标准，牵住新时代文明实践“牛鼻子”，坚持问题导向，建章立制，让规章制度既涵盖文明实践工作各方面要求，又切合新时代社会发展特点，鼓励各乡镇、村结合自身实际大胆探索创新，彰显“怀柔”实践特色。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产业、生态、乡风文明、社会治理等方面融入文明实践，培育树立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为乡村振兴“塑形”“铸魂”完善实践中心建设、实践活动、志愿者管理等各类规章制度，强化志愿服务项目管理，明确实践活动主要流程、服务范围、责任人员等，做到文明实践活动有章可循、规范有序建立。制定符合本区实际的三级阵地建设标准，大手笔建设实践阵地、大力度整合全区资源，用好用活全区文化载体。尝试推行乡村文明积分制，量化管理乡村文明实践，用村规民约对文明实践进行激励和约束，促使乡村文明由“虚”向“实”，从“软”变“硬”。健全文明实践的领导体系，充分整合理论专家、技术人才、文艺骨干、乡村贤能等志愿者队伍。充分挖掘怀柔长城文化、满族文化、红色文化、乡土文化等资源，建好用好乡情村史陈列室等基层文化阵地，通过潜移默化提升村民文明意识和乡村文明程度。

（二）不断丰富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内涵，增强活动的针对性

牢牢把握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条主线，突

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新风尚，以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弘扬道德风尚、提高发展本领为重点内容，开展高质量的文明实践活动。立足村情实际，着力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村民素质方面下功夫、出实招，努力让群众精神生活更加富足。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走访慰问、百姓宣讲、教育培训、惠民服务、文艺会演等活动，让广大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文艺节目和惠民服务，真正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借用景观、墙面、标牌等载体，生动传播党建知识、法律法规、村规民约、文明礼仪等内容，着力建设一个集思想教育、休闲健身、文化宣传于一体的教育场地。定期开展“村庄好人”“最美家庭”“最美儿媳”等评选活动，让广大村民见贤思齐，向身边典型模范学习。依托党员活动室、道德讲堂、村微信群、公众号等各类宣传“微”平台，以润物无声的形式推进文明实践活动常态化、制度化。尝试文明实践活动根据村民参加次数和成效赋予一定个人加分，根据群众参与情况赋予积分用于兑换洗衣粉、肥皂、毛巾等实物，将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与各村的精神文明奖挂钩，有效调动村民参与实践活动的积极性。

（三）加强文明实践志愿者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主体力量是志愿者。因此，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要突出志愿服务这个重点，着力构建上下贯通、供需对接的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工作平台。建设一支主体力量是当地村民的志愿服务队伍，各乡镇、村充分吸纳老党员、老干部、老战士、老教师、老模范，充分发挥村民主体作用，激发村民自身活力和内生动力。积极引导各部门专业力量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志愿活动不搞一刀切、大呼隆，鼓励农村大胆闯、大胆试，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讲述百姓身边故事、宣讲先进典型事迹、传授生产生活技能，在寓教于乐中让群众学理论、学政策、学技能。深入开展文化下乡、文艺下乡等文化志愿活动，把党的十九大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移风易俗、邻里故事等内容，以快板、小品、戏曲等形式，让群众做文明实践的推动者、践行

者、受益者，让文明实践接地气、聚人气。针对村里老人、残疾人、低收入家庭等特殊人群，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引导村民互帮互助。

（四）促进各类资源融合，弥补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短板

文明实践中心不是另起炉灶，也不是翻牌子，重点是整合盘活现有资源。整合党校、党员电教中心、党员活动室等理论宣讲资源，中小学、活动中心等教育服务资源，图书馆、博物馆、影剧院、村文化中心、益民书屋及民间演出团体等文化服务资源，对科技示范基地、科技信息站等科技科普资源，医院、卫生服务站和体育馆、健身广场等健康健身服务资源，探索“融媒体+文明实践”的新模式，发挥手机、户外大屏与社区广播等平台功能，实现“群众吹哨、志愿者报到”，打破资源使用壁垒，实现线上线下同频共振、互相融合，形成工作合力。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伍，由实践中心统一调配使用，努力为群众提供多样化、精准化、高效化的志愿服务。通过建立“文明实践+民俗旅游”的方式，挖掘怀柔区民俗文化、红色文化资源、满族文化等让传统文化在文明实践活动中“活起来”“火起来”，带动民俗旅游的发展，提高村民收入。同时，做强本地文化企业开展农村新时代文明实践，依托怀柔本地文化，举办文化活动，制作文创产品，为农村新时代文明实践添砖加瓦。

课题负责人：祝传佳

课题组成员：于博 喻维莉

首都重点工程建设中思想政治工作的 实践性与创新性研究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充分认识到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改革创新是增强党的政治优势、实现“两个巩固”、解决现实思想问题的迫切需要。做好重点工程思想政治工作对服务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推动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发挥着重要作用。本课题以北京建工集团京内重点工程为研究对象，总结提炼了重点工程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和经验做法，分析了现场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对加强重点工程建设顶层设计、加强组织领导、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工作建议。

思想政治工作是国有企业的独特政治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强调要把“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作为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环节。在服务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推动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过程中，北京建工集团在京内和京津冀区域承担着一批首都重点工程。为深入研究首都重点工程思想政治工作，北京建工集团课题组通过召开专题座谈会、发放调查问卷、实地走访、专人访谈、查阅资料等形式，对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30余个工程项目思想政治工作情况进行了调研，总结提炼了重点工程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和经验做法，分析了现场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针对首都重点工程思想政治工作在加强顶层设计、加强组织领导、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工作建议。

一、加强首都重点工程建设中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

（一）加强首都重点工程思想政治工作，是实现“两个巩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思想政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提出了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论断、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充分认识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改革创新是增强党的政治优势、实现“两个巩固”、解决现实思想问题的迫切需要。

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坚持和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我们党执政的政治基础。重点工程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紧抓“两个巩固”这个根本任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汇聚员工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引领员工爱岗敬业、忠于职守，从而推动企业战略部署的落实。因此，必须充分发挥重点工程思想政治工作的激励、引导作用，以坚定理想信念筑牢精神之基，找准员工思想认识的融合点、精神追求的共鸣点、关乎利益的平衡点、调解矛盾的着力点，推动“两个巩固”根本任务在重点工程建设中落细落小落实。

（二）加强首都重点工程思想政治工作，是服务首都“四个中心”定位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客观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多次对北京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在服务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过程中，首都国企必须发挥主力军作用，履行好社会责任。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武装干部职工头脑，提升格局视野，以高站位、高标准积极融入首都经济、社会发

展和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有企业职责所在。同时，重点工程参建人员数量庞大、人员庞杂，各工程施工高峰期用工量达8万~10万人，且由于工程责任大、难度高、标准严、工期紧，参建人员面临的心理压力和工作压力明显高于一般工程，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引导，统一人员思想，调动职工积极性；及时疏导情绪，维护职工队伍稳定，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对于保障工程顺利建设，保障大庆之年、敏感之年的首都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加强首都重点工程思想政治工作，是国有建筑企业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

一方面，重点工程既是建筑企业的重要经济来源，也是展示企业实力和品牌形象的重要窗口，是保持和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的重要阵地。2017年以来，北京建工集团中标多项首都重点工程。这些工程“政治意义大、社会影响大、工程体量大、施工难度大”，确保高质量施工、高效管理、顺利履约，对于维护和提升企业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推动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舞台，重点工程项目通常在团队配置上集中了企业的优质人力资源，这些职工的思想状况对企业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当前，重点工程项目现场职工队伍结构和他们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正在发生深刻变化。“80后”“90后”职工已经成为工程项目现场的主力军，“95后”职工所占比例也在逐渐增加，青年职工思想活跃，加之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多样，价值观念和思想诉求更加多元，为现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新机遇的同时也增加了一定难度。

二、首都重点工程建设中思想政治工作现状

北京建工集团坚持问题导向，紧紧围绕“统一思想、凝聚力量”这一核心环节，结合工程项目实际，守正创新开展现场思想政治工作，很好地起到了凝心聚力作用，有效推动了工程建设顺利实施，并探索积累了一些好做法、好经验。

（一）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谋划项目思想政治工作

北京建工集团党委高度重视基层工程项目思想政治工作，先后下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集团京外、境外项目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集团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意见》等制度文件，纵向打通“集团公司、参建二级单位、基层工程项目部”三级通道，从人员配置、制度机制等方面对重点工程思想政治工作进行统筹谋划；横向积极完善党组织高度重视、党组织“一把手”担当第一责任、党政齐抓共管的“大思政”工作格局。项目党支部根据工程特性明确工作主线，具体组织实施。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工程项目党总支明确了“三抓、三促、三提升”的工作主线（抓思想高度统一，促凝心聚力，提升团队大局意识；抓基层组织建设，促作用发挥，提升党员党性意识；抓融入中心，促工程建设，提升企业品牌形象），并围绕这一主线开展了“为什么而来，来了干什么，将来何处去”大讨论、“党旗耀机场”等主题活动，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顺利通航奠定了基础。国家会议中心二期工程项目党支部制订了“12345”工作总体规划。土木公司党委坚持“四个结合”开展重点工程项目现场思想政治工作（把思想政治工作同业务工作相结合、同一线工作相结合、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同提升素质相结合），有效推动项目顺利履约。

（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增强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

北京建工集团京内在施重点工程中，涉及政治工程、冬奥工程、国庆服务保障工程和民生工程等，对参建人员的政治站位和思想水平要求非常高。这些重点工程项目把加强职工政治思想教育作为首要任务，利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这一有利契机，结合工程建设实际，组织干部职工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总书记对北京的重要讲话精神，有力促进了学习成果转化，激发党员干部职工坚定理想信念，高质量、高水平完成工程建设。2017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建设，并指出要全力将大

兴国际机场建设成为精品工程、样板工程、平安工程、廉洁工程。项目党总支将每月的23日定为主题党日，强化“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意识。副中心行政办公楼A2项目党支部着眼工程的政治定位，组织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工程开工当天，在项目现场与天安门广场同步进行升国旗活动，极大激发了干部职工以工匠精神和责任担当投入工程建设的工作热情和斗志。

（三）严防死守，筑牢意识形态工作防线

基层项目部是意识形态工作的落地单位，也是意识形态工作风险的集中地和高发区。北京建工集团党委按照“分级负责”原则，构建从集团公司、二级单位到基层项目的“网格化”管理格局，层层设立舆情联络员，实现“上情下达”“下情上传”，构筑起意识形态工作安全防护网。在世园会、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国庆等重大活动期间和重要时间节点，各重点工程项目开展舆情隐患全面排查，实行舆情“一日一报、层层上报”制度，顺利度过了多个敏感节点和敏感事件，圆满完成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服务保障工作，维护了意识形态安全。某政治工程项目党支部创建政治指导员队伍，开展“1+N+1”系列活动，并定期组织保密工作培训，确保工程建设“万万无一失、精益求精”。

（四）融入中心工作，围绕重点难点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实施重点工程“五出”计划，在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亚投行、冬奥会项目、南航基地、东航基地等重点工程建设中，锁定“五出”（即出效益、出精品、出经验、出成果、出人才）工作目标，开展现场思想政治工作，确保了首都重点工程建设的顺利推进，为国家和首都城市战略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撑。副中心A2项目部抓住工程“开工动员、过程节点、总结表彰”三个重要时机，在工程开工动员环节向全体参建人员进行“思想交底”；在工程正负零、结构封顶、竣工等重要施工节点组织开展劳动竞赛；在总结表彰阶段，将物质

鼓励与精神鼓励相结合，表彰奖励先进典型、鼓舞士气。某保密项目是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服务保障工程，针对政治工程特点和参建单位多、工作面广、工作内容多等难点问题，在现场设立了6个临时党支部，并与参建单位开展“牢记使命勇争先、党建引领筑精品”为主题的联创共建活动，每月围绕一个主题开展活动，有力推动了项目团队“同心圆、先锋队、工匠魂”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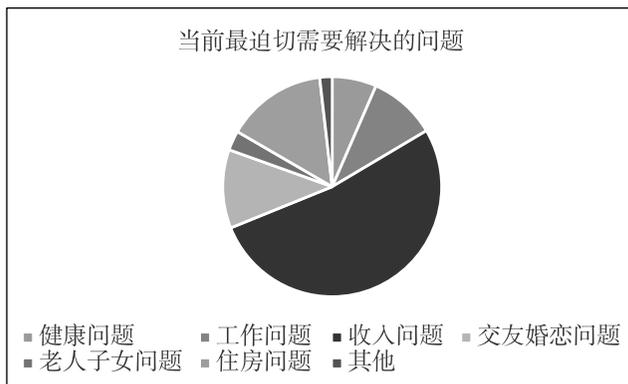
（五）突出文化聚力，为重点工程建设保驾护航

企业文化是企业之魂，在重点工程建设中发挥着“内聚人心、外塑形象”的重要作用，为确保工程建设顺利进行提供了坚强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调研中发现，重点工程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的措施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抓文化宣贯。积极推进企业文化“四进”（进头脑、进课堂、进现场、进媒介），并重点加强对新入职员工、基层支部书记、宣传干部的企业文化工作培训，通过故事会、报告会、座谈会、主题宣讲征文活动等，积极宣贯“建德立业 工于品质”的企业文化理念和员工行为规范，推动企业文化入脑入心入行。二是抓活动聚力。组建了北京建工集团企业文化宣讲团，参加北京市、市国资委“时代新人说”宣讲比赛，在企业内部开展了“我和我的祖国”宣讲、征文活动和“身边的榜样”巡回故事会，唱响了新时代共筑建工梦的奋斗之歌。三是抓典型选树。在重点工程建设中实施“典型选树计划”，深入挖掘和大力宣传了白恒宏、郭双朝、季连党、褚金栋等各类工程建设一线的先进典型，使勇于担当、强化执行、创先争优、创新创效成为全员的价值导向和共同追求，汇聚了工程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强大合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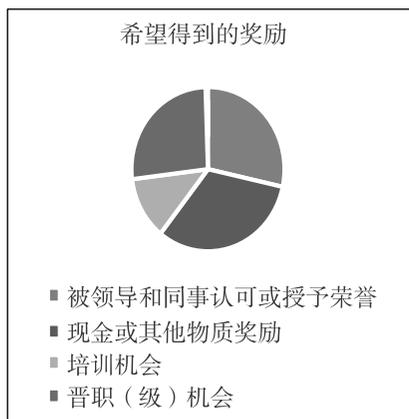
（六）坚持以人为本，将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职工思想日益多元化，同时，建筑行业流动性大、工作环境艰苦、远离家乡、户口、收入、婚姻、住房等现实问题容易让员工思想波动。调研中显示，“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收入、住房、交友婚恋排在前三位，其中，选择“收入问题”的比例最大，占到 52.39%， “住房问题”占 14.83%， “交友婚恋问题”占 11.56%。在对青年职工住房问题的调查中，“无自有住房者”占到 80.39%，其中“住单位宿舍或者项目部”的占到 48.72%，比重最大。



在对“工作中取得成绩的时候，最希望得到的激励”调查中，选择“现金或其他物质奖励”的占到 32.22%，选择“被领导和同事认可或授予荣誉”的占到 28.44%，选择“晋职（级）的机会”的占到 26.4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就要求重点工程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紧密围绕生产管理重点难点问题和职工群众关心的热点敏感话题，坚持将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及时做好正面引导、释疑解

惑、理顺情绪和矛盾化解。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指廊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团队平均年龄不到35岁，年轻同志占到70%以上，缺乏大型工程施工经验，遇到困难时难免迷茫或退缩。项目党总支创造性地设立“倾心工作室”，项目党总支书记每周与员工谈心谈话，为员工疏导情绪。项目部还组织开展了员工集体婚礼、“三八”节游园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把思想工作做到职工的心坎上，形成一座座无形的“精神加油站”。土木公司地铁工程项目组织开展“青听90后”、毕业生座谈会、合理化意见征集等积极倾听职工心声，设立探亲房、组建伙委会、举办七夕相亲活动、为毕业生提供免费食宿等工作措施，积极解决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

（七）适应时代需求，利用融媒体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近年来，北京建工集团积极适应新媒体发展形势，在企业报基础上，整合搭建了“一报、一网、一站、一厅、两平台”的融媒体传播平台，打通了从集团公司到基层项目的传播通道。各重点项目将积极利用集团媒体资源和创办自有媒体传播平台相结合，运用“互联网+”思维，积极探索微信、微博、微电影等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运用。城市副中心A2项目部以工程建设为内容，自编自导自演微电影，增强思想政治工作感染力。

三、首都重点工程建设中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对做好现场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不足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但是，在当前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一些基层单位和一线项目部人员政治站位不高，对思想政治工作极端重要性缺乏深刻认识，在人员配备、经费投入、工作协同等方面支持力度不大，还存在“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的现象。在调研中发现，重点工程项目思想政治工作干部58%为兼职，一些思想政治工作干部疲于应付，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思想政治工作。有的单位不注重思想政治人才培养，部分单位基层党群人才后继乏人、专业人才匮乏现象较为突出。

（二）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意识不强

思想政治工作是常干常新的。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普遍存在用老思想、老办法解决新问题的现象，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理念、新方法学习得不够多，对融媒体传播格局研究得不够深。与中心工作结合不紧密，存在“两张皮”现象，在推动工程建设和企业高质量发展方面的作用发挥不突出。比如，在理论学习方面，多采用学书本、学文件的形式，学习过程中单向灌输较多，交流研讨较少，学习的鲜活性、灵活性、有效性有待提高。在运用新媒体方面，对新媒体的传播特点和话语方式把握还不够准确，虽然运用了载体，但是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

（三）思想政治干部自身能力素质还存在欠缺

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对政工干部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要求越来越高，但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干部业务素质提升上还存在欠缺，思想政治工作干部水平参差不齐依然比较明显。在注重培养“复合型”党群干部的同时，也要注意思想政治工作专业技能培养，在参与调研的项目中，政工干部拥有中级以上职称者占到50%，但是拥有政工类专业职称的比例只占到12.5%。有些思想政治工作干部自身认识不足，不积极钻研专业技能，有些思想政治工作干部因为水平有限而不擅于开展工作，造成思想政治工作水平不平衡。

四、创新和加强重点工程建设中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和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守正创新”的重要论述，为思想政治工作指明了新方位，奠定了主基调。做好新时代工程项目现场思想政治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和北京市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要坚持守正

创新，立足发展大势，找准工作坐标，担当“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五项使命任务，在重点工程思想政治工作中，传承好经验、探索新路子，将思想工作做到每名建设者的心坎上，汇聚起推动重点项目建设的磅礴力量。

（一）加强顶层设计，加强重点工程思想政治工作组织领导

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思想政治工作不是基层项目党群宣传系统一个部门的事，也不是一个项目部、一个单位的事，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谋划，完善党委（党总支）决策领导、宣传部门积极协调、相关部门积极参与、项目党支部扎实推进的思想政治工作格局，保证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加强重点工程思想政治工作组织领导，首先，要建设队伍。在专兼职队伍配备职工中，应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一是要注重把自身素质高，既懂政策、会管理，又能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化解矛盾、协调关系的“复合型”人才充实到重点工程党支部书记岗位上，使其真正发挥好班子的“领头羊”作用。二是要注重提高党群人员的综合素质，激发他们做好工作的事业心、责任感和能力素质。三是要切实关心和支持思想政治人员工作。面对新形势，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中面临着较大压力，一些思想政治工作干部也存在着一些困惑。上级党组织要通过多种有力措施，做好工作指导、情绪疏导，增强思想政治工作者做好工作的自信心，解除其后顾之忧，使他们安心工作。

其次，要层层压实责任。党组织书记负“第一责任”，其他项目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切实担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投入更大精力管好阵地、管好导向、管好队伍，构建“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责任体系。

最后，要完善工作考核评价体系。与生产管理等具体业务工作相比，思想政治工作更侧重于务虚，存在不好量化、不易考核的特点。要逐步探索思想政治工作标准化建设，梳理标准化工作流程，完善考核评价监督，形成工作闭环，提高工作水平，增强工作实效。

（二）坚持“守正”，确保思想政治工作的正确方向

守正创新，守正是基础、是保障。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要把守正放在第一位，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工作，确保集团改革发展基础牢固、方向正确。

1. 坚守正确的思想方向，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扎实深入的理论学习，不断提升党员领导干部创新思维和战略思维，切实增强推动工程建设、破解发展难题、实现创新发展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要大力开展“四心四力”工程，突出思想教育引导，强化全员责任心，激发凝聚力；突出发展业绩鼓舞，强化全员自信心，激发工作驱动力；突出形势任务教育，强化全员事业心，激发工作执行力；突出标杆引领，强化全员进取心，激发工作创新力。

2. 坚守正确的立场方向，做强做大主流思想舆论

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建立完善的意识形态工作机制和 workflows。同时，要努力做大做强主流思想舆论，加强正面宣传，统一思想共识，增强信念决心，激发干事创业热情，为工程建设铸牢坚实的精神支撑。尤其是一些工程建设中存在重点难点较多的项目，更要做好舆论引导工作，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团结、凝聚职工力量，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激发战斗力、提升执行力，推动项目施工顺利开展。

3. 坚守正确的文化方向，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集团企业文化

要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相结合，将企业文化建设与工程建设目标相结合，大力倡导“以拼搏为美、向行动致敬”和“赢在执行”的价值理念，树立激情、创业、实干、奋斗的文化导向，以文化鼓舞士气，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典型、树立典型、宣传典型，

形成正向的示范引领。

（三）勇于创新，开拓重点工程项目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

守正创新，创新是关键、是动力。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要大力推进理念创新、载体创新和工作方式创新，使集团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强起来。

1. 推动理念创新，增强思想政治工作亲和力

要强化协同意识，坚持上下一盘棋，构建集团公司主导与各单位积极参与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内部与外部相结合、传统载体与互联网手段相结合、时代特征和企业特色相结合的工作体系。要转变工作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以职工群众为中心的发展观，突出思想政治工作的群众性原则，将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高度关注工作对象和受众，聚焦职工职业生涯规划、青年职工成长成才、婚恋、住房等问题，研究解决方向，拿出具体举措，增加职工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要细分对象受众，将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具体化、个性化、时代化，按照职工群众的意愿、用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从“居高临下”到平等对话，从静态到动态，从单向灌输到双向交流转变，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温度，让职工群众感受到受尊重，从内心深处激发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 推动载体创新，增强思想政治工作传播力

在理论学习方面，要建好用好集团公司、基层单位和基层项目的学习矩阵，倡导基层项目部之间开展联合学习。要充分利用微课堂、案例教学、观摩教学等多种学习方式，让深奥的理论通俗化、抽象的观点具体化，引导广大干部职工的能力素质整体提升，形成“学习领会理论政策—统一提升思想认识—推动工程建设”的工作链。在文化建设方面，要充分发挥新媒体传播快、受众广、灵活机动的特点，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积极利用大数据、VR、AR等新技术成果，用好QQ、微博、微信、网络论坛等平台，用好音频、短视频、图片等元素，创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灵活机动开展文化引导，潜移默化传播文化理念。在品牌

建设方面，要充分利用企业媒体矩阵平台，增强工作联动，加强活动策划，积极开展媒体公关活动和品牌宣传。

3. 推动工作创新，增强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力

要结合生产管理实际，深入基层一线项目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让思想政治工作“接地气、入人心”，打造有温度、有广度、有深度、有力度的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在理论学习方面，要创新理论学习方式，结合生产管理工作设置学习议题，倡导在项目一线开展现场学习、展开交流讨论。开展“理论走基层”活动，把理论学习送到基层一线，通过深入浅出的解读，把党的知识和政策送到职工群众心坎上，提升思想认识，凝聚发展共识。在文化建设方面，把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融入企业经营生产的方方面面，贯穿人才培养教育的全过程。抓住重大节点、重要活动、重点时刻开展主题活动，增强主流思想的吸引力、感召力。创新开展主题宣讲、“身边人故事会”等活动，着眼于身边人、身边事，通过小切口，用身边可敬、可信、可比、可学的先进人物对职工进行直观生动的教育和引导，以“身边榜样”的带动示范作用感染激励职工群众。

（四）夯实基础，加强重点工程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

要将政治坚定作为选拔任用思想政治工作干部的第一标准，把政治素质高、理论功底深、责任意识强的干部充实到思想政治工作岗位，配齐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干部。要加强对思想政治干部的能力素质培养，围绕增强思想政治工作者“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目标，制订培训计划和方案，加强系统互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导师带徒、人员轮岗、调训。要不断加强和改进工作作风，坚定工作信念、强化责任意识，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进一步打造“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干部队伍，以坚定的信念、务实的作风、过硬的本领，创新开展重点工程思想政治工作，为推动项目建设、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为服务国家战略实施和首都“四个中

心”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李敏. 开创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 [J].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2018 (10): 52 - 54.

[2] 游浩. 深化新时代国企思政工作的思考 [J].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2019 (3): 54 - 56.

[3] 张鸣. 坚持思想工作“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 [J]. 求是, 2018 (21) .

课题负责人：李 琼

课题组成员：张晓磊 刘林萍等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石景山段文化遗产 保护和利用研究

中共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党校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历史悠久，是北京市制订的文化保护规划中三个文化带之一，在这个文化带上聚集了各类文物单位 460 多家，未纳入文物单位的遗迹数十项。文物占地总面积达十多平方千米，是北京市郊区文物最密集、档次最高的区域，文化遗产极其丰富。近年来，北京市对西山永定河区域内的部分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保护修缮，但缺乏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系统规划，区域内各节点之间的分工合作水平偏低，西山永定河文化对城市品质提升的效能尚未充分显现，为统筹西山永定河相关重大项目建设，协调指导区域内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传承与发展，特开展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文化传承方面的研究。本课题以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石景山段，即石景山区全域的文化遗产在保护和利用方面存在的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希望进一步提升西山文化带区域中的文物保护与传承利用水平，促进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建设的整体发展。

一、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石景山段文化遗产的现状

（一）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石景山段文化遗产的基础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石景山段规划范围为石景山全区域，总面积 84.38 平方千米，根据《石景山区水务志》记载，永定河石景山段全长 12.9 千米，约占北京境内永定河平原段 1/5；太行山余脉形成的西北部

山地约占全区面积 1/3，山水特色非常明显。整个区域共拥有登记文物保护单位 105 家，其中，国家级重点文保单位 3 家（法海寺、承恩寺、八宝山革命公墓），市级文保单位 13 家，区级文保单位 20 家，普查登记文物 69 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27 个，包括国家级代表性项目 2 个，市级代表性项目 8 个，区级代表性项目 17 个。

（二）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石景山段文化遗产的特点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石景山段文化遗产人文资源丰富，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以佛教文化、皇家园林文化为代表的八大处、天泰山；以工业文化为首钢工业遗产；以永定河流域文化为代表的莲石湖水岸经济休闲带；以民间民俗文化为代表的模式口历史街区等多元文化共生。

1. 传统文化历史悠久

历史文化古街模式口是古都北京通往塞外商贸往来的交通要道，这条驼铃古道融汇了军事文化、塞外文化、寺庙文化、商贸文化、村落文化，是京西多元文化汇聚之地。这个区域民俗文化资源丰富，太平鼓、秉心圣会等 14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八大处灵光寺供奉着世界上仅有的两颗佛牙舍利之一，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佛教徒的朝拜，另外，西山上还有承恩寺、慈善寺等 21 座名寺古刹，其中法海寺的明代壁画与承恩寺“燕京八绝”都具有浓厚的皇家寺庙文化。还有这里的山水文化吸引着众多历史政要和文人墨客，留下了诸多名人足迹和千余诗文传说，体现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2. 工业文化积淀百年

石景山区是首都近现代工业崛起的摇篮，首钢、石景山发电厂等“京西八大厂”见证了首都工业百年变迁，搬迁调整后的首钢园区留下 200 余项宝贵的工业遗址资源，工业文化特色鲜明、景观性强、面积大，与西山、永定河交相辉映，文化价值潜力巨大，正在朝着兼具历史感与现代感方向改造。

3. 生态文化山水融合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石景山段拥有登记注册公园 9 处、古树 1546 株，

形成了以天泰山、石景山、翠微山为代表的名山文化，以永定河起源、变迁、治理为代表的水文化，石景山区是永定河水利建设遗迹最集中的地区，戾陵堰、车厢渠距今 1700 多年，是北京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金口河水利遗址，元朝都水少监郭守敬在此凿金口、导卢沟水，灌溉土地；明清时期修建的庞村古堤“十八磴”，见证古人治理永定河的辉煌业绩，这些都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作为永定河石景山段的莲石湖生态修复和景观提升也基本完成，使这段区域具有山峰林地镶嵌连线、河湖沟渠萦绕贯穿的独特山水风光。

4. 红色文化丰富厚重

八宝山革命公墓是中国声名最著、规格建制最高的园林式公墓，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朱德、任弼时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长眠于此。八大处公园也是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附近有陆军总部和中部战区，《谁是最可爱的人》《长征组歌》等一批优秀军旅题材文学作品在这里诞生，赤子报国、忠诚担当、锤炼进取的红色文化在这里生长。作为全国双拥模范城“七连冠”，石景山区有着深厚的军民鱼水情，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5. 创意文化集聚发展

石景山区具有“一轴三园”重点产业功能区的规划，文化创意产业呈现规模化、集聚化、专业化发展趋势。文化跨界融合创新态势良好，网络游戏产值占全国同行业的一半以上，文化创意产业呈现动漫、游戏、影视、设计等多元化发展态势，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石景山段具有传统文化和现代创新的汇聚融合特点。

6. 冰雪文化方兴未艾

2017 年首钢滑雪大跳台比赛项目和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训练中心四个场馆的落户、3 个国家级冰雪组织的进驻，使石景山区成为为数不多的“双奥之区”。《石景山区服务保障冬奥会加快冰雪体育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2 年）》《加快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发展建设 打造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行动计划（2019—2021 年）》发布实施，市民冰雪体育中心投入运营，北京市冰球运动协会入驻，冬奥设施和运

动的开展为石景山区带来了冬奥运动会的体育文化。

（三）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石景山段文化遗产的定位

依据《石景山区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保护发展规划》的设计，这段区域的发展定位为：国家级文化引领转型发展示范区、首都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京西山水文化交融发展特色区。笔者以为，相应的文化遗产发展的定位也应如此。

1. 国家级文化引领转型发展示范区

石景山区要紧抓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打造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的重大历史机遇，将冬奥会带来的文化活力、首钢释放的工业遗产价值与老工业区有机更新、高端绿色发展紧密融合，进而带动区域环境面貌持续改善、城市功能全面提升、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努力走出一条文化引领的绿色转型之路，打造“国家级文化引领转型发展示范区”。

2. 首都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

可以把西山永定河石景山段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放在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大局中考虑，深入挖掘八大处—模式口历史文化、首钢工业文化、西山永定河生态文化、八宝山红色文化、创新创意文化和冬奥冰雪文化的深厚底蕴，凸显西山永定河石景山段在首都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中的特殊地位，打造“首都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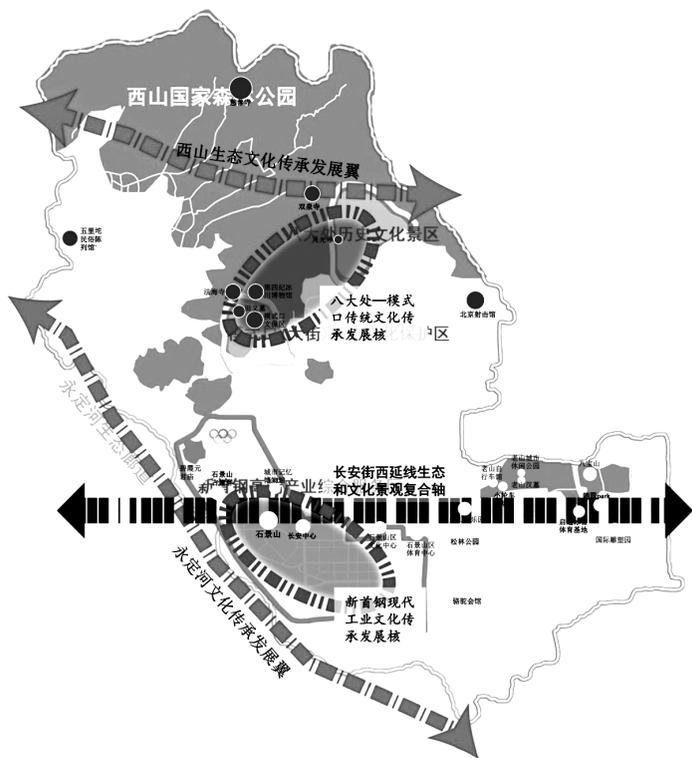
3. 京西山水文化交融发展特色区

立足“太行山下、永定河畔、长安西端”区位优势，建设山水融城、绿树环绕、林园相嵌、水清林茂的宜居森林之城，充分彰显西山与永定河交会区的生态文化魅力，打造“京西山水文化交融发展特色区”。

（四）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石景山段文化遗产的布局

依据《石景山区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保护发展规划》，目前石景山区正在构建“一轴双核两翼多片区”的空间布局。其中一轴指的是长安

街西延线创新文化发展轴；双核中一是八大处—模式口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核，二是新首钢现代工业文化传承发展核；两翼中一是永定河文化传承发展翼，二是西山生态文化传承发展翼；多片区包含红色文化传承区、冰雪文化特色区、古村落文化精华区、文体设施共享区、地质文化展示区等。（见下图）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石景山段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空间布局

二、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石景山段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取得的成绩

2019年9月，《石景山区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保护发展规划》正式发布，这标志着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石景山段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工作取得了制度化的成绩，这对于今后石景山区的文化保护和利用具有指导性作用。

（一）加大了文物保护力度

1. 加强了文物修缮保护和安技防升级

对石景山区兴隆寺、黑石头关帝庙、模式口过街楼、八大处香界寺、清凉寺、永济寺等部分文物进行修缮和历史建筑、景观进行恢复，以及周边环境进行整治；对慈善寺、上石府村龙王庙、清凉寺、长安寺、香界寺、石景山区冰川擦痕等文保单位的防雷工程安装和智能化安技防、消防系统进行了升级改造；已启动对位于石经山上建于唐代的金阁寺包括钟鼓楼、金阁殿、天王殿等古建筑群的修缮工作。

2. 启动了以模式口历史文化保护区建设为核心的街区风貌和遗产保护工程

石景山区从 2015 年开始启动模式口文保区修缮改造计划，结合疏解整治促提升行动，推进模式口地区历史文化院落、街道修缮和景观再造。在模式口大街建设工作中，深入挖掘模式口大街所包含的自然特色和人文内涵。联合区城市文化艺术研究会全面启动模式口大街历史文化调研项目，广泛利用社会资源，目前，占地 2 万平方米京味十足的模式口公园和反映新中国水利发展的模式口水电站工业遗址公园两处新景观已经亮相，预计 2019 年年底，模式口大街和法海寺通道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及房屋外立面修缮完成，全长 1500 米的京西古道将重现历史上的繁华景象。

（二）推进了西部基础设施建设

目前，基本建成“三横三纵”主干路网，各条支路建设逐步实现，新建道路总长达 17 千米。完成小流域综合治理规划，南马场水库生态修复工程、隆恩寺沟、潭峪沟、黑石头沟等治理工程相继完成。石门路、五里坨路沿线、五里坨保障房周边等绿化工程基本完成。完成 110kV 变电站、五里坨热力一次线、五里坨污水处理厂、五里坨供水厂、西部环卫中心场站项目一期等公益项目建设并投入使用。启动五里坨综合医院、五里坨精神病医院、儿童福利院、救助中心、残疾人康复

中心、气象局、五里坨小学迁址等一批群众急需的社会公益项目前期工作。

（三）加大了对永定河流域石景山段的治理

1. 对莲石湖的全面治理

北京市投资4.67亿元，完成对“永定河绿色生态发展带建设工程”莲石湖建设范围的建设任务。通过引水文化、防洪文化、植柳文化、治水工具及人物以及亲水平台五部分集中体现了石景山区永定河文化。占地约30公顷的南大荒湿地正在进行建设，通过功能性湿地净化以后，每天能够回补到永定河道6万立方米净化水。

2. 对黑石头小流域的综合整治

为了进一步提升黑石头小流域生态功能，打造石景山区精品生态清洁小流域，2013年以来，投资1300余万元，进行了多项治理工作。对小流域上游水土保持和环境保护铺设生产道路5000平方米；拆除并新建库区原破损栈道410米；修复梯田12.14公顷；设置生态型挡墙1610米；边坡防护1890平方米；南马场水库库区完成绿化整地2万多平方米，土壤改良1020立方米等。使南马场水库水质得到明显改善、植被覆盖率得到大幅度提高、生态环境更加自然和谐，推动小流域内的生态经济发展。

三、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石景山段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存在的问题

（一）历史文化资源挖掘不够充分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整体形象还没有得到充分展示，文化遗产公共展示场所少，可达性不强，没有成为区域标志性符号。永定河文化和古道文化资源呈点状分布，首钢厂区内的石景山古建筑群有些文物列入规划，但是尚处在起步阶段，目前还未形成整体的保护和传承。石景山区文化类型纷杂多样，文化资源开发潜力大，但缺少表征性、引领性文化

符号，文化遗产内涵挖掘不深，文化资源闲置严重、活化利用水平不高，有些文化业态比较落后，文化品牌影响力尚未形成。

（二）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配置不足

文化空间和公共文化设施配置不足，博物馆、图书馆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绿道、步道等游览设施亟待改善提升，整体服务能力仍需提升。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难以适应日新月异的群众文化需求，整体服务水平和能力还有待提升。

（三）城市文化风貌特色不够鲜明

石景山区整体城市风貌塑造有待提升，目前存在诸如城市文化气息不够浓厚，城市风格特色不够鲜明，部分公共空间缺少精品化设计，道路景观塑造不足、生态文化缺乏有效连通等问题，文化风貌亮点片区和标志性建筑缺乏，品牌性的文化集群尚未形成。文化产业总体规模偏小，文创产业经济总体量在全区经济总体量中所占比重不足 10%。文化创意、旅游休闲等产业发展不足，对周边区域发展的带动作用发挥不足。

（四）基础设施配套能力有待提高

西部地区市政基础设施承载力不足，城市建设水平相对滞后，重大项目统筹谋划需进一步加强；区域内环境整治、卫生条件改善和生态景观修复等方面还有很大差距。交通道路、游览步道、食宿接待等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去中西部休闲旅游交通耗时长，主要交通道路在节假日拥堵严重，进入性不佳，可驻留性不强。

四、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石景山段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对策建议

(一) 继续深入挖掘文化资源的内涵

可以再深入挖掘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石景山段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全力保护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石景山区精品文化名片，推进西山永定河石景山段文化传承工作。

1. 保护优秀传统文化

实施深入细致的文物保护与修缮措施。普查登记区内文物，划定保护线，实施数字化保护，建立西山永定河历史文化遗产基因数据库。主要加强重点文物的保护和修缮，采取“少点多体”文物元素集群工程，可以重点进行八大处文化景区、模式口历史文化保护区文物保护工程、首钢工业建筑与附属物修缮及石景山古建筑修缮工程，从而带动京西整个历史文物保护集群建设。

保护好碧霞元君庙、雍正御碑亭等古建筑群，挖掘相关历史人物的故事和传说，全方位展示石景山在永定河流域、北京城的重要地位。高标准打造石景山山体公园，形成“东有石景山、西有燃灯塔”的历史文化格局。串联古河道、古香道、古商道。挖掘金口河人工河道遗址历史价值，研究建设金口遗址公园。对庞村古渡口、十八磴古石堤等水利设施遗址部分具有复原条件的河道和重要节点进行原址复建，采用雕塑、缩微景观或石碑等形式展示镇水牛、刘娘府、柳庄村等传说。研究整理区内名人资源，建设“老舍茶馆”、曹雪芹故居等，扩大文化品牌影响力。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强重点非遗传承者的普查登记和申报。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扶持办法，建立“传承阵地、人才队伍保障、传承利用”机制，鼓励相关组织和个人开展非遗传承工作。把非遗保护与文物保护、历史建筑保护、旅游以及新媒体、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统筹结合，通过举办非遗传统技艺大赛、非遗讲座等系列活动活态展

演太平鼓、京式旗袍、京西民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2. 打造精品特色文化

充分挖掘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石景山段文化资源的特色，打造“六张文化名片”。

一是八大处—模式口历史文化名片。彰显八大处佛牙舍利、十八罗汉、冰川漂砾、敬佛碑等文化魅力，主动对接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三山五园”皇家园林文化，统筹构建“三山五园八大处”大西山历史文化品牌，争创国家5A级旅游景区，树立“禅林圣地+旅游胜地+养生度假区”的文化品牌；精心打造模式口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龙型街巷肌理，推动老布店、过街楼遗址等文物修缮，在模式口周边5千米范围内打造绿化景观，拓展升级休闲自行车道、休闲步道，对周边房屋色调进行装饰。激活模式口历史文化保护区灵魂，使之成为古老街区与现代文明融合发展的典范。加强模式口与法海寺、承恩寺、田义墓、法海寺森林公园的规划统筹，挖掘法海寺明代壁画的艺术价值，提升模式口的国际知名度和文化影响力。

二是打造首钢工业文化名片。落实《加快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发展建设 打造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行动计划（2019年—2021年）》，实现文化复兴、生态复兴、产业复兴、活力复兴。从引领世界老工业区更新利用的历史性高度，充分保护好利用好北京现存规模最大、价值最高、地位最重要的首钢工业文化遗产。推进首钢工业遗址公园建设，注重保护延续老工业文化脉络，规划建设五一剧场、后工业景观休闲带等文化景观节点，提升公园绿化和水系建设，并同步实施滨水绿带建设，打造以绿为体、蓝绿交织、景观多样的绿色生态空间，焕发百年首钢的深厚底蕴，呈现山—水—工业遗存相互融合、交相辉映的独特魅力。

三是打造西山永定河生态文化名片。推进国家森林城市创建，打造山水融城、绿树环绕、林园相嵌、水清林茂的宜居森林之城，凸显城市魅力。继续推进造林绿化工程，确保五年任务三年完成；通过保护修缮十八磴古石堤等水利设施遗址遗迹，研究并创造条件恢复永定河水系古

河道，同时进一步挖掘戾陵堰、车厢渠等古代水利遗址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探索镇水牛、刘娘府、柳林庄由来等永定河传说的非遗内涵，整理提炼永定河水利文化内涵，形成开放式永定河水文化展示长廊，深化河长制工作，推动永定河生态廊道修复；加大西山生态修复力度，提升天泰山植被覆盖和保护水平，完善绿色屏障，推进山区生态景观建设，打造多彩山地，充分彰显西山与永定河交会区的生态文化魅力。

四是八宝山红色文化名片。依托八宝山革命公墓红色文化，按照“红色旅游区+群众活动基地”的思路，创新革命传统教育活动形式，建设红色教育的实践课堂，展示新时期党员风采、推动地区发展的重要窗口，宣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缅怀革命英烈的教育基地。编写出版红色文化系列丛书，创作红色文化影视剧、戏剧等艺术作品。扩大《红色陵府——八宝山革命公墓》《红色的背影》等影视文学作品影响力，充分发挥北京市第一个区级“红色基因”主题百姓宣讲团作用，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五是打造创新创意文化名片。推进“文化+”战略，促进文化与设计创作、旅游休闲、体育运动、军事工业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和跨界发展。以长安街西延线为核心，发挥北京国际雕塑公园、郎园 PARK、京西商务中心、新首钢等重要节点的前沿引领作用，推动双创服务体系提质升级，做好“三城一区”科技创新成果承接，继续建设好北京国际雕塑公园、北京银行保险产业园区、众创空间，形成开放的创新创意人才生态圈和蓬勃向上的创业环境，建设京西科技创新新高地。

六是打造冬奥冰雪文化名片。加快北京冬奥会相关比赛及训练设施建设，高质量做好赛事服务保障。抓紧推进首钢滑雪大跳台建设，力争早竣工，保障北京冬奥会测试赛和正式比赛的顺利举办。推进老山冬奥项目训练基地、区体育中心改扩建项目进程，加快校园冰场建设。推进冬奥赛区周边区域城市景观提升工程，建设冬奥冰雪文化大道，推动驻地海绵城市和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打造冬奥特色城市服务和景观。促进冰雪文化普及，持续推动冰雪“四进”活动和冬奥社区创建，组织开展以冬奥为主题的特色活动，形成冬奥文化品牌，营造浓厚冬奥氛围，

建设奥运文化新高地。

3. 建设文化展览展示载体

规划主题博物馆群，完善冰川博物馆、五里坨民俗展览馆，推进首钢陈列博物馆、八宝山文化纪念馆、北辛安城市记忆博物馆、永定河历史博物馆以及加快北京保险博物馆建设。研究启动中国壁画博物馆、清宫造办处、老山汉墓博物馆等建设，打造承恩寺、模式口、五里坨、永定河等非遗传承基地。

（二）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坚持以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为导向，深入推进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文化设施、丰富文化产品、培育文化品牌、提升服务水平，构建均衡发展、供给丰富、服务高效、保障有力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1. 高标准建设公共文化服务设施

建设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推进陈列馆、展示馆以及各种小微文化设施建设。实施国家级“公共文化服务目录制”示范项目，推进“区—街道—社区”三级公共文化设施达标建设，实现公共文化设施标准化、均等化。通过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陈列馆、五里坨民俗陈列馆等，展现石景山区特色文化景观和文化内涵。建设石景山区博物馆、石景山区城市记忆馆等，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城市记忆情怀、红色文化爱国情怀、永定河生态文化情怀、工业文化发展情怀等有机融合。在模式口历史文化保护区引进漆器艺术馆、非遗老字号文化传承展示馆、历史文化遗产展示基地等，打造石景山区文化新标志。

着力打造以步行15分钟为公共文化服务半径，规划完善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建设，建设一批具有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地标性特色的文化设施；不断提升街道综合文化中心、社区文化室等的设施设备建设水平，鼓励设置区域综合文化中心、社区文化活动室等。支持兴办图书馆、美术馆、公共阅读空间，鼓励发展24小时书店、自助图书馆、深夜食堂等新型设施，充实完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

2. 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可以建立公共文化服务“按需制单、百姓点单”模式，提供多种形式的高品质文化服务。通过不断更新发布地区年度公共文化服务目录，采取“菜单式”“订单式”“点单式”等服务方式，将服务效能、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核心指标，推行街道社区公共文化设施社会化运营，加强地区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不断完善公共图书、文化活动、公益演出、公益电影配送体系，进一步扩大覆盖人群范围，优化参与人群的年龄结构，努力实现需求、供给和服务效能有效契合。加强文化工作队伍建设，街道配备3~4名文化专职人员，每个社区配备至少1名群众文化组织人员，形成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处处有覆盖、人人有服务”的规范化标准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工程，开发公共文化服务在线平台，建立区级数字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加快广场文化活动数字化终端、社区数字影院等数字化项目建设。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在线咨询查询、在线点播、在线培训等功能；启动建设覆盖全区的设施服务效能大数据采集分析系统，对运营设施开放时间、信息公示、场馆环境、服务项目、参与人群等情况进行常态化监测，为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精准供给提供科学依据。建立西山永定河历史文化遗产基因数据库，实现文化信息资源互联互通共享，提升文化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3. 打造群众性文化活动品牌

可以通过举办“西山永定河文化论坛”、西山文化节、西山永定河文化讲座等系列文化活动，出版一批反映京西特色文化的书籍，策划原创优秀剧目《晚霞》《首钢百年》展演，开展“西山知识竞赛”，推出更多反映西山永定河历史文化、冬奥及工业记忆、“老街坊”品牌的文艺作品。通过舞台剧、交响乐和原创文学、音乐、书法、绘画、摄影、动漫等艺术创作，展现石景山区西山永定河文化特色。通过搭建名家创作交流平台。策划举办文化名家系列活动，承办全国性、国际性的学术交流和作品展示活动，推介石景山区文化名家，吸引国内外文化名人来石景山区开展诸如“印象首钢”“大羽华裳”中国古典戏曲服饰展演、

首钢“实现·突围”等实景演出。围绕重大题材、重大活动，推进文化精品创作立项，建立名家重点文化作品项目库。

可以举办一系列文化活动，打响“北京冰雪体育庙会”“石景山游乐园春节庙会”“元宵灯会”“北京清明诗会”“西山八大处重阳游山会”等活动品牌，策划推出民俗文化知识竞赛、石景山名人作品朗诵大赛、爱国主义教育、游乐园嘉年华等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展现文化发展软实力，讲好“石景山故事”。

（三）打造山水融城的城市品质

提升生态环境品质和城市特色风貌，构筑望得见青山、看得见绿水、记得住乡愁的城市环境本底，打造山水融城的城市品质。

1. 恢复永定河生态系统

修复永定河生态功能，构建“一带、两轴、三湿地、六湖、七沟、八渠”健康水系格局，进一步织密蓝网系统。开展南水北调永定河生态补水工程，加快水源涵养林建设，加强幼龄林抚育管理，提高水源涵养能力。扩大永定河主河道水面，连通莲石湖、群鸣湖、人民渠、永引渠、黑石头沟等水系。综合开展河湖水系截污、清淤、水土保持和绿化建设、沿岸治理、生态修复，建设麻峪、南大荒湿地公园，形成功能景观并重的生态系统。突出新首钢大桥、冬奥广场等文化地标，打造景观优美的休闲场地。

实施永定河首钢段、高井沟流域生态修复，拆除河道范围内的基站、增大湿地水面面积；实施永定河左堤燕山水泥厂段加固，增强永定河防洪排水能力；推进中小河道治理和上游水质监测，加强黑石头沟、高井沟、麻峪等沿线污水收集和处理；推进沿线衙门口、1603 街区环境整治，构建城市低冲击开发模式，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推进潭峪沟、高井沟等中小河道治理，提升永定河水体水质。

2. 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和国际花园城市

持续推进“西绿东引”，规划建设健康步道网和城市绿道网，实现山区林地、滨河绿带、道路廊道、城市公园有机串联。到 2020 年，实

现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53%，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超过23平方米。全面推进“留白增绿”，利用拆违腾退空间，集中布局一批精品绿地和城市公园，完成社区公园11座、“口袋公园”15处，精品社区改造30处，首都绿化美化“花园式社区”5个，创建一批创意屋顶花园。保护天泰山、黑石头、潭峪景区等山体轮廓的景观形态，推进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法海寺森林公园、国际雕塑园、衙门口城市森林公园等建设，打造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和国际花园城市。建设串联山、水、城的绿道体系，建设登山步道、自行车道，形成串联香山、八大处、法海寺、天泰山、南马场水库、“狮子窝”的山地健身休闲观光旅游线路；建设永定河绿色廊道，形成以水串景、水绿相间的绿色生态走廊；依托莲石路、石景山路、阜石路等主次干道，完善沿线绿化带，建成功能综合的城市绿色廊道。

3. 构建精品城市风貌

加强永定河东西两岸，西山浅山地区以及古建筑群、重要文物建筑周边空间形态、景观视廊、公共空间、建筑高度、色彩和风貌等的全面控制和引导，塑造“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城市景观风貌。传承西山永定河文化底蕴，建设一批标志性建筑、主题广场、街边雕塑、社区点缀等人文景观，打造一批兼具西山永定河文化特色与国际风貌、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精品力作。在永定河、首钢工业遗址、模式口等区域中融入更多的文化元素，打造一批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景观。依托长安街、阜石路、莲石路等主干路网，构建城市文化廊道、视觉景观廊道，比如强化石景山游乐园、北京国际雕塑公园、万达广场等长安街沿线建筑的夜间景观建设。继续推进景观提升工作，创建一批精品小区、精品社区和精品街道。

4. 综合整治城市环境

开展棚户区改造工程，大力实施西井、西黄村等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着力推进衙门口、北辛安、五里坨建设区等区域的更新改造工作。重点推进长安街西延线和阜石路两侧等区域的整治提升，持续推进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治理开墙打洞、拆违还绿等工作，加大环境脏乱

差整治力度。实施西山—永定河沿岸高压线入地改造，恢复西山永定河生态和整体风貌。集中建设环卫综合场站，解决环卫车辆无处停靠以及周边环境脏乱差的状况。实施交通缓堵工程和疏堵改造项目，改善城市微循环。

（四）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配套基础设施，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提高文化可通达性。

1. 整体提升内外交通网络

修缮八大处、模式口、法海寺、慈善寺、文化中心等重要文化节点周边道路，改善文化旅游景区周边交通状况。加快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建设，继续推动 M11 线、R1 线等轨道交通设施建设，优化城市交通路网，打通断头路，实施北辛安路南段、高井规划一路、长安街西延线等重点工程，形成畅达的立体城市交通网络。

2. 改善市政基础设施

切实提升全区供水、电力、供热、供气、电信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地下综合管廊建设，重点推进石景山 220kV 变电站、刘娘府 110kV 变电站等电力设施建设工程。实施石景山水厂工程、五里坨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等工程，提高全区用水供应能力，解决日益增长的污水排放问题，为产业转型提供用水和净水保障，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3. 推动智慧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 5G 通信网络、WLAN 无线网络等公共网络建设，构建集约安全高效市政网络和公平普惠公共服务网络。提升智能信息网络、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搭建高速畅达的信息网。在重点旅游景区、大型文化体育场所以及交通枢纽等区域提供免费无线接入服务，为文化活动举办、旅游文化传播交流提供便捷的信息技术支持。

课题负责人：吕冀平

课题组成员：张 建

首都国企文化品牌建设研究

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生活越来越繁荣，文化对人们思想、行为的影响越来越深远。国有企业在发展初期，首先积累的是“硬实力”，在“硬实力”达到一定程度后，企业要想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就必须重视“软实力”建设。经过改革开放 40 余年的发展，国有企业改革步入了攻坚克难阶段，既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又面对国内外企业的竞争压力。现阶段，国企正逐步加快改革发展步伐，加强企业文化品牌建设就成了促进企业快速发展不可或缺的助推器。用统一的理念和行为方式塑造文化品牌，将内部文化外化为发展动力，是企业凝聚力量，发挥资源优势提升企业形象的有效途径。国有企业关乎国家经济命脉，首都国企关乎首都的稳定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首都国有企业文化品牌建设必须主动适应新常态，树立大局意识，挖掘发展潜力，聚集发展要素，培育发展动力，努力实现文化品牌带动国资国企持续健康发展。

本课题主要研究的是结合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从首都国企文化品牌建设的现实意义、发展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等方面，探寻首都国企开展文化品牌建设的主要方法。

一、文化品牌的内涵和现实意义

（一）文化品牌的内涵

品牌是用于和其他竞争者的产品或劳务相区分的名称、术语、象征

或者设计及其组合，产生价值的源泉是客户对于其载体的印象。品牌的文化即企业的文化，反映的是一个企业对自身定位及其独有的价值观，即企业的“个性”。文化品牌是指“窗口”单位在发展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文化内涵丰富、价值理念正确、服务方法创新、外部形象良好，并被行业和社会普遍认可的特色服务品牌。文化品牌一般具有完善的价值理念体系、完整的价值识别系统、较高的服务质量、鲜明的时代特征、很高的社会知名度和很好的社会满意度。具体到某个企业，文化品牌的内涵又有所不同。

（二）文化品牌建设的现实意义

文化品牌能够帮助企业员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能够引导员工了解企业发展方向，引领企业员工传承和发扬优秀的企业文化，主动适应社会和企业发展的需要，从而促进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首都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首都国企在维护首都稳定、促进首都发展中的作用至关重要，首都国企开展文化品牌建设，提振员工干事创业精气神，提升文化“软实力”和企业竞争力，推动首都经济社会发展也是历史的必然。

一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的需要。首都国企员工队伍主要呈现四个特征：一是对企业的忠诚与忧患并存；二是传统思想与新理念并存；三是讲求实惠原则与维权意识并存；四是队伍稳定与人才流失并存。要想最大限度地凝聚员工队伍，发挥员工主观能动性投身企业建设，更好地实现融合发展，就必须进行文化品牌建设工作。首都国企开展文化品牌建设的载体，其主要任务是结合国企实际需求，打造符合时代特点，在精神层面坚持党的领导，能够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特色文化思想为主线，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理论中的文化精髓，使其成为统一干部职工思想、凝聚员工智慧和力量的精神支柱，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二是促进国企提质发展的需要。做优做强做大国有资本，对我国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国有企业起着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加强国有企业文化品牌建设，有利于增强企业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首都国有企业在文化品牌建设中有其突出特点，即在文化品牌建设中，要始终贯穿企业使命和社会责任，对标首都发展规划和企业发展战略，在发展实践中，探寻文化品牌建设的有效途径，提升首都国企文化品牌的价值和竞争力，实现做优做强做大的国有企业的目标。

三是国企员工精神文化的需要。精神需求是人们更高层次的需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必须根据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精神文化进行再造。国有企业员工队伍庞大，年龄跨度大，工作区域和领域较分散，需要用企业文化作为精神保障，引领员工队伍正确执行企业战略。在文化建设中，将企业发展战略、管理思想融入企业文化，通过开展文化品牌培育和提升，让员工“认识”“认知”“认同”，才能实现从对企业文化的情感体验，到行为指引，再到行为自觉，完成企业文化的导入，丰富国企员工精神文化生活。

二、国有企业文化品牌建设的形势任务

作为国民经济的骨干力量和重要支柱，国有企业肩负着不可推卸的使命，决定了其必须承担起巨大的社会责任。新时代的国有企业，面临挑战与机遇并存的重要课题。在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首都国企面临着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通过打造、推广、提升文化品牌，有针对性、分层次和体系化建设文化品牌，形成人人关心文化品牌、人人重视文化品牌、人人参与文化品牌培育和宣传的良好氛围，才能充分发挥企业文化品牌的引领驱动作用，深耕文化品牌的社会价值，从而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地促进企业完成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一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目标为文化品牌建设指明了新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能为人民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必须不断加强文化建设。党的十九

大报告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这就为我们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基本思路与根本遵循。企业文化，就是企业内部形成统一的价值观、信念、处事方式等具有特色的文化形象，融入企业日常运行中的方方面面。企业文化是企业的“魂”，是企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文化品牌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在新时代肩负着新的使命和任务。站在新时代新起点上，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更好地履行社会职责，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品牌已经成为国企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是首都经济社会发展为文化品牌建设提供了新空间。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遵循，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首都国企主体作用，强化文化品牌意识，牢固树立文化品牌引领发展的理念，将文化品牌建设提升到战略高度，并融入生产、经营、管理的全过程，才能推动企业产品、市场、人才等资源优势向企业品牌竞争优势转化。作为首都国企中的一员，需要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提升文化品牌价值，提高文化品牌的影响力，打造代表北京质量、北京标准、北京服务的优质文化品牌，主动适应行业、首都发展需要。

三是国企发展战略的定位和布局为文化品牌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文化品牌的影响是深刻而持久的，是企业最重要的无形资产。首都国企在开展文化品牌建设中具有政策支持、人文环境需要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首都国企发展战略定位和布局，结合了行业特点、企业实际和发展需要，文化品牌建设要根据企业发展战略的定位和布局不断完善架构，调整处理好文化品牌体系内部协调发展的关系，同时要围绕文化品牌建设的关键环节，明确提升、创新、改革以及传播的主要路径，与企业发展规划同步实施。

三、国有企业文化品牌建设的主要做法和存在的问题

企业不仅是经济系统，也是由价值观、企业精神、企业愿景等要素组成的文化系统，企业文化代表企业所特有的、员工共同遵循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是企业文化品牌形象的内核，也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泉。文化品牌建设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和支撑，体现的是国有企业企业文化的价值理念，文化品牌建设对推动国有企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国有企业在文化品牌建设上，能够围绕中心工作，融入企业文化内涵，并且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整合资源，通过不断的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经过对集团内部三家二级企业文化品牌建设的研究发现，现阶段，国有企业在文化品牌建设的主要做法上有一些共同点，也普遍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主要做法

在对企业文化品牌的研究中，我们选取了首发集团内部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即京沈分公司、八达岭分公司、京开分公司。这三家企业是首发集团的分公司，在文化品牌建设上因企业的特点而独具特色。

一是争取政策扶持发挥企业优势。加强文化品牌建设，是加快企业市场化的需要，随着当前“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首都国企品牌建设的要求日益迫切，只有加快培育一流品牌，才能更好地参与合作和竞争。作为企业内在发展动力的源泉，国有企业在文化品牌建设上，多数能够充分利用、发挥政府的影响力、政策的扶持等来培育文化品牌。在对京沈分公司、八达岭分公司和京开分公司三家直接提供对外服务的窗口单位在文化品牌建设的研究中发现，在文化品牌建设的过程中，大多能够充分利用政府对服务百姓出行需求给予的支持，从客户角度出发建立文化品牌。如京沈分公司的“秋子服务”是在“北京服务”精神的引领下，以服务社会为出发点，针对首都高速公路“政治意义重大、社会关注度高”的特点，把“微笑是最好的礼

仪，快速是最好的服务”作为服务理念，树立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的高速公路收费团队形象。八达岭分公司为积极响应“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号召，贯彻落实《北京市“十三五”时期职工发展规划》《关于进一步促进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方案》等文件要求，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推进集团公司“百年首发”和“走出去”战略，进一步提升员工的创新意识和水平，立足于首都高速公路功能定位和收费运营工作实际，提升收费技能和服务水平，着眼于高速公路行业的未来发展，充分结合自身特点，打造了“田迎技师创新工作室”。

二是集团带动集群发展。京沈分公司、八达岭分公司和京开分公司都是以首发集团“适需服务，畅行高速”文化品牌为引领，开展子文化品牌建设。京沈分公司和八达岭分公司在文化品牌建设上重点强化服务的态度和技能，京开分公司更注重员工队伍“横排面”的整齐划一性，但三家企业的共同点都是以人为本，立足客户需求和企业发展的大前提下，开展普惠性的优质服务。在研究中，我们对集团公司所属的16家二级企业的文化品牌建设情况进行了调研，二级企业围绕集团文化品牌开展子文化品牌建设，在抓好中心工作、突出特色亮点的基础上，充分利用集团的影响力带动提升子企业文化品牌的影响力，已经形成了普遍的共识和趋势。京沈分公司的“秋子服务”，以全国劳模方秋子的名字命名，更注重员工个人为客户服务的态度和精神风貌，通过矗立在机场二高速这一“国门路”上的劳模服务岗和服务团队对外提供高速公路通行服务，在首都发展的变迁中接受洗礼和检阅。在品牌推广的过程中，经过了诞生、启动、推广、深化、拓展、提升六个发展阶段，在秋子的带动下，“秋子服务”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逐年提升。八达岭分公司的“田迎技师创新工作室”以“北京市劳动模范”田迎的名字命名，开展团队建设，工作室集业务技能交流、培训、实际操作、课题研究、现场演示等多方面功能于一身。团队成员100名，成员涉及收费业务、电工业务、厨师业务三个领域，每个领域设置一名业务带头人。工作室侧重提高高速公路收费员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无论是日常技改、专项研究，还是全面带动，工作室俨然已经成为促进企业创

新发展的“发动机”。

三是突出重点塑造领军形象。在推动企业发展战略中，典型人物、典型事件的带动作用毋庸置疑的。京沈分公司、八达岭分公司在文化品牌建设中，充分利用了这一点，突出劳模的带动作用，强化服务技能，以点带面树立品牌形象。随着方秋子作为全国劳模和十九大党代表的影响力逐渐扩大，“秋子服务”在交通行业、首都窗口服务行业，乃至全国窗口服务行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田迎技师创新工作室”成立以来，大力弘扬新时代工匠精神，制定了“五个打造”工作目标，即：打造一个田迎技师创新示范所；打造一条田迎技师创新示范路；打造一支全业务百人技师团队；打造一套高速公路业务技能评定标准；打造一个京津冀乃至全国交通行业集创新、交流、培训、认证于一体的综合平台。也是结合文化品牌建设和发展的趋势，树立了宏远目标。京开分公司“红窗口”作为后起之秀，在推广品牌中实现了跨步前进，直接向现场服务窗口铺开，以突出的窗口形象、感人的品牌内涵强化品牌印记，在品牌的对外宣传上也走在了其他企业前列。京开分公司以首发集团“适需服务，畅行高速”文化品牌为指引，继承分公司文化理念沿革，打造子文化品牌，并与现场服务相结合，使品牌文化建设带动运营服务提升，推进企业健康发展，在高速公路运营系统内形成一定示范效应。“红窗口”是一种精神理念，脱胎于岗亭的窗口，传承北京红色文化底蕴，通过窗口服务让优质服务成为连接过往客户的桥梁和纽带，体现国企的社会责任担当。将“心手传递 微笑同行”作为服务口号，融于日常运营管理中，在瞬间服务中让优质的服务从心出发，让服务触手可及。“红窗口”文化品牌建立了完备的理念识别（MI）、视觉识别（VI）和行为识别（BI）系统，注重强调内外转化、内外联动作用，在提高企业知名度和强化竞争力中形成了强劲的文化力。综合三家企业的文化品牌建设经验不难看出，突出行业地位、企业特色、服务亮点是开展文化品牌建设的着眼点，充分利用内部资源塑造行业领军形象，从而促进企业发展是文化品牌建设的追求和目标。

（二）存在的问题

首都国企在文化品牌建设中不断摸索，一些企业已经形成了一批具有典型特色的文化品牌，但整体看来，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认知程度不统一。在文化品牌建设过程中，企业高度重视文化品牌的宣贯，花大力气开展文化品牌建设，结果却是写在纸上、贴在墙上，没有实现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实践相融合，没有深入到员工思想和行为之中，对企业发展的助推作用也没有发挥出来。究其原因主要是与企业员工的互动不足，易造成员工文化品牌意识相对薄弱，对企业文化品牌建设的真正目的和意义含糊不清，不甚理解，被动接受的较多，吸收消化的部分很少，转化为行动自觉的能力尚需进一步提高。

二是文化品牌定位不清晰。开展企业文化品牌建设，始终要坚持“问题导向”的原则，顺应外部环境变化，针对企业发展遇到的瓶颈和出现的管理上的难题，用文化进行疏通、化解。目前，大多数国有企业的文化品牌内涵流于形式化与趋同化，似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缺乏企业的“个性”特点。此外，文化品牌定位关系到员工个人的行为习惯和企业发展稳定的大局，过于强调服务方向或者服务对象的地位，就会造成员工在企业中的自我盲从，个人价值定位较低，得不到员工的高度认可，给企业发展带来不稳定因素。文化品牌建设在个人价值取向、员工与企业整体发展方面缺乏系统性、科学性和协调性，制度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

三是品牌吸引力不突出。文化品牌建设需要员工上下联动，发挥企业领导者在文化品牌建设中的主导作用是一方面，调动广大员工参与文化品牌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企业领导者和广大员工都参与到文化品牌建设的过程中来，在过程中引导、在过程中凝练，才能形成上下共同认可的价值理念。通过开展文化活动进行文化品牌的宣贯是企业文化品牌建设中较为常用的方式之一。员工普遍参与的积极性和实际参与度不高，甚至不了解、不关注、不积极参与，就会造成企业领导层或者管理层唱“独角戏”的局面。文化品牌建设团队对内增强文

化品牌推广的吸引力，外化为文化品牌的社会影响力的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

四是过于追求形式创新。推动文化品牌建设需要创新，创新才能发展，创新才能注入新的活力，但创新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企业发展。新的宣传推广方式方法的大量引入，推广的受众接受程度如何，转化情况如何，光有“吸睛”的开始，没有漂亮的收尾普遍存在，对宣传推广的效果更是无从考量和评价，造成了文化品牌推广效果不甚理想的现象。用好创新的技术和手段，精准对接文化品牌和企业发展的需要，才能用真心讲好企业的故事。

四、对国有企业文化品牌建设的思考

首都国企在新时代，立足改革发展和推进融合发展的现实情况，以十九大精神为引领，结合文化品牌建设现状，针对文化品牌建设存在的问题，在文化品牌定位、体制机制建设、挖掘优势资源、创新驱动等方面，更好地打造文化品牌、发挥文化品牌作用的一些启示。

一是找准文化品牌定位。首都国企要对标新时代对文化品牌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对标首都发展规划，对标企业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首先要“量身打造”，即根据行业特点和自身发展实际需要，科学确立文化品牌定位，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其次要“精品制造”，即要结合企业发展总体规划、内外部资源、企业文化传承等因素，制定或完善适合本单位、具有独创性和吸引力的文化品牌战略，并与企业发展战略同步实施、系统推进；最后要“精细打磨”，即要结合企业使命和定位，在文化品牌名称、标识、形象、核心价值观等方面精雕细琢。

二是完善体制机制建设。首都国企在改革发展的进程中，要结合企业实际，科学制订文化品牌建设规划；要围绕文化品牌定位完善文化品牌建设的体系架构，正确处理好母文化品牌与子文化品牌、文化品牌与商标品牌、并购文化品牌与原有文化品牌的关系；要针对文化品牌建设的关键环节，明确文化品牌培育、提升、再造、创新、保护及传播的路径；要建立更具人文特点的文化品牌战略升级机制，根据外部环境、企

业经营状况的变化，定期对文化品牌战略进行评估，适时调整更新文化品牌内涵、形象和发展策略，提升文化品牌战略的前瞻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要进一步完善文化品牌建设激励约束机制，促进文化品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制”，才能真正提升文化品牌发展的凝聚力。

三是注重系统性建设。文化品牌植根企业，是企业发展的内部生态系统的外在展现形式。首先要在打造企业人文环境上下功夫。文化品牌建设要与企业内部的业务板块、业务流程紧密结合，与企业人文环境相融合。要在做好文化品牌宣传推广的基础上，强化文化品牌在企业内部的引领作用，引导企业内部形成以人为本、团结奋进、信誉至上的统一的价值理念。其次要在持之以恒、推陈出新上下功夫。企业在文化品牌建设中要给予持续关注、持续支持，按照文化品牌建设规划推进文化品牌建设各项工作开展，并结合企业不同时期发展目标进行不断完善，与时俱进地充实文化品牌内涵。最后要在打造精品、强化文化品牌影响力上下功夫。文化品牌建设不能仅仅停留在“有”上，还要在“精”上做文章，重视建设精品文化品牌对于提升企业社会影响力的重要作用。

四是挖掘企业内部优势。文化品牌建设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要讲究科学性，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而异，充分发掘和利用企业内部优势资源。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将企业资源优势与员工精神文化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利用不同的文化资源打造标志性的文化品牌，广大员工积极参与到企业文化品牌建设中来，才能够充分发挥文化品牌的影响力。员工是企业文化品牌建设的主体，随着文化活动流行趋势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文化品牌建设的内容和形式也要不断更新，让文化品牌建设活动更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员工内心，才能为文化品牌建设持续不断地注入新的元素和活力，才能使文化品牌带动企业经济效益、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五是加强文化品牌宣传。深入推广文化品牌，培育文化品牌忠诚度，让更多的客户成为国企的“铁杆粉丝”，就要深入思考社会公众和内部员工需求，细化文化品牌宣传推广措施，规范文化品牌宣传推广行为；实施重点子文化品牌宣传推广工程，强化典型示范引领效应；要建

立健全信息资源共享机制，为挖掘文化品牌、培育文化品牌、推广文化品牌提供广阔的空间和平台；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思维，建设社会化、网络化、专业化、多功能的一站式服务平台；要建立文化品牌数据库管理模式，实现对文化品牌多层次、多维度的宣传推广；要建立子文化品牌准入及退出机制，加大对子文化品牌的监管力度。

六是充分调动员工参与。员工是企业的主体，只有充分调动、发挥这一主体的作用，才能真正发挥文化品牌的作用。一方面要加强文化品牌人才队伍的建设。通过拓宽人才引进渠道、引进和培养结合的方式，多措并举加强文化品牌建设专业人才的团队管理，培养一批精通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的复合型人才队伍；要针对文化品牌建设薄弱环节和企业实际，积极开展经常性的内部文化品牌建设的学习和培训，培养文化品牌专业人才，不断提高文化品牌建设能力。另一方面增强文化品牌建设活动的吸引力。培育员工对企业文化品牌的信仰，通过开展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文化品牌建设活动，提升员工参与企业文化品牌建设的热情和积极性。

七是加强引领创新驱动。创新能力决定了文化品牌的竞争力。首都国企要主动适应市场和消费升级的需求，积极应用新的信息技术和传播手段，强化互联网思维，运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精准对接客户需求，增强客户对文化品牌的黏性，提升市场需求响应能力。同时，要加强母文化品牌的引领，建立子文化品牌培育机制，推动文化品牌协同发展，扩大文化品牌影响力，加快企业整体品牌发展速度。要继续加大“引进来”的力度，学习借鉴世界先进品牌推广方式方法，提升首都国企文化品牌整体管理水平，提升文化品牌竞争力，保障文化品牌旺盛的生命力。

课题负责人：王 可

课题组成员：关 华 郝文丽 刘 静

划定医院“岗位红线”，强化党风廉政建设

首都儿科研究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到一个全新的战略高度。公立医院作为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医院党风廉政建设事关医院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与患者改革获得感和满意度提升息息相关；同时新形势下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的新的要求和卫生医疗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都对医院党风廉政建设提出了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和更多挑战。

本课题通过梳理总结医院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的实践探索，分析总结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在实践中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结合调研和成果转化，在党员干部职工中进一步加强医院党员干部职工的廉政意识和“岗位红线”意识，做到明“底线”、筑“防线”、远“红线”，不断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促进了医院健康稳定发展。

本课题组在本医院范围内围绕行业风险点和岗位职责，面向68个一级科室、27个党（总）支部进行广泛调研，通过填写问卷、专题座谈、调查走访等方式，汇总梳理并划定“岗位红线”，围绕调研中发现的党员职工理论认识不高、规矩底线不明、管理路径不清、责任落实不力的情况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总结，提炼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难点和堵点，明确风险等级，以主责科室为单位，提出防控措施，健全医院相关制度，完善医院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机制，深化医院党风廉政建设取得新进展和新成效。

一、医院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的实践探索

(一) 突出党委主体，加强统筹引领，保证重点覆盖

1. 做好顶层设计管理，强化“一岗双责”

做好管党治党的顶层设计，切实履行好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分层级明确主体责任，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全面开展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全程纪实工作，保证科室百分百覆盖。领导带头做表率，党委主要负责人履行管党治党第一责任人职责，切实坚持“四个亲自”，党委班子成员履行职责范围内的管党治党责任，对分管科室通过谈心谈话、抓早抓小、巡查约谈等方式开展日常监督管理。加强对纪检监察工作的领导和支持，党委会定期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配齐配强专职纪检干部，提供独立办公条件，每季度培训支部纪检委员，保证纪检干部顺畅履职。

2. 做实思想政治教育，强化政治引领

医院分层级建立经常性的政治理论学习和廉政纪律教育机制。每月大课学习、每周重点学习、每季度交流研讨。每月制订廉政学习计划，发到每个党支部和科室，强化各级人员的理论武装，让廉政教育成为领导班子、支部及科室的日常工作；开展专题集中学习，干部党员轮训。近两年组织四批近400名党员赴红旗渠干部学院开展党员党性教育，重在提高广大党员艰苦奋斗的奉献意识和大公无私的廉洁意识，让广大党员形成先锋表率；开展正反典型教育，开设勤廉之苑专栏，坚持全院职工拒收“红包”登记并在院务会及首儿所官网公布，同时通过院务会、党支部会及科室例会等形式学习反面案例，正向引导，以案明纪，让党员干部学有榜样、行有示范。

3. 严管党员干部队伍，强化廉政要求

每年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科室主任、党支部书记述职述廉；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组织领导民主生活会和支部组织生活会；实行重点岗位人员定期轮岗，严把党员干部廉洁关，将党风廉政建设作为干部使

用的“硬标准”。在中层干部重新聘任过程中，全部征求纪检监察部门意见，对有问题的干部一律不予任用，坚持“凡提四必”，杜绝“带病”使用，实行任前廉政谈话，在党员发展过程中，同样要征求纪检监察部门意见，对存在问题的党员不予发展，保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和先进性。

（二）强化制度约束，推进作风建设，明确纪律规矩

1. 健全制度规范，强化行为约束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作风建设为切入点从严治党管党，强调守住党的纪律这条底线，首儿所党委从制度规范、制度落实上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制定《关于持续改进领导人员及中层干部作风的指导意见》，从工作、生活、学习及政治要求等方面做了严格规定；制定了《关于对党员干部进行函询、诫勉的实施细则》，为运用“四种形态”开展监督执纪提供了良好依据，对党员干部形成了良好的纪律约束；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中层及以上干部请假报备工作，按照上级文件要求，对请假程序、要求、工作机制进行了重新明确，严肃组织纪律，加强管理监督，进一步加强中层及以上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

2. 坚持多措并举，严防作风反弹

紧盯重要节点，对重点科室和岗位进行重点巡查，严防“四风”问题。在官网公布举报电话和邮箱，通过院务会、党支部书记例会、行政交班会等会议传达上级关于各个节日期间严明纪律要求、加强监督检查的工作要求及中央纪委公开曝光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等。每个重要节点前组织开展两个层面关于“四风”问题监督检查，一方面由党支部纪检委员自查党支部所属各科室，另一方面是重点处室层面，由纪委委员现场检查，紧盯“四风”老问题，防范“四风”新变化；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约谈函询，做好信访工作，党政领导亲自管，限定期限不拖延，加强“三公管理”，做到关口前移。

3. 深化行风治理，弘扬清风正气

不断完善行风建设管理体系，健全医疗质量与安全管理制度，规范

医疗服务行为，加大行风建设“九不准”的宣教，通过医德医风巡查、医德医风考评等多种途径进行督导检查；健全医疗设备、药品、耗材的采购管理，加强重点领域、关键岗位的管理，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规范外转病人、医师外出会诊及多点执业的管理；实行医用耗材使用动态监测，对使用异常的执行停用等措施；对药品用量实行动态监测及超常使用预警报告；开展处方审核前置和处方点评工作，严格管理不合格处方，保证安全合理用药；组织开展“杜绝以个人、科室名义或个人、科室以医院名义违规开展对外医疗合作的自查清理”等专项活动，对发现的问题积极进行整改。

（三）深化标本兼治，强化监督落实，保持高压态势

1. 运用“四种形态”，发挥震慑作用

加大谈话函询力度，坚持抓早抓小、预防在先，真正体现党组织的严格管理和关心爱护；强化日常监督，对出库金额排名前十的药品使用量及使用该药品前十名的科室、个人在院务公开栏进行公示。加强药品动态监测结果反馈整改，整改措施包括对相关医药公司进行谈话、签署廉洁购销承诺书、限量使用、下架三个月等多种方式，确保整改及时有效，保证合理用药与用药安全。

2. 坚持以案治本，及时反思改进

坚持有案必查，严格执行案件办理流程处置问题线索，认真做好移交问题线索的处置工作。通过查办案件，分析发生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查找体制机制方面的不足，及时下发纪检监察工作建议书；面对医院出现违规违纪问题，严格监督整改，开展深刻反思，推动以案治本，以案为鉴、以案促改，扎实推进查办案件中发现的体制机制问题和制度漏洞整改工作，在深化标本兼治上持续发力。

3. 开展专项治理，对待问题零容忍

持续开展“知边界、守规矩、抓落实”“严肃查处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为官不为、为官乱为”问题，收受红包回扣、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问题等专项治理工作，在首儿所官网首页向职工和社会公

布专项工作举报电话及邮箱，加强线索收集，进行全面自查自纠、整改落实，消除短板和隐患。

二、医改背景下医院党风廉政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在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上存在认识不足

1. 个别干部党员职工政治站位、廉政意识不足

在调研中发现，很多党员干部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纪律规矩观念不强，日常边界意识不清，认为党风廉政与自己关系不大，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治病救人，没权没钱也没有贪腐的机会，“号贩子”“药贩子”应该是派出所等相关机构的工作，“红包”“回扣”是行业老现象，法不责众，清者自清，影响不大。在思想上不适应新时代对医院党风廉政建设的新要求，不适应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的的要求，需要进一步强化廉政教育，坚守初心和使命，以病人为中心，在思想上、行动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2. 在工作方式方法上不够创新，存在“比照”“参照”等思想

医院工学矛盾突出，宣传教育方式停留在“老三样”上，还是以书报学习、会议传达等形式为主，工作方式方法不够与时俱进，缺乏创新，对新情况、新问题认识不足，应对措施不及时不到位，履行职责履行不实，导致在实践工作中不同程度出现一些问题，过去能做的现在不能做了，过去没问题的现在有问题了，处理新问题还是惯性思维和传统方式。在医改背景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亟待解放思想，改革创新，要在思想认识上、制度建设上、监督落实上层层发力，以新情况、新问题为导向，探索创新工作方式方法。

（二）在服务大局、保障监督上效果不够明显

1.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和业务工作存在“两张皮”的现象

首儿所附属儿童医院承担着北京地区和外省市患儿医疗诊治工作，年门、急诊量和住院患者逐年增加，医院长期处于饱和状态，医务人员

超负荷工作，工学矛盾突出，导致在一部分干部职工身上存在“重业务”“轻党建”的现象，在工作落实上存在一会儿松一会儿紧、有的松有的紧的不平衡状态，廉政建设和业务工作开展不够紧密，与岗位脱节，作用发挥不明显。

2.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在服务保障医改成果上有差距

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是医院义不容辞的责任，新的医改政策给患者带来更多便利和福利，让更多老百姓看得起病、挂得上号，享受到更优质、更精准的医疗服务，但“红包”“药贩子”“号贩子”等顽疾还依然存在，个别医生将病人转到自己多点执业的单位、院外检查和采购药品等现象时有发生，侵蚀医改红利，影响患者改革获得感，影响医院的形象，影响着党和国家的形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与群众的需求还有差距，在服务保障、工作效果上还有很大改进空间。

（三）在风险防控、制度建设上存在薄弱环节

1. 在深入基层、过程管理上还有“死角”现象

党风廉政建设向基层延伸方面在广度和深度上还有待提升，“教育前置、过程监控、实时监控”还没有全覆盖，标本兼治、惩防体系建设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还有存在腐败的漏洞，还存在“死角”和盲区。

2. 在防治体系、监督落实上还不尽规范完善

讲话、函询等抓早抓小的警示手段应用还不够广泛，警示震慑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落实主体责任和“一岗双责”认识还没有到位，监督和制约机制还不够健全，措施不够得力，还需要进一步做实做细。

（四）在规矩底线、管理路径上存在模糊问题

1. 规矩底线不清在党员干部中不同程度存在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下，我们党直面挑战和问题，不断完善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体系，先后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制度性文件，对我们更好地贯彻落实具有指导意义。医院党员干部群众通

过学习教育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有了参照标准，但在具体贯彻落实上，还存在规矩底线不清、不能很好地对标对准的问题，在推动制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方面还要下功夫。

2. 管理路径不明影响反腐倡廉工作的效果

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广大党员干部党风廉政重要性的认识有了，规矩红线意识有了，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也基本清楚了，但在“应该怎么做”上还有模糊认识。还需要领导班子和相关职能部门结合工作实际，进一步细化权力业务运行流程，让管理流程更加简洁明了、公开透明，让职工熟悉了解每个关键岗位工作流程图，知道“应该怎么做”，教育引领广大干部职工在规矩面前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自觉把遵规守矩贯穿于日常工作生活各个方面。

三、医院“岗位红线”的研究确立及推进实施

（一）广泛深入调研，全面摸底梳理

面对新时代新要求、新情况新问题，围绕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实践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围绕医疗乱象行业风险点等痛点堵点问题，医院成立了党委书记、纪委书记挂帅，党委办公室、纪检监察办公室、医务处为主导的调研课题组，面向医院全体科室和党支部，通过填写问卷、专题座谈、调查走访等方式，进行广泛调研摸排，深入查找存在问题，区分不同层级、不同岗位的问题，突出自查自纠侧重点，尤其对关键环节和重点岗位的深入调查和分析。涉及27个党（总）支部和68个一级科室，包括科研、临床、医技和职能处室，广泛征求党员职工对党风廉政建设的意见建议，为岗位红线划定奠定基础。

（二）依据岗位职责，划定岗位红线

结合全院调研梳理上来的问题，调研课题组以岗位职责和内控风险点为基准，以廉洁从业风险防范为导向，依据党规党纪、法律法规、医院管理规章制度、内控风险防范要点等方面，共梳理医疗领域、采购领

域、骗取医保、收受红包、倒卖号源、基建项目、药品使用、科研领域、财务领域、党务领域等行风领域风险点 100 余条，从中进行归纳提炼，有针对性地进行分类划线，最终就医疗岗位、采购岗位、科研岗位、工程建设管理岗位、行政管理岗位、工会岗位、全体职工等职工岗位，梳理岗位红线 30 余条。

（三）明确责任主体，提出防控措施

调研课题组将收集汇总的各类“风险点”和“岗位红线”重新发回到各科室和各党（总）支部，依据岗位职责，明确责任主体，分别提出防控措施，对重点问题提出建议解决方案，为党委、纪委决策提供依据。如针对骗取医保、红包回扣等重点问题，责任部门提出了建立阳光采购、规范临床诊疗行为等措施，纪委专门制定了《关于对收受红包回扣、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问题治理情况开展专项监督工作方案》，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建立问题线索移交机制，确保问题得到有效控制和解决。通过分类管理，明确责任部门和具体举措，医院建立起了务实有效的党风廉政风险管控体系。

（四）强化红线意识，形成长效机制

将岗位红线方案报党委会、纪委会审定通过，以正式文件在医院发文公布，并且以口袋书的形式为每位职工发放《廉洁从业工作手册》，并通过院务会、支部“三会一课”、医院 OA 等多种形式和渠道向党员干部职工进行宣贯，使职工形成强烈的纪律意识与底线思维，督促医务人员强化自律，引导患者遵守秩序，切实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形成“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成效工作机制。

四、加强医院党风廉政建设的思考与建议

（一）抓住根本——坚持教育先行，实行关口前移

一要牢牢牵住政治建设的“牛鼻子”。“四风”问题、违纪违法问

题，从根子上说都是政治问题，这与部分党员干部政治根基不牢密切相关，因此要抓好党风廉政建设，首先要抓好政治建设，这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要注重引导党员干部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切实弄清规矩边界，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切实增强防腐拒变的能力；要明确党委的主体责任，党委主要负责人的第一责任人职责及班子成员的“一岗双责”，坚持领导带着中层干部做，中层做给党员职工看，不断提升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四个意识”，建立拒腐防变的思想屏障。

二要让覆盖全员的思想教育成为日常常态。思想决定行动，紧紧抓好日常思想建设是保持强有力的政治引领作用的前提。警示教育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手段，也是为党员干部“治未病”的有效方法，通过正反两面的警示教育让广大干部职工看到先进典型的引领，同时认识到违反党纪国法的危害，摆正“权力观”“利益观”。健全从上至下的学习体系，让思想政治教育深入到每一名职工、每一个岗位。从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到党支部的“三会一课”，再到各科室的廉政教育，形成相对固定的学习机制，让廉政教育成为支部及科室的日常工作，扫除思想政治教育、廉政教育盲点盲区，保证全体职工人人受教育、个个知敬畏，明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让防腐倡廉扎根在党员干部心里。

三要紧紧抓住干部队伍这个“关键少数”。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领导干部、中层干部是医院发展建设的骨干力量，是中流砥柱，对他们理应有更严格的要求。要通过民主生活会、述职评议等形式，对中层以上干部的个人思想建设、履行岗位职责、部门工作、廉洁自律及履行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一岗双责”等情况进行检验；通过“红红脸”“出出汗”“洗洗澡”“治治病”，统一思想、凝聚共识、锤炼队伍；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建立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选用“德才兼备”的干部，把“严管就是厚爱”思想融入到对党员干部管理教育监督全过程。

（二）强化保障——坚持制度规范，深化行风治理

一要健全制度加强刚性约束。全面从严治党要注重制度治党，健全

的制度是管党治党的有力依据。制度的权威在于落实，医院要在制度完善规范和落实过程督导上下功夫，保证健全制度与落实制度齐发力，真正让铁规发力、禁令生威，对党员干部形成良好的纪律约束。要在干部党员管理、干部人才选拔任用、人事晋升聘用、先进考核评优等方面，利用科技信息化手段规范医院管理和党员干部行为，加强制度规范和科学管理，加大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不断消除滋生腐败的工作漏洞和土壤，扎紧制度的笼子，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二要抓牢重点严防作风反弹。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要紧盯重点部门、重要时间，利用重点专项工作，形成工作抓手，促进作风转变。要定期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及反腐败工作巡查，对重点处室、重要领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落实情况开展巡查，查找问题，提出工作建议。要紧盯重要时间节点，在元旦、春节、清明、“五一”、端午、中秋、国庆等重要节点，畅通举报渠道，开展督查巡查。往深里抓，往实里做，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锲而不舍纠正“四风”。

三要深化行风治理注重重建并举。良好的医德医风是树立公立医院在人民群众心目中良好形象的基本保证，也是保证人民群众获得良好就医体验的基本要求。因此，行风建设是面向社会展示医院风貌的窗口工程、民心工程，是医院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一环，也是医院党风廉政建设好坏的晴雨表。要通过不断完善行风建设管理体系，不断完善医疗质量与安全管理相关制度，不断健全医疗设备、药品、耗材的采购管理，加大行风建设“九不准”的宣教等，多种途径提升行风建设工作水平，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和氛围。

（三）抓住关键——坚持监督管理，加强队伍建设

一要注重源头治理，坚持预防在先。党风廉政建设的目的是让党员干部不犯错、少犯错、不因小错铸成大错。因此，充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警示干部、教育干部就变得尤为重要，要突出抓早抓小抓苗头，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加大谈话函询力度，重点在运用第一种形态上下功夫，坚持预防在先、防微杜渐，注重源头治理，加强日常

监督和专项治理，切实把腐败遏制在萌芽状态。认真落实党内监督条例，扩大群众监督渠道，不断完善监督体系建设，坚持权力在监督下运行，杜绝腐败发生。

二要保持高压态势，坚持重拳治腐。要深化标本兼治，支持纪委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力度，规范按照线索管理和办理程序，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纪案件，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充分保障，做到有案必查、执纪必严，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坚决快查快办，切实起到震慑和警示作用，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重视发挥案件治本功能，进一步规范信访举报问题线索核查办理程序，对信访举报问题，要坚持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结果，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以案示警，让党员干部职工吸取教训，引以为戒。

三要完善班子建设，坚持配优配强。强化主体责任和“一岗双责”落实，突出党委带头，抓好干部示范引领，明确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各党支部、各处室的目标责任，厘清明确工作职责，突出考评结合，坚持重点任务集中查，日常工作常督查，推动责任下沉。建设强有力的纪检队伍，是强化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保障，在纪检队伍建设上要形成专职于兼职相结合的队伍体系，充分发挥党支部纪检委员作用，形成全覆盖、上下联动的纪检工作队伍，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和支撑。

（四）突出创新——坚持与时俱进，深化主体责任

一要不断建立健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机制。坚持把党风廉政建设纳入中心工作和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组织领导，党政主要领导要落实第一责任人职责，加强班子成员落实“一岗双责”意识，注重将业务工作与党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检查，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工作格局；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将管党治党责任向党支部和科室延伸，创新开展廉洁党支部建设，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求支部书记或委员进入所辖科室核心组，参与科室管理、“三重一大”事项决策；深入推进党务、院务公开，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事项要通过党代会、职代会征求意见或通报，

推进医院民主建设和监督管理。

二要突出医院特点，增强管党治党针对性。医院作为一个特殊的服务型机构，肩负着满足人民群众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重任，业务工作涵盖医、教、研、防各个方面，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关于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都对医院“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具体要求。医院要突出公益性特色，以贯彻落实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改善医疗服务为主线，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将党建工作和医院中心工作结合起来，把党风廉政建设贯穿落实到每项医疗活动的各个环节，确立起完善的、高效的医院廉政机制，着力推进医院政治生态建设迈上新台阶，有力推动医院事业发展呈现新作为。

三要坚持问题导向，坚守“岗位红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抓党的建设表现出强烈的担当意识和问题导向，全面从严治党，强调要解决党自身建设碰到的重大现实问题，要猛药祛疴、重典治乱。医院党风廉政建设面临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要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为主线，针对存在的问题、风险隐患进行分析研判，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防范和整改措施。瞄准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坚守“岗位红线”，做好风险控制前置，强化实时督导，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廉政风险。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聚焦突出问题和新型违规违纪行为，举一反三、以案明纪，引导党员干部职工明晰边界、守住底线，切实让“岗位红线”成为警戒线和安全阀。

课题负责人：刘中勋

课题组成员：杨健 冯玉香 王爱华

王菲 韩林 卞大卫

关于加强机构改革进程中基层党组织 规范化建设研究

北京市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应有之举，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重大政治任务，对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市场监管机构的改革，是这场复杂变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搞好这项改革，可以整合监管资源，更新监管理念，创新监管方式，加强市场综合监管，提高监管效能，必将对我国市场监管格局的重塑和市场体系的构建带来深远影响。但这项改革，毕竟涉及人员、权力等的调整，本质上是利益关系的调整，以机制体制的调整和建立完善为直接表象，必然存在阻力。这对党的领导力和执政能力都是直接而现实的考验。特别是在机构改革进程中，如何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党的十九大精神，强化“四个意识”，切实发挥党组织作用，全面推进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全面推进基层党组织党的政治、思想、组织、制度、纪律作风及文化建设，做到思想不乱、工作不断、队伍不散、干劲不减，努力打造一支“心中有责、眼里有活、执行有力”的党员队伍，是摆在我们各级党组织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围绕机构改革对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的新挑战和新要求，结合房山区市场监管局在机构改革进程中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的探索与实践，分析了加强机构改革进程中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的功能与作用，提出了几点规律性

启示，为机构改革进程中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提供参考借鉴。

一、深刻认识机构改革对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的新挑战和新要求

党章规定，基层党组织包括党的基层委员会、总支和支部。特别是党的支部，是党的基础组织，担负着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如何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发挥其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确保机构改革顺利推进，是摆在基层党组织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

就房山区市场监管局而言，这次机构改革涉及原工商、原质监、原食药、发改委、科委等单位，共670余人。其中党员430余人，占比64%；包含行政、事业、纳规、劳务派遣、合同工、退役士兵等多种身份；涉及本区市场综合监督管理、市场主体统一登记注册、组织和指导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工作、反垄断统一执法、监督管理市场秩序、宏观质量管理、统一管理本区计量、标准化、检验检测、食品安全、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特种设备安全、药品安全、医疗器械安全、化妆品安全监管等多项职能。机构和职能整合后，新成立29个基层支部，人员几乎全部“换血”，这就必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直接带来思想波动和人际关系的变化，甚至存在不同层次不同内容和不同表现形式的文化的碰撞，这就给基层党组织的规范化建设提出如下新挑战、新要求。

（一）新挑战

一是精神状态的挑战。如上所述，这次改革涉及单位多、人员广、影响深，部分干部职工因为进退留转产生思想波动：有的不知道改革后自己会何去何从，会从事什么工作，遇到什么样的领导和同事，有些迷茫甚至情绪低落，听天由命；有的面对新岗位新业务新要求，遭遇本领恐慌，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有的出现学习焦虑，对于新的法律法规不知从何学起，工作不知从何抓

起，畏首畏尾不知所措；有的出现工作方向和目标缺失、工作热情不够、动力不足，不推不动。这种情况下，如果基层党组织不够坚强有力，这种现象会在干部队伍中扩散，势必影响工作干劲和责任担当。

二是作风纪律的挑战。这次机构改革涉及职责重新界定、机构调整撤并、人员精简分流、干部职位岗位变动、资产划转处置等问题，头绪多、时间紧、任务重，每个部门、每个人都面临着部门利益、个人利益能否服从全局利益的考验，都面临着能否依法行政，能否按政策办事，能否模范遵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机构编制纪律、干部人事纪律、财经纪律、保密纪律等机构改革纪律的考验，是一个繁杂的系统工程。如果基层党组织不够规范严格，势必影响队伍作风建设，甚至触碰党纪国法的底线和红线，不利于机构改革顺利推进。

三是工作统筹的挑战。即职能发挥和党建工作的统筹。人员整合，需要考虑基层单位构成、人员数量、党员比例、效能发挥等因素，会出现职能相关的科室成立联合支部、地理位置相近的科所成立联合支部的情况。这就要求党组织整合必须保证机构改革目标顺利完成，在单位人员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开展。从党务工作专业化角度看，党组织成立过程严谨，程序复杂，周期较长。机构整合开始后，行政单位被取消重建，涉及大量人员调整，原有支部党员被大量分散，党员难集中、活动难开展的问题逐渐凸显，组织生活制度落实容易打折扣。这些现实情况势必导致机构整合与党组织整合不同步，有可能存在党、政空档期，统筹行政工作和党建工作面临挑战。

四是组织管理的挑战。新成立的党组织，工作任务新，人员构成新，在扎实开展“三会一课”、严格落实党内政治生活，以党建工作统领助推中心工作等方面，需要不断探索与实践。市场监管机构改革推动市场监管步入“大市场、大监管、大服务”时代，对执法效能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机构改革初期各部门在执法理念、侧重点、标准方面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必将带来行政许可、行政执法和行政处罚的标准不同和风格冲突，一定程度上影响监管效果和干部职工的向心力、凝聚力。如果基层党组织不够规范统一，极易出现各自为战的情况，组织管理面

临挑战，工作效能大打折扣。

（二）新要求

一是要进一步加强政治建设，使党的领导不松劲、不虚化、不弱化、不脱节，确保机构改革的正确方向。党的领导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作用，首先取决于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和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同时也要通过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凝聚作用和政治核心作用来体现，最终通过党管干部来实现。基层党组织处于我们党治国理政的第一线，直接担负着组织领导的重大责任，特别是在机构改革中，更需要把确保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推进机构改革和经济发展，作为加强党组织规范化建设和改进自身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力戒“七个有之”、坚持“五个决不允许”，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严守改革的各项要求和底线。

二是要进一步加强组织建设，特别是通过撤、改、立，使基层党组织机构健全，实现队伍不散。机构改革，面临机构整合、职能融合、人员磨合等一系列过渡性问题，涉及范围广，影响层面深，操作难度大。房山区市场监管局从2019年3月挂牌成立，目前仅机关内设机构整合完成，综合执法体制、基层所改革还未到位，党组织整合必然滞后于行政机构整合。其间，党员教育、党组织关系转接、党费收缴等一系列原本有条不紊的正常工作都将面临冲击。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要求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必须切实加强党的组织建设，通过撤、改、立等手段，尽快健全完善党组织机构，才能使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得以发挥，才能切实推动机构改革从“整合”向“融合”转变，确保新机构高效、平稳运行，从根本上实现队伍不散。

三是要进一步加强思想建设，真正使党员干部在思想上认同改革，自觉融入改革，实现思想不乱。党的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是当前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的迫切任务，这其中就必然涉及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一场深化改革的冲锋号，党的十九大对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又做出重要部署，此次机构改革就是其中一部分。通过机构改革，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打下坚实基础。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处在机构改革的一线，广泛分布在党员和群众中间，各方面的任务更直接、更具体、更迫切。因此，推动机构改革，就必然要加强思想建设。不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机构改革难以从实质上推进。加强基层党组织思想建设，就是要使党员干部在思想上认同改革，自觉融入改革，切实实现思想不乱，在改革发展最前沿经受考验、化解风险，为全面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提供坚强思想保证。

四是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制度执行，为改革顺利推进和更好发挥自身职能提供坚强保障，实现工作不断。制度建设是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重大问题，抓制度的贯彻执行，注重运用制度法规的执行力 and 约束力来调节党内关系，指导党内生活，规范领导行为，保证党的事业顺利发展。机构改革涉及的人员、权力和权利关系的调整，在特定时间段甚至长期对一部分人、一部分机构、一部分职能、一部分工作产生影响。要控制波动、缩小影响、减轻阵痛，在机构改革中实现工作不断，确保履职尽责，就必然要加强党的制度建设，这就要求基层党组织健全完善制度，尽量减少制度建设的滞后性，同时狠抓制度执行，切实发挥制度的稳定性和长期性作用，使广大党员干部尊崇制度、遵守制度、捍卫制度，真正使制度成为硬约束、“压舱石”，确保机构改革行稳致远。

五是要进一步加强作风和文化建设，树立和强化新机构对自身职能发挥提出的新要求，打造一支干劲不减、忠诚干净担当的党员干部队伍。作风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是党性问题。加强作风建设要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首要任务，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落到实处。在机构改革中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目的是提高党员干部队伍的凝聚力

和战斗力，强化党员干部的担当意识、奉献精神和纪律观念，以更加严格的标准和昂扬的态度应对新机构提出的新要求，打造一支干劲不减、忠诚干净担当的党员干部队伍。作风建设也是文化建设。机构改革涉及人员融合、机构融合、职能融合，深层次的矛盾和冲突是文化融合问题。要促进文化融合，消除误解、隔阂，形成广泛的文化认同，就需要进一步加强文化建设，特别是要消除小圈子等圈子文化，努力减少亚文化或非正式群体等文化的负面影响，用文化促进共识，用文化凝聚人心，努力营造积极向上、履职尽责的文化氛围，为打造一支干劲不减、忠诚干净担当的党员干部队伍提供内在的不竭动力。

二、房山区市场监管局在机构改革进程中加强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房山区市场监管局深刻认识到强化党建引领，加强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对持续深化机构改革、巩固机构改革成果、彰显机构改革效力的重要作用，正确分析形势，积极应对挑战，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探索出一条机构改革进程中加强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之路。

（一）强化政治领导，确保改革方向

其一，提出基本遵循。房山区委领导到区市场监管局就机构改革调研时指出：一是要提高站位，坚定信心；二是要抓住契机，形成合力；三是要抓好队建，提质增效，提出“锻造一支业务精明、纪律严明、作风过硬的市场监管‘铁军’”的要求。这三条要求为推进这次机构改革，加强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确保整个改革始终在中央、市委和区委正确领导下推进，不打折扣、不搞变通、不走过场。

其二，明确组织领导。成立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充分发挥党组领导核心作用，以专班会议代替党组会议，下设工作班子，以党建工作组统领全局党建工作。研究制定《党建工作要点》，进一步明确了全局全面推进党的政治、思想、组织、制度、纪律作风、文化和群团建设等7个方面27项工作要点，使基层党建工作有章可循，有内容可落实，有标

准可检查，有依据可评价，让党建工作成为实实在在的政治工程。

其三，狠抓责任落实。制定《进一步深化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党组书记、班子成员的责任清单。重新修订《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书》，并结合各部门实际，制定个性化责任清单、时间表、路线图，层层签订责任书、逐级推动责任落实。

（二）强化组织建设，夯实基层基础

一是由选举组到党支部，基层党组织实现无缝衔接。随着机构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机关科室的整合，以党组成员联系分管和便于开展组织生活为原则，成立了32个选举组，明确选举组召集人，并要求选举组在新的党组织成立之前，按要求开展党组织生活，切实做到改革过渡期党建工作不断档。同时，按照程序要求，迅速启动机关党委、机关纪委组建工作，确保组织领导有力、安排部署周密、程序规范严谨、党内民主畅通、党员参与广泛。最终选举产生机关党委和机关纪委，并设立29个党支部。由32个选举组到29个党支部成立，标志着机构改革期间基层党组织实现了无缝衔接，有效避免了机构整合与党组织整合不同步带来的党、政空档期的问题，实现了机关党委对下辖党组织指导的全覆盖。

二是持续加强基层党支部班子建设。按照活动便于开展、党组织科学设置、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等原则，严格把握标准和程序，选优配强党组织书记、委员等党务干部。对新选举产生的基层党组织书记、委员，采取以会代训、专题培训、交流学习等多种形式，分层分类、全覆盖进行培训，切实提高党务工作者的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始终把提升支部书记党建履职能力作为党支部班子建设的基础工作来抓，先后组织召开党支部书记述职评议工作会、党支部书记座谈会、党建工作培训会等专题会议，就抓好支部党员思想政治工作，提升基层党组织建设水平，共同交流工作经验，探讨工作方法，研究工作难题，逐步提升支部班子“第一责任人”履职能力。

（三）强化学习教育，凝聚思想共识

一是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做表率。区市场监管局挂牌成立后，局党组以上率下，带头加强学习，提高政治水平和理论素养，为基层党组织学习教育做表率。及时研究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意见》和《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19年学习计划》，对学习内容、学习责任、学习制度等内容进行了进一步规范。坚持每月组织一次集中学习讨论，确保实现理论中心组“学习一次，就是强化一次理论武装、统一一次思想、强化一次导向”的目标。

二是经常性思想教育不断档。结合改革过渡期的工作实际，研究制定《关于发挥党建统领作用加强机构改革期间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充分运用支部集中学习、支部“主题党日”活动、支部专题研讨、党课等，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通过学习，促使党员干部进一步提升政治意识，将党的政治理论入脑入心、做到融会贯通，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精神及要义吃透弄懂，正确把握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原则，准确定位机构改革的重点工作任务，做到学以致用。健全完善逐级谈心谈话、意识形态自上而下的信息收集和自上而下的宣导等制度，准确了解和掌握党员干部的思想动态，注重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确保全体干部职工思想稳定。通过每月印发《学习指导》的方式，发挥党支部和部门的组织作用，及时将党的最新会议和文件精神、区委区政府的决策决议、党组的工作部署和制定的新规定新制度传达到每一个党员干部，切实统一思想、凝聚共识。

（四）强化制度建设，狠抓制度执行

一是不留隐患收好尾。市场监管局挂牌成立后，局党组迅速对原3个单位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落实市委第六巡视组反馈机关党建意见、全面

从严治党等工作进行了全面自查，对发现的问题逐一进行了整改；对改革过渡期间原3个单位37个党支部的《党支部工作手册》进行收集归档、检查规范，对党员E先锋系统使用情况和党统资料进行全面检查，查漏补缺；对党员发展、党费收缴等情况进行全面摸底，确保收尾迅速、存档规范、不留死角。

二是建章立制开好头。收集整理原3个单位各项组织生活制度，按照上级有关要求，结合改革形势和工作任务制定修改完善，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确保基层党组织制度建设有章可循，切实为改革进程中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三是严格执行提好速。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制度和中央、市委、区委及局党组关于党务工作的有关制度，狠抓各支部的“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谈心谈话、民主评议党员、个人有关事项请示报告等制度，定期检查、不定期抽查、发现问题及时提醒，并限期整改，推动制度落地，形成了按制度办事、以制度管人、用制度约束的工作格局，为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提速增效，以法治思维的养成和制度权威的树立为改革目标的实现保驾护航。

（五）强化纪律规矩，锤炼优良作风

一是健全组织“严管理”。成立局党的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工作领导小组，结合机构改革形势和工作任务需求，召开全面从严治党工作部署会，印发《纪检监察工作要点》，出台了一系列工作规则、纪律要求，将监督执纪问责职责细化为具体的操作措施，确保机构改革期间，组织坚强有力，各项工作有章可循，令行禁止。

二是警钟长鸣“促养成”。印发《廉政工作指导》十余期，在“五一”、端午、中秋、“十一”等关键节点进行廉政提醒，及时转发通报案例，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通过正反两方面的教育，倡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机构改革中自觉做到明规矩、守底线，抵制各种不良风气。

三是严格执纪“强督查”。为驰而不息纠正“四风”，落实好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特别是针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印发了《关于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工作的通知》，在节日假期、“两会”安保及安全生产整治等重要节点、重点工作中，采取“四不两直”方法，通过明察暗访、随机抽查、突击检查等方式，对各支部工作落实、廉洁自律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针对党风廉政建设重视程度不够、“一岗双责”履职不到位、信访投诉量居高不下等问题，对相关单位进行廉政提示，切实提高党风廉政建设水平。

（六）强化文化建设，激发担当作为

一是抓品牌建设，引领中心工作。结合“上一线、做贡献”实践活动，持续打造“双走访·织网行动”这一党建创新品牌，即走访服务和管理对象、走访社区（村）党组织、织牢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防控网。广泛征求他们对市场监管部门在作风建设和服务企业方面的意见建议，深入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和现实需求，共同探索基层党组织和在职党员有效服务社区的方法路径和党建创新模式，大力开展送法律、送服务、送政策活动，切实把区委的发展思路、惠民政策和本单位的便民举措送到群众中去，把群众关注的问题建议汇总上来，全力打造亲商、爱商、扶商的营商环境和爱民、便民、为民的服务环境。2018年，走访服务和管理对象391个，征集各类意见建议58条；走访社区党组织5个，开展讲座10场，发放各类宣传材料3000余份，惠及社区群众400余人；2019年计划走访服务和管理对象450余个，社区（村）党组织60余个，切实通过党建品牌的创建，引领、服务中心工作，助推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扎实开展。

二是抓关键节点，锤炼党性修养。局党组认真筹划部署挂牌成立后的第一个“七一”，组织召开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大会，重温入党誓词；为在职党员制作颁发政治生日贺卡；组织“共产党员献爱心”活动捐款；走访慰问新中国成立前老党员、困难党员；党组书记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争做新时代市场监管战线上的合格

共产党员”为题讲党课。“七一”期间，组织各选举组开展“大学习、大宣讲、大讨论”活动，以“三会一课”为载体，开展“三个一”活动，即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决策部署开展一次专题学习、以“加强机构改革进程中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为题进行一次专题研讨、支部书记讲一次专题党课。在全局党员干部中开展“我和我的祖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文艺作品征集活动，引导党员干部坚定信念跟党走，不忘初心干事业。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在“十一”前夕，举办“我和我的祖国”主题演讲比赛，展示区局挂牌以来的建设成果，展示房山市场监管人忠诚、干净、有担当的队伍风采，进一步坚定党性修养。

三是抓日常点滴，浓厚党建氛围。结合改革需要和党组织建设进度，利用微信公众号、执法交流微信群、OA办公系统信息发布平台等渠道，图景式实时展现执法干部一线执法打击假冒伪劣、开展专项整治、参加综合执法的工作场景，用身边人影响和教育身边人，发挥宣传工作的带动作用，为日常工作开展汇聚了丰富的正能量。同时，在局主办公区建设党建文化长廊，按照统一经费、统一标准、统一建设的原则，计划为新成立的基层所支部建设党建活动阵地，进一步提升办公区的党建氛围和文化环境，使干部在日常工作中多看多学，潜移默化中强化党员干部的个人修养和政治水平，进一步激发党员干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四是树榜样典型，汇聚正能量。“七一”期间，局党组评选表彰了46名优秀共产党员，激发党员干部和党组织创先争优、干事创业的活力，为市场监管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紧扣党建主题，传播最新理论，跟踪发展动态，指导工作实践，制发《党建工作专刊》40余期，营造党建持续发声、凝聚队伍合力的政治生态，其中制作“党建风采特刊”“榜样的力量特刊”，对机构改革过渡期表现突出的29个集体和个人先进事迹进行报道，在局内营造了学习先进、宣传先进的浓厚氛围，汇聚正能量，激发新作为。

三、机构改革进程中加强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的启示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宣传者、执行者、落实者。全面加强党的各项建设，是推进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最直接、最高效的举措，基层党组织既是深化改革的“排头兵”，也是保持稳定的“压舱石”。房山区市场监管局在机构改革中全面加强党的各项建设，着力提升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水平的实践，有效应对了改革过渡期中的各种挑战和阵痛，真正做到了思想不乱、工作不断、队伍不散、干劲不减，在锻造一支业务精明、纪律严明、作风过硬的市场监管“铁军”中初步实现了预期目标，使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顺利推进。从这些加强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的一系列务实、高效的举措中，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一）机构改革，党建先行

就改革后新组建的党组织而言，党建是滞后的，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就整个改革而言，党建不仅应该先行，更应常抓不懈。这其中关键点就是确保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落到实处。房山区市场监管局抓住了政治建设这个根本，以党章和党内法规制度为依据，认真落实中央、市委关于此次机构改革的各项任务，特别是以区委书记的三条要求为基本遵循，以党建工作组为领导机构，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为抓手，做到了组织领导到位，自觉强化“四个意识”，切实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他们把新时代党的建设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的要求，始终贯穿于整个改革的全过程，确保了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进行。

（二）党的建设，贯穿始终

审视房山区市场监管局在改革中抓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的做法，有四点至关重要：

一是抓住了组织建设这个关键。房山区市场监管局深知“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从选举组到党支部的无缝衔接，再到支部班子的能力建设，局党组紧紧抓住党组织这个关键，着力提升自身和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力和组织力，有效解决了机构整合与党组织整合不同步带来的党、政空档期问题和支部班子建设问题，为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搭建了严密的组织体系。他们的实践再次验证了党的力量来自组织这一论断。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组织体系的根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最终要靠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落到实处。他们正是在改革进程中充分发挥了党员干部在思想引领、作风引领、法规制度执行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发挥了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找准建好了推进机构改革的“发力点”和“承重墙”，使改革有了坚实的基层基础，使党的全面领导、全部工作通过党员和党的组织体系去扎实推动，有效推进。由此，健全党在基层的组织体系，切实推进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是改革能否顺利进行、各项工作能否落地的关键环节。

二是抓住了思想建设这个灵魂。思想建设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势。从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的以上率下，到经常性思想教育的丝丝入扣，房山区市场监管局在改革过渡期以学习教育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为机构改革中加强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他们抓思想建设的实践，不是空洞的理论说教，而是把学习教育融入改革，把政治建设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以一系列的党建活动，紧紧围绕改革目标开展，以学习教育推动党员干部和职工思想观念的转变，进而理解改革、支持改革、自觉推动改革，有效解决了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迷茫、焦虑、本领恐慌、动力不足等问题。这意味着，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思想建党始终是党的建设的灵魂。抓住了这个灵魂，解决了思想认识问题，不论是机构改革中的艰难险阻，还是建设现代化强国中的激流险滩，我们都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

三是抓住了制度建设这个刚性约束。从对改革前工作的检查归档收尾，到改革后的建章立制开头，再到严格执行提速，房山区市场监管局通过“三步走”加强制度建设，在较短的时间内搭建了较为完善的制

度框架和执行体系，为改革过渡期加强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形成长效机制提供了坚强的制度保证。他们的实践，让我们充分认识到，法治是最有效的治理，但前提是良法和善治。良法既为善治奠定基础 and 前提，也保证了权力的及时有效运行。加之以不间断的监督检查和纪律执行，有效防止了权力真空，正是发挥了制度的这一刚性约束作用，在此次改革中才管住了人、管住了事、管住了权力的怠于和滥于行使，使改革进程中没有出现一例违法违纪现象。

四是抓住了文化建设这个持久工程。文化即人化，即社会化，是经常性的事，也是习惯的养成。房山区市场监管局抓日常点滴，潜移默化创氛围；抓重要时刻，轰轰烈烈领思潮；抓榜样典型，源源不断聚能量，从三个维度整合重塑文化体系，树立文化价值导向，以强有力的文化建设推动改革中的人合、事合、心合、力合。文化建设好比一支队伍的血液，潜移默化、继往开来。在机构改革中，文化融合是最需要时间和精力去推进的融合，是最不易考量和评价的一项指标，抓好了，是最能从根本上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工作。因此，机构改革中，文化建设重在“常”字，将文化建设常态化，充分发挥其凝聚、导向、约束、激励、提质的作用，确保改革中队伍的和谐统一，以文化建设凝聚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的磅礴力量。

（三）党建工作的创新创造，必须与行政、业务工作深度融合

机构改革本身是根据社会发展需求，预设目标、明确要求、按照程序进行的自我革新与创新创造过程。房山区市场监管局推进机构改革的实践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也是遇到问题、研究问题、创新创造解决问题的过程。他们采取专班会、工作组、选举组、召集人、学习指导、廉政指导、党建专刊、政治生日、党建品牌等一系列新方式、新手段，推进了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和单位各项建设的全面发展。从中可以看到，他们推进党建工作的创新创造是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不是因循守旧，不是换汤不换药，更不是异想天开或者闭门造车，而是始终围绕改

革目标，统一了思想，整合了人员、机构、资源，融合了文化，提高了实际工作的质量和效能。因此，党建工作的创新创造，不能单纯为了创新而创新，必须与行政业务工作深度融合，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原来分离或者将来可以分离，而是在开展工作进程中，不同的组织机构应有所侧重、有所分工，但是最终目标只能有一个。换言之，如果说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是以创新创造的方式方法建设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的话，那么这支队伍建设的成效如何，其最有效的输出形式就是业务工作的高质量开展，这既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也是机关职能更有效的实现。因此，新时代党建工作与机关职能的有机统一、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的深度融合，不仅是机构改革中应该着力研究的内容，在非改革机构的党建工作中也是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房山区市场监管局打造的“双走访·织网行动”就是将二者融合的具体表现。离开了党建工作这个“里”，党的执政将成为空话；离开了机关职能和业务工作这个“表”，党的建设将被虚化，甚至成为纯粹的形式主义，这是房山区市场监管局改革进程中得出的一条重要启示。

课题负责人：姜青海

课题组成员：侯佳慧 臧伟

张雪 安娇娇

依托门头沟区红色文化资源，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

中共北京市门头沟区委党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也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对于新时代弘扬红色文化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路径提供了纲领性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魂”。红色文化是人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的精神动力，是人们奋发有为、励精图治、精忠报国的时代召唤，更是人们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价值诉求。将红色文化资源这一有效育人载体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的范畴，是我们的必然选择。门头沟区具有独具特色的“六大文化”，其中一项就是红色历史文化，可以说红色文化是我区最大的特质。充分利用我区的红色文化资源，进行红色文化教育，对于推进我区群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

一、红色文化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意蕴

（一）红色文化资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密切联系

1. 红色文化资源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内容方面存在相通性

红色文化资源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的物质和精神资

源，包括思想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精神资源以及它们的物化形态。^① 简言之，红色文化资源是指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和形成的，可以为我们开发利用，经过转化能够彰显当代价值的革命精神及其载体的总和。红色文化资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内容方面存在相通性。红色文化资源所包含的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爱国爱民、坚定理想信念、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等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公民层面所包含的内容具有很强的相通性。所以，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也是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和教育的重要过程。

2. 红色文化资源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价值导向方面存在互促性

红色文化资源本身具有意识形态价值。无论是革命先辈的感人事迹，还是重现历史事迹的红色文化遗址、诗集、歌谣，抑或是展览实物、模型等，都反映了先进的共产党人在带领中国人民走向胜利的坚韧不拔、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反映了革命先辈积极乐观、艰苦奋斗的精神面貌，也表现出了先辈们对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的无限向往和憧憬。红色文化资源本身所体现出的价值导向和追求，是与当代中国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追求基本契合的，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和践行，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红色文化资源在新时代价值的实现。

3. 红色文化资源是弘扬和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

红色文化资源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部分，具有强大的精神支撑价值和精神动力，是弘扬和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红色文化资源充实了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丰富了宣传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式。革命理论和红色精神的教育内容，是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素材；充足的红色文化资源如博物馆、纪念馆、革命遗址、红色体验基地等丰富了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途

^① 舒毅彪：《以红色资源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版，第2页。

径；创新型的红色文化资源教育形式如重走革命小路、观看演出、举办红歌会、红色故事宣讲等活动，改变了以往完全依靠理论灌输式的教育方式，创新了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式，提高了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有效性。

4. 红色文化资源在弘扬和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红色文化资源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精神激励、思想教育、文化传承、榜样示范、心理优化等方面，同时红色文化资源具有分布广、易开发、感染力强、教育意义大的基本特色。^①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作用和基本特色决定了红色文化资源在弘扬和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其中，一些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力比较大的红色文化资源，如井冈山、长征、延安、西柏坡、红旗渠、雷锋精神等，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深远的思想教育意义，在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作用显著。一些地方性的红色文化资源虽处于开发、宣传、利用中，对于地方党员干部、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作用也已经凸显。

（二）红色文化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要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价值观层面的集中体现，其价值引领作用的发挥，必须经历从认知到认同乃至身体力行的完整过程。^②但随着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与变化，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背景下，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过程中也呈现出一些困境和挑战。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困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困境源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解读存在不同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3个层面，24字，内容全面丰富，在解读的过程中存在标准不统一，表达不深刻的现象，带来的是广大民众

^① 舒毅彪：《以红色资源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版，第8—13页。

^② 颜旭、刘彦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的挑战与思路》，《大连干部学刊》，2013年第3期。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的困惑，出现了“不知道”“不践行”的情况。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困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描绘的理想蓝图与当下中国社会现实存在一些不一致现象：如现实中道德失范、诚信缺失、贫富差距拉大、部分党员干部贪污腐败成性、不公平不民主现象存在等。主导价值观与多元价值思潮的博弈，缩小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覆盖面。公众人物正面定位与负面言行的矛盾，损耗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能量。宣传路径的政治化取向与社会化诉求的冲突，造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被屏蔽”。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困境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既是从事精神生产的过程，更是社会实践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和各种物质生产以及物质利益发生联系，这就催生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主体面对利益诱惑时的价值抉择。主体的困惑源于客体的复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主体面对的是复杂的现实社会：外有西方世界的强势文化渗透，内有社会各阶层思想动态的发散性变异，甚至威胁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如何在国内外复杂形势的共同挤压下实现全社会的价值共识，如何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深入人心的主流价值，成为摆在主体面前的时代拷问，成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困境。

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弘扬红色文化二者统一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实践活动中，二者具有过程上的同一性。红色文化成为文化自信的主体之一，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文化来源，是突破核心价值观培育和实践中的困境的重要方面。通过红色文化资源鲜明、真实、形象的表达，可以突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困境，对于认同困境和实践困境的突破也有重要的促进、示范作用。

（三）红色文化资源塑造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意义

1. 红色文化资源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资源

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的核心资源。红色文化资源具有意识形态属性，而且有利于寓教于实践体验，营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良好氛围。由于受众的普遍性与基础性，再加前面提到的存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方面的困境，因此，对于群众而言，准确并且深刻领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存在着一定困难。而把红色文化资源作为一种黏合的介质，通过切身体验、主动参与感知等方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神具体化，可以营造全面教育的良好氛围，从而有利于产生塑造群众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效果。

有利于潜移默化，深化认知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红色文化资源不仅从内容上讲生动形象，具有吸引力，更容易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体系、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精神，能够更加有利于深化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性认知；而且在形式上又多样具体，具有感召力，群众深入其中、情景再现、感同身受，产生共鸣。因此，红色文化有利于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同。

有利于价值引领，指引人们践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核心价值观才能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红色文化不仅能浸透内心，修身养性，还能指导行动，传播发扬，使群众真正身体力行、知行合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首先，红色文化资源能引导基层群众在日常生活中规范自身行为，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的践行者；其次，群众身体力行的同时也是在传播发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神，是其有力的传播者；最后，红色文化作为一种精神所在，具有传承作用，引导群众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其成为忠实的倡导者。

2. 红色文化资源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塑

红色文化资源需要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实现历史形态向现实形态的转变。红色文化资源主要是指在革命、战争、建设时期形成的革命遗址、纪念场所、物品、文献，以及承载革命历史、精神的载体等。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内国际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红色文化必须经过

科学转化，实现历史价值向现实价值的转变，才能让其真正发挥作用。而通过当代中国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要义对红色文化进行更新解释，使红色文化更能立足当代中国实际，更能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更符合当代人民群众思想道德建设的需求，那么红色文化资源就能发挥更大的时代价值。

红色文化资源需要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实现理论形态向实践形态的转变。红色基因的传承，说到底，必须落到实处，也就是要熔铸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必须把革命历史和理论转化为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要求，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提供持续的价值引导和精神激励，引导人们向上向善、敬老爱幼、爱岗敬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把理论和价值追求变成普通人民的切切实实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

二、门头沟区红色文化资源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经验和问题

（一）门头沟区红色文化资源概述

门头沟区地处北京西部山区，是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和优良传统的革命老区，有着较为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门头沟区红色文化资源是在京西地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创造和形成的，是对当今时代具有重要价值意义的精神及其载体的总和。门头沟区红色文化资源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态：

1. 历史标识、战斗遗址、纪念场所、文献（物）

（1）历史标识。门头沟区是北京最早传播马列主义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活动的地区之一，从抗日战争开始，成为平西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地带。拥有不容忽略的9个红色第一：

第一，北京地区第一支八路军主力部队（八路军第六支队即邓华支队）诞生在今天的门头沟区；第二，北京地区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相当于省军级指挥机构（冀热察挺进军）诞生在门头沟区，并在相

当一段时间驻扎在门头沟地区；第三，抗战时期驻扎北京地区第一个中共省级机关（中共冀热察区党委）驻地在门头沟区；第四，抗战时期北京地区第一份中共省一级机关报《挺进报》诞生在门头沟区，并在相当一段时间在平西出版发行；第五，抗战时期北京地区第一支八路军纵队级别大部队（八路军第四纵队）诞生在门头沟区；第六，抗战时期北京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宛平县抗日政府诞生在门头沟区；第七，抗战时期北京地区由中共所创建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平西地区核心区域）在门头沟地区；这里有村政权、区政权、县政权和地委、专署等政权组织和抗日民众群体；第八，抗战时期北京地区成立八路军主力团最多的地区是门头沟地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六团、第七团、第九团、第十团、第十二团都是在斋堂川组成的；第九，抗战时期北京地区第一个子弟兵团——八路军昌宛子弟兵团是以门头沟区青年为主组建的部队，同样诞生在门头沟区。

（2）战斗遗址。作为党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之抗日战术在冀热察地区的战术实验核心地带，门头沟斋堂、清水、雁翅地带的山地拥有大片战场遗址，包括百花山、斋堂川、小龙门、军响、雁翅等诸多伏击、阻击游击战场遗址。

（3）纪念场所。今天，包括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马栏旧址、冀热察军政委员会塔河旧址、八路军宋邓支队司令部旧址、冀热察区党委大三里旧址、挺进军司令部塔河旧址、田庄高小党支部旧址、宛平县八年抗战为国牺牲烈士纪念碑、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纪念馆、王家山惨案遗址等成为华北地区红色教育、红色旅游的重点基地。其中有两个被列为市级革命教育基地，一个区级革命教育基地。有5处开发建立了纪念馆或纪念碑。革命遗址遗迹数量之多，在北京市是处于前列的。在这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所还保存着大量的革命文献文物。这些革命遗址、纪念场所、文献（物）等都是门头沟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的见证。

2. 革命人物和文艺作品

漫长的革命战争岁月里，门头沟地区涌现了许许多多革命英雄人

物，锻炼了一大批英才。其中包括第一位门头沟籍中共党员崔显芳、勇猛杀敌连战连捷“小白龙”白乙化、门头沟区党的创建人之一魏国元、妙峰山平西情报站首任站长梁波、门头沟区著名抗日民主人士李文斌、屡建战功使敌闻名丧胆的大队长刘玉昆、烈火见真金的刘恭烈士、战地作家唐月樵、永不屈服的王家山人等，还有许许多多无名英雄。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抗日战争时期，门头沟区就有3946名优秀青年参加了人民子弟兵，1476名优秀分子离开家乡参加抗日工作，829名子弟兵和干部群众牺牲在抗日战场，850名子弟兵在战场负伤致残，形成了门头沟老区人民不屈不挠反压迫、求解放的生动革命历史实践，集中体现了无数革命先辈、先烈对党忠诚、敢于战斗、敢于牺牲、甘于奉献的革命精神。

红色文化资源还包括我们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所创造的红色文学艺术作品、红色书籍等。其中有代表性的书籍、红色歌曲、珍贵影音等已被收藏和整理。包括：《挺进军歌》、《王家山小调》、萧克在百花山硝烟转战中创作的军事小说《浴血罗霄》、战地作家丁玲参照门头沟锄奸团长赵永成的事迹创作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挺进剧社《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灵感渊源等。

3. 门头沟区红色精神

红色精神是革命遗址、纪念场所、文献（物）、革命人物和文艺作品等所体现出来的革命理论、革命事迹、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等。革命遗址、文物、文艺作品等是红色精神的载体，是红色文化的“身”，红色精神则是红色文化的“灵魂”与核心。正是红色精神的存在，才使得那些革命遗址遗物有了鲜活的生命和特殊的意义，才使得红色艺术作品有了鼓舞人心的巨大力量。

门头沟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奋斗，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壮丽的篇章，创造了不朽的业绩，铸就了门头沟红色精神。门头沟区红色文化精神内涵极其丰富，概括起来主要包括永远忠于党，忠于革命的精神；爱国爱民、坚定信念的精神；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精神；勇于开拓、敢为人先的精神；万众一心、不畏强暴、英勇顽

强、百折不挠、行动果敢的革命传统等。

（二）门头沟区红色文化资源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经验

门头沟区一直注重打造“红色门头沟”党建品牌，致力于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当中。作为典型的革命老区，门头沟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红色文化资源得到了不断开发与利用，红色旅游、红色故事、红色精神得以渗透到党建、经济、教育等各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借助红色文化资源得到了很好的塑造。

1. 门头沟区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近些年来，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先后对区域内的红色遗址、纪念馆进行了修缮和保护，修复和保存了一批重要的红色文物，纪念场馆对外开放，群众可以免费参观，也对场馆增添了现代化的技术等。相关部门、单位集中力量挖掘区内红色历史，编辑、整理、印刷、出版了一批文献资料、著作及特色干部培训教材。在区博物馆、档案馆等进行红色文化专题展览。整理了门头沟区红色革命歌曲，拍摄有了一些影片、视频介绍短片、话剧等。区委组织部和区委党校依托区域内的红色文化资源，多次聘请专家、学者来区考察调研，开发了一批具有特色的红色党性教育课程，如《车载教学：京西革命史》《体验教学：寻根马栏》《研讨教学：妙峰山上的信仰之问》和专题教学课程《“评说”京西风云》《在回溯平西抗战史中感悟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等，在各类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班次上取得良好效果，并将课程从区内向外推广宣传，吸引中央、市级单位党组织的参观学习，均获好评。

2. 注重红色精神与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

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仅在于挖掘红色文化本身，更要赋予其时代价值，让红色革命精神与新时代精神相契合才能更好地展现出红色文化的魅力。门头沟区始终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与当代人的价值追求相结合，将红色文化资源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让门头沟区的红色文化资源在新时代得到新的诠释和传承。门头沟区注重在红色文化资源的细节上赋予其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与理念，在回顾历史讲好红色故事的同时也面向当下与未来，激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与感悟，门头沟区这一做法很好地实现了依托红色文化资源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的。

3. 注重红色文化资源对群众潜移默化的正向引导

红色文化资源不仅能够释放出强大的精神动力，也能够绽放出强大的新时代光芒。这两种力量都能够带给群众精神上的洗礼与教育。门头沟区的红色文化资源包括了书籍、展览、红色足迹、历史人物、烈士纪念碑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能够带给广大群众极大的震撼。门头沟区充分利用这一点，在加强红色文化资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的过程中，也更加注重红色文化对群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上潜移默化的正向引导。因此门头沟区在红色文化资源所在地注入了很多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也通过重走革命路、交流学习体会等多种方式让群众在听红色故事的同时能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得到启发。调研过程中很多群众也表示“之前从未了解过门头沟的红色文化与红色历史，在接受过红色文化的洗礼之后，对当下的生活有了全新的认识与感悟，自己也有了动力与干劲”。

（三）门头沟区红色文化资源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的问题

1. 依托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教育的育人理念有待加强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过程不能是灌输式的，而是主动汲取式的。因此要发挥红色文化资源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作用，育人理念必须与时俱进。然而，目前教育理念存在着不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中存在应付性、功利性思想，忽视受众的主动性，采取“短平快”运动式的方法，流于形式，未能符合受众群体的兴趣，受众主体地位被忽略；缺乏理念倡导与生活实践相结

合的观念，受传统教育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只重视理论灌输，忽视实践教育的开发，教育与生活化脱节；缺乏分众规划和精准教育的理念，存在教育过程中“一刀切”的现象。

2. 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充分

全区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缺乏总体规划，许多红色文化旧址未开发或开发不到位，缺乏系统梳理、统计、分级、建档，对于各个红色文化资源点缺乏科学定位、宏观设计和长远规划。因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的载体内容不系统。

区域党史、军史、理论等基础性研究比较滞后。门头沟区红色文化资源的基础性研究工作薄弱，在学术期刊的相关刊载文章数量较少，权威性高、学术性强的专著极少。研究工作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存在“窄”“粗”“浅”的问题。基础性研究薄弱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束缚了相关展馆的更新、红色课程的开发和教育活动的开展等。

红色文化品牌意识不突出，宣传不到位。门头沟区红色文化资源丰富但在品牌打造和宣传方面存在很大进步空间，宣传力度小，手段单一。造成一方面门头沟区群众对本区红色文化知之甚少，另一方面其他地区人们对门头沟的红色历史和文化认知度相对较低。导致个体主动参观学习的人数较少。没有建立起门头沟区特色红色品牌，红色文化资源点的自我更新速度较慢，发展后劲不足，创新性不强，影响其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

红色文化资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衔接口有待开发。对于红色文化资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之间的联系也需要进一步开发，塑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够深刻，往往导致群众看得到红色足迹、听得到红色故事，却感受不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升华。

3. 红色文化资源的内容形式缺乏创新

在调研走访过程中，多位专家一致表示门头沟区的红色文化资源存在“呈现内容表层化、传播方式传统化”的问题。在内容方面，红色文化资源教育过程中存在着内容单一、陈旧、形式主义、与现实脱节的现象，缺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内容，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塑造作用减弱。

在呈现方式上，门头沟区现有的呈现方式多局限于课堂授课、观看红色影片和参观红色基地等。有群众表示：“今年中秋和去年清明来参观的流程与内容基本是一样的，感觉形式不新颖，加上路程也很远，以后不想再来了。”在传播方式上，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又多局限于实地、报刊，忽略了互联网、自媒体的运用，从而导致门头沟区的红色文化辐射范围较小、影响力相对较弱。因此，挖掘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必须要创新红色资源内容和教育的方式、方法。

4. 红色文化资源的管理保障不到位

门头沟区红色资源分布较广、数量较多，近些年来，随着区政府的重视和经济发展需求，红色资源虽然得到更多的开发，但也出现管理无序的问题。

首先，在管理机制上，对红色资源的管理缺少制度的有效支撑，权责不清、多头管理现象普遍，红色文化资源的管理与保护开发利用亟待从法律法规层面得到加强；其次，一些管理者对红色资源缺乏大局意识，红色文化资源本身呈现出较为离散的星星点点状，不成体系，缺乏严谨的统筹策划，从中塑造出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较为离散难成体系；再次，在红色文化的利用开发过程中，相关的组织管理者缺乏调查活动和资源勘测，红色文化资源数据库亟待建立，红色文化资源需要存起来、用起来、活起来，才能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最后，门头沟区本身有着 98.5% 的山区，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其他区而言较为落后，而门头沟区的红色文化资源又多集中于深山区，使得红色基地交通、餐饮、住宿等问题一一暴露。

究其原因，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问题其实就是资金问题和基础设施与队伍建设的保障问题。例如马栏村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旧址陈列馆的建设最初主要依靠村民集资来开发，而开发、保护红色文化资源方面资金的缺乏，则造成了红色教育基地总体配套设施不健全，队伍建设也得不到充分保障。队伍建设得不到充分保障，直接降低了工作人员的

积极性，工作人员不足或积极性不高，又会使基础设施得不到改善，较差的基础设施必然带给群众较差的体验感，而游客量减少则又直接影响红色基地收入，如此恶性循环，红色文化资源价值就得不到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也难以顺利进行。

三、门头沟区红色文化资源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探索

（一）更新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理念，提升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专业性

1. 调动受众群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动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应避免宏大叙事般的存在，在教育者和受众群体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开展教育活动。应从受众群体的角度出发，选择其感兴趣的主题、形式及内容，充分尊重其在此过程中的主动性。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红色文化教育内容形式都应贴近受教育群体的兴趣，并积极调动其主动性、积极性，启发内心的思考与感悟，避免走马观花、随大流的现象。

2. 理念倡导和生活践行相结合

红色文化教育不应脱离社会现实特别是社会生活和受众群体的需求而干巴巴地讲理论，以免让群众感觉自己是理论以外的，内心产生距离感和陌生感。应该注重教育内容的时代化、生活化，突出人文关切，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群众个人的生活、成长结合起来，使红色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嵌入日常生活，尤其是情感认同、行为认同中。注重以满足受众需求为导向，采取重复性教育、规范性教育、经验性教育、情境性教育、实用性教育相结合的方法。

3. 分众规划与精准教育相结合

分众化即教育要分群体、分情况进行，不能“一刀切”。根据我区实际，主要群体可分为党员干部、青少年、社区群众等。针对不同群体，教育内容和形式应有所区别，根据群体年龄特点、生活背景、现实

需求对内容和形式进行调整。精准化要求在分众规划基础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有针对性，要精细化。关键是提高质量，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使群体产生共鸣。

（二）强化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提升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性

在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区文委、组织部、宣传部、档案史志局、政策研究室、党校等相关单位要加强交流合作，形成合力，系统调查梳理全区红色文化资源点并分级建档、修缮保护、开发利用。这项工作必将是复杂而又细致的。首先要建立详细的实施方案，成立搜集机构，组织人员相互配合、分组行动、各司其职，对红色革命遗址、建筑、场所进行摸查清点，获取相对准确、具体的信息；利用走访、采访的方式，收集老革命、老战士所了解的、熟悉的红色历史故事，征集遗物、故事、事迹、影像、图片等。

依托党史、军史、党建专家力量，进行理论的、历史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党史、军史工作旨在客观、真实、准确、科学地记载、反映、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历史，以期用党的历史激励人，用党的传统教育人，用党的经验启迪人。门头沟区相关部门要依托首都高校、科研院所、学术人才的聚集优势，以科研项目、课题团队、编写组等形式，深入挖掘地区一手史料，访谈历史亲历者和革命后代，系统梳理地区红色历史，深刻阐释地区红色精神及其所包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为地区红色文化资源注入深厚内涵，也为系统规划、保护、开发工作奠定学术和理论基础。

挖掘和创立红色文化品牌，通过精品品牌更好地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紧紧依托我区区域优势和红色文化资源特色，树立精品意识，培育红色文化精品，打造集参与性、互动性、体验性于一体的红色文化教育精品。以红色文学创作、徒步活动、摄影活动等形式，传播红色精神；以走革命小道、历革命艰险、祭革命先辈、访革命老人等形式丰富红色党建活动。同时，要利用传统媒体、新媒体加强宣传推介工

作，以纪录片、影片、小视频、专题报道等形式，强化自媒体网络宣传，增强宣传力度，提高我区红色资源的认知度。

积极开发红色文化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衔接点。红色文化资源教育中需要深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社会、个人不同层面上的内在一致性，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贯穿其中，升华精神内涵。

（三）丰富红色文化资源内容形式，增强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创新性

1. 内容创新性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高度重视红色基因的传承，而且格外关注红色文化的创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不但需要继续加大对于红色文化保护和传承的力度，而且应该主动契合时代发展的需求，大力促进红色文化的创新性发展。门头沟区经过长期沉淀的红色文化内涵非常丰富，但由于各种原因红色文化资源没有发挥更好的功能，因此我们要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的归纳、提炼与综合，紧密结合群众的思想实际，努力实现红色文化资源与时代特征有机统一，建立融物质与精神于一体的红色文化教育内容体系。

教育内容方面，要体现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耦合性的内容。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门头沟区红色文化见证自我党成立以来 90 多年的光辉历程，是一部自强不息的奋斗史。通过红色文化教育广大群众见证历史、触景生情、启迪思想，还可培育群众追求民主富强的意识，提高建设和谐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红色文化资源传承红色精神，红色精神见证中国人民追求自由、平等、公正和法治的奋斗历程，开展红色文化教育有利于培育社会大众的自由意识、平等权利、公平公正意识和法治思维。个人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红色文化诠释着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无一不反映着革命前辈的爱国意识，各行业职业的不同红色遗址又昭示着革命年代的敬业精神。无数红色故事也传递着诚信和友善

的传统美德。

2. 形式多样性

以实践活动、现场教学为主要形式。实践活动源自历史事实，在红色文化教育过程中对受众有着强烈震撼力和即视感。要进一步在革命旧址遗址、纪念馆等地设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社会实践教育基地、党员教育基地等，面向全区人民开放。场馆基地在场馆的设计、布置方面，可以借助现代科技手段，用生动活泼的形式，如影视动漫、三维虚拟成像、现场模拟参与等形式，展示革命历史和革命精神，避免千篇一律、简单说教、内容枯燥的陈列给群众带来的拒斥感。实践活动中，多设置体验环节，如重走革命小道，身穿军队服装、吃军队饭，忆苦思甜。多设置行动类环节，探索发现、竞赛方式等。重视研讨的重要性，要引导受众进行相关内容的研讨，从而促进思考和体悟。教师总结提升要做好，总结提升是实践活动精神升华的重要部分，规范受众的思想意识，必须非常重视。

挖掘“沉浸式体验”教育的多面维度。结合我区情况，如何全面体验挺进军生活，体验衣食住行、战斗工作，探索如下：穿一套挺进军服——穿挺进军服、戴挺进军帽、站挺进军姿，言行举止等处处以一名合格的挺进军战士为榜样来管理、约束学员；走一段挺进军路——沿当年挺进军百花山游击路线，负重拉练，边走边学习当年挺进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负重即可模拟行军部队的木枪背包，又可模拟清水运粮队的隔山运粮；吃一顿挺进军饭——吃一顿自己亲手做的八路军餐，小米豆角饭、贴饼子，从味觉上追寻小米加步枪的艰苦岁月，体会贫瘠的山区军民生活意志；唱一首挺进军歌——平西抗日根据地诞生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样脍炙人口的红色歌谣的灵感，应在学唱过程中体会军民同心的革命情操，用歌声鼓舞斗志；读一份挺进军报——以重现当年《挺进报社》期刊的形式，把红色系列教学知识点以挺进军报的仿古格式发给学员，让学员手握具象化的红色知识点；演一出挺进军剧——模仿当年“挺进剧社”的抗日话剧排演形式，学员根据掌握的知识点和排演指导，设计歌舞、旁白、对话，排演简易的抗战宣传小

话剧；访一位挺进军人——与还健在的老挺进军人或其后代，进行访谈，倾听他们讲述老一辈当年的战斗情形、革命事迹；说一段挺进军语——探寻挺进军所处斋堂川的人文内涵，学说斋堂川方言，重拾语言文化的精髓，也促使新一代党员干部深入老区群众，消除沟通障碍，融入基层；传一份挺进军秘——在妙峰山重走情报小道环节设计定向越野解密科目，学员按组别传递、解密情报密码，深入体会隐蔽战线的工作精神；打一场挺进军战——引入“真人激光野战”的适当项目，把学员真正带入战斗氛围，在军事教官的指导下，比拼团队在山地游击战中的投弹、射击、阵型排演成绩，体验战争的残酷，培养战斗精神。

开辟其他生活化教育形式。开发我区红色文化相关影片、话剧，向群众免费播放；开发多种多样的活动，如特色展览、文艺演出、知识竞赛、故事会等，使人们有兴趣参与进来，实现教育效果。尤其重视网络平台、自媒体的作用，广泛构建红色文化网络平台，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促进红色文化传播，让其成为群众获取红色信息、学习红色文化、交流红色思想的主阵地。

（四）完善红色文化资源管理保障，增强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长效性

利用红色文化资源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对于红色文化资源的管理和保障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解决管理失序、保障不足的问题十分迫切。

管理有序，制度先行。加强相关制度建设是重要前提，其中包括：领导制度，构建相关顶层设计机制、协同推进机制，对红色文化资源合理的统筹规划，力争建立全面合理的资源库；保障制度，确保经费保障，对于我区红色文化教育交通、餐饮、住宿等基础设施保障问题尽量给予解决。进一步完善反馈评估制度等。

注重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一批能力较强的研究、管理、教学、讲解人员队伍；调动企业、社会组织等力量，探索开发运营新模式。全区合

依托门头沟区红色文化资源，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

力做好管理保障的工作有利于红色文化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长效性。

课题负责人：安 晴

课题组成员：张连妹 王华玉

申志清 张 董